

海洋战略译丛

RED STAR 红星照耀太平洋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吉原恒淑
詹姆斯·霍姆斯 著

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译

张洁 钟飞腾 校译

中文
CHINESE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红星照耀太平洋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吉原恒淑
詹姆斯·霍姆斯
著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译

张洁 钟飞腾
校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 (美) 吉原恒淑，
(美) 霍姆斯著；钟飞腾，李志斐，黄杨海译.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4. 6

(海洋战略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4385 - 0

I. ①红… II. ①吉… ②霍… ③钟… ④李… ⑤黄…
III. ①发展战略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70 号

海洋战略译丛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著 者 / 吉原恒淑 詹姆斯·霍姆斯

译 者 / 钟飞腾 李志斐 黄杨海

校 译 / 张 洁 钟飞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许秀江

责任校对 / 刘宇轩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恽 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10.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385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1 - 708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2010 by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年版译出

《海洋战略译丛》 总序

张蕴岭*

地球的 70% 被海洋覆盖，海洋对于人类之意义无需赘述。海洋不像陆地那样被山川河流分割，被国界隔离，它是一个互通的整体，应该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资产和共同享有的资源。

尽管海洋早被人类加以利用（比如捕鱼，取盐），但是它的巨大价值真正被认识还是始于现代工业文明。无垠的海洋是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彼岸到底是什么。现代工业则提供了用于制造大型船舶的技术和材料，这使得人能够在海上进行远航，而正是全球远航才让人发现了新大陆。于是，海洋也就成为沟通世界的最便利的大通道。有了这样的大通道，意味着谁掌握了制造大船的技术，拥有从事远洋航行的能力，谁就可以具备开发和利用海洋致富的手段。于是，海洋提供的便利，很快被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大加利用，成为他们掠夺财富、抢占地盘、扩展殖民，甚至称霸世界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19 世纪末，美国军事家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

* 序言作者为第 10、11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权论，认为海上综合实力决定国家兴衰，要使国家强大，必要拥有海上霸权。马汉的理论被认为是经典，至今仍有影响。鉴于此，围绕海权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海洋成为了角逐的战场，海洋被强势霸占或瓜分。

不过，事实也表明，要获得，特别是能维持在海洋上的霸权并非易事。历史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的帝国舰队，都曾称霸一时，最终也都成为过去时。如今，只有美国还维持着二战以后确立的海洋霸权地位，几大舰队仍能在海洋上耀武扬威。不过，维持这样的海洋霸权美国已显底气不足，政府的财政赤字飙升，美元信誉下降，削减赤字的压力增大，军费预算不得不大幅度缩减，总有一天，也会发现其霸权难以为继。

海洋的价值新近被发现和利用是其拥有的丰富资源——油、气、矿产和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许多沿海国家因发现大型海上油气田而财富剧增，尤其是当陆地可用资源几近枯竭时，海底蕴藏的矿产资源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于是，围绕海上资源占有、开发和利用的争斗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甚至成为引发冲突的火种。

其实，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还有海洋的另一面，即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这是人类活动，尤其是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后果。海洋成了最方便的污水排放处，大量有毒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向海洋，使很多海域成为没有海洋生物的“死水”，蓝色的海洋变红（红潮），还有大量的废物集聚成一个个“垃圾岛”在海洋上漂流……

海洋呼唤维护，海洋呼唤管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第一个这样的法规，已有70多个国家签字，被认为是创建海洋新秩序的开始。这个公约的本意是化解有关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矛盾，

通过分责管理优化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然而，出于复杂的历史、地缘和现实原因，它反而成为加剧相关国家发生冲突的因素，比如，专属经济区给定沿海国家 200 ~ 300 海里的管理海域，但由于专属经济区的界定原则模糊、范围重叠、权利和义务不够明晰，无论是在划定上，还是在管理上，都引发了新的矛盾，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存在划界冲突的情况下，自行圈定范围，进行管辖，从而引起矛盾和冲突，有的海洋大国，像美国，甚至不签署公约，也即不承认它的法律效力，我行我素，……

人类因争夺陆地（包括划定国界、扩充领土）发生了无数次战争，生灵涂炭，为争夺霸权和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人类的悲哀。如今，对海洋的争夺和破坏似有加剧之势，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中国是一个基陆接海的大国，既有广袤的陆地，也有很长的海岸线，沿海居民靠海吃海，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据考证，早在隋唐时代，中国人就开始扬帆出海，与邻国开展海上贸易。元朝时期，中国已经与上百个国家通商，许多都通过海上的通道进行。特别是明朝时期，郑和指挥船队七下西洋，船队之大，航程之远，无与伦比，远早于麦哲伦、哥伦布的远航探险之行。不过，与那些以探宝、抢财、殖民的欧洲航海家不同，郑和的船队出航是为了互通有无、弘扬国威，因此，在沿海受到来自海上倭寇的骚扰之后，明朝竟以禁海加以应对，这说明了以大陆为根基、基于大陆文化战略思维的中国，并没有把海洋作为强国富民的主要资源来看待。

相反，海洋留给中国的多是恐惧。据解，“海”这个字本身的构成就含有“可怕”之意，是“水”与“晦”的合体。尽管这可能是一家之言，为咬文嚼字的意解，但是，仅从近代的历史来看，海洋为中国带来的灾祸都是历历在目的。1840 年的鸦片

战争，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海洋进犯中国，从北到南，沿着海岸线，一路打杀，撬开了中国的一个个关守，迫使清政府签订开放口岸的条约，让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各种特权和治外法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大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中国从此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如今，尽管中国的实力大增，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东海、南海的安全威胁仍然居于高位，中国感到的战略压制也主要来自海上。

不过，现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还是有了重大的转变。其一，中国的现代化经济起步于沿海地区。国家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提升，进口大幅度增加，海上航线成为中国连接世界市场的主要渠道，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海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不断提升海运能力，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都必然成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其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传统的“地大物博”架构发生逆转，海洋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其中，最重要的是海上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这些资源一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贸易交换或者投资开发取得；二是来自近海，尤其是属于中国可资利用的专属经济区。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形成了一浪超过一浪的“海洋热”，各种各样的文章、专著铺天盖地，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研究也由冷变热，似乎成为一种“显学”。

当然，海洋意识增强的不仅是中国，其他临海国家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这也引起了围绕海洋资源、专属经济区、海岛主权归属等的争端大大升温。中国与许多国家接海为邻，存在

岛屿归属与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本来，出于维护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安定的大局，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也曾得到相关国家的基本认同。但是，在中国实力提升、海洋意识增强的形势下，争议变得难以搁置，联合开发更难加以推行。争端升温、冲突升级，不仅损害了国家间的关系和地区的安定，而且也增大了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还有，它也引起了其他大国（其中主要是海洋霸权国家美国）趁火打劫、直接介入。面对与相关国家海洋争端的升温，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海上战略遏制，一些国人惊呼，中国面临新的“海洋包围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比较好理解，因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加大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力度，不会容许外强侵犯中国的海洋权益或者利用海洋侵害国家的安全。但是，对于“建设海洋强国”，仍需要细细斟酌，准确定位，明晰战略和政策。

什么是“海洋强国”？目前各种解读都有。比如，有的认为，“海洋强国”是中国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几千年来，受陆地中心文化的影响，海洋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如今，中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对海洋重要性的高度肯定，把海洋的重要性与国家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的提出，“海洋强国”是一个全面发展战略，内涵是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优化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防力量。还有的提出，向海洋进军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竞争的焦点，也是世界新一轮空间挤占、资源争夺、战略要地控制的主战场，为此，中国要扩大管辖海域，维护中国在全球的海洋权益。国外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非常关注，也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

这是中国向海洋进军的信号，是要在争端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也有的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争霸的海洋强国路途还长，作为海洋强国的身份尚不明确，还有待观察。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依靠开放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中国重视海洋，提出新的海洋战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中国不需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围绕中国是走“蓝色文明”（代表海洋意识，开放文化）还是“黄色文明”（代表大陆意识，保守文化）之路进行争辩，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不是要获取霸权，而是要确立她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让其人民获得应享的福祉。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也不称霸。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只是其新形势下实现民族复兴全面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来看，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型大国，不会只重视海洋，看轻大陆，必然会实行陆海均衡的发展战略。

张洁博士牵头翻译出版了这一套海洋研究丛书，出于对我的信赖，要我为丛书写一个序言。我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不过，鉴于她一再坚持，盛情难却，我也只好答应了。海洋问题如同海洋本身那样宽阔无边，深奥难解，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素养，不敢探究，想来想去，只是写下了一些想法，算是表明我对这套丛书给予的支持和期待吧。

序

自《红星照耀太平洋》在2010年10月首次问世以来，亚洲海域目睹了中国海上实力持续，且有时令人捉摸不清的变化。中国在海面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使世人不再质疑中国海洋战略的转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亚洲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策议程的重点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静默的矛盾心理转变为直接的关心。那些对于中国海上计划长期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现在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海军，而这些在90年代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海上力量发生日新月异变化之际，我们很高兴利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文版面世的机会，重新审视本书的观点是否依然成立，并探讨由本书所引起的激烈学术争论，从而使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本书的核心理论概念与主题。

首先，关于物质力量的变化。得益于持续而全方位的投入，中国海军的创新能力和正在不断提高。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试运行代表了中国海军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而其他海上平台的出现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2012年，经过10年的舰队试验，中国海军研制出了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新一代052D型导弹驱逐舰，它堪比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2013年初，人民解

放军海军第一艘 056 隐身轻型护卫舰开始服役，据报道这一类型护卫舰将会达到 30 艘。随着“江凯 2”级导弹护卫舰、“宋”级“元”级潜艇和“侯北”级快速攻击艇的大量投入生产，建造开发这些最新的高级别船舰将会成为未来十年的趋势。无疑，中国建设一支力量均衡的海军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海上实力不单指海军。中国海上监控和执法力度的上升在近些年来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是中国海上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海监预计在 2015 年增加 36 艘船，包括 7 艘 1500 吨和 15 艘 1000 吨的快艇。许多快艇都能够在中国最远的海域持续巡逻，保证了中国在海上的实际存在，维护了国家主权。运用这种并非隶属于海军的力量使得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有力地巩固海上主张，而无需动用具有优势的武装力量。中国派遣非军事船舶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日本在东海对峙。中国将菲律宾驱逐出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后，从 2012 年 9 月日本将钓鱼岛/尖阁列岛国有化开始，中国展开了与日本在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的竞争。

这些重要的发展和令人困扰的事件证明了我们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的主要观点，即中国的海上存在不是转瞬即逝的，这对于美国及其在亚洲的海上伙伴构成了长期且复杂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书中强烈主张，中国海上实力的扩充超越了其在台湾和其他领土争端中所需要的武装力量。开展海军外交，采取行动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在水下进行威慑性的核潜艇巡逻，这些和平时期的活动将更加重要，而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将日益扩大到远离中国沿岸的海域。我们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海权提倡者——“马汉们”（Mahanians）看起来无论在对于可见的外部世界的战略争论中还是在政策实施中都会获胜，中国海上实力的综合性发展即为证明。就连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也会向这种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与决心致敬。

虽然我们论证的核心内容经受住了国际时事飞速变化的考验，但本书并未能预计到中国开始运用其强硬的海上实力。如果《红星照耀太平洋》现在才出版的话，我们会对第七章进行最大幅度的修改，即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我们相当合理地假设，在遥远的未来，直到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其雄心相匹配时，中国才会依靠软实力。诚然，我们注意到软实力的攻势在某些方面可能未被重视，如印度。但是谁又能够预见到，中国曾经煞费苦心地营造善良无私的海洋国家形象，而今却故意挥霍它的魅力，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冒犯亚洲邻国？

例如，在 2011 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新加坡对拥有平等主权的一个亚洲国家说，“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种做法相当于用一个大铁球去破坏中国软实力。如此傲慢的态度促使忧心忡忡的邻国向域外国家如美国寻求帮助，而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虽然软实力源于固有的吸引力，但是它仍然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培育。外交官们如果想在外国民众的脑海里铭刻下讴歌自己国家美德的叙事诗，那么他们的言行必须与叙事诗相符合，否则将权威不再。

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困惑，中国的领导层为何会执着于如此明显的、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中国想被看作是共同的海上保护者，它就必须加以注意。如果现在写这本书，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

迄今，西方学者对本书批评最多的是，我们关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 国际竞争和战争的“逻辑”和“语法”的分类法组织的分析。我们承认，对于回答什么是我们认为更直接的方法，仍备感困惑，因此只能对其中的原因加以推测。批评者中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核心

课程——战略理论，很多人是美国现役海军中擅长战术而缺乏战略思想的老兵，还有一些批评者是研究船体、传感器和武器等细枝末节的专家，他们承袭了海军对于更宏大的战略和政策的漠视。而其他人依旧不能超越冷战中对抗苏联海军时所学到的战术和行动教训。这些障碍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方法的不悦。无论何种原因，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多少价值。

为了中文版的读者，让我们回顾并展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并不认为：加入武力的政策组合使得国际交往与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完全不同。政策——国际竞争的逻辑——赋予军事活动以目的与方向，正如决策者指挥国家权力中非暴力工具的运用。只有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海洋或者天空中对抗时，行动和战术的语义才会改变。政策统治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类似的。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写作时对两个层次均有所涉及。他是一位主张海权扩张的战略理论家，在 19 世纪晚期的书中，他告诉美国人为何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使美国成为海洋型国家。他是一位明确阐述国家首要逻辑的伟大战略家，也是对海上贸易和战争的有力支持者。不同于那些更多倾向于操作性的理论家，马汉探究驱使人们扑向海洋的动力，而不仅仅研究在浩瀚的海域中经商。他关于国家目的和权力的逻辑——并非那些花费时间和技术，提出来讨论的行动性或战术性描述——构成了他研究的一部分，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间依然保持着最蓬勃的生命力。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有意识地避开对中国海军实力结构的单纯评估，或者直接地说，这是乏味的数豌豆行为。逻辑延续时语法可以改写。鉴于人民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预见，任何对于中国海军作战序列和其他战术发展列出的清单都会过时，甚至是在本书出版之前也是如此。这是一项从

战略理论和运用于海上战略的持久性原则中吸取长处研究。若探究中国海军具体的发展，则需要转向其他物质性力量的方面。

毋庸置疑，对外贸易、商船舰队、军事基地也是马汉研究的一部分，它们使中国海权的倡导者们着迷，大抵上这就是我们的作品得以被中国战略界接受的原因。中国海军确实可以寻求其他任何方法来审视海上战争的语义。那些受毛泽东思想激励的更多的进攻性思想会使中国追求马汉式的结果，我们认同这一明显正确的论点。

我们简明扼要地回顾本书出版以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学术观点的交流，这向中国读者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著作绝非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后一本。通过探讨中国转向海洋的非凡行为，我们希望这项研究成为讨论中国在未来亚洲海域角色的跨太平洋对话的工具。在《红星照耀太平洋》的翻译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使得我们的思想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知晓，而且在中美学术界和战略界架起了桥梁，我们对这种珍贵的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吉原恒淑 (Toshi Yoshihara),

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R. Holmes)

罗得岛，新港

2013年4月

前 言

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

本书是我们5年多来合作研究的结晶，主要议题是关于中国海洋问题的转变（China's seaward turn）。2004年夏天，我们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阿森斯，这个看上去与海洋没什么关系的内陆城市，对有关亚洲的地缘战略与海权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深入研究，我们提交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论文，撰写了大量时评，并且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海权与亚洲海洋战略的专著。第一本是《21世纪的中国海军战略：转向马汉》，该书试图研究发生在中国的知识反常现象（intellectual anomaly）。21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开始在中国流行。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位已故美国海权理论家却受到广泛批评。现在，中国学者对马汉表示出很高的敬意。这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学家们正在认可马汉的著作，并预期中国会加入海洋大国的行列。本书的观点是，鉴于中国独有的海洋环境，中国将借鉴并重塑马汉的理论。迄今为止，中国有关马汉的研究日臻成熟，而中国政府最高层的政策声明也证实了本书的相关论点。

本书论证、提炼和详述了中国的马汉理论研究，但研究并不

仅仅限于战略理论。国际政治充满着竞争性，竞争者为追逐重大利益而互动决定了这类特性。美国如果打算在未来维持有利于自身与亚洲的战略地位，就需要认真思考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无论是就硬件而言，还是在航海技术和作战能力方面，中国的海上能力已经能够检验中国战略家们的各种理论。换言之，借用中国官员与学者的口头禅来表述，中国已经处在要求海洋具有“中国特色”的关口。关于中国走向海洋的原因已经被充分论证，中国需要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实现自身的海洋雄心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事实上，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MSI）的同事们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海军的优秀成果。但是，中国如何迈向一个海洋强国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挖掘。因此，我们试图填补西方学者在理解中国海权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特别关注中国的战略、行为和策略是如何与在亚洲的美国海军进行互动，并研究国家权力中的非军事因素如何在中国海权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们就职于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使用了在该研究所处于前沿的研究方法。本书参考了各种公开的中文文献，文献主要源于中国海事研究所图书馆近年积累的可观资料，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在线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 7200 多种全文期刊，开放源代码中心（原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心），以及个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购买的书籍。我们所引用的学术资料包括有关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学术作品，有关战略与行为相互关系的文章，有关世界先进武器的概览，以及各种科技期刊。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分析和解读了几百篇内容各异的文章，而书中引用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的内容。除在文中特别标注，其他所有中文资料都由我们亲自翻译，如有错误，也由我们承担。

鉴于中国的出版物汗牛充栋，因此很难一一核实作者的专业

性及其所在机构。因此，中国问题专家日益重视质量的控制和书目的完整性。本书根据五个基准对相关文献进行反复审查。第一，我们努力辨别作者的专业性，并基于机构的可信度对杂志进行排名。例如，我们优先关注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高校的出版物。第二，分析草率或结论牵强的文章都被排除在外。如果文献包含的技术分析超出我们的专业，我们会向具有工程背景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现役或退役海军官员咨询。幸运的是，海军战争学院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专家。第三，我们偏向使用那种接近西方，尤其是美国写作风格的文献，只要它们有助于追寻中国的原创性思想。除非需要突出某个特定话题，否则本书很少使用汉译美国著作。第四，本书使用的大量资料是关于某些具体话题所进行的经常性和持续性的讨论。这些被关注的议题有助于我们推测相同的争论是否也发生在官方范围内，或是即将被决策者所重视。第五，本书最重视那些能够反映思维多样化的资料，以及更重要的能够标志着对某一观念或者政策描述达成共识的资料。持久的共识意味着某一特定议题已经达到了知识临界点，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发现和预测。

本书之所以进行广泛的文献调查，目的是考察中国海军内部思想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进程，我们并不特别要求文章的权威性，或者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力。然而，这些自下而上对现在中国战略思想的评估，为捕捉中国民间和官方潜在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毕竟，在美国，如美国海军所的《汇编》（Proceedings）等“流行”或是专业军事杂志所刊登的诸多文章，对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能低估那些非政府机构的论坛对中国战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认为，严格的意识形态正确性损害了官方性质的资料，

这些资料缺乏具有想象力的分析。而那些非官方的资料则具有卓越的知识活力和创造力。事实上，我们始终对中国学者所具有的学识、坦诚和独立印象深刻。而那些对“中国人”未加区分、一言概之的人们显然只能自寻烦恼了。

未来，中国的剧烈变化将会放大思想界的斗争，这使得政府很难把各种外部声音隔离在战略决策之外。事实上，中国政府很可能从外部寻找灵感。因此，我们认为，衡量外部知识刺激对中国决策者和规划者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国防共同体如何对待有关战略和行动的辩论。如果我们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大量公开性文献，就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估。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对中国海权的研究受益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慷慨帮助。我们衷心感谢那些给予我们指教的朋友，介绍我们观点的朋友，以及为我们的观点提供重要传播途径的朋友。我们向萨尔维·里贾纳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佩尔中心的执行主任彼得·李欧塔（Peter Liotta）表示感激。李欧塔最先使我们有机会宣传关于中国海洋战略的观点，他两次向国际研究联合会中有关海权研究的讨论组推介我们。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杰弗里·梯尔（Geoffrey Till）和拉夫·萨瓦尔（Ralph Sawyer）评论了我们以前有关中国转向马汉研究的著作，并给予了指导和鼓励。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阿兰·华齐曼（Alan Wachman）使我们有幸与他的学生一起讨论。最后，多位编辑对我们的著作给予了帮助。

我们衷心感谢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系主任约翰·毛瑞尔（John Maurer），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和同事，更是一个很棒的朋友，他非常支持我们的研究。中国海事研究所的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和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了该研究所无与伦比的藏书，其中包括大量有关

海事的资料。我们向历次海事研究所的年度会议提交了论文，并得以通过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论文观点。我们感谢美国海军（退役）指挥官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为我们提供的水下作战的专业知识，感谢美国海军（退役）指挥官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他是我们教授中国治国方略课程的教学伙伴，对我们的观点给予了犀利的批评。

最后，我们要感谢妻子和儿女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序 / 1

前 言 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 / 1

第一章 马汉的两柄三叉戟 / 1

第二章 中国接触战略理论家 / 19

第三章 中国海权的德国先例 / 61

第四章 中国特色的海军战略 / 97

第五章 海上导弹和反导的相互作用 / 134

第六章 中国新兴的水下核威慑力量 / 168

第七章 海上软实力 / 204

第八章 美国的东亚海洋战略 / 248

第九章 谁掌握着三叉戟? / 289

后 记 / 311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马汉的两柄三叉戟*

2006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海军军官，“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海军要“随时”准备捍卫中国的利益，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①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意味着海军即将迎来辉煌的时刻。在海军战略思想中，物质层面的内容最容易被观察，也是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标。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从物质角度衡量，欧洲和亚洲的海军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欧洲各国似乎在收缩海军力量，放弃制海权。鉴于亚丁湾和红海地区海盗猖獗，直接危害关系到全球繁荣的商船安全，欧盟渴望在亚丁湾和红海获得领导地位。^②但是，欧洲

* 三叉戟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武器，外形类似于长柄的鱼叉，中间刺较长而两侧较短。——译者注

① David Lague, “China Aims Ambitions to Beef Up Naval Pow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12/28/world/asia/28ihtchina.4038159.html>.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Navies,”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4/05/opinion/05iht-edkennedy.1.5158064.html>.

海军力量的下降趋势（downward drift）却正在发生。对欧洲人而言，海权现在更多是维护治安，而不是武装对抗以决定谁统治海洋。^①

在索马里反海盗要比敌对国之间的主力舰队冲突更能诠释当代欧洲海权的含义。欧洲各国的民众和精英对高端海上平台和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在减弱，例如，最近英国皇家海军下令提前退役一些水面战舰。皇家海军将其未来押注在资助两艘中型航母上，这说明英国政府可能在考虑放弃航母建设。^② 2009年11月，伦敦《卫报》报道，英国国防部考虑向印度出售一艘航母。^③ 这象征着海权东移正在发生！财政压力和军种间的竞争迫使英国军事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事实上，自1805年特拉法加战役以来，目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第一次小于法国海军，而正是在1805年的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一举击溃了在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联军。

欧洲海上力量的衰退颠覆了500年的海军历史。西方对传统海上力量的冷漠与亚洲各国大肆发展海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印度和中国的统治者放弃制海权后，葡萄牙人来到了印度洋，欧洲才控制了亚洲水域。肯尼迪认为当今正在发生的，具有非连续性

① 作者与欧洲官方和学者的讨论；See Conference on “Pioneering for Solutions against Pirac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8, 2009, <http://www.clingendael.nl/cscp/events/20090708/>。

② Jasper Gerard, “Ministers Accused of ‘Sea Blindness’ by Britain’s Most Senior Royal Navy Figure,” Telegraph, June 12,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pers/politics/defence/5517833/Ministers-accused-of-sea-blindness-by-Britains-most-senior-Royal-Navy-figure.html>。

③ Tim Webb, “MoD May Sell Aircraft Carrier to India to Limit Cuts,” *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9/nov/15/mod-may-sell-carrier>。

的海洋史，与发生在中国明代的情况比较类似。当时，明代政府解散了由郑和统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宝船队”。^① 中国在达·伽马抵达印度次大陆几十年前就撤退了，由此开启了一个外部力量统治亚洲的时代。^②

欧洲征服者对亚洲海上交通的控制，致使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独立地位，也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征服者在整个亚洲海岸建立了基地和殖民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帝国式微，20世纪50年代撤出苏伊士运河东岸，英国才心照不宣地将海洋霸权转让给美国海军。皇家海军退出亚洲水域标志着“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在亚洲的结束。^③

在欧洲人背弃传统的海上战斗时，亚洲却投身于海军发展，声势日隆。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中国终于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它的航母野心。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推出了五种新的现代常规潜艇和核潜艇。高科技海军导弹驱逐舰首次出现在印

①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Navies." For more background, see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 Pow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esp. 28 - 43; and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 - 143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intro. Eric J. Grove (1911; rep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94;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 - 1945* (New York: Day, 1954); and K. M. Panikkar,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India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③ Nicholas Evan Sarantakes, "The Last Days of the Royal Navy: Lessons from Britain's Strategic Retreat from the Pacific," in *Asia Looks Seaward: Power and Maritime Strategy*, ed.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7), 32 - 45. See also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度洋上，履行反海盗的职责。据报道，北京正在研制一种反舰弹道导弹，这可能会改变争夺远东地区海上统治权的规则。在这样的平台和系统中，胡锦涛关于建设一个强大人民海军的讲话更加印证了这一判断。胡锦涛的讲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它预示着中国正在迅速转向海洋。他的讲话已经成为中国对海洋问题进行评论和战略辩论的必引之语。

在建设强大海军方面，中国并不孤单。日本早已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最近它委婉命名的“直升机驱逐舰”——或者是DDH——已经下水。显然，DDH是未来轻型航母的原型。日本配备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潜艇——一种尖端制造技术，可以提高潜艇的水下续航时间，便于躲避侦察——目前已开始服役。韩国处于全面海军现代化计划的中期阶段。在未来十年，韩国将交付护卫舰、柴油动力潜艇和两栖攻击舰，更不用说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亚洲的南部同样如此，澳大利亚也计划获得“宙斯盾”驱逐舰，以及价值170亿美元的12艘柴电潜艇。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昂贵的军事项目。在澳大利亚的西北部，印度也渴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印度海军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已经签约购买一艘俄罗斯退役航空母舰，同时自建两艘航母，成为其蓝色海军的核心支柱。

当一种文明从海洋撤退时，另一种文明立刻填补了这片海洋和天空，伴随而来的是明显具有攻击性的船只和战机。亚洲海军力量的崛起对于该地区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观察，海权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应该高度重视发生在海上的变化。例如，在二战中发动战争的国家其实很早就装备了本国的海军，这一端倪在两次大战之间就可以发现。当然，目前发生类似的大国灾难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如此，东亚海域发生的竞争和对抗正在升温。中国分析家章明和陈向君警告，由于两大海权的地理邻

近，中日摩擦具有危险性，“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狭窄的西太平洋海岸线很难同时容纳两个世界级大国，在第一岛链内也很难保持两支远洋海军。”^①

章明和陈向君预言，随着大国海军在亚洲海域正面遭遇，潜在的意外事件、误判，甚至故意挑衅将会增多。他们的判断基于某些重要因素，但也含有某些评价海权的非常规方法。船舶、飞机和武器只是衡量海权的一个基准，这些方面确实值得研判。思想领域比净评估固然更模糊，但理解一个有抱负的或已经建立海上力量的大国如何进行战略思考，对于增进我们预测它的海洋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海军政治领导人和指挥官偏好进攻性战略，那么他对资产的使用必然不同于一支倾向于防御性的海军。例如，一些学者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攻思想”渗透到欧洲的战略思想和军事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战的大规模杀戮。

毫不奇怪，保罗·肯尼迪洞察到的亚洲海上势力崛起与欧洲海权衰落之间的物质断点同样发生在知识层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杰弗里·梯尔（Geoffrey Till）教授扩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欧洲人正在进入一个海权发展的“后现代”、“后马汉”阶段。后现代的视角认为，各国的非战斗任务目标旨在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其面对的非传统挑战要远比传统的击溃敌人舰队来得更为重要。关于亚洲人的海权发展态势，梯尔认为，其知识轨道恰好相反。亚洲正在进入“现代”、“新马汉”的世界，像是西方海权国家诞生的阶段，或者生活在马汉时代的日本。如果梯尔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亚洲人的未来无疑具有血腥味，发生海

① 章明、陈向君：《太平洋的碰撞：浅论新世纪中日两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及可能出现的冲突》，《舰载武器》，2005年11月，第19页。

上武装冲突的机会极大。^①

事实上，如果从亚洲有关海洋事务评论中浓厚的军事色彩来看，“马汉”无疑正在卷土重来。2009年5月，《经济学家》杂志亚洲专栏作者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该会议由国际战略研究所赞助。杂志专栏“Banyan”认为，每当他们“询问来自印度或中国的军人时，回应总是马汉式的”。^②现在，“马汉”成了一种简称，意即对公海上国际竞争的零和性和战争必然性这一宿命的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虽然没有这么悲观，但他也说：“美国海军向马汉致敬的方式是以马汉命名建筑物，而中国人则贪婪地阅读他的著作；中国人现在是马汉主义者”。^③作为对“Banyan”的回应，卡普兰认为不仅是中国人在阅读马汉，在印度“他的书现在也很流行”。^④如果解放军海军和印度海军确实尝试将马汉理论直接转化为海军战略和力量，建立像美国的“福音”或“哥白尼”号那样史诗般舰队的可能性无疑在增强。^⑤

-
- ① Geoffrey Till, “Maritime Strateg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Orbis* 51, no. 4 (Fall 2007): 569–575; and Geoffrey Till, *Seapower* (London: Frank Cass, 2003).
 - ② “Chasing Ghosts,” *Economist*, June 11, 2009, 48, http://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825154.
 - ③ Robert D. Kaplan, “America’s Elegant Decline,” *Atlantic*, November 2007,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711/america-decline>.
 - ④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9,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4862&print=1.
 - ⑤ Margaret Tuttle Sprout, “Mahan: Evangelist of Sea Powe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ed. Edward Meade Ear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415; Robert Seager II and Doris D. Maguire, eds., *Letters and Paper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vol. 2, 1890–190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5), 342.

美国似乎试图跨越新马汉和后马汉的世界，满足持平或下降的物质需求。有一则海军的老笑话，如果海军用越来越少的资源完成越来越多的事情，那么他们最终将一文不名却要承担一切。这就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做的，不仅把自己当作维护世界海上通道自由航行的警长，这一功能包括维护良好秩序，而且还认为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特权，以对付有抱负的“同行竞争对手”。维护海洋秩序要动用美国的外交、信息、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权力。

在印度洋的美国海军就是这种大战略的一个缩影。海军战斗/攻击机为在阿富汗的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这是对陆地的最高形式的力量投射，有时甚至动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船舶去追踪数量庞大、从事海盗活动的小型船只，并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时，如果华盛顿一声令下，海军肯定会为打击伊朗核设施作准备。海上部门如何处理好海权的双重特性，即保持警察角色和军事作战两种功能的同等地位，这是检验美国是否能够维持海上主导地位的核心内容。在亚洲，这种挑战尤其严峻。亚洲正在迅速扩大本土海军力量，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却停滞不前。

如果肯尼迪、梯尔、卡普兰等的预测都是正确的，那么亚洲海域的海上力量正在重构。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管理影响区域秩序的干扰因素。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是首要挑战，我们希望，这同时也是美国和其亚洲盟国的一个重大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次“红队”演练，我们试图预测未来趋势，帮助“蓝队”美国及时调整战略和军力，即便不是在变革发生之前，也确保能不落后于世事。我们相信与“红队”沟通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特别关注海洋战略的人为因素。美国人必须避免把自己的假设强加给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经验和思维习惯的

社会。通过了解竞争对手的想法，美国未来将会更好地回应中美之间的互动。

中国海权和拒止/区域封锁辩论

在大多数分析美国海上霸权面临的挑战的文献中，军事和作战趋势是焦点。有关亚洲的对手可能会采用拒止和区域封锁战略的探讨，在华盛顿的圈子内已经取得重大共识（为简单起见，我们将这些战略总结为“拒止介入”）。这一战略涉及如何协调军事和非军事因素：①延迟美国及其盟军的到达；②防止美军使用地区内基地支持军事行动（否则的话就破坏这些基地）；③使美国军力和物资投送尽可能地远。^① 不管这些设想在军事领域的效用如何，我们认为单单考虑军事并不利于推进相关研究。本书的另一目的是拓宽使用武力之外的关于介入的概念。

美国分析人士一直在努力探究“拒止介入”如何影响台海冲突。正如托马斯·爱尔哈德（Thomas Ehrhard）和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解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介入作战”是指，采取行动阻止美军在能够有效打击中国军力的战区进行部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政治手段，迫使区域内国家拒绝给美军提供作战基地，袭击美国现有的区域基地或前沿部署的海军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封锁作战”的行动发生在太平

① For a Definition of Antiaccess, see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and Kevin L. Pollpeter,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7), 11.

洋战区，其目的是不让美国军队在靠近台湾或者大陆的地点发动有效作战。^①

作者的结论很悲观，他们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第一次，也是自二战结束后第一次，美国航母战斗部队将很快面临重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威胁^②，这让美国感到愤怒”。换句话说，他们将中国给美国在亚洲力量带来的威胁，等同于苏联和日本帝国舰队的威胁，日本曾挑战美国在远东水域的控制权。

因此，考虑到权威评论家给出的黯淡基调，“拒止介入”已成为华盛顿决策者观察中国海权崛起的棱镜。他们认为威胁真实可信，并且不断增大，前途十分令人担忧。他们痴迷地认为“拒止介入”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台湾的前途。然而，对中国海权崛起理解过于狭隘的话，则有一定的危险。我们认为，“拒止介入”策略只是中国更广泛、更持久地在海上挑战美国的一部分。将“拒止介入”与中国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相联系，其实是对中国海权的误读。这种短视严重限制了对中国长期的海权发展前景的理解，也是对美国制定和执行亚洲战略的误导。

在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建设计划中，加强“拒止介入”能力

① Thomas P. Ehrhard and Robert O. Work, *Range, Persistence, Stealth, and Networking: The Case for a Carrier-Based Unmanned Combat System* (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 137-138.

② Thomas P. Ehrhard and Robert O. Work, *Range, Persistence, Stealth, and Networking: The Case for a Carrier-Based Unmanned Combat System* (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 195.

的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完全恢复大陆对台湾的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合理的假设是，北京一旦重新统治台湾，将减少其对美国海军优势的挑战，或者停止发展海权。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在“后台湾”时期，一个满足的中国可能会内向化。中共政权将收复最后一块在外国压迫时期丢失的中国领土，实现国家统一和恢复尊严。中国将完成其海上目标，而美国除了默认台湾海峡的新状态之外将别无选择。亚洲将返回到一个不平衡的权力变革进程中，具有陆权优势的中国对峙具有海权优势的美国。在这个可能的未来，中美任何一方都不能战胜对方的地缘战略优势，任何一方也没有理由去这样做。相对稳定的共存是最佳选择。

如果这种乐观的推理是错误的呢？目前中国海军建设的趋势以及中国发出的相关言辞表明，这种良性的结果既不是必然的，但也不是不可能。中国建设针对后台湾时代的军力投送能力已不再有任何争议。^① 如果是这样，那么“拒止介入”的系统发展是中国在亚洲海域更持久存在的前提。很少有中国观察家去探索这种存在。而其中，只有更少数人开始估算中国实现对海洋环境控制后更远的前景。中国如何建立海外势力范围可能是一个仍然没有答案的问题。

如果不去牢牢把握激发中国转向海洋的具体因素、过程和情景，那么美国及其盟国不可能制定长期的亚洲海上战略。而我们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① Mark Cozad, "China's Regional Power Projection: Prospects for Future Mission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in *Beyond the Strait: 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 ed.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and Andrew Scobell (Carlisle Barrack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8), 287 - 325.

“介入”的马汉式逻辑和基本原理

如前所述，西方战略家往往将关于“介入”的问题限制在军事方面，这损害了他们设想未来中国海洋战略的能力。我们认为，“介入”具有巨大的分析价值，扩大对“介入”的前景分析是一个有益的起点，由此可以绘制出中国海权的发展路线，也可以评估其对美国亚洲海权的潜在影响。为了帮助重新调整视野，我们转向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的作品堪称讨论该议题的基石。

在这位美国上校看来，海洋是一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往各个方向”。^①“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或军事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②“海权的显赫”在于有能力控制海上通道以及重要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阻碍商业流通和海军船舶通行。开掘一条中美洲的运河，获取加勒比海的基地，以此保障巴拿马地峡的通行，马汉始终沉迷于这种想法。^③马汉认为，确保自身的交通便利，同时“割断对手的交通，将会影响一个民族活力的根基”。^④

以军事为核心界定“介入”的概念，符合上述对海权的观察。但广泛阅读马汉的著作后会发现，海权的内涵要大得多，应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25.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1900; repr., Port Washington, N. Y.: Kennikat Press, 1970), 124.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1897; repr., Freeport, N. 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65 - 83, 277 - 292.

④ Mahan, *Problem of Asia*, 124.

该在两个层面上对马汉的作品进行解读。普鲁士战略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理论揭示了马汉海权理论的双重性质，克劳塞维茨假定“战争并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政治活动的工具。”克劳塞维茨对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即战争会使交战各方之间的政治交换暂停，或是被完全不同的状况所替代，抑或被战争自身而不是规律所主导。克劳塞维茨反问：“当外交照会不再交换时，民族之间、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会停止吗？难道战争不是他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是言辞和写作的另一种形式吗？语法可能是自己的，但逻辑不是。”^① 在这段话中，克劳塞维茨指出的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介入。第一，战争是国家政策与军事手段的混合物。它不同于其他凭借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进行的国际互动，战争点燃了黑暗的激情，排除了无数的其他因素。第二，敌对双方的政治交换不会在炮火开始时停止。非军事手段如外交、经济压力或奖励，以及联盟政治都将在战时发挥作用。

现在将这种双重结构应用于马汉的理论。许多评论家过度使用马汉关于作战和策略的基本原理（grammar），忽视他关于海权的逻辑——或者用历史学家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的说法——他的海权“哲学”。^② 如果轻视逻辑，只是强调马汉论述海战的基本原理的重要意义，那么必然限制和扭曲我们对马汉海权的认识。^③ 海军历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605.

②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203, 217–222.

③ James R. Holmes, “China’s Way of Naval War: Mahan’s Logic, Mao’s Grammar,” *Comparative Strategy* 28 (2009): 1–27.

史学家强烈否认对远洋作战的垂涎，事实上，马汉在《亚洲问题》一书中坚持“军事或政治力量”是国际关系中的“外来因素”。^①当战争强加给海军时，马汉敦促海军采取攻势，但他从不主张海军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竞争。用当代的说法，马汉敦促海上力量“对冲”可能的军事冲突，保持开放的选择。

但他也用克劳塞维茨的方式进行论述，将他的逻辑和基本原理不仅运用于论述战场，而且运用于和平外交领域。马汉写到，海军战略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状态，其最终目的是发现、支持并增加一个国家的海权。”^②在平时，发现和确保战略性地理节点是加强海上力量的一种方式，努力保持开放市场准入和基地也是同样的目的。一个国家意图发展海权便意味着永远进攻，这一点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一样。德国海军上将沃尔夫冈·韦格纳（Wolfgang Wegener）申明，英国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略进攻能力，德国为此需要装配最大的海上帝国，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

海军军备是海洋战略的剑锋，但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马汉认为有时舰队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但是，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是促使国家繁荣和伟大的真正途径。“战争已不再是国家自然的，甚至是正常的状况”，他说，“军事考虑只是一种附属品，而且应该服从于其他更大的利益”。^③国家要以经济和商业为主。理解海权的“起点和基础”是“通过政治措施增强军事或者海上力量，确保有利于商业的环境。这个秩序实际上与国家综合国力的三个重要部分——商业、政治、军事——都有相

① Mahan, *Problem of Asia*, 33.

②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22-23.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 Prospect* (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246.

当大的关系”^①。

很难说清为什么许多国家会觊觎像亚洲这样的边远地区。从本质上说，商业是创造财富和增强国力所需手段的必要途径。如果没有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保护，并迫使其他方不危害商业介入，商业活动就不可能得到保障。航海国家应该将目光锁定在这个压倒一切的任务上。马汉因此提出了一个三重特性的概念，鉴于马汉著作的海洋特性，我们称之为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个“三叉戟”。获得经济福利的来源——诸如外贸、商务和资源——是马汉的三叉戟的首要任务；而军事介入只排第三。这与对马汉作品的惯常解释不同。

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即马汉的基本原理，更偏重于武力和作战。我们称这种特性为第二个“三叉戟”。但即使这样，马汉更看重的是商业。事实上，贸易和商业构成了海权的基本原理和逻辑的交界面。在马汉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中，他将海上力量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即生产、商船和海军航运，以及海外市场和基地。尤为神秘的是，马汉把市场看作商业交换的关键场所，同时也是补给和修理蒸汽动力船的前沿站点。^②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三大支柱都直接关系到商业，即本国的工业生产、商船和国外市场。马汉指出“贸易的趋势涉及生产贸易所需的东西……民族特色对于发展海权是最重要的”^③。

其他两根支柱直接涉及海军力量，即前沿海军驻地和舰队。如果海权的逻辑出于商业目的确保介入，那么基本原理则意味着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 Prospect* (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246.

②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71.

③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53.

通过海军力量确保介入的安全。马汉断定“制海权”意味着“压倒性的海上权力，可以驱走敌人，即使敌人出现在海上，也像流寇般逃窜；以及，通过控制更多的公共海域，封锁来往于敌方海岸的商业通道。”^① 压倒性的权力在形式上主要是军舰、海军武器装备和战斗效率，这些体现了海权的武力原则。两柄三叉戟必须保持锋利，以便利其他一方开展工作。

双重性质的海权，即体现为平时和战时的活动，再次表明马汉用细致入微的办法来审视海洋事务的特点。重要的是，海权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两者都将获取地点（如港口和基地）和实物商品（如商品贸易和自然资源）作为他们的重点。基本原理和逻辑都瞄着相同的目标，但逻辑支配着海权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而基本原理则为海军准备与战争提供规则。

用马汉的术语定义“介入”，即包括经济的逻辑和军事的基本原理，“介入”事实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对美国而言，不仅仅是将军事力量自由投送到中国水域。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更强调中国视角中的介入。北京太担心拒止介入。中国领导人和指挥者担心美国将部署海军，阻止中国进入公海，报复中国的越界行为，甚至可以想象，有时只是美国总统的一个偶然想法就促使美国采取行动。确保在公共海域自由行动是经济和军事努力的中心，中国政府认为这对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声望至关重要。

因此，“介入”深化了战略目的，它远比台湾的应急性或其他短期军事目标更为广阔。用马汉的术语重新界定介入，为理解中国海权的未来发展打开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表明中国走向海洋的力度不会止步于台湾。中国在做更大的准备。

^①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38.

本书的结构

尽管贸易和商业在马汉的两柄三叉戟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本书侧重研究军事这根“刺”。在基本原理方面，马汉对压倒性的海上权力的判断主要基于武力，为此很多中国人向马汉致敬。在本书中，我们扩大了马汉关于压倒性的权力的观点，意指中国利用优势力量对付其他国家的能力，或是以此打击在重要海域同样拥有优势力量的敌手。狭义上讲，拒止介入的军事中心主义概念属于后者。当胡锦涛支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时，显然胡主席是就基本原理而言。但强加和取消压倒性的权力，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也就是说，否认制海权的能力，为海上遏制的舰队开辟了道路，它们可以自主按命令行动。对介入的这种理解，捕捉到了在同一海域和天空，具有重要利益的两国典型对抗的动力。如果没有互动，中美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本书的组织原则是地理决定介入和反介入将在何处发生。我们假设，中国将努力实现和确保自身的介入，同时也获得对它者的反介入能力。在地理上，范围是中国海岸线的周围。中国将首次尝试保证获得介入其附近海域（immediate maritime periphery）的能力，也就是中国所指的“近海”。这里，我们对介入的理解是，它包括了中国在一个特定地域范围的商业、政治和军事活动空间。一旦中国有信心在其近海自由行动，它将扩大介入范围，超出周边，也即中国所指的“远海”（far seas）。进一步设想，这种对介入的追求为西方观察家跟踪中国海洋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工具。中国对海权的理解与马汉的海权到底有多接近（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是商业优先于军事方面吗？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揭示中国未来会追求何种海洋战略。

本书从多种角度考察介入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建立了战略背景。在第二章中，我们更为细致地考察了介入的理论基础。我们探讨中国如何借鉴战略理论家和其他战略思想来源，并将这些心得应用于指导海洋战略。其中，对马汉的分析将占据突出位置，但中国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这也为如何制定和执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说，我们认为，马汉提供了中国海权的逻辑，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概念则有助于北京把海权的海战原理与中国当地的情况结合起来。第三章采用回顾性的方法，比较研究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困境。我们考察了地理、能力和国家意志——在面临重要敌手时确保和扩大介入的三项主要成分，这对发展海权也同样重要。我们发现，在将不利的地理条件转化为优势方面，中国比德国更有利。

第四章至第七章沿着地理线展开，与近海和远海概念相一致。我们调查了中国海上战略的各个方面，重点放在接近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和贸易需要，还考察了中国试图将影响力辐射到更远战区的努力。第四、五章分析中国可以利用战术概念和能力，达到或拒绝近海的介入。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从美国手中夺取部分领海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力至关重要，长期而言也有利于共产主义政权。因此，我们开始研究北京如何管理黄海、东海与南海，这些都是中国的近海。拒止介入作战和战术都围绕中国海域而发生。我们还调查了中国对海基导弹防御努力的看法和反应，以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调整其反介入战略，以抵消美口的能力。

第六章和第七章研究中国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舰队具有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力，以及海军“软实力”如何深化和拓展中国在沿海和远海的介入能力。在第6章，我们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下威慑的前景，其主要表现在核动力潜艇和海上发射弹道导弹。我们发现，水下威慑能力与中国介入和

反介入战略是协同的。坚不可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使美国在战略层面遭遇困境，为解放军在战区级战争中，就附近海域确立反介入作战提供了选择。同时，强大的反介入姿态提供了一个保护伞，凭借该保护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向东扩大他们的威慑巡逻范围，将北美的更大范围涵盖在内。

在第七章中，我们认为，北京将其力量应用于保卫其在印度洋的利益，这与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密切相关。中国领导人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通过将复杂的历史故事融入他们的区域外交，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海权国家。如果成功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生存环境将更为宽松。中国是否决定向外部署海军力量，与中国商船自由通行南亚海域息息相关。

在对中美海上互动做出详尽研究后，我们转向美国的亚洲海洋战略。第八章剖析和比较了美国的 1986 年和 2007 年海上战略，以明确海权中逻辑和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与冲突。1986 年的战略在基本原理上非常出色，鼓励美国与苏联进行海军竞赛，2007 年的战略阐明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海权逻辑，但基本不涉及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考察了这两个战略及其优点，以及他们的亚洲和西方批评者。该比较有助于决策者决定是否要以及如何调整当前的“21 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使之更为成功，无论是在诸如防扩散和海上通道安全等后马汉时代应完成的使命，还是在海军军事准备、威慑等新马汉时代所承担的任务方面，都有助于分析中美是否会发生海上争霸等问题。

本书最后一章回顾了海权的逻辑和基本原理，试图用马汉的标准衡量美国和中国的措施。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分析，其目的是分析中美作为海权国家，分别处于上升、下降还是平行的轨迹。我们认为，趋势分析将帮助海洋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确立他们对马汉三叉戟的真切认识，马汉无疑还在统治着亚洲的蓝色海洋。

第二章

中国接触战略理论家

如第一章所示，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已经阐明，海洋国家的任务就是争取国际贸易、培育商人和发展海军舰队，并构建前沿基地。以马汉式标准来看，中国正在迅速扩大海权。中国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但经济越来越依靠源源不断的海运货物，比如来自非洲和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海洋还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通道。中国造船业正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事实上，从龙骨铺设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上看的话，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世界船舶工业的领先者韩国和日本。

同样，在军事航运领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取得了大幅进步。不久以前，西方水手和学者抨击中国海军力量，一个经常听到的笑话是，中国将通过“万人游”登陆台湾。1999年，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地理的和平》一文，罗斯认为，美国将继续统治亚洲海域，而中国将保持对亚洲大陆的

控制权，中美两国都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攻击对方。^① 尽管美国鲸和中国大象可能互不喜欢，但它们却很难威胁到对方。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迈克尔·汉龙（Michael O'Hanlon）在长文《中国为什么不能征服台湾》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② 2001年，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教授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认为，除了“立即关闭其海岸”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根本无法保卫中国海上交通线（SLOCs）。科尔进一步认为，中国海军几乎不需要扩大其防御线，因为美国海军仍然是亚洲海上安全受托人。^③ 中国可以坐享美国海军治下的和平。

不过，今天已很少听到上述言论。如果有的话，不少官员和专家已开始对中国海军发展保持警觉。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表现出的焦虑感日益增加，部分原因是中国这个封闭社会所具有的不透明性，西方分析家时常争论中国公布的国防支出数字是否准确。^④ 中国问题专家和官员们一直在商讨中国将如何使用其日趋强大的实力。2008年的军力报告在内容摘要中指出，“这种情况自然会合乎逻辑地导致对冲，

①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no. 4 (Spring 1999): 81–118. 也可参考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orton, 1998).

② Michael O'Hanlon, "Why China Cannot Conquer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51–86.

③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181.

④ 参考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Medeiros, James Mulvenon, and William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5), 91–134.

以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① 200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为纪念成立六十周年进行了阅兵式,展示了国产中国军舰,包括不少于四艘潜艇和第一艘“玉昭”级两栖突击舰。^② 经过多年的否认和掩人耳目,中国军方领导或多或少公开表示,中国希望拥有航空母舰。在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Yasukazu Hamada)时,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宣布北京最终将建立航空母舰。尽管梁没有为这一雄心勃勃的新项目设定时间表,但他的表态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以往解放军的标准言论极为不同。^③

在海军基地建设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海南拥有一个基地,可停泊核潜艇(以及水上设施),并扩大其巡航半径至马六甲海峡,这一狭窄水路连接着南中国海与作为资源供给者的印度洋。^④ 中国高层担心“马六甲困局”,即这一海上咽喉要道的自由通行面临威胁。^⑤ 中国还计划在印度洋建立基地,这一动向引起美国,特别是印度的担忧,印度认为中国构建海上

-
-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8),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_Military_Report_08.pdf.
 - ② “China’s Navy: Distant Horizons,” *Economist*, April 23,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asia/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527838.
 - ③ Wang Jianfen and Nie Ligao, “Japan Defense Minister’s China Visit a Sign of Warming Relations,” *China Daily*, March 23,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1.htm.
 - ④ “Secret Sanya—China’s New Nuclear Naval Base Revealed,”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pril 21, 2008, http://www.janes.com/news/security/jir/jir080421_1_n.shtml.
 - ⑤ Ian Storey, “China’s ‘Malacca Dilemma,’” *China Brief* 6, no. 8 (April 12, 2006),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31575&tx_ttnews%5BbackPid%5D=196&no_cache=1.

“珍珠链”已包围次大陆。^① 知名分析师古佩特·库拉纳 (Gurpreet Khurana) 指出, 中印“竞争弧”的范围从东北亚的日本延伸至西亚北非的曼德海峡。^② 如果朱利安·科贝特 (Sir Julian Corbett) 或 K. M. 帕尼卡 (K. M. Panikkar) 等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话, 那么印度的海上交通及其国民生活都将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进一步而言, 这有可能促使新德里进入太平洋, 以还击中国入侵印度洋。^③ 印度人对他们唯一一次遭受大英帝国的海上入侵而失去独立记忆犹新, 因此新德里将从心底里排斥北京沿印度海岸的权力扩张。^④

马汉式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越来越凸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存在一个马汉式战略呢? 如果是这样, 那么其内容到底有哪些?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仍然是中国将如何以及抱着何种目的使用迅速增长的海军力量。此外, 还有待观察的是, 马汉的思想是如何渗透到中国的战略思想的, 并进而影响北京的海洋事业。尽管从陆地的角度看,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尚武精神及哲学传统, 不乏对其行动提供丰富的指导。仅列举一些中国战略思想渊源的大人物, 如孔子、孙子、毛泽东、邓小平和刘华清, 他们都会影响中国的战略运筹。借用中国思想

① Bill Gertz, “China’s Pearls,”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 2009,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9/jan/01/inside-the-ring-84163751/>.

② Gurpreet Khurana, “China-India Maritime Rivalry,” *Indian Defense Review* 23, no. 4 (July-September 2009),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2009/04/china-india-maritime-rivalry.html>.

③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intro. Eric J. Grove (1911; rep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94.

④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 - 1945* (New York: Day, 1954); and Panikkar,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家通常使用的术语，北京开始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制海权，其战略内涵显然将远比马汉来得丰富，而且其中一些本土因素的重要性要超过任何西方的理论家。整理这些知识链是这一章的主要目标。

如果说西方海洋大国正在遗弃海洋，而亚洲人则刚刚开始认识海洋的话，那么这是一个讨论新马汉时代对中国到底具有何种含义的恰当时刻。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战略存在，推而广之，美国海军提供的海洋秩序其未来发展也有赖于此。

中国的马汉式哲学

向马汉请教代表了中国对海洋事务态度的一个巨大变化。在毛泽东的鼎盛时期，马汉在中国被骂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使徒，当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压迫中国的大山。基于意识形态的缘由，信服陆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马汉的海权思想。在一篇评述马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书评文章中，倪乐雄生动地描述了过去中国人对马汉的态度兼有“厌恶”或“憎恨”。^① 倪乐雄的文章中充斥着中国学者对马汉理论的批判和否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马汉的作品就已经开始激发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强烈兴趣。诸如“制海权”和“制交通权”等术语成倍增加。一些新马汉主义者对美国理论家把制海权理解为“压倒性的海上权力，驱走敌人，或允诺敌人像逃犯那样出现在海上”迷惑不已。^② 在一些

① 倪乐雄：《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第23页。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138.

重大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分析家已经就这些高深莫测的术语进行了解读，并宣示其对中国的价值。^①

我们看到，对马汉而言，贸易与商业、商船和军舰，以及地理扩张等都是在拥有海权的情况下实现的。马汉的意思是，国家想要获得的是基地或使用基地的协议，而不是对东道国强加殖民主义规则。在马汉的上述等级排名中，商业处于第一位。他断然否认使用武力的价值，马汉深信海上战争不利于贸易。^② 从实际意义看，马汉与今天的全球化支持者如出一辙。当代全球化论者指出，如果发生战争，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将伤害当前或潜在的贸易伙伴。从政治、军事或经济的成本考虑的话，战争的价值非常低。

尽管如此，马汉的著作还是带给后来者一种零和思维。他的许多追随者仍然走向了海战——这种确定国家兴衰的达尔文式斗争。马汉在其著作《亚洲问题》一书中指出，“增长是健康生活的保障”，并强调各国拥有“权力去利用正当手段确保国家进步，并打击损害该国获得进步的外来干涉，如果外来干涉本身并不具有合法性的话。”^③ 乔治·贝尔（George Baer）指出，“海权理论的核心是对冲突的预期。当国家的繁荣取决于船运商业，而贸易量是有限的时候，那么在竞争趋紧的情况下，会导致海军竞赛以保护贸易。”^④ 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期，这一阶段的德国是

① “Asia’s Maritime Rivalries,” *Economist*, June 11,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825154.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1900; repr., Port Washington: Kennikat, 1970), 38.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1900; repr., Port Washington: Kennikat, 1970), 29–30.

④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 S. Navy, 1890–199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一个迅速变革的马汉式国家，舰队中的狂热分子甚至创造了“马汉主义”一词，用以指称有关增长、衰落和永久争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①在对马汉著作进行决定论和简化的解读之后，“海军意识形态”也出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中。^②

如果马汉的确瞩目非暴力国际竞争，那么他一定对这种滥用他的理论的现象感到震惊。但是许多马汉的追随者，不管是过去还是当前，都漠视他对和平贸易的倡导，而赞成他的更暴力性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展现了海洋大国的魅力，激发起想象，并给人们以承诺去恢复国家威严。许多中国战略家都属于这一范畴。马汉对经济和谐的呼吁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当前中国正全力促进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运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汉对海军控制关键水域的见解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这意味着由商业驱动的海上战略将担负越来越多的军事扩张。^④

不同于那些集中讨论战略机制和作战的战略理论家，马汉不仅探讨功能性问题，也深入剖析由海洋战略激发的政治

① V. 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35.

② 参考 Sadao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③ 例如，可参考 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76 (Summer 2004): 137-147.

④ 对在建中国商船的估计可参考 David Lague, "The Making of a Juggernau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8, 2003, 30-33. David Lague 在文中表示“马汉在中国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力”，他指出中国商船建设的速度惊人。另外一些媒体也提到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快速增进舰船能力的因素。例如，可参考 Edward Cody, "With Taiwan in Mind, China Focuses Military Expansion on Nav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04, A12.

目的。20世纪40年代，斯普劳特夫妇发现马汉阐明了“海权的主义与海权的命运”。马汉塑造了“海上力量的哲学”，这是一种“国家繁荣的理论和建立在重商主义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的天命论”，同时它也是有效提升海军战斗力，甚至技术性事务的“海军战略和防御的理论”。^①用克劳塞维茨的术语来看，作为一种暴力性、交互的意志冲突形式，战争中存在着区别于其他人类行为的“语法”。^②但是最终政治给海洋事业以“逻辑”，并决定其目的。^③用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的比喻，逻辑和基本原理是马汉海权理论三叉戟中的两个。

我们有可能只谈论马汉理论中的一个方面，比如逻辑或者语法，而淡化甚至忽视另一个方面。如果美国理论家关于海上战争的原理不看时间和技术变革的话，那么这类海权哲学仍然是无用的。中国海军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马汉对伟大的国家源于海上力量的断言让许多中国战略家陶醉。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断言中国是“海洋国家”更能说明问题，吴将军认为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海域管辖权。吴将军呼吁中国公民提高对海洋的集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④强大的舰队巡视海洋属于复兴的一部分。吴胜利所描绘的天定命运和中国海洋未来这两者的关系，会从马汉的学说中找到支持。

①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203, 217–222.

②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605.

③ Michael I.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3rd ed., repr. (London: Frank Cass, 2004), esp. 119–134.

④ 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第14期。

在周边获得驻地

我们相信中国接受了马汉关于海权的逻辑，一边挥舞着美国理论家的第一支三叉戟，一边寻求本土资源以指导海洋战略和战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借鉴早期理论家如孙子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思想，是北京实施三叉戟战略中第二项内容的创始人。但是为了理解马汉和毛泽东的战略传统如何可能与中国海洋战略形成互动，我们必须首先辨识中国何以走向海洋。复兴中华民族这一理由必要但不足以让北京在远洋舰队上作巨额投资。同样重要的是，要辨别哪些地理特征促使中国战略家注意海洋。如果海权建立在商业、基地和船只的基础之上，那么有必要对以下这些行为做出预测：包括中国企业家将在何处建立商业关系，以及北京选择哪里作为基地，如何考虑值得维护的费用。

为什么出海？首先，中国日益拥有超越亚洲大陆的能力。数个世纪以来威胁中国安全的陆地因素基本消失，北京已不用再担心苏联袭击中国的核心地带，也不用再去管理不断升级的中苏冲突。陆地上其他较小的争议也逐渐得到解决。北京已解决与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越南、朝鲜与蒙古的陆地边界争端，与亚洲大陆腹地的诸多国家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中印边界争端的主要争议地是位于中印边境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但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总之，北京现在可以考虑成为海上强权而不用担心损害其陆地利益，它可以把以前需要防范陆地边境威胁的资源集结于海军建设，生产军舰、飞机和弹药。

其次，经济是中国发展海权的动力。与马汉一样，在中国思想家眼里，商业茁壮成长与海军发展是相互关联的。不过，

商业交换是否应该免于海军威胁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在受人尊重的《中国军事科学》上，少将蒋士良援引美国理论家的观点来证明中国控制关键商品的“战略通道”的合理性。对蒋士良来说，角逐关键水域的“绝对控制”和地理资产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现实。^① 为什么具有明显的军事竞争态势？中国共产党将其合法性归结为安抚民众和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北京已经到波斯湾和非洲等偏远地带寻求资源供应者。

对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关注，将印度洋、南中国海与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这一条海上交通线连接起来。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些海上交通线即便对共产党统治不算生死攸关，但中国船舶自由通过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依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数次宣称要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以确保自身最基本的利益。中国似乎没有顾及美国的善意，打算自行确保东亚的海上安全。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叶海林做了形象的解释，“不管中国是多么喜欢和谐世界或者和谐海洋，海上运输线都绝不可能依靠别国海上力量来保卫。一个基本上依靠对外贸易强盛起来的制造业大国将自己远洋船队的安全交到其他人手中，和把咽喉放在别人匕首下面并且用红笔标出自己血管的位置没有任何实质差别。”^② 在叶海林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或不愿意保护自己的海上利益，那么会招来外界干扰贸易，从而增加了中国的脆弱性。因此，中国认识到尽管美国海军维护亚洲航运六十载，但其善意的姿态几乎一夜之间就可彻底改变。华盛顿可能在关键时刻借此威

① 蒋士良：《再论制交通权》，《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5期，第106～114页。

② Ye Hailin, “Safe Seas,” *Beijing Review* 13 (April 2, 2009).

胁中国的资源流动、绑架中国经济。中国战略家总是担心有朝一日美国海军的封锁。^①

中国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地理因素影响经济健康。对中国来说，从日本本土到印尼群岛形成的第一岛链，看起来像是美国意图遏制中国海权发展的路障。中国评论员回忆起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20 世纪 50 年代为美国划定的“太平洋防御线”，其内容大致与岛链相近。^② 主张发展海权的人很容易看出岛链说与艾奇逊的说法接近，这是美国阻止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的壁垒。岛链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刺痛了中国。

为了控制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建立自己的海上长城，这促使北京发展海军和军事力量，增强其在近海和近空话语权。一旦解放军部队在诸岛屿间自由航行，那么中国的国防影响将遍及太平洋周边，从而把艾奇逊的概念压缩到太平洋内。如此一来，外国船队在进入太平洋时，不得不三思而行，因为它必须考虑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海域或岛屿基地的军力威慑。北京一旦获得自由行动能力，将极大地扩大防御范围。

台湾也是发展进攻性海权的一个平台。分析人士认为，台湾是中国军力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地理财富。如果该岛是一个海上长

① Bruce Ellema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Blockade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China's Energy Strategy: 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 ed. Gabriel B. Collins,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William S. Murra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365-386.

② Dean Acheson, "Remarks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January 12, 1950," in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12, January 1 - December 31, 1950*, ed. Raymond Dennett and Robert K. Turn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431.

城的守卫塔，那么它的进攻性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在二战期间，海军上将厄内斯特·金（Ernest King）宣布，美国海军通过驻守日本到台湾一线，事实上以“软木塞放在瓶里”的方式遏制了中国向南中国海的军事发展。也就是说，台湾一旦独立，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切断连接东北亚和南亚的海上通道。与此同时，当自己要使用该航道时，就可以打开瓶子。^①这就是制海权的本质。中国思想家回忆起麦克阿瑟将军对台湾的描述，它是放置在中国沿海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是美国遏制战略的空中和水中部分。^②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都在台湾派驻监测和核作战飞机，形成了第一岛链内的中转站。即便是今天，台湾“外国势力”也是常见的，这份不好的回忆一直萦绕在中国人心头。

在评估台湾的价值时，中国分析师使用马汉的周边原则。中国人偶尔也把目光投到美国第二岛链的海军要塞关岛，讨论关岛在同样严峻的情形下所发挥的作用。^③如果台北保留了其事实上的独立，那么大陆将继续被约束在岛链内，无法自由进入广阔的太平洋。权威的《军事战略学》一书揭示了这一点，“如果台湾脱离大陆……那么中国将永远被锁定在太平洋西侧的第一岛

① 转引自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Two-Ocean Wa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476。

② 转引自 Courtney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56), 378 - 379。

③ 参见展华云《出海口：走向世界的战略通道》，《当代海军》2007年第4期，第28页；李玉平：《台湾地缘战略的海权解读》，《现代舰船》2004年第4期，第5页；白炎林：《岛链与中国海军》，《当代海军》2007年第10期，第18页；陆保生、郭宏军：《关岛：西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塞》，2003年6月19日《解放军报》。

链”，一旦这样，“中国复兴必不可少的战略空间将丢失。”^①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的地缘政治面临着与一百年前德国类似的问题（见第三章）。美国能把权力延伸至岛链内部，而中国则试图向外拓展其权力。如此一来，近海岛屿链就构成防御和进攻的资本。这些岛链并不是沉寂的大厦。

中国国防白皮书与海军战略

北京每两年公布一次中国国防白皮书，为国际社会理解解放军如何处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提供了线索。中国问题研究显然不是精确的科学，观察家们继续就这类报告的来源争吵不休，其中许多与军方有密切关系的出版商，或多或少都具有权威性。尽管如此，发布一份较为详细的国防白皮书，向外界认真说明中国如何计划应对其安全环境，在此过程中该白皮书经过了严格的审查，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外国政府，经常指责白皮书不够详细，但白皮书已经是理解北京如何看待其战略及周边威胁的最权威论述。

在这些文件当中，《2004年中国的国防》也许是对海洋事务最具开创性的评论。白皮书认可东亚走向和平与经济发展，但它也认为，“新的深刻调整”继续干扰国际关系，“主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进程加快”。美国“重组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军事同盟关系”，而日本“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加强自己的地位。日本是从东北到南部的第一岛链的

^① Peng Guangqian and Yao Youzhi, *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5), 443.

核心，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重要一环。

目前还不清楚地缘政治动力是否获得北京的青睐。2004年国防白皮书显示出对全球化的矛盾心态，认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在新秩序建立之前“围绕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此起彼伏”。因此，“军事因素对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的影晌上升”。白皮书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能够“赢得制海权和制空权。”^①

这是中国马汉主义的最明显的官方声明。它也是第一个在官方指导性文件中提到“公地”的控制——即海洋、天空、太空，甚至是网络空间。《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得军舰、飞机、精密武器和信息技术，以确保获得制海权。

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放弃了前一版的马汉式语言。但它关于全球政治的观察仍然非常矛盾，新版本忠实于前一版对近海水域和领空控制的表述，和2004年版对地缘政治的关切一样不甚明朗。该报告指出国际贸易威胁的主要来源，宣称“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令人吃惊的是，列入报告的五个安全问题中，三个直接涉及海上运输，这是马汉三大支柱中的一个。

2006年国防白皮书进一步指出，“海军逐步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提高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空军加快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提高空中打击、防空反导、预警侦

①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4,” December 2004,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Web site,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doctrine/natdef2004.html>.

察和战略投送能力。”^① 原来清晰的马汉式语言已经消失，不过控制公地这一概念表明，中国的国防防范范围扩大至境外这一点仍旧保留着。

2008年版的国防白皮书软化了2004、2006年版的基调。尽管它仍旧重复前几个版本的近海防御任务，但新白皮书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海盗、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同时，白皮书也关注海运武器扩散。白皮书描绘这一最新阶段的发展，即越来越多的外向型海军发展态势：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在近岸海域实施防御作战。80年代以来，海军实现了向近海防御的战略转变。进入新世纪，海军着眼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②

上述这段引文概括了中国海军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中国海军在毛泽东时代从无到有，它将在未来几年实现如下执行能力：在作战范围的一个极端上，解放军海军将为中国确保水下威慑，确保北京在面对解除武装式第一次打击时具有反击能力。在另一极端上，军队将在对中国能源安全和商业机会至关重要的水域，维护良好的海洋秩序。中国明显具有承担非传

①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6," December 2006,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book/194485.htm>.

②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8," January 2009,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eb site,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China_English2008.pdf.

统任务的意愿，这是一个重要转向，预示着中国日渐增强的海上能力的信心。

澄清上文引用白皮书中所使用的关键术语和概念相当重要，它们为正确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给当前和未来规划任务时如何分配资源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中国规划者而言，“近海防御”仍然是一个基本概念，不过对西方分析家来说，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仍然显得有些混乱。尽管在官方出版物中近海通常被翻译为“离岸”，但更接近于字面和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附近海域。”李南 [音] 解释说，“对于中国试图表达的相对距离这个意思来讲，离岸这个词含义太含糊。”^① 在李南看来，“附近海域”这个词是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接近于航海环境中以中国为中心这一含义。但是对本书而言，“离岸”和“近海”这两个术语是可以互换的。我们认为，“附近”并不比“离岸”更少主观性。

过去，一些观察家认为，“离岸”意味着投送力量时的距离通常在二百海里。但考察中国海军权衡该主题时的权威图表和来源，以及仔细研究中国战略家的想法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人并不赞成这一狭窄的空间观。在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刘华清将军——他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的马汉”——的回忆录中，这一距离是有记载的。^②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刘华清为中国海军战略提供了知识基础。因此，刘对海军发展的描述是相当权威的。他明确写道：“‘近海’是指我国黄海、东海、南海、南

① 参考 Nan L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Asian Security* 5, no. 2 (2009): 145.

② Jeffrey B. Goldman, “China’s Mahan,”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22, no. 3 (March 1996): 44–47.

沙群岛海域，台湾－冲绳岛链的内外水域，以及北太平洋海域。”基本上“附近海域”超过“中等距离”海域。^①刘华清对中国海军看待近海的简短说明揭示出几个关注点。

首先，地理界限并不一定决定中国如何看待国家海洋环境。对刘华清而言，根据海上防御任务制定的海军作战能力拓展并不限于第一岛链包围的水域。例如，刘华清指出的“北太平洋”可能包括日本列岛以东海域。近海防御的范围到底超越第一岛链多少仍然还不清楚。不过，有可能这一策略是故意的，这样就允许未来的解放军指挥官根据中国的需要和能力大小来解释它。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刘华清制定和完善近海概念已近 25 年。这一概念的寿命不仅证明了刘华清为中国海军所作规划的长期性，它也预示着这一个概念具有含意深远的灵活性。刘坚称近海防御是要确保反击从任意距离来的攻击，这一声明意味着中国海军可以根据其自身能力调适这一距离。最近的白皮书将近海防御多次推离大陆海岸，这再次验证了该概念的可塑性。

再次，刘对近海的定义传达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以极度私有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沿海地区。这种明显的自以为是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主要的近岸海域历史上都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周边地带，自然适合于中国的保护。应该基于这种背景去理解北京对周边海域的主权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海防御应被视为中国本土防御的一个次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期望中国将近海海域的战斗以及获胜视作价值非凡。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官方百科全书从功能方面定义近海防御，包括四个主要目标。中国海军将要：①坚持防御性海军战略

①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 434 页。

目标；②增加其海事防御力；③进行战场准备；④执行主动防御。根据条目：“〔近海防御〕结合使用各种方法，从总体上影响海上力量，在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时，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它需要足够的把握机动作战能力，以搜索和消灭敌人，逐步扭转力量对比，改变战略形势，从而在适当的时机过渡到战略反攻和进攻。”^①关于近海防御的这一条目的结论是，“〔随着〕海上进攻性武器的有效范围增加，近海防御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面临许多重大改革。”它承认海上战争和预期作战对手拥有更大的范围并且在攻击力之间存在着互动性。本条目写于1999年，早在中国海军实现其目前的地位之前，像刘华清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官便明确预见到需要扩大近海防御和适应新的军事动向。

姚有志少将和陈泽亮大校在著名的《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要求提高军事能力，扩大控制范围，或者建立作者所谓的“交通战场”。他们宣称：

实行攻势防御须加强交通战场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战场将向敌我两个方向延伸，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己方交通战场的防护，而且还要着眼于前出，并力求把交通战场推向敌方，在敌必经之路上打击和阻滞敌人。届时交通战场的范围将从陆地推向海上和空中。加强较大范围的外向型的交通战场建设，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保证“打得赢”的必要举措。^②

① 中国海军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海军百科全书》，海潮出版社，1999，第1154页。

② 姚有志、陈泽亮：《高技术战争交通战场建设初探》，《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3期，第61页。

扩大和准备更具竞争力的战场空间这一观点，与几版国防白皮书提出的适应海军发展的一般要求完全一致。对某些人而言，这种积极的防御姿态完全符合中国历史。戴旭上校说：“中国军队的建设发展方向虽然指向海洋，和长期趴在陆地上的姿态相比这只不过是站起来，把防线向外推几步而已，战略防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近 200 年来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本土，就是发生在中国门前，中国理所当然有权将历史上的战争噩梦推远些。”^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坚持一个高度的进攻作战姿态，去赢得和行使交通控制权。这种进攻精神的起源可追溯至中国的战略和军事传统。虽然中国官员、海军和学者得出这种结论的灵感来自美国理论家马汉，但他们经常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著作，学习力量结构、策略和海军学说。我们在下文将显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存在着近海防御和进攻防守的概念。因此，值得重温毛泽东的战争理论，以此窥视未来中国海权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主席，他不仅凭借个人魅力，也通过大量的政治和军事工作，给当代中国印上了自己的战略观点。共产主义在中国也许处于衰落之中，但毛泽东的头像仍然悬挂在首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陆，不够重视航海活动。即便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其名称和基本原则都从毛泽东的“积极防御”

^① 戴旭：《大国崛起离不开军事转型》，《环球时报》2007年3月15日。

中衍生而来。

毛主席在数十年的战争中不断完善他的“攻-防”方式，从相对弱小的阶段发展到获得最终胜利，起初是把日本从中国驱逐出去，后又经过内战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①红军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获得胜利，红军通过故意拖延战术疲惫敌人，并招募中国民众，以全民战争的方式取得了分期、快速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接受了《孙子兵法》中的很多指导，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战略理论著作。但与此同时，毛也无视孙子对持久战的警告。

这纯粹是权宜之计。就像今天的中国海权支持者那样，毛泽东嘲笑被动防御，甚至在他的红军力量很小的时候也如此。毛泽东预见到他的持久战理论可能被误解为被动，所以他煞费苦心地区回避消极。“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他说，“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相反，主动防御被提高到为在最终决战中的战略反攻所做的准备：“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② 尽管物质装备上更有利于国民党军队，但红军混合了源自《孙子兵法》的直接和间接的攻

① 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建设海军的论述，参考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The Chinese Navy's Offshore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47, no. 3 (Summer 1994): 9 - 18; and Jun Zhan, "China Goes to the Blue Waters: The Navy, Sea Power Mentalit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7, no. 3 (September 1994): 180 - 208.

② Mao Zedong,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207, 224.

击技巧。^① 最终，通过在战略防御阶段消耗敌人的力量，共产党改变了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最后采取战略进攻，并取得胜利。

灵活性是必不可少的。“在军事上说来，”毛主席告诫说，“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在防御战役起始之初，战略撤退是正确的选择，但也只是在面对强大的反动力量时才可如此。防御部队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广阔的战略纵深。他们可以假装虚弱，撤退以引诱敌人做出不自量力的事：

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②

毛泽东把红军部队称作“聪明的拳师”，“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引用孙子的说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③ 红军回到自己的基地之后，集中力量，使敌人疲劳沮丧，此后红军将着力反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进一步采取攻势，消灭战斗中的敌人。

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理论展示了明显的地理空间的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道，“侵略者经营外线”来包围经营“内线”的中国人。那么现在，引起中国领导人关注的被包围前景，

① Sun Tzu, *The Art of Warfare*, trans. Roger T. Ames (New York: Ballantine, 1993); Mao,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217–218.

② Mao,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220, 234.

③ Mao,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208, 211, 217, 234.

促使他们思考未来对策。根据米兰·维戈（Milan Vego）的判断，

在敌人作战力量之间运动时，就相当于沿着内线运行。内线总是源于一个中心位置。他们从一个中心位置长期地向一个或多个方向运动，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中央位置。内部线路一般允许集中力量反对敌人一部，同时保持小部分力量维持必要的平衡。^①

就内线作战而言，共产党的军队处于不利地位。但即使如此，这也是“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一格言的确表明“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② 在宏观层面的防御战中保持微观的攻势战，毛泽东告诫指挥官零敲碎打地消灭敌人的部队。毛泽东建议“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③ 因而，内线可以变成弱者的优势。这不仅适用于陆地活动也适用海军作战。此外，毛泽东还考虑沿太平洋盆地结成联盟，经营外

① Milan N. Vego,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London: Frank Cass), 85 - 88. 关于美国陆军军队内路线的界定，参考 Headquarters,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ield Manual 3 - 0, *Operations* (Washington, D. C.: U. S. Army, June 2001), 5 - 7 - 5 - 9,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fm3_0b.pdf.

② Mao Zedong,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Guerrilla War,"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83.

③ Mao Zedong, "Problems of Strategy in Guerrilla War,"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82 - 84.

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尽管中国军队在战略上被包围，但“太平洋反日阵线”构成了一种外交上的反包围。^①

毛泽东的理论塑造了中国治国方略和大战略的逻辑，以及作战和战术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军事著作具有毫不含糊的进攻性。消极防御代表“假防御”，而“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② 防御是短暂的，受到不平衡力的驱动。防御不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更不用说是中国的战略偏好。^③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采取战略防御并不是将军事战略或战术限制于纯粹防御或消极应对。

毛泽东的战略智慧运用于海洋以及陆地作战。经由马汉和毛泽东的提示，像倪乐雄这样的中国海军战略家现在经常谈论要控制美国海军第一岛链内的水域。^④ 甚至在美国整体上保持着对亚洲海域的控制情形下，他们仍打算运用进攻性手段包围和控制这些水域。许多中国人视美国统治东亚水域为现代版的民族主义海上包围与压制，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努力用火力和数量优势遏制中国获得

① Mao Zedong, "On Protracted War,"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09.htm.

② Mao,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207, 224.

③ The offensive mindset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when we are already locked in battle with an enemy who enjoys superiority, we revolutionaries should not adopt defensive measures even when we are hard pressed. Only a prize idiot would think in this way." *Ibid.*, 208.

④ 刘华清将军被认为创造了“海上主动防御”这一术语。他用此敦促中国采取分阶段战略控制海域，在第一岛链内阻止美国海军，然后才转入“第二岛链”，在此之后才进一步面向太平洋，最终全球争夺海上霸权。参见 Cole, *Great Wall at Sea*, 165-168; Goldman, "China's Mahan"; Jun, "China Goes to the Blue Waters," 189-191; and Huang, "Chinese Navy's Offshore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18.

海域控制权的正当愿望。^① 毛泽东的红军反围剿的方法适用于海军战斗。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许多中国战略家把毛泽东的陆地战原则借用到海上。^② 如果解放军海军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智慧，那么它会一直保持耐心，直至其相对于敌手的力量对比处于有利的位置。

这样看来，马汉似乎为进攻性的中国海军战略提供了地缘政治逻辑，而中国则从毛泽东那儿获得了执行这一战略的教义和战术。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了国外和本土资源的合成战略理论。

中国人是哪一种马汉？

美国观察员如何洞察中国海军战略思想的趋势呢？许多中国专家阅读马汉的著作，把马汉的观点作为权威来证明他们的见解。但他们并未从马汉的言辞中获得多少具体的教训。值得指出的是，马汉在作品中分析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海权与当前的实际差异甚大，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说其见解弄巧成拙。可以说，英国和美国是马汉海权理论的最佳实践者。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自由海上帝国，无与伦比的皇家海军捍卫着这种地位，英国的例子补充了马汉的海权模型。马汉在著作中印证了英国的做法，吹捧其为一种模本。不出所料，马汉出访不列颠群岛时大受赞扬。例如，马汉当时指挥着海军“芝加哥”号，他获得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并在古老的皇家海军俱乐部发表演讲。^③

① 中国人在理解美国的“包围”和“遏制”等词语时含混不清。参见 Willy Wo-Lap Lam, “Hu’s Central Asian Gamble to Counter the U. S. ‘Containment Strategy,’” *China Brief* 5, no. 15 (July 5, 2005), 7–8。

② Mao, “Strategy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205–249。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1907; repr. New York: Da Capo, 1968), 313–316。

19世纪末期的美国首先赞颂马汉的作品。当《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时，他的作品被看作“填补了当前舆论热切呼吁的需求，这一点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要比在美国更加清楚。”^①该书力图扭转美利坚合众国孤立的历史，促使美国人向西看走向亚洲，向南驶往加勒比海，这是通往太平洋的门户。马汉主张，1898年击败西班牙后，美国已经继承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权利与职责，菲律宾是美国海军驻扎亚洲的第一站。^②在马汉的呼吁下，美国海军建造了一支拥有20艘舰船的美国水域港湾驻扎的欧洲式舰队。美国海军舰队无须强于整个大国海军；它只需要足够的火力来击败入侵美国的，来自欧洲大陆的敌人。美国的战略是要——但也并不一定需要——像特拉法尔加海战（Trafalgar）或对马海战（Tsushima）那样，以少胜多一战成名。

德意志帝国依靠马汉的理论起飞。德皇威廉二世有一次声称，“我现在不仅仅是阅读，而是在咀嚼马汉上校的书，试图洞悉其真谛。在我所有的船只上都有这本书，我的船长和官员不断引用该书。”^③尽管德国领导人热情非凡，但马汉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德国，对于一个大陆型大国而言，过分受限于不利的海洋地

-
-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1907; repr. New York: Da Capo, 1968), 302.
 -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8-10.
 - ③ Robert K. Massie, *Dreadnough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xxiii-xxiv. 也可参考 Margaret Tuttle Sprout, "Mahan: Evangelist of Sea Powe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ed. Edward Meade Ear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415-445.

理条件。马汉的书主要是写给美国人的，美国的海军和商船很容易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与德国不同，美国并不面临来自大陆的威胁，其资源很容易转移至海上目标。而来自德国港口的船只必须通过不列颠群岛，只有穿过英吉利海峡或苏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域，才能到达广袤的大西洋，德国的家底大部分都在非洲和亚洲。^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家海军军舰的封锁让北海变成了“死”海，英国实行远程封锁，船只一旦离开德国其实就不起作用（第3章探讨了德意志帝国案例的一些细节）。

马汉说日本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在马汉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与一批日本官员和翻译的愉快通信”。没有人比日本人“对这一课题给予更密切、更兴趣十足的关注”，这一点从“其制备和他们在日俄战争中的成就”上表露无遗。马汉接着说道，“就我所知，同类作品中再也没有比我的著作更多地被翻译成日文。”^② 1902年，山本权兵卫（Yamamoto Gomei）将军为他在日本海军学院提供了一个待遇丰厚的讲习职位。^③ 在开始阶段日本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然而日本帝国随后的海上战略却极为失败，部分原因是日本国内对马汉海权理论的主流解释出了问题。在马汉理论的指导下，日本试图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区，沿着第二岛链建立防御外围，为此还建立了一支无与伦比的舰队。^④ 日本对地理特征和力量结构的痴迷导致其毁灭。

①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929; rep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22.

②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303.

③ Shinohara Hiroshi, *Kaigun sōsetsu shi* [History of the Navy's Establishment] (Riburopōto, 1986), 409 - 13; David C. Evans and Mark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 - 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67 - 71.

④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像过去的海权大国一样，中国现在到处是马汉的爱好者和批评者。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评论家很少超越大家熟悉的马汉原则。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国人还在不断评估马汉的海权理论。中国分析家也往往热衷于那些难忘的段落，用马汉的作品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以证明预先就确定的结论。中国评论家接受的是表面价值，例如，他们认为马汉的单一目的是说服各国建立海军，以便通过武力解决经济纠纷。^①在对马汉著作中的这一逻辑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中，展华云认为：

海权论的创始人美国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马汉提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并且能够控制海洋。他的制海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世界海军战略的分水岭。他的海权论学说及海军战略理论应运而生，成为西方海军战略理论的基石和谋求霸权的思想武器。^②

冯昭奎引用马汉的著述，“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他斥责马汉的海权过于偏重军事，“海权的潜台词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舰队能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就可以了，控制重要航道、获得海外资源才是崛起大国的真正目的。”^③冯昭奎敦促中国避免走上霸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马汉当时为雄心勃勃的海上力量制订的。其他人则把马

① 刘新华、秦仪：《现代海权与国家海洋战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73页。

② 展华云：《经略海洋——叩响大战略之门》，《当代海军》2007年第5期，第17~19页。

③ 冯昭奎：《中国崛起不能只靠走向海洋》，2007年3月23日《环球时报》。

汉与美国在亚洲的海上霸权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美国位于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而且其中还有人认为马汉给美国带去了对中国的敌意。根据沈阳炮兵学院的高新生的分析：

马汉在其著名的“海权论”中认为：要取得制海权，就要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建立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网；为使美国获得制海权，就必须以强大的舰队在海上开辟战略基地；建立军事据点。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美国先后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主要岛屿，在岛上建立起许多重要的军事基地，并且与太平洋上的岛国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建立起牢固的军事同盟，从而实现了其海上扩张的战略，并构筑起所谓的岛屿封锁线，成为其控制海洋的重要据点和网状纵深战略布局。^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陈舟认为，地缘政治利益一直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美国的对华战略，从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地缘战略背景。正是依据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思想，美国占领夏威夷、菲律宾等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使之成为进军亚洲和中国的‘踏脚石’，将力量伸展到距美国西海岸7000海里、距中国海岸仅700海里之处。”^②高新生和陈舟都从一个世纪以前发表的马汉理论中寻找当前美国的亚洲战略。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揭示的线性因果关系含糊不清。马汉的逻辑深深引起中国战略家的共鸣，自然地导致他们把马汉的

① 高新生：《岛屿与新世纪中国海防建设》，《国防》2006年第11期。

② 陈舟：《美国对华战略演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4期，第9~13页。

动机与美国决策者——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些近似于漫画式的对马汉理论的粗略理解，显然加深了北京误读和简单化这位美国理论家的可能性。一方面，对马汉的误读可能是无害的。中国分析家钻进死胡同后，也会转移到另一个更适合中国独特性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预期一种较悲观的结果。如果中国不加批评地接受马汉理论中的军事主题，并依此模式化中国海军政策，那么北京很可能重蹈德国或日本的覆辙。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和谐的亚太地区的前景将无比暗淡。

至少有两点可以解释这种明显的肤浅，每一点都对思考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思想有着重要启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思想家仍然在阅读和消化马汉的理论，并考虑如何将它们应用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文献表明，他们发现马汉的内涵要比作战舰队更深厚。马汉认为，“商业繁荣得益于和平，而毁于战争”，因此对一个海洋国家来说“和平是首要的利益”。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话语讨论中越来越多地提到马汉。他们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大大超出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也包括更多论述地缘政治的书籍，比如《亚洲的问题》和《美国的海权利益》。

随着中国思想家对马汉理论的理解日渐深入，意识到马汉理论不仅包括综合作战、战术和力量结构层面的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的视野，这些人可能调整自己适当利用海权的态度。在中国有关马汉的话语圈里，突出和平的商业竞争将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西方分析家应该对中国更深入、更丰富地掌握海权理论进行及时监测。

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出理解马汉的复杂性。例如，刘中民在海权理论研究领域的三部曲中广泛引用马汉的作品，代

表了近期学术界的明显进展。^① 北京也在对大国兴衰进行深入分析，期望通过梳理历史来获得如何经略崛起的经验。分析人士似乎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需要谦虚和谨慎地使用海上力量，以免其他海洋大国，特别是美国寻求抗衡中国的海上势力。

事实上，一些中国的新海权主义者敦促北京拓展“有限海权”，目前中国的海权在地理上仍然限制在第一岛链内。^② 在他们看来，要维护中国的领海主权，一个真正的马汉式解放军海军应该集中精力确保对贸易至关重要的海路畅通。这样中国将努力提升适度的战舰水平。还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马汉重视和平时期商业的独特重要性。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马汉从不规劝海军为自己而战。^③

在更具体的业务和战术水平方面，一些中国战略家公开质疑马汉的追随者，后者过分迷恋马汉对制海权的解释。海军少将、海军指挥学院院长黄江提供了一个最有洞察力和细致入微的制海权概念。他劝告：

夺取制海权不是一种零和对策。在海战中，我方失去行动自由，并不意味着敌方必然获得行动自由。我方阻止了敌方获得行动自由，也不等于说我方必然获得行动自由。只有当一方不仅阻止敌方海上行动的自由，同时也享有海上行动

① 刘中民：《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海洋世界》2008年第5~6期。

② 王素娟：《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海权》，《赤峰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87页；张文木：《生存发展海权》，《当代军事文摘》2006年第7期，第30页。

③ 蒲瑶：《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6期，第144页。

的自由，才能说明其已经掌握了制海权。否则，只能说制海权还处于一种争夺的状态，归属是不确定的。^①

黄江敏锐地意识到海上控制是一项高度不确定和困难的工作。事实上，他的这番话等于重提了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爵士的主张，朱利安认为非控制状态是一种常态，总存在争议。^②他认识到中国海军可能会处在一个模糊的作战环境中，海上控制稍纵即逝，很难实现。国防大学的纪荣仁、王学进预言中国和潜在的敌手之间存在着持续竞赛（fluid contest）。他们认为：

制交通权并不排除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反复争夺和得失。对于任何强大的军队，制权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夺取全部的、自始至终的制交通权、制空权、制海权。对于装备相对落后的我军来说，更是如此。制权的控制时间是有限的，控制程度是相对的，控制范围可能是局部的，控制权的得失是动态的。^③

这些清醒的评估与那种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寻求“绝对”控制的说法相去甚远。就实际而言，这种更现实的评估符合中国近海防御战略，即努力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维护海上控制，直至距离大陆海岸几百英里为止。马汉、毛泽东和刘华清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鼓励分析的趋势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家群体

① 黄江：《论现代制海权》，《中国军事科学》2003年第2期，第25页。

②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91.

③ 纪荣仁、王学进：《试析制交通权与制空权、制海权的关系》，《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4期，第141页。

中。不过，这种对海权理论进行更细致、更准确解释的潮流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海权主义者仅仅是利用马汉来游说建设费用高昂、高技术的强大海军。他们不需要广泛深入地阅读马汉的作品，只要宣传威胁中国利益，就能建设强大的舰队。曾有一篇文章敦促北京建立远洋海军舰队，这表明机会主义者确实是将马汉作为政策偏好的权威，促使资源向海上军备进行决定性转移。马汉对重建过于简单的海权史贡献良多，罗援认为：

纵观历史，国家兴衰与海军力量息息相关，海兴则国强，海衰则国弱。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500年里，欧洲主要国家实力的消长、国家竞争的胜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海军力量的强弱上。^①

其他马汉主义者从《亚洲的问题》中获取信息，警告美国一个世纪以前的领导存在着忽视海权的危险。马汉认为，“睿智的政治家”将抓住美国在海权上“国家落后”的情绪，不知疲倦地工作以“提供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海军——如果没有海军，那么扩展国家意志的努力，将处于紧急状态，而国家也变得笨拙、臃肿不堪，看上去像是站立不稳和未受过训练的巨人。”^② 中国分析家喜欢引用这个动人的隐喻，以此呼吁更积极的海军建设。^③ 这些人也试图

① 罗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蓝色呼唤》，《瞭望》2009年第2期。

② Mahan, *Problem of Asia*, 190-191.

③ 李义虎：《海权论与海陆关系》，《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第21页；刘江平、追月：《世纪经略海洋——中国海军将何去何从？》，《当代海军》，2007年6月，第8页；刘江平：《我海军应用不对称作战对付海空威胁》，《环球时报》2009年6月4日。

向政治决策者灌输紧迫信息：如果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施展意志，那么必须加快中国海军现代化。

绝不要认为解放军海军是把马汉作为口号使用的第一支海军。事实上，极为讽刺的是，美国海军领导人用马汉理论建立大舰队，但却把他的书弃置一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使用马汉，无疑停留在口号的层面。就像战略理论的其他作品那样——比如《孙子兵法》，马汉的著作具有可塑性。中国可以挖掘出马汉的多种用途，从引发中国民族主义到编制出强大海军的预算。如果“中国的马汉”们有选择地利用他的理论规划火药味十足的舰队，那么中国的海上崛起可能会导致与其他海权国家的对抗。这意味着，如果同样的马汉式评论鼓噪不断，那么它将为美国海军及其亚洲伙伴提供一个判断麻烦的先行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中国真用战争语言解释马汉，它也不需要建立一个与美国力量对称的海军，用此实现海上目标，如维护中国附近海域的领土主张，控制东亚的海洋和天空，维护遥远的海上交通线（我们将在第四章审视中国力量结构和作战的原理）。北京可以接受马汉关于海军战略的总体逻辑，与此同时，寻求通过武器和不同于马汉预见到的力量来控制重要海域。例如，如果拿深思熟虑的反舰弹道导弹来制衡，解放军可以让美国海军航母舰队远离近海。^① 在这种防护体系之下，中国中型航母可以自由航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技术和理论聚焦于建设相当于美国海军“尼米兹”号或“福特”号大甲板载体。北京以相对较少的成本——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得以履行其马汉式

^① Andrew Erickson and David D. Yang, “On the Verge of a Game Changer,”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35, no. 5 (May 2009): 26–32.

控制近海目标。对此，无疑更符合马汉的思想。西方观察家应避免把自己的假设强加给中国的战略思想家。

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战略家在海上战略方面不会因循守旧。事实上，嘈杂而不是一致是有关中国海权讨论的突出特点。分析人士提出了各种反对新马汉主义的思想流派，援引其他战略理论家支持他们的这些主张。例如，大陆主义鼓吹者（Continentalists）引用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理论论证其主张。^① 鉴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担忧来自北方陆地的威胁，麦金德的著作享有相当一批追随者。此外，大陆主义鼓吹者也可能和马汉主义者一样简单化他们各自偏爱的理论。虽然麦金德作品的翻译略有不同，但中国的大陆主义鼓吹者往往也援引他的著名论断，“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世界”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②

不出所料，他们的意见与海权的主张相左，由此也揭示出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多样性思维。与此同时，这些不同视角为理解观念的相互竞争提供了理想的机会。2007年，关于陆海之争的知识辩论公开爆发。北京大学教授叶自成引发了这场争议，他发表

① 刘从德、吴晓波：《不变的公式？哈尔福德·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理论的三次论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52~56页；吴征宇：《重新认识“心脏地带理论”及其战略涵义》，《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第56~61页。

② 俞邃：《赖斯之行凸显中亚热点》，《瞭望》2005年第42期；杨丹志：《亚欧首脑会议不威胁任何人》，2008年10月27日《解放军报》。

了一系列文章，贬低海上力量在推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同时叶教授强调中国长期战略成功的关键是要追求陆地导向。^① 叶自成坚持认为，“陆权可以离开海权而存在，但海权的存在离不开陆权的发展。因此，陆权仍然是地缘政治中最基本的形态和要素，欧亚大陆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② 麦金德肯定会赞同这些话。

根据叶自成的论述，所有其他形式的空间权力，包括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应为促进中国陆权而服务。^③ 在政策方面，一个以陆权发展为导向的战略，要求中国进一步发展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睦邻和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与此同时，内向的发展战略也会避开与当代海上霸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上竞争，从而进一步造福北京的和平崛起。^④

在另一个著名的杂志上，叶自成为他的假设提供了历史视角。他声称陆权与海权不同，在国际体系中陆权往往更具持久性。叶自成论述到：

以陆权发展为主的那些国家，其影响力则要长久得多。大陆空间有很强的聚集性，一旦形成就较能长久，陆权发展的成果也更能长期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地位……中国这样的陆权大国的影响则时断时续能达上千年。中国虽然海陆属

①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5期，第5~17页。

②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24页。

③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29页。

④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31页。

性都具备，但本质上，中国的自然特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能在几千年中分而不散、弱而不灭，始终是一个统一国家，与中国的大陆属性密切相关。^①

叶自成提供历史上大国过度使用比较地缘政治优势的警示故事。冷战期间俄罗斯致力于发展海权的失败尝试，日本在二战中竞争大陆霸权，都表明试图掌控不熟悉的地缘领域时的危害性。对叶自成而言，近些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的困境，说明美国也“大大超越其自然禀赋所给予的战略潜力”。^②换句话说，中国应该坚持发展陆权，以免重蹈之前大国的错误。

刘中民看起来同样也是以过去来指导未来，他把德意志帝国海军对抗英国的例子作为出发点，直言中国领导人。对刘中民来说，北京对“故事的示范意义”了解得很清晰：“德国的领土既包括陆地也连接海洋，但其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更依赖于陆地。由于过分崇拜和发展海权，德国走向了其区位优势的反面，致使同时在陆地和海上树敌。作为海陆一体的国家，这种困境造成了双重伤害。最终，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被彻底打败。”^③在刘中民看来，上述案例中德国的局势接近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刘认为北京也是一种陆海混合型权力，兼有陆地和海上的战略责任。鉴于这种多维度的压力，中国不可能只专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刘中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重点阐述，“中

① 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2页。

② 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4页。

③ 刘中民：《中美海战之说是误导》，2008年3月12日《环球时报》。

国的综合国力根本不能帮助中国建立起美国式的全球海上力量”。^①因此，中国必须避免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回避徒劳地试图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努力，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无法取胜的竞争。

陆权的中心显然承载着重要的资源与力量结构相关的启示。张敏谦承认，中国必须重视地缘空间层面的所有因素，包括天空、海洋、外层空间和信息领域。然而，由于“在资源配置事实上不可能等量投入而必须有所突出的情况下，身为主要具有大陆型国家特质的中国首要的选择只能是陆权”。^②换句话说，中国领导层必须有选择性地优先考虑其军事投资，最大化中国在陆地上的地理优势。

程亚文则主张，北京应该利用现代化的地面部队，应付内部和外部威胁以及来自陆上邻国的安全挑战。程亚文认为，“维护陆地安全的基本方式，将是空中机动和空陆联合作战，比起陆海空联合作战，将减少复杂性，而且便于发挥中国军队的传统优势。”^③就这种类型的未来而言，中国将拥有强大的军力，能够发动类似于美国陆军空地联合作战的陆战。美国的这个概念发展于冷战时期。这一战略理论的设计师设想使用立足于信息化的精确打击武器，弥补美国及其盟友在欧洲战区面对苏军时的数量劣势。

对一些专家而言，包括叶自成教授，即便北京维持其陆权主导的发展态势，也未必会受制于陆权的命运摆弄。一个强大的陆

① 刘中民：《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4页。

② 张敏谦：《地缘政治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第18~19页。

③ 程亚文：《欧亚大陆是中国利益重心》，《环球时报》2007年11月15日。

权可以有效地控制海上事件，特别是反对中国大陆的临海威胁。叶自成认为，技术进步已经大大延长陆基飞机和导弹攻击半径并增强了它们的攻击力，弥补了蓝色海军的脆弱性。陆地、空中和海上部队的联合“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威慑力量，足以保卫中国大部分海域和中国大陆的所有沿海地区”。根据叶自成的论述，最重要的是“若大陆本土的陆权（陆军、陆基导弹、陆基空军）足够强大，也足以控制台湾海峡的局面”^①。有趣的是，叶自成的这一评估符合当前中国军队针对台海的建设。

上述见解反映出中国地缘战略，尤其是中国海权发展中巨大的知识差异，叶自成与其他人的作品引起了有力的批评。解放军海军的官方出版物《人民海军》出版了直接反驳叶的论著。前大连海军潜艇学院教授陆儒德认为，叶自成的分析不符合中国的战略现实。陆儒德斥责叶自成对海权的理解是狭隘的地理概念，陆儒德进而认为，“建立海权是国家战略面向海洋的自然延伸，也是海上活动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技术、法律和军事。海权决定了一个国家海上事务的兴衰以及强弱，海权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它不只是‘陆权’与‘海权’的竞争。”^② 陆儒德在把海权描述为一种国家大战略的表达时，并未对马汉有多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陆儒德痛骂那种必然在陆权和海权之间做出互斥性选择的概念体系，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倪乐雄或许是中国最多产和最积极的新马汉主义者，他也反对叶自成的分析。倪乐雄尤其反对叶自成的下述观点：即中国可以通过内向化避免与美国展开地缘竞争。

① 叶自成：《中国海权须从属于陆权》，2007年3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

② 陆儒德：《前海军教授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海军》，2007年6月6日《人民海军》。

对倪乐雄而言，最可能的是其相反的结果：中国海上力量的软弱将使中国遭受被侵略和欺凌的后果。^①

对陆权观更有力的批判，是从中国转向海洋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视角出发论述的。对此鲁宁粗略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若以海权视角观之，正是从传统农耕文明之内向型经济形态，向现代工业文明依赖海洋通道之外向型经济形态的嬗变，由此带动中国社会“经、政、文、外、军”等全面嬗变，奠定中国由传统的崇尚陆权，向现代的崇尚海权的历史性转身，继而为中国 21 世纪实现由“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国家中兴之路开辟出清晰的历史通道。^②

这番话语出惊人。关于国家命运和伟大与海权不可分割的观点明白无误源于马汉。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该论点的竞争性思想流派往往带有历史决定论。中国未来是否有信心以线性方式展开竞争，或者只是故作姿态，目前还不清楚。

北京大学教授李义虎利用“陆海二分”概念给出了一个调和的分析。“在处理海陆关系时，”他说，“我们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也不要搞平均主义。”^③ 不过，他认为存在的问

① 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1 期，第 31 页。

② 鲁宁：《融入海洋文明中国应拥有航母》，2009 年 3 月 24 日《东方早报》。

③ 李义虎：《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8 期，第 6 页；李义虎：《地缘政治在整体上发生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 5 月 20 日，第 6-7 页。

题是，大陆主义鼓吹者认为陆权足以保卫中国这一点令人怀疑。李义虎认为，陆权不足以保护“太平洋经济圈的主要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要地”。因此，“发展海权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前景和安全保障的战略问题。”^① 海军指挥学院的冯梁大校同意李义虎的这一判断，敦促北京“坚持在国家安全筹划中‘陆海并重’”。^②

中国海军知识界的复杂性

显然，中国战略家关于海权在中国整体的、长远的目标中的定位缺乏共识。同样明显的是，马汉的世界观绝没有处于垄断地位，甚至也不是中国战略共同体中的主流。但争论本身含有相当多的分析价值。首先，地缘战略思想的辩论在中国知识界竞争和诚实的环境中日益升温。2008年，大连海军潜艇学院教授在一篇回顾10年来海权辩论的文章中，引述了20多篇一流中国学者的论著。^③ 《现代国际关系》是影响中国政府观点的旗舰杂志，2008年5月号的整个杂志都在谈论地缘政治问题，包括海权问题。^④ 许多学术界人士和决策机构经常使用与海权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这类观念显然涉及中国。

其次，话语讨论是一个关键指标，显示海权理论是如何在学

① 李义虎：《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第6页。

② 冯梁、段延志：《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特征与新世纪海上安全战略》，《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第1期，第22~29页。

③ 史春林：《近十年来关于中国海权问题研究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53~60页。

④ 参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编者按”及王在邦：《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第1~2页。

术界和决策圈中“社会化”的。这两个共同体相互观察寻求启示，似乎催生出一个知识互动和进步的良性循环。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思想质量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海洋事务认识的深入，使其变成一个有用的指标，帮助外部观察员把握海权理论获得政策肯定的程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广泛和严格的辩论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环境，使其不同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时期无条件拥抱马汉的氛围。中国可能因此而获得正确的教诲，反对好战的海军至上，在当时的柏林和东京，德日领导人过分痴迷海军至上。如果是这样，那么亚洲海域出现一个合作的海洋环境显然是值得期待的。

再次，对观念的知识竞争为深入了解战略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文化和社会层面提供了契机。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学者们很少注意地缘政治，经常将其描绘成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中不可救药的、过时和不相关的领域。他们往往低估地缘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向其他权力传递西方的世界观。然而，本章的文献回顾表明，中国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人却往相反的方向思考。

这些不同的趋势，一方面印证着西方社会兴起的后现代海权观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亚洲出现了新马汉主义的心态。杰弗里·梯尔（Geoffrey Till）恰当地抓住了这两种趋势，但这两种对立对未来西方-亚洲发生海上抗争的影响仍不清楚。中国和西方在海权意识上的明显差距表明，潜在的相互误解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在海洋问题上，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公理的判断，却可能不适用于北京。因此，西方战略家和决策者应该避免用镜像的方式理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存在关于海洋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可能无法获得中国的回应。

总之，战略理论给了西方人跟踪中国海上崛起的工具，以补

充更为传统的技术性评价标准。如果中国学者和军队中的主流学派继续无视马汉思想中的合作传统，误认为他的作品（或歪曲宣传）倡导血腥的海战，那么中国海军战略会趋向于竞争和冲突。相反，如果中国领导人接受更深层次的认识，提出更周到的分析，充分掌握马汉理论的逻辑，那么争议将减少。西方观察家应该通过筛选中国战略的话语和官方声明，以此确定中国的马汉主义者的走向。美国亚洲战略的长期性可能取决于此。

第三章

中国海权的德国先例

在这一章，我们将研究先例，考察按照人口、自然资源和工业潜力衡量的陆权型国家，是如何发展出卓越的海上力量，以及为掌握海权付出何种代价的。在这个案例中，地理因素和敌人主导海军两者带来过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探究的问题是某种占主流的压倒性判断，即大陆型国家不适合发展海权。这是一种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亚洲成为检验这一论断的实验室。我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合理运用地理优势和明智地管理资源，避免过去陆权发展海权的悲剧。像美国那样，如果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造船和航海上显示出足够的技能，如果他们有坚强的意志进入海洋，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时间会证明这一切。

我们记得马克·吐温的说法，“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的确如此，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和国务活动家努力把握中国的长期发展轨迹。像马克·吐温那样，许多人期待着由历史来预测未来。按照这种思路，丰富多彩的欧洲历史，关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同时带给人们以乐观和悲观的预测。^① 德意志帝国崛起于

^① Aaron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42, no. 3 (Autumn 2000): 147–159.

统一战争（1864～1871年），衰落于凡尔赛条约（1919年），该案例已获得特别的关注。倾向于乐观的中国观察家认为，北京追求一种良性的、低调的宏伟战略，这使人联想起奥托·冯·俾斯麦的德国。俾斯麦极力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缓和邻国对德国意图和能力的恐惧。^①但悲观者则答复说，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工业发达，雄心勃勃地环视周遭小国——最终于1914年向欧洲进军。一个强大的修正主义的中国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搅乱亚洲的现状。如果19世纪末的欧洲还有那么一丁点指导意义的话，那可能就是敌意、冲突甚至战争。^②

中国人自己也分析德意志帝国的案例，研究它与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案例的意义。2006年，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央电视台制作了12集名为《大国崛起》的电视系列片。该片审视了过去500年来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兴衰故事，其中就包括德国。鉴于德国统一之后保持了20年的和平，中国人给予俾斯麦极高的评价。该系列片赞扬了俾斯麦处理德国与邻国的政策，与邻修睦确保国家安全，并孤立持有复仇情结的法国。^③这一实例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中国人希望北京在国际秩序中扮演“负责任的

①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4–219.

② “Statement of Dr. Arthur Waldron, Full Committee Meeting on the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Goals of China,”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June 21, 2000, <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comdocs/testimony/106thcongress/00-06-21waldron.html>. 与此类似，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也常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验警示美国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认为中国一定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59 (Spring 2000): 11, and Paul Wolfowitz, “Remembering the Future,” *National Interest* 59 (Spring 2000): 42。

③ 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37页。

利益相关者”。

国防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唐永胜敦促中国学习俾斯麦模式，实现和平崛起。唐永胜观察到，“德国的俾斯麦曾编织了一个复杂的地缘安全体系，通过构筑与周边国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网络，缓解了欧洲列强对德国的战略压力，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困境，并成功地孤立了法国”。^① 与此类似，中国也应该参与各种覆盖全球的多边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他中国战略家则强烈拒绝与威廉德国作比较。有学者认为与德国类比是“荒谬”和“建立在对德国毫无认知的基础上”。^②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积极的经验还是消极的教训，中国的战略家已经深入考察了德国案例。

鉴于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海上挑战——中国已经派遣护航编队赴亚丁湾，我们期望具有历史素养的分析家和官员注意到历史上海上强国的成败。他们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们未来的行为和政策，不管是周边政策还是海洋战略。威廉德国再次提供了潜在的、富有成效的参照系。德国是欧洲陆地大国，在英国海军统治阶段，极力寻求出海通道，这一过程与亚洲的陆权中国寻求突破美国统治的亚洲海域类似。比较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异同，可以为美国寻找有效的战略对策。

测度海权

海军中将沃尔夫冈·韦格纳 (Vice Admiral Wolfgang Wegener)

-
- ① 唐永胜：《构建坚实的地缘战略依托》，《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第20~21页。
 - ② 参见仇华飞《新世纪中美战略关系发展趋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8~26页。

是德国最有天赋的海军思想家，他编制了一个估算海权的公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格纳是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的一位中级军官，起先是炮手指挥官，后来升任上校。他写了三个备忘录，广泛流传于海军界。他对德国海军战略的思考在战后以《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为题出版，该书跻身于海权的经典著作之列。韦格纳写道，海权是几种因素的产物，包括：①“战略位置”，即地理因素；②舰队，即战术因素；③一个社会走向海洋的“战略意志”，它不仅“将生活气息融入舰队”，而且力图改善国家的战略地位。^①德国海军领导者从来没有试图改变这种扼杀德国海军锐气的战略处境，而是把舰队部署在很少有敌人争夺的水域。除了误导德军的努力方向以外，海军司令部还缺乏进攻精神，不敢与英国皇家海军正面交锋。一旦发生挑衅、激变或需要谈判，对于柏林来说，战争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

这种异端使韦格纳在海军中几乎没有朋友。海军上将马格努斯·冯·莱沃茨（Magnus von Levertzow）是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海军参谋长，他评价韦格纳是“吹毛求疵的人”，是沉迷于地理和消极等待的学究。^②尽管如此，韦格纳的模板为比较历史上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我们考察德国和中国海洋地理的异同，分析德国和中国海军基于相对优势所采取的措施，并评估德国和中国人民倾向于航海的程度，以此说明未来中美在远洋的互动，运气好的话，还将有助于华盛顿友善地处理与北京的关系。

① Wolfgang Wegener, *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929; rep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xxvii, 96–100.

② Holger H. Herwig, “Introduction,” in *ibid.*, xxviii, xxxvi, xxxix–xli.

地 理

将地理简化为抽象杂乱的线条图和航海图是一种自然倾向，但战略地理学是一个天生需要努力的互动领域。像战略的其他层面那样，地理也不能脱离人的因素。历史上的海洋强权如何管理新进入大国圈子的国家，这一点值得认真考虑，因为大国往往将重组海上秩序，使之成为更有利于自己的优势。英国在 20 世纪前后的欧洲展示了卓越的海上力量，而现在美国在亚洲海域扮演同样的角色。任何海上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互动模式都将带来启发。

德国领导人赏识海权理论家马汉的思想。前面的章节已经指出，马汉关于人类与海洋互动的思想是革命性的，致使有评论员称他为美国的“福音”或海权革命的“哥白尼”，而不单纯是一位地缘政治思想的先驱。但柏林却迷失在地理上。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 1783 年》中提出的开创性理论，获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特别青睐。有一次皇帝报告说，他不只是阅读，而是在“咀嚼马汉上校的书，试图洞悉其真谛”。^① 马汉开创的不仅是一个海军战略的理论，侧重于海上战斗的机制，而且马汉的学说也是一种强调地缘政治在促使国家走向海洋中的作用的“哲学”。^② 在马汉看来，海权的内涵远比海军和海战更丰富，

① 转引自 Robert K. Massie, *Dreadnough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xxiii - xxiv. 也可参考 Margaret Tuttle Sprout, "Mahan: Evangelist of Sea Powe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ed. Edward Meade Ear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415 - 445.

② Holger H. Herwig, "The Influence of A. T. Mahan upon German Sea Power," i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 ed. John B. Hattendorf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1), 70 - 71.

它还包括国际贸易和商业。马汉认为人天生倾向贸易，这是海权的基石，由于贸易的需要，国家才发展前沿基地支持蒸汽船航海。^①

马汉还宣布，一个伟大的航海国家需要在远洋拥有一处或两处基地，以防止敌手扼杀其海上贸易和商业。^② 美国是马汉学说的拥护者，美国与许多大陆国家不同，它很容易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国从来没有面临来自陆地的威胁。德意志帝国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德国狭长的海岸港口，主要坐落于北海的戈兰湾，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尔和罗斯托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日德兰半岛侧翼。但无论他们来自北海还是波罗的海，从德国港口出发的船舶要进入大西洋，都必须通过不列颠群岛，这就是殖民帝国德国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面临的挑战。^③ 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从南部港口就可以接近多佛海峡，其苏格兰北部斯卡帕湾的舰船可以封锁北海。正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德国航运实施“远程封锁”。

要进入大西洋，德国必然要面对一个敌对的英国。德国需要发展一支舰队，足以在邻近海域压倒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对公海舰队而言，这种战略进攻并不简单。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已经抢占了决定性的地理位置，英国背靠大海，腹地就是英帝国本土防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军的优势。韦格纳对此感到吃惊，英国“发现自己在战争爆发前处于一个极有利的战略地位。

①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71.

② 伦敦《泰晤士报》把马汉作品的革命性影响比作“天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Gregory Weeks, “Mahan, Alfred Thayer,” in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 2, ed. Kelly Boyd (Oxford: Routledge, 1999), 754.

③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22.

英国的商业主要是在大西洋，从易北河出发的德国舰队根本触碰不到。然而，德国的贸易路线却很容易被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的舰队切断”。^①

韦格纳总结到，在战争爆发前“英国完全拥有‘制海权’”。^② 海军上将莱沃茨目光短浅，宣称“胜利的海战……总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战略，在哪一个海上位置攻击敌人的主要力量，定然是不确定的。”^③ 如果这种战略构想被通过，那么其判断就背离了政治目的。为自身而战斗这一概念，始终对军事思想家具有欺骗性。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非德国式的思维方式。韦格纳引述典型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克氏将战役和战斗描述为出于战争目的而使用的战略。莱沃茨反驳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认为战斗本身即是目的，与战略和地理因素无关。

除非德国海军可以侧翼包抄不列颠群岛，提高其战略位置，否则它没有任何机会促进德国的整体战略成功。戈兰湾的战术突击并没有使德国控制北海的能力加强，韦格纳宣称德国所控制的戈兰湾是“死”的。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封锁其进入远洋的通道，实际上使戈兰湾成为在战略上无用的内陆海。经由北海控制大西洋，就像试图从内陆里海控制大西洋一样，德国有以下三个选择。

第一，它可以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矿石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通道。在波罗的海保持对俄罗斯海军的优势，就为德国工业维护了这条生命线。控制日德兰半岛东部狭长地带的海域，将有助于德国掌控波罗的海。然而，这一战略有一个严

①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4.

②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4.

③ Herwig, "Introduction," xxxix - xli.

重的缺点：它意味着放弃德国帝国的殖民地利益，如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

第二，德国舰队强行打开大西洋南部的“门户”。德国可以绕过多佛海峡的港口如布雷斯特和瑟堡，从法国进入大西洋（事实上它在二战期间就是这样做的）。韦格纳指出，如果德国海军在大西洋获得立足点的话，死的北海将“涌现活力”。这将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可以将德国北部港口与大西洋前哨连接起来。德国远洋舰队必须为夺取这条海上交通线而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战斗。

第三，远洋舰队经由北线强行进入大西洋。这个方案需要连续实施，逐步提高德国的战略地位。如果占领日德兰半岛，或者威胁丹麦政府准予德国进入其港口，就为德国海军通过北部海上交通线进入大西洋提供了机会。一旦德国军队占领了前哨阵地，就有可能沿挪威南部海岸挺进，最终占领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甚至是冰岛等战略要地，作为进入大西洋的跳板。即便德国不能在上述地区抵抗英国的反击，这些岛屿的“大门”至少也为德国船舶提供了一条随意出入大西洋的重要海上交通线，而这是柏林一直渴望的。按照韦格纳的设想，从最低程度看，德国舰队为了保持自己的战略地位，不得不动武以解除此些这些战略要点上的英军威胁。

英国政治领导人如何在缩减海外承诺的同时又保持对德国海军的一个可接受的边际优势——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德国发动海战，这是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中心问题之一。从海军竞赛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如何权衡殖民利益和本土防御。最终，保卫领海取代了英帝国对新世界和东亚的承诺。英国政治家取悦于美国，使美国同意在英国皇家海军撤出美洲水域（American Waters）后，监管英国在该区域的利益。英国开始与日本结盟，以补充皇家海

军力量在中国海岸的部署。一系列外交活动之后，英国从各地调集大量军舰部署在欧洲水域。这一切无疑使德国原本认为“英国不会为了维持本土的海军地位而放弃其海外利益”的判断失效。^①

像德国海军那样，中国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方向上存在着大陆和海洋权益，但其范围却是跨区域的。中国陆地与 14 个国家相邻，海上被 6 个国家包围。这 20 个邻国中，6 个国家的人口名列世界前十位，8 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跻身世界前五十五名，其中还有 4 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防大学的孟祥青感叹，“中国背陆面海，但陆有强国接壤，海有岛链环锁。虽为陆海兼备的大国，但从未享受陆海兼备的利益。”^② 怀疑陆权国家寻求海权的马汉，或许会同情中国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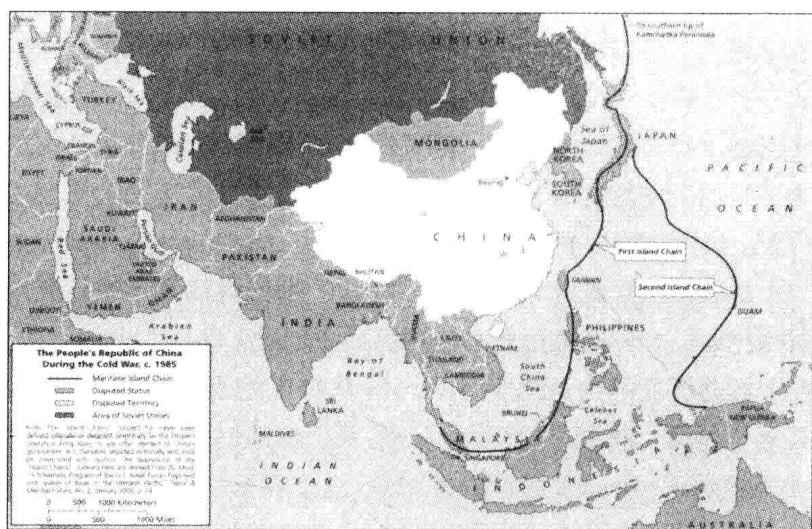
具有地缘思维的中国地缘战略家，比如孟祥青，将目光越过海洋时，自然认为这些岛屿国家是中国进入海洋大道的障碍。在中国分析家眼中，“第一岛链”从日本列岛往南到菲律宾，构筑了包围大陆海岸的防御圈，限制了中国的海上活动。五角大楼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中的一幅地图有助于解释许多中国思想家看到地图时的惊恐。日本领土构成了岛屿链的北部，中间经过台湾部分区域，其中点离大陆海岸最近。岛链在吕宋海峡断裂，此后它向南沿菲律宾和印尼群岛延伸，最终朝北绕回到越南北部。^③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是主观的。蒋

①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Ashfield, 1986), 205-218.

② 孟祥青：《周边稳则中国安，周边乱则中国损》，2007年4月4日《环球时报》。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16.

红、魏岳江在《中国国防报》发表的文章中，将第一岛链描绘成从印尼群岛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弧线。^① 他们选择迪戈加西亚岛——一个由英国管理、美国战机经常使用的岛屿，作为岛链的西面终点可不是巧合。岛链延伸到印度洋，则大大显示出中国担心被海上包围和遏制的恐惧。第一和第二岛链图如下。



第一和第二岛链图

仅仅是偶然一瞥，就会看到自然界本身已给中国进入海洋设置的严重障碍，那些密切关注地缘战略的中国分析家更是心知肚明。中国已经基本解决 14 个陆地边界争端中的 12 处，目前更为焦虑的是这个海上包围圈。在著名杂志《中国军事科学》上，海军指挥学院冯梁大校和段延志中校描绘了中国明显被岛链包围

^① 蒋红、魏岳江：《亚太 10 万美军找“新家”》，2003 年 6 月 10 日《中国国防报》。

的图形，他们指出“这些岛屿阻断了中国海向大洋的延伸……中国的半封闭性给国家海上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显而易见……大陆沿海交通容易被切割封锁，而自身海防兵力难以集中。”^①

在有关北京困境的精辟总结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海洋大国不能忍受“有海无洋”。^②对德意志帝国的尴尬地位和中国所处的地理处境进行类比之后，江雨指出：

岛链的存在是中国海军在远洋舰队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地理劣势，实力再强大的舰队如果无法克服岛链的封锁也难有作为，没有真正面对大洋和解决出海口之前的海军，再强大也难以被称为远洋海军。中国海军在面对岛链限制这个问题时不能盲目发展远洋作战的大型舰队，否则很容易重蹈德国一战时公海舰队被封锁在近海而无法作为的覆辙，凝聚大量资金和国力所打造的舰队也就无法在争夺海上权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③

江雨敏锐地指出中国面临的困境。建设强大的舰队可能是唯一穿透岛链屏障，或者说突破“岛链封锁”的工具。然而，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风险，当然包括巨大的开销，但从根本上讲或许是在海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冲破这些封锁时，北京并没有将海军建设放在首位。这些作者的迫切愿望是打破岛链枷锁，确保中国自由到达重要水域，并阻止他们所看到的美国在中国海域的

① 冯梁、段延志：《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特征与新世纪海上安全战略》，《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第1期，第22~29页。

② 转引自《中国须突破第一岛链的包围》，2009年2月21日《大公报》。

③ 江雨：《岛链与中国海军向远洋发展》，《舰载武器》2008年第12期，第30~31页。

反介入战略。

在寻求开放的进程中，地缘战略家们一直聚焦于台湾。就像沃尔夫冈·韦格纳认为德国需要占领法罗、设得兰群岛或冰岛以打开大门那样，中国思想家认为，一旦台湾与大陆统一，那么仅仅是地理条件这一项就将赋予中国直接进入太平洋的机会。如展华云观察到的，中国东海、黄海的外侧是日本本土四岛，而南中国海则被东南亚国家封闭。因此，“台湾以东的洋面是能够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① 他们把台湾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岛”。李玉平将台湾描绘为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和“跳板”。^②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分析的，具有很高声誉的《军事战略学》一书也同样强调台湾的地位。官力生动地描述了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宣称“台湾问题如果解决，中国大陆面对太平洋的大门自然打开，第一岛链就突破了”。^③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林思行（音），更为明确地谈到了台湾的重要性。林思行说，“中国如果没有台湾，将无法摆脱‘第一岛链’，也将被太平洋拒之门外，中国的东南地区将没有任何保障”。^④ 林思行认为，东南沿海省份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心。林思行所指的风险，显然包括台湾在内的潜在对手，为了阻遏和制裁中国，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繁荣。

① 展华云：《出海口：走向世界的战略通道》，《当代海军》2007年第4期，第28页。

② 李玉平：《台湾地缘战略的海权解读》，《现代舰船》2004年第4期，第5页。

③ 转引自2009年2月21日《大公报》，也可以参考彭光谦、姚有志《军事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第443页。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5), 443.

④ Lin Sixing,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Are Indestructible though Not Stable", Yazhou Zhoukan, no. 32 (August 13, 2006).

台湾除了具有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门户这一价值以外，岛屿本身也将赋予中国一定的地缘优势，通过获得中国历史上的边缘区，确保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商业航运的安全通行。王伟指出：“如果台湾得以回归，那里必将是中国唯一可以建立起绝对控制的海域。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时的台湾无疑是中国海军进入大洋的最可靠通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台湾在中国近期海洋战略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通过向台湾投送力量获得马汉强调的控制能力，这一点符合我们第二章的叙述，中国海权倡导者正是这样想的。在一篇介绍马汉的术语和概念的文章中，江雨认为岛链是一个“枷锁”，是中国海军的“心腹之患”。他不无惊人地判断台湾“回归”祖国将如何造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解释：

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将处于岛链中段的台湾岛收回，那么就可以从地理上将整条岛链从中间切断，中国海军舰队和航空兵不但可以利用台湾的基地直接进入太平洋，使台湾岛成为中国远洋舰队攻守皆宜的基地群和避风港，而且以台湾为基地的海、空军作战范围可以直达日本和菲律宾的侧翼，大陆与台湾岛形成的T字形阵地将可以半包围的形式威慑周边。收复台湾不但可以明显改善中国沿海国防的安全环境，而且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军力东进太平洋的地理限制，迫使封锁中国的岛链终端支撑点由台湾后退到太平洋北部的关岛。^②

① 王伟：《台海战略随想》，《舰载武器》2005年第11期，第79页。

② 江雨：《岛链与中国海军向远洋发展》，《舰载武器》2008年第12期，第31页。

一些观察家甚至更进一步，把台湾作为攻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的平台。他们特别注意从阿留申群岛伸展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岛链”。美国力量投送的主要枢纽关岛占据了该岛链的中心位置。中国海军政治部的主要出版物宣称，“台湾还掌控通往第二岛链海域的有利航道及通向远洋的便捷之路。因此，如果我国解决了台湾问题，还将意味着我国突破第二岛链的能力有了根本转变。”^① 该文作者还设想利用台湾发动攻势，可以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力量。

除了夸张之外，这种观点有什么值得分析或比较的价值呢？第一，中国可能过于悲观地看待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版图。第一岛链在地图上看起来像一个壁垒，但更仔细的审视表明，北京拥有突破中国海的选项。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一个突出通道，引起中国分析家的极大关注。俞风流认为，该海峡是“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价值‘含金量’极高的海区，是西太平洋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区，也是中国走出‘第一岛链’理应高度关注的通道”。^②

吕宋海峡是第一岛链的一个最大的“缺口”（Gap），其复杂的海洋地形给美国海军的控制权带来挑战。俞风流说，中国空军和海军装备足以在不依赖基地保障的情况下独立通过海峡。这种信心意味深长，与新近推出的海南岛三亚海军基地的战略意义相关。可以想象的是，一旦发生冲突，中国将佯攻，避其弱点，分期突破第一岛链，同时在别处集中优势兵力，也许是北方，极力拉长对手的防御线，攻击其最薄弱的地方，这

① 白炎林：《岛链与中国海军》，《当代海军》2007年第10期，第18页。

② 俞风流：《进出太平洋的最佳海上要道：巴士海峡》，《当代海军》2007年第5期，第20页。

种优势德国人显然不具备，但中国战略家却有这样的灵活性。那些炒作中国战略位置不利的人们，忽视了这个有前途的替代方案。

第二，不同于海域开阔的北海，它对英国的价值并不大，而第一岛链涉及的区域是美国及其盟国海军力量支撑的不可或缺的全球化秩序的构成部分。这些水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内经济体的命脉所在。更复杂的是，亚洲盟国和伙伴沿着岛链的位置，对应的正好是美军基地和设施，这不仅对美国力量投送的可持续、可信度至关重要，而且对阻止干扰地区秩序的行为也十分关键。美国在东亚海域的统治对该区域的稳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海上安全公共产品，就不可能在亚洲出现西方式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自由化。

如果没有安全保障，自由航行就不能持续下去，而这只有美国海军可以提供，因为美国人已经为此努力了不止六十载。如果中国挑战美国的海上控制权，美国会发现自己被迫选择要么接受挑战，要么放弃其长期立场。总之，北京可能招致华盛顿动武，这是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无法相比的。三个最近的事件突出表明中国有能力触动美国在中国沿海部署日久的势力：2001年撞机事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和美国的EP-3侦察机在南中国海相撞；2004年，中国“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进入日本领海；2009年，中国船只在海南岛南部“骚扰”美国调查船“无瑕”号。中国海不太平，这对东亚的所有海上行为体都是致命的。

第三，北海靠近英国本土水域，注定了伦敦会密切关注柏林的海上野心。英国本土的防卫没有摆脱德国的海军威胁。因此，毫不奇怪，针对德国的攻势，英国必须设法壮大自己，维持一个不可超越的主力舰队，封锁通向大西洋的门户。与英国极力控制海权不同，美国统治亚洲水域既不是自然的赋予，也不便

宜。在作战层面，前沿部署的美国远征军必须克服复杂的地形，还要具备可资利用的复杂网络，包括相互支持的基地、后勤安排与支持华盛顿在该区域存在的盟国。从政治上说，美国选民和官员很难把中国海军建设这样一个遥远的事情当作对美国的致命威胁。

不管气势如何雄伟，对于忙于日常事务的老百姓而言，解放军海军仍然是抽象的。这使得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很难号召公众支持一场美国人并不熟悉的、保卫遥远土地的远征。中美冷战很难发生，人们很难想象中国海军现代化能让美国做出像英国那样的反应。中国发展海权的目的与规模本来就很模糊，这种模糊性由于中美距离遥远而进一步加重，再加上中国努力对其海上力量崛起保持低调，中美冷战难以想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决心可能错配，相对而言北京的决心更强，这表明华盛顿可能发觉越来越难以牢牢控制三叉戟。

舰船建造

海军战略如同企业那样，在地理上具有战略互动。德国面对的是伟大的英国。不仅在地理上英国是幸运的——首位海上爵士杰克·费雪（Jacky Fisher）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帝选择英国”，而且在德国海军头上还骑着个“相当卓越的”皇家海军。^① 威胁包括能力和意图，但军事战略家一般针对对手的能力做判断，而把判断意图的任务留给政治家。从军事领导人的立场看，这种分工是合理的。毕竟，意图可以迅速改变，而即便在工

^①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1.

业化时代设计和建造武器也需要花费很多年才能完成。海军上将提尔皮茨 (Tirpitz) 不能容忍英国在海上交通线上具有压倒德国的优势, 尽管缺乏英国敌视德意志帝国的证据。^①

在 1898 年担任海军部部长后不久, 提尔皮茨报告威廉皇帝, 针对英国的军事形势, 要“尽可能多地建造战列舰”^②。对提尔皮茨而言, 如果要为德国赢得“阳光下的地盘”, 那么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时, 至少要在德国海港驻扎 61 艘主力舰只。^③ 这意味着从议会中撤销对海军的采购监督, 不断使舰队升级。提尔皮茨本来设想德国战舰服役 25 年后自动更换, 可是, 1906 年他把战舰服役年限这一数字降到 20 年, 这是因为当时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无畏舰”, 这是一艘枪炮齐备、燃气涡轮驱动的战列舰, 这使得当时大多数战列舰都几乎落伍, 保持海军技术领先的时间大为缩短。^④ 从真正意义上说, “无畏舰” 起航后, 海军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⑤

提尔皮茨通过研究英国海军传统和 19 世纪后期欧洲的政治军事配置, 来计算公海舰队的最佳规模。不过他的结论经不起

① Paul M. Kennedy,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Naval Operations Plans against England, 1896 – 1914,” in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 – 1914*, ed. Paul M. Kennedy (Boston: Unwin Hyman, 1979), 171.

② Paul G. Halpern, *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2.

③ 转引自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 – 1918*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95 – 110; and James R. Holmes, “Mahan, a ‘Place in the Sun,’ and Germany’s Quest for Sea Power,” *Comparative Strategy* 23 (2004): 27 – 61.

④ V. R.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1973), 25 – 42.

⑤ Alfred von Tirpitz, *My Memoirs*, vol. 1 (New York: Dodd, Mead, 1919), 142 – 165.

推敲。他假设：第一，德国能够实现其目标，即建立规模略小于英国保卫不列颠群岛的舰队。其部分原因是他相信德国可以通过优越的船舶设计抵消数量劣势，建造比英国海军性能更强大的舰队。^① 海军部长认为数量上没必要与英国相匹敌。霍格尔·赫威（Holger Herwig）指出，“通过援引英国海军史，提尔皮茨认为，英国将永远是战争中的攻击者。因此，英国需要33%的数量优势；相反，德国只需建造一个相当于英国舰队三分之二规模的舰队，这是一支‘风险’舰队……伦敦面对挑战时会犹豫，因为伦敦害怕因北海的‘坎尼海战’而失去它在海上的全球地位”。^②

坎尼海战是罗马古代的一场战役，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率领的军队包围和消灭了罗马军队。欧洲战略思想家在讨论军事事务时，经常提到这个实例。最近一个更常见的、用以度量未来英国行为的指标是特拉法加海战。在1805年的决定性海战中，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勋爵以少胜多，在西班牙伊比利亚海岸摧毁了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虽然韦格纳很少同意提尔皮茨的观点，但韦格纳也认为，英国舰队数个世纪以来在战略上都是进攻者，在战时和平时都一样是为了改善英国的战略地位和商业利益，这是英国海洋战略的本质。如果是这样，那么德国方面预测战争爆发后，英国的舰队将占领北海打击德国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

提尔皮茨看待德国海军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欧洲大国如法国将追随德国摆脱英国的海上控制。公海舰队将形成一个小而精

① Alfred von Tirpitz, *My Memoirs*, vol. 1 (New York: Dodd, Mead, 1919), 170-177.

② Herwig, "Introduction," xviii.

的“联合舰队”，在数量上匹敌或超越英国大舰队。但是自1890年辞退俾斯麦总理后，威廉皇帝完全疏远潜在的盟友，使他不可能领导一个反英的海军联盟。^①从柏林的角度来看，情形更为恶化，英国皇家海军为海上安全提供国际公共品，造福所有的航海国家。英国与欧洲大陆数百年争霸，但今非昔比，欧洲领导人首选英国这个他们熟悉的魔鬼，而不愿选择他们不熟悉的德国魔鬼。^②英国面对的威胁不足以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联盟。

在海军竞争能力方面，提尔皮茨不经意给出的外交信号，却显示出在造船能力上的欠缺。提尔皮茨试图在本土水域威胁英国皇家海军，所以德国建造的舰艇都装载着笨重的盔甲，以此抵御英国的炮火，为德国军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坚固的构造增加了重量，将消耗更多的燃料，大大缩小了德国舰队的航行范围。由于德国战舰的巡航半径太短，不足以跨越北海，从英国的立场来看，德国很难将公海舰队的矛头直接指向英国。事实上，保罗·肯尼迪恰如其分地将德国舰队描写成“锋利的刀刃，闪闪发亮，但离颈内静脉总有几英寸远”，这正是当时德国竞争海权的真实写照。^③这不是一场建造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的防御战，而是欧洲水域的大决战。赫威说，虽然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自杀式的，但

① Holger H. Herwig, "Imperial Germany: Continental Titan, Global Aspirant," in *China Goes to Sea: Maritime Tran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Carnes Lor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172-174.

② Eyre Crowe,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January 1, 1907," in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 3, *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 1904-1906*, ed.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27), 402-417.

③ Paul M. Kennedy, "Tirpitz, England and the Second Navy Law of 1900,"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8 (1970): 38.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已经僵化成“教条，神圣和不可侵犯”。^①

马汉关于危险的暗示混淆了海洋战略。在评论柏林 1900 年的《海军法》时，马汉指出，该法将在“未来很多年里”规定德国海军发展的原则，“这对一个试图创造一支强大海军，足以挑战当时海军霸主的国家来说极为关键”。^② 这是以法律的方式指定英国为主要敌人，并以此为基准构建德国舰船，不过人们很难说清楚公海舰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用今天的行话说，德国海军装备的动机没有“透明度”。英国被迫从德国的意图来判断德国的能力。一支短程舰队，全副武装，厚实的装甲战舰，它们驻扎在北海可能只有一个目的：反对英国皇家海军控制欧洲水域。做了这样一种净评估之后，英国的战备主要就是大力推进海军建设。

今天，美国和中国的回避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错误。如第八章将分析的那样，在 2007 年的“21 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会议上，美国坚决拒绝命名敌手，这是美国如何看待世界和做出战略应对的最有权威的声明。发展壮大高科技舰队，同时坚持美国目前并不面临传统的海军威胁，美国的这一战略迫使中国海军战略家从字里行间解读，并根据美国的能力而不是官方声明的意图来制定中国的战略。

但相反的情形是真的。五角大楼不断地抨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透明度，质疑中国发展强大舰队的意图。事实上，北京很容易使用“某些国家”这一公式指称美国，而不是坦率地陈述其

① Herwig, “Introduction,” xviii.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 Or, the Place of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s* (New York: Harper, 1912), 57.

观点。而华盛顿也必须针对中国的能力做出计划，因为中国的意图仍然含糊不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坦率地说，“我们彼此竞争”。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期望显然要比沈丁立的话语更丰富。西奥多·罗斯福明智地建议政治家在外交上轻声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掩饰。坦率是美德，尤其是对潜在的对手坦率。

如果不对柏林面临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光是指责德国的思想或行动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德国海军司令部并没有通过在地理上包抄英国来提高德国的战略地位。德国的海军领导人也没有努力采用新技术去发展非对称战略。事实上，提尔皮茨很早就排除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法国思想家主张大陆国家发展海权的战略。本质上，“少壮派”战略依靠海外的巡洋舰战斗，而不是以精湛的舰队组成“主力舰”正面对抗。^①对马汉来说，“任何海军的骨干和实际力量都是由适当比例的防御和进攻能力组成的，进可攻退可守”。^②这意味着舰队兼具战列舰和巡洋舰的优势。战列舰速度快，机动灵活，而巡洋舰则战斗力强。总之，巡洋舰作战是一个不对称的策略，主要是攻击敌人的海上交通，同时要避免遭遇敌人的优势力量，这就是基本的战斗规则。

这类间接路线旨在规避舰队决战性对抗的企图。^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后起之秀的国家热衷于发展非对称手段。但是，德国海军直到1906年才建造第一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提尔皮茨担心水下战争会挤占战舰建设的资源，水雷和鱼雷艇也很落

① Theodore Ropp, "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ed. Edward Meade Ear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446-456.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1897; repr., Freeport: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198.

③ Tirpitz, *My Memoirs*, 57-62.

后，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展了对称的军备竞赛，它不可能以当时可承受的成本获胜。德国避开了能让其获得决定性胜利的非正统方式。总之，德国没有及时开发诸如潜艇、鱼雷、水雷这样的新技术，是德国海军发展的一个重大损失。^①

中国微弱的海洋传统，后二战时期的海上弱点，毛泽东游击战战略的遗产，加之又深受苏联海军学说影响，使得解放军海军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②几十年来，中国海军被认为是一个反对外国入侵的次要角色，其作用主要是辅助地面部队。因此，中国海军，包括潜艇、鱼雷艇和护卫舰都紧靠海岸。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北京阐明了视野更加广阔的海权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海军上将刘华清的请求下，中国领导人要求海军提高进攻能力，既防御大陆，又能在第一岛链内外航行。

尽管如此，海军立足于黄海的防御还是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这样的力量结构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海岸防御导弹快艇，尽管其更隐秘、更致命。^③这种明显的战略缺陷其实是后发制人。不同于德意志帝国，德国投入巨资建设海军硬件设施，但历史证明就算这样也不能与英国匹敌，而中国是以有条不紊的、连续的方式发展海上力量。早期海军的防御型思维——必须承认是需求而非选择的产物，它催生了关于如何打败海上优势敌人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考。

① Herwig, "The Influence of A. T. Mahan," 72-73.

② 参见 David G. Muller,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44-56, 111-116.

③ 霆宇：《脱胎换骨还是新瓶装旧酒：浅谈中国022型隐身弹艇的定位》，《现代兵器》2008年9月2日。

中国的规划者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海军将以弱者的地位应对美国海军。因此，他们试图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对付美国的弱点，从而使成败机会均等。在五角大楼的术语中，中国军队实行“反介入”战略，本书第四章将对此详细分析。反介入战略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措施，以拖延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战区的特别军事行动，妨碍或破坏对维持美国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区域基地的使用，并迫使美国海军投送能力远离中国海岸。^①

通过有选择地开发或从国外购买价格低廉、容易获得的武器系统，如潜艇、巡航导弹，并结合中国本土情况调整作战理念，解放军早已把自己置于反介入战略的执行中。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跟美国竞争全球公域，给美国军队在东亚海岸建立一个禁区。争夺控制权，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感觉到的，都将削弱美国的政治意愿，并排除美国的某些军事选择。同时，它也为中国提供了操纵空间，提高了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屏障的可能性。受制于地理和相对短距离的武器，德国在北海并没有这种战略选择。

除了潜在的作战优势，中国在拒止介入战略上的投资，以军事结构和成本衡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高效率。直到最近，北京仍避免公然声称增强海军实力，包括昂贵的大甲板航母。与提尔皮茨不同，中国似乎没有受到不平衡的力量对比的影响，因为反介入涉及不同性质的有效措施。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尽量避免进行一对一的军备竞赛，这样一来就消除了海军控制权竞争的压力。这为海军试验和改进其水面和水下战斗力提供了空

①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and Kevin L. Pollpeter,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7), 11.

间，每隔几年就推出新型舰艇，并投入系列生产。这种不紧不慢而富有成果的发展过程对舰队建设而言是很理想的。

战略意志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我们也可以说任何涉及竞争的人类行为——都卷入了互动冲突的意志竞争。从英国海事历史中得出经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认为“国民性”和“政府性质”是一国发展海权的两大关键因素。^①对沃尔夫冈·韦格纳而言，海权的最后一项因素——舰队获取战略地位的能力——就是一国走向大海的“战略意志”。韦格纳显然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权力意志》中吸收了这一概念。德国思想家高度评价英国海洋文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造船得到了不列颠人不敢懈怠的反应，“英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大海的精神，这源于其千年的海上战略传统；海洋战略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本能，就像我们吸收了陆地战争的传统那样。”^②

但“失败的战争表明”，德国海军尽管战术能力突出，但仍然是“纸上谈兵的岸边海军”。^③这种文化不匹配暗示，德国并不准备进行像英国那样强化海岸的持续努力，而英国具有极强的政治选择意识，就是不管花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其海上优势。^④正如战时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宣称的那样，“每一个英国人都会花掉最后一个便士保卫英国的海上霸

①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50–89.

②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95.

③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96.

④ 关于深度竞争，参考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shfield, 1980), 410–431。

权”。从1911年起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更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类似观点，“冯·提尔皮茨竭尽全力想打赢海战，却使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和英帝国的每个角落都团结到英国周围。攻打基尔港和威廉斯港的是反德国家联盟，德国遭到打击，最终垮台了”。^① 总之，德国领导人应该反思英国的海洋意志。他们应该重新考虑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对英国作战传统的判断。德国指挥官阅读英国历史使他们夸大了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决战的欲望。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舰船建造和战略取决于提尔皮茨的假设，即战争爆发后英国舰队将展开“严厉的攻势”，提尔皮茨预计英国皇家海军将攻入北海，展开一场玉石俱焚的大海战。

然而，除日德兰海战之外，英国皇家海军明智地展开了新的特拉法加战役。虽然德国人预计为海战而海战，但英国指挥官却回避这类不能为英国战略目的服务的战斗。英国皇家海军运用早已取得的制海权以尽可能少的海军力量对遥远的北海实行封锁，英军指挥官认为没有理由拿他们早就拥有的制海权去拼命，因此公海舰队只有去一些重要的水域才能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权。^②

总之，柏林的造船计划足以激起英国人民、政府和海军的反应，通过掀起两国的互动过程，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但德国领导人对大规模投资建造夺取英国海军优势所需的舰队犹豫不决。从陆地防御的角度来看，机会成本太高，而德国指挥官对是否要抢占海上战略主动，集体失声。德国领导人对海权的态度反复无常，导致其海洋战略十分薄弱。如果舰队只是摆设，失败自然就会接踵而来。^③

①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New York: Scribner, 1923), 115.

② Wegener,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11.

③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1956), 36-38.

与柏林不同，北京不存在这种海洋战略的欠缺。中国已审慎培育出发展海军能力的国家意志，全神贯注、悄无声息地支持其长期的海军雄心。忠实于邓小平几十年保持低调的国家形象这一命令，北京严格按照防御战制定其海上利益发展规划。^① 自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开始，以进攻作战和战术实现战略防御为目的的“近海防御”战略，始终是中国海军学说的基石。^② 对此，海军指挥学院的全金富在故弄玄虚的言辞中，巧妙地主张发展投送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力量，“我海军……必将发展成一个具有远海防卫作战能力的强大海上威慑力量。这支海军将在宽广的战略防卫纵深有效地进行战略防御作战，实施反威胁斗争，以制止和打击敢于对我国重大战略利益，特别是对我国家主权和战略物资远洋航线的任何侵犯”。^③ 像全金富这样的分析家有多少战略深度不得而知。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与德意志帝国的轻描淡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北京的近海防御学说消除了美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指责中国威胁的公开证据，由此这些国家也就不能有任何借口警示或者采取积极对策。例如，北京对其海上目标的定义相当笼统，事实上将经济专属区称为它的领海，但是，中国外交官均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迄今为之，这种办法缓和了亚洲各国和华盛顿潜在的过度反应。

① 对邓小平“24字”战略的简要讨论，可参考 U. 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070523 - China - Military - Power - final. pdf>, 7。

② Information Offic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8*, January 2009, 31, GOV.cn Web site, 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9 - 01/20/content_1210227. htm。

③ 全金富：《新世纪我国海军战略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81~85页。

同时，高层决策者公开地积极寻求利用国家意志发展海军事业。没有比胡锦涛主席更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广大民众的了。在2006年的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上，胡锦涛敦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和“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① 据大连海军舰艇学院三位学者的判断，胡锦涛热衷于“提高海军在第一岛链的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提高远洋机动作战能力”。^②

换句话说，最高领导人的目光相当长远。在中共中央的官方杂志《求是》上，海军上将吴胜利司令员，对胡主席的指示做了呼应和发挥，宣布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许多岛屿和大规模的海上保护区。吴胜利在回忆历代王朝忽视海洋和屈辱的近代之后发现，西方国家无一例外是海上大国。随着中国重新崛起，海军上将吴胜利认为扭转不幸的过去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强大海军。^③ 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位海军上将对未来中国海权命运和选择相互作用的描述接近于马汉。简单地说，他的文章是努力调整国家意志走向海洋的典范。

中国海军的实力是国家意志的基准。十多年来，中国从国外购买或自己生产了一系列的海军装备，它们适合于争夺第一岛链内外的海上控制权。海军让过时的潜艇集体退役，同时引进了三

-
- ① 曹智、陈万军：《胡锦涛强调锻造适应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新华社2006年12月27日。
 - ② 方永刚、徐明山、王淑美：《论海军建设中党的指导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8月，第66~77页。
 - ③ 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第14期。

类新的隐身的柴电潜艇。2004年突然出现的“元”级潜艇，据报道让美国情报界大吃一惊。中国也公开推出了第二代核攻击舰艇和弹道导弹潜艇，大概是作为一种威慑信号。除了兴建新的平台外，中国投入了大量精力提升水下战争的作战技能。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是2006年的事件，据说当时中国的“宋”级潜艇浮出水面，正好进入实施演习的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的鱼雷射程之内。此外，海军情报办公室显示，2007~2008年，中国潜艇巡逻增加了一倍（尽管是低作战节奏）。^①

在水面作战领域，自1999年起中国已经建造了4艘现代舰艇，配备先进雷达和电脑，据说可与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宙斯盾”空防系统相媲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从俄罗斯购买了“Sovremenny”级驱逐舰。吨位是衡量舰船的粗略指标，新战舰达到了六千吨，相当于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三分之二大。媒体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打算兴建两艘以上中型常规航母，中国官员在2009年的发言或多或少证实了媒体的这一报道，中国的航母建造计划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评论。^②有关中国发展弹道导弹打击水面舰艇的兴趣引起了国外决策者的恐慌。事实上，2008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召开的考察中国航天能力的会议上，对这类前景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③（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①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供军情局报告。Hans Kristensen, "Chinese Submarine Patrols Doubled in 2008,"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 Strategic Security Blog, <http://www.fas.org/blog/ssp/2009/02/patrols.php#more-731>。

② "Aircraft Carrier Project,"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cv.htm>。

③ Andrew S. Erickson and David D. Yang, "On the Verge of a Game-Changer,"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35, no. 5 (May 2009): 26-32.

过去几十年中国海军一直被轻视，但现在不管是退休还是仍在职的美国海军军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计划都越来越表示尊敬。在物质方面，中国显然是在进步。那么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海上战略意志呢？马汉担心他的同胞漠视航海事业，甚至在美国拥有海上霸权时也如此。马汉建议，美国不应步英国后尘，美国是一个友善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作为跨大陆的国家，其注意力应保持在北美。马汉推测，美国更像法国，而不是英国。英法战略地理不同，不列颠群岛资源禀赋差，促使英国人进入大海寻求商贸繁荣，而法国人可以自己提供资源。或者，美国可能会像 17 世纪的荷兰，这是另一个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国家，不过荷兰被证明在建造强大海军方面过于吝啬，不足以维持即便是和平时期所需的海军。

用马汉的话说，美国的航海文化可能是个装饰——不管美国与其母国英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多么接近。^①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众不会长期支持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海军，美国人认为海上威胁并不存在。今天就如同马汉的时代那样，美国的战略意志体现在军舰、飞机和战斗系统中。成本上升使舰队规模无情地缩小。现在仅有 282 艘舰艇服役，数量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 600 艘的一半，目前的美国海军规模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小的。^② 很少有学者或海军军官认为美国海军会实施重建 313 艘舰

①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35 -42.

② Naval Vessel Register Web site, <http://www.nvr.navy.mil/nvrships/FLEET.HTM>; and James W. Crawley, "Navy Has Fewest Ships since before World War I," San Diego Union-Tribune, October 2, 2003, Global Security.org Web site,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org/news/2003/03 1002-usn.htm>.

船的计划。虽然个别船只的性能比其先辈强大得多，但数量仍然是质量的保证，尤其是还存在与中国海军发生潜在对抗的可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缩小与美国海军的质量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已处于危险中。

美国舰船数量减少，已经让美国踏上杰基·费雪和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走过的老路。2007年的美国海洋战略宣布，美国海军仍然是二战以来的两洋舰队。但是，以往的战略重点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军将把其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①换句话说，美国的海洋战略目光现在盯住了亚洲。就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那样，美国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将力量集中在重要的战区，减少相对次要的义务。显然，在海军领导人看来，广袤的大西洋和地中海可以委托欧洲保护。不过美国是否像英国那样有意识地做出政治选择仍然不清楚，不知道美国是否会继续投资于主力舰队。如果美国主力舰队不再加强，那么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战略处境是过去的德意志帝国梦寐以求的。

中国幸运的战略地位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三个参数评价中国的海洋转向——地理、舰队和战略意志，结果表明北京施展海洋抱负的处境要比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好得多。一百年前海权国家英国最终战胜了陆权国家德意志帝国，但海权国家没有理由自满。尽管德国和中国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但两国间的差异更具启发性。首

^①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October 2007, <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

先，东亚地区内的海洋国家都重视海岸防御。黄海、东海与南中国海并不像北海之于德国，它们对区域内国家都很重要。亚洲海域内的海上交通线，为经过印度洋把原材料向东运往亚洲提供最经济的路线，并由此为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

与指挥德国海军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不需要着力提高中国的战略地位。主动权早已落入北京之手。北京可以迫使美日同盟保护沿大陆的航海自由。可以肯定的是，不要过于夸大中国海的重要性。一些分析家质疑台湾对中国和美国的价值，指出台湾只是将北京的海上防御范围延伸约一百英里，前往日本或韩国的航运可以在没有额外费用的情形下绕过它。按此推理，他们断言，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将完全不受大陆重新控制该岛的影响。美国海军在该区域的作战指挥和相关能力将继续畅通。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重视政治联盟。日本是一个对南部海上安全极度敏感的国家。

首先，台湾回归大陆，将使中国和日本水域不仅在东海也在日本的最南端衔接，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几乎看得到台湾北部海岸。在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射导弹到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海域，企图影响台湾“总统选举”。据报道，一个“测试”导弹曾经射入距离琉球岛南部六十公里的与那国岛附近海域。^①

1996年的导弹试验事件提醒日本决策者，很难将日本从未来海峡两岸的争端中撇清，而且东京也意识到如果台湾落入大陆之手，日本领土如此接近中国将是十分不幸的。自1895年甲午

① Yoichi Funabashi, "As a Maritime Nation, the Seas Await Japan," *Asahi Shimbun*, February 2, 2004.

战争之后，日本占据台湾，拥有了隔离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但“台湾之后的日子”显然使一个世纪的地缘政治优势逐渐消失。此外，北京可能还会对岛屿周围的专属经济区提出要求。如果最近的实例有参考价值的话，那么北京将开始对这些地区声称拥有法律特权，这类似它在其他水域的主张，中国企图把这些水域变成事实上的主权水域。延长中国近海三百英里——而不是一百海里，显然将使日本的海军防御变得更复杂，同时也提高了其绕道中国控制海域的航运成本。

更复杂的是，东京、北京和台北都声称对有争议的尖阁/钓鱼岛拥有主权。一些中国战略家似乎认为，如果台湾回归大陆，那么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的说法将站不住脚。正如一位分析家指出的：“如果台湾掌于我手，那么敌视我国的国家将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的政策。如果我国在台湾设立强大的海空军甚至陆军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就会让我国的战斗和威慑力量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钓鱼岛问题也很可能会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① 这个看法符合如下概念，即中国拥有台湾将使北京占据日本南部海域的侧翼。东京不得不关注台湾的命运，而太平洋联盟会使华盛顿重新部署在亚洲的力量。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承认（为了讨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和作战是不重要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仍坚持认为，在东京的安全意识中，台湾的核心地位是不会轻易消除的。台湾对日本的价值仍然是美国地区战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美国人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得罪日本人，他们希望日本人能够接受台湾回归中国的情况。如果日本人反应强烈，那么可能意味着美日联盟的终结，而这是过去六十年来美国在亚洲驻军的首要前提。

^① 白炎林：《岛链与中国海军》，《当代海军》2007年第10期，第17页。

第二，回顾韦格纳令人回味的措辞，与英国不一样，美国对海权并不全然控制。尽管美国的舰队仍然占优势地位，美国海军也无法像 19 世纪末的英国皇家海军那样阻止中国进入远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不具备像苏格兰 - 挪威海域或英吉利海峡那样的战略地理条件，凭借它封锁中国船舶的海上通行。中国军舰可从多个港口进入中国海。青岛张各庄镇、旅顺两处基地，为北海舰队提供了进入黄海与东海的通道；东海舰队驻扎在宁波和舟山港口，南海舰队则在海南岛的三亚基地驻扎。这些基地（或更多）容易满足进入海洋的马汉式标准，即通过多个点进入大海。北京的海上地缘处境并不像柏林那样艰难。

第三，中国比美国更占优势的是接近战区。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术语，中国是理想的“有争议地区”，中国可以利用附近的基地和人力、岸上的武器，还有对该地区物理、社会、文化和地形的透彻了解，这一切都可以给力量上占有优势的美国造成严重损害。^① 横渡太平洋的距离不仅消耗美国的力量，据推测，也将降低美国政府和人民保卫亚洲海岸美国利益的价值。通过提高美国在亚洲开展军事行动的成本，北京希望能阻止或打消华盛顿不利于中国利益的做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与英德案例的相似性不复存在，而差异越来越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地理上彼此靠近使得英德展开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而绵延数千英里的海洋把中国与美国隔离开，美国领土最接近东亚的是第二岛链的关岛，从火奴鲁鲁到上海大约有 5000 英里。从地理角度来看，日本和英国类比更适合。

^①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 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no. 1 (Summer 2003): 22.

在有的纬度上，日本本土距离中国海岸只有大约一百英里。事实上，日本是第一岛链的北半弧，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沿着日本列岛布防周边。不过，与中国和日本不同，当时的英国没有盟友，德国不必担心其他远方的国家参与对抗，而美国恰是东亚的重要盟友。

如果日本扮演英国的角色，而中国扮演德意志帝国，那么权力不对称有利于陆权而不是海权。按照马汉海权的六个指标衡量——地理位置、物理形态、领土范围、人口、国民性质和政府性质，在东亚，日本“鲸”根本不具备超过中国“大象”的优势。为使两者之间的类比更符合实际，我们必须将美日联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但即使如此，最强的搭档远离该区域，这进一步增强了战略不对称，而英德竞赛中不存在这种困扰英国官员和指挥官的问题。

第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近海采取战略进攻轻而易举（相对于鼎盛时期的公海舰队）。如果中国海军不断扩大舰队的规模，增加舰队的数量，而美国海军在数量上不断减少，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可能最终在第一岛链内获取“压倒性的权力”。按照马汉的标准，中国将统治中国海。同时，北京希望能阻止美日联盟长时期进入这些水域，以期实现台湾回归大陆的政治目标。如果台湾回归，中国将获得公海舰队一直不能实现的，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打一场他们目前理所当然认定的海权保卫战。

例如，想象一下中国成功之后，在台海发生危机或冲突时，有争议的地区将推进到琉球群岛附近。这样一来，中国接近嘉手纳空军基地（Kadena Air Force Base）的中心位置，而这给在西太平洋的美国空军带来巨大压力，美国和日本的航空兵都集中于冲绳机场。只要美国坚持其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承诺，北京将始终面临战略遏制态势。

第五，从一开始，中国海军规划者就明智地采取渐进方式开

展舰队建设，在形成更先进的、更马汉式的平台和武器之前，中国海军始终具有“乳臭未干”的风格。在毛泽东时代，从政治上看有其必要性。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禁止建造蓝海舰队，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清除了军官队伍中的大部分专业人才。因此，海军创立多年来，满足于低端装备的建造，如布雷；发展导弹巡逻艇和开发柴油动力潜艇。不像提尔皮茨，解放军海军经受住了巨大的诱惑而没有盲目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按照中国指挥官的逻辑，这支“不太成熟”的舰队打下了与美国对阵的坚实基础，总有一天中国会跟美国开展直接的海军竞赛。

第六，由于战略处境比较有利，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宣示海权的做法远比犹豫不定的德国威廉皇帝坚决。马汉观察到，在一个专制国家，海权取决于专制领导人的决心。德国缺乏这种决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意志坚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表现出德皇威廉二世所不具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坚定性，中国利益依赖海洋的程度远远超过德国。北京需要利用海权来整合国家。而德国没有国家认同或海洋遗产可言，所以德国领导人把海权当作一种使国家统一的力量。中国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略去清代，中国古代始终处于海权强盛的时代，当时亚洲的中国海域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一部分，中国舰队四处游弋。因此，很有可能的是，中国寻求海权只是恢复其应有的地位，而德国却是争取阳光下的地盘。宽松的环境、后发优势和战略决心，将使中国成为比德国更强大的竞争者。

第七，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外交上的表现比鲁莽的德皇更谨慎。北京小心谨慎地对待海上崛起，避免陷入像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那样的恶性循环。与俾斯麦的外交战略相比，中国官员更审慎地将海上崛起限定在非进攻性的范畴内，中国外交充满了类似“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样

的短语，旨在让亚洲国家和美国相信，北京尊重自由主义的、美国领导的海洋秩序。如第七章将说明的那样，北京有针对性地发布消息，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当作一个有天生力量的仁慈国家。不像过去那些掠夺成性的帝国，世界可以放心地让北京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初步的结论

总体上说，在对待海权这个问题，中国人意志坚定、富有智慧、善用技巧，比笨拙的德意志帝国表现得更出色。这一发现与过去的判断截然不同，中国海权问题不是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之间非此即彼的争论，中国不会在俾斯麦或威廉路径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将不顾一切地建设海军对抗美国，这一点令人怀疑。如果中国未来采取了威廉的方式，它将比德国具有更多攻击对手的余地；即使北京坚定不移地奉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原则，它也远比德国在海上受到的约束少。这显然是一个思想实验。尽管如此，《大国崛起》这部系列片是否能让中国从德国案例中获得有意义的启发，还不是很清楚。但比较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探究德国海权的兴衰，对即将从陆权转向注重海权发展的大国而言，将使其更加明白它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的感想：从世界历史上很少有陆权转变为海权的例子出发，很容易在事实还未发生之际就声言中国的海权发展必然失败。我们希望能在此提供的比较历史分析可以暂停那些过度自信的预言。中国海权发展可能会与德意志帝国类似，但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四章

中国特色的海军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的海军战略偏重无形的方面，强调地缘政治、历史先例和战略思想，现在我们来探讨中国海军战略付诸实践的机制。即使有俾斯麦自我约束的外交政策为前提，德国皇帝仍追求一种野心勃勃的海洋战略。相比之下，中国的战略环境给北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在过渡时期，海上拒止将是中国掌控自身海洋环境、组建全副武装的精良舰队巡逻亚洲海域的最佳方式。当然，该假定的基本前提是中国仍然认为在以经济发展优先的大环境下保证建设一支主导型舰队的经费支出是必要的。

海上拒止型海军（sea-denial navy）坦承他们的实力较之强大的对手确实自叹不如，但他们也不会轻言失败。他们不会逃离生死攸关的重要海域，也不会只是消极抵抗。20世纪90年代末，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公开表示，海军先天不足使得中国采取了一种“旷日持久的自卫防御战术”，消极避于第一岛链内。由于美国的海洋霸权咄咄逼人，中国不得不放弃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措施。^① 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海上拒止部队善于扬长避

①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24-26.

短，能有效歼灭特定海域内敌对势力，将敌军阻隔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防止敌人进入前沿阵地，以确保国家的战略目标能胜券在握。^①一般来说，海上拒止是由力量较弱方发起的进攻性作战，是一种战略防御型战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未来可能面临战略困局，但它仍会采取这种进攻性的战术。

攻防混合型作战既体现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争哲学，也符合马汉“弱小海军也可以在本土重要海域上发号施令”的信条。^②中国海军正在获取相关能力并建立起相应的体系以确保大陆毗连的任何领海、领空绝不让敌人染指分毫。从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量购买俄罗斯武器，同时大力发展国内国防工业，批准国产武器投入生产，并用于装备部队。新平台和新系统的引进，更专业、更适应战斗的海上军团的加入，使解放军海军的攻击作战能力实现了大跨越。^③

举几例近年来已投入使用的武器系统。现代柴油动力潜艇，在近岸浅海都很难被探测、跟踪和定位，已经大批量地在国内造船厂中生产或从俄罗斯军火商手中购入。装备先进雷达、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的驱逐舰已经成为中国海上舰队的主心骨，据称其作战能力

① 例如：J. Noel Williams and James S. O'Brasky, "A Naval Operational Architecture for Global Tactical Operations," in *Globalization and Maritime Power*, ed. Sam J. Tangredi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ttp://www.ndu.edu/inss/Books/Books_2002/Globalization_and_Maritime_Power_Dec_02/29_ch28.htm.

② 马汉认为，虽然美国海军总体上实力逊色于欧洲海军，但是美国有能力跨越运河地区，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发布号令。马汉有关这些海域的，从地缘政治方面进行的，最详尽的分析可参考两篇文章：“The Strategic Features of the Gulf of Mexico and the Caribbean,” which appeared in *Harper's* in 1887, and “The Isthmus and Sea Power,” which appeared in *The Atlantic* in 1893。

③ Martin Andrew, “The Dragon Breathes Fire: Chinese Power Projection,” *China Brief* 5, no. 16 (July 19, 2005): 5-8.

堪比美国“宙斯盾”作战系统。解放军海军水面部队抵御远程导弹和高空轰炸的作战能力同样让人刮目相看。这些无疑给解放军海军舰队在岸上基地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常规作业提供了双重保险。

解放军岸基武器的射程和精确度提高，扩大了海军的作战半径，中国对近海岛链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事实上，中国可能正在演绎“岸上火力支援要塞舰队”的策略。此概念最早曾被马汉大加指责，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海军对抗日军时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马汉归咎于俄国海军司令部采用了这种彻底错误的事务处理方式。^①但放到现在却不再如此。如果中国的陆军能够给近岸水域撑起保护伞，那么解放军海军部队可在保护伞内的任何北京认为重要的海域来去自由。

在此保护伞之下，攻防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防御圈也向第一岛链以东扩展。发展先进的地面防空系统、高性能的海军战斗/攻击机、远程巡航导弹和具有公海打击作战能力的弹道导弹，已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心。^②（第五章涵盖了反舰弹道导弹及其衍生体系）中国明智地使用这些先进武器装备，并深入发展配套的战术及作战能力，其阻击任何贸然进入附近领海领空的国外敌对势力的能力将大幅提升。^③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08), 155–156.

② Keith Crane, Roger Cliff, Evan S. Medeiros, James C. Mulvenon, and William H. Overholt,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5).

③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24, no. 1 (January-March 2005): 53–71; and Lyle Goldstein and William Murray, “Undersea Dragons: China's Maturing Submarine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no. 4 (Spring 2004): 162–194.

中国的大陆地形（continent-scale geography）是海军实施海上封锁战略的无价之宝，为沿海基地提供了丰富的站点。新的军事战斗力本来就是为了从陆上基地打击海上目标而设计的。随着攻击射程范围的提高，岸上防御可以部署在更远的内陆，用大陆腹地作为避风港对沿海入侵者施以惩戒。^① 这些避风港是出于纯军事目的考量，用以作为保护解放军的武装力量的缓冲地带。广阔的大陆战略纵深将迫使敌军进入解放军的作战范围之内，受制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地理和军事等诸多因素。这与毛泽东“诱敌深入再给其致命一击”的战略思想相吻合。^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对手胆敢贸然侵犯深入内陆的防御工事。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攻击位于内陆的反舰导弹基地——尤其是当被告知这些基地毗邻人口稠密地区，（受到攻击）其附带损失风险巨大时——中国将获得国内社会、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同情。如果美国协同其主要贸易伙伴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冒险将有限的海上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大大超过美国适度的战略目标；华盛顿极有可能出面平息争端，中国将不费一兵一卒而获胜。将进攻和防守融为一体，攻防兼备，与中国的战略传统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方式构成了中国舰队战术的核心。

①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写道，敌军虽强，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但是数量甚多，具有广阔的领土、人口众多、兵力充足。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中国能掌握大后方和主要的根据地，它们将执行持久战直到最后的胜利。参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外文出版社，1966，第158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外文出版社，1966，第220、234页。

集中兵力进攻、分散兵力进攻还是循序进攻？

假设中美对抗进入紧要关头。韦恩·休斯上校（Captain Wayne Hughes）为美国海军队员提供了亚洲海战的范本，美国最有可能的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能力集结地面、水下和空中防御攻势应对海上威胁。^① 亚洲海上战略环境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变化，美国紧跟时代的步伐，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以维持自 1945 年来的海上霸权，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该地区整体利益。

休斯的《舰队战术》（*Fleet Tactics*, 1986）以及后来的《舰队战术和海岸战斗》（*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2000）构成分析中国反舰战术所带来的挑战的基本思路。休斯的著作启发大批学院派战术家对武器装备和潜在对手的研究。但毋庸置疑，再好的专著也不能面面俱到。休斯认为他写“舰队战术”只是为了“阐明海军作战动态全过程”，而不是预见特定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② 因此，《舰队战术》在战争具体操作层面和战略问题上基本毫无建树，也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和战略等方面的考量。但和其他好的理论一样，它可以适应变化中的现实环境。

同时认知有关问题的长处和短处，并果断对其进行技术分析，是受过海军专业院校技能培训的学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孤

① Wayne P. Hughes Jr.,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2nd 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This work is a lightly revised version of Hughes' classic *Fleet Tac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② Hughes, *Fleet Tactics*, 266.

立地看，休斯论述海战的著作的负面影响在于其暗含了一个有力的基本判断：技术将决定海上战争的结果。敌军舰队可以用精确制导武器在公海一决高下。而近海作战则有所不同：岸上防御可以部署地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向美国作战部队开火；陆基飞机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从空中发动攻势；无声的柴油动力潜艇潜伏水下，鱼雷伺机而发。苦心研究这两种战斗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先行展开有效攻击的一方更有可能是胜利者。

对于休斯来说，高科技海军作战的制胜关键点是：（a）“侦察效力”，即有效运用舰载和非舰载探测系统、作战系统和计算机数据联络系统发现敌方部队；（b）“射程”，即能实施有效打击的距离和范围；（c）由侦察成果和武器装备决定的策略。^① 休斯的判断无疑正确，但也有局限。影响中美海上冲突的结果远不止导弹的部署、侦察效力和探测 - 作战演算（detect-to-engage algorithms）等因素。约翰·博伊德上校认为“人民群众、指导思想和硬件条件是制胜的首要决定因素”也并非一无是处。^② 简而言之，如毛泽东指出的，“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③

维持探测设备和武器装备的优势远非美国海军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舰队战术》仅考虑各作战平台及其技术特性而轻视了战

① Hughes,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268 - 274.

② Chester W. Richards, "A Swift, Elusive Sword: What If Sun Tzu and John Boyd Did a National Defense Review?" presentation at Boyd Conference, Marine Corps Base Quantico, Virginia, Fall 2001,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Web site, http://www.cdi.org/mrp/swift_elusive_sword.rtf.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参见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09.htm。

争和政治中人的因素具有纯标准化评估的不足。放宽眼界看待该问题才更为妥当。纵观亚洲航海史，日本帝国曾是解放军海军发展的榜样。中国海军重要建言者倪乐雄指出，中国清王朝没有充分认识到海权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中国应该牢记马汉提出的“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能改变历史，制海权是通过海上决定性会战获得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是由作战双方的火力强弱决定的。”^①

尽管 20 世纪中日关系史充满苦涩，但这位著名的研究者赞赏日本的海洋实力，也表明了中国战略思想的显著转变。中国开始考虑日本模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陆军和海军事务上对非中国、非共产主义的智慧来源日益多元的姿态。聪明的中国人从来都不会一味地墨守成规。谈中国的战略思想就不得不说到《孙子兵法》，这一古老著作始终是中国战略理论的必修课。这位中国圣人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② 虽是老生常谈，但也确实值得反复强调。交战国必须认清自身的长处和不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不要过于狭隘。

有战略价值的洞察应该不问出处，哪里能发现，就到哪里去找。因此，美国军官也要学习孙子的智慧，了解自身物力和人力优势，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研究中国在危机或战争中达成妥协的限度、方法和手段。如前面章节所述，马

① 倪乐雄：《海权和中国的发展》，2005 年 4 月 17 日《解放军报》。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translated_articles/2005/05_07_18_Sea_Power_and_Chinas_Development.pdf。

② Sun Tzu, *The Illustrated Art of War*, trans. Samuel B. Griffith (1963;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5.

汉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的制定，也刺激了北京试用与美国相关的各种武器。我们这里重点阐明马汉的海权论对中国海洋战略和战术的意义：

- 马汉提供了海战的宏大逻辑，毛泽东的陆上作战思想提供了战术层面的指导，两者共同影响了中国在台湾、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周边热点地区所有冲突的战略战术和战争实践。

- 南中国海最有可能成为北京蓄意发动的、联合攻击以渗透和压制美国作战部队的防御，实现其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海上战场。

- 解放军将把新式和旧式武器整合到一起，形成“常规”和“非常规”攻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发动进攻以实现战略防御目标。他们将不依赖任何单一的作战方式或作战系统，也不会仅限于开展单一的陆战、海战或是空战。多路进攻、多类型武器综合运用，主、次要目标间灵活转换，将成为中国海上作战的特色标志。

- 在韦恩·休斯假定的三种战术情景中（下文即将论述），如果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决策者和指挥官的倾向进行排序，最有可能的先后顺序依次是分散兵力攻击、循序攻击和集中兵力攻击。除非北京对自己在数量和质量上优势的信心增长到认为可以一锤定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击破美国的防御，否则仍会使用屡试不爽的中国打法。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彼知己，才能为胜利提供保证。不论是在春秋战国还是在 19 世纪的欧洲，这一至理名言都得到了证实。^①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绝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政治活

^① Samuel B. Griffith, “Introduction,” in Sun Tzu, *Illustrated Art of War*, 17 - 30.

动的工具。”“战争是一种以剑代笔、以剑代言的思想表达形式。”他指出“战争有自己的根本属性，但它的逻辑却不是自己的。”^①他道出了三点：第一，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追求政治目标的行为。武力介入可能激怒参战双方，带来恐惧、愤怒和仇恨等负面影响，同时也增添了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后外交和经济高压政策等非军事手段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战争准备和战争都是政治和战略思想的表达形式。克劳塞维茨学派如果不能从更大层面上把握影响战争的战略、政治和文化等影响因素，就不可能充分领会中国的作战条件和战略战术。

亚洲海上战争的未来不见得是暗淡无光的。中国的意图及其海上命运的愿景尚有足够的讨论空间，同时中国海军力量也完全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演变。确切地说，我们的主要建议之一是，美国应该尽最大努力营造一个与中国互谅互信的海上环境。因为，正如一些美国军事专家指出的那样，希望不能称为一种策略。华盛顿不能简单地因为它觉得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概率很低，有希望继续保持低概率就什么都不做。美国的战略家们需要通过调查和研究中国海军的战争逻辑与作战原则（logic and grammar）来评估和判断解放军海军会如何在亚洲海域部署一整套用以对抗美国海军航母两栖战斗群的进攻性防御体系。

近海和公海不同战术的情景分析

休斯将突发状况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敌方拥有强大的陆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605.

基防御系统，但在广阔海域缺乏战斗力。第二类是潜在对手拥有能在公海对抗美国海军的舰队，并且能够或多或少提供独立的陆上支援。当然，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他所定义的“争议地区”中认为的那样，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排列组合是无穷的。

波森注意到，一个力量较弱却经验丰富的对手在其家门口作战时享有特定优势，包括海岸附近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短线通讯以及对战术环境的熟悉程度等。^① 精明的对手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展开谈判，将其转变为战略上和实战中的独特优势，增加美国的战争成本。有些后果甚至是华盛顿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比如说，一个毫不起眼的对手损毁或击沉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这会让美国决策者在危机时刻有所犹豫，甚至有可能迫使美军取消后续的系列破坏性行动。该动态将会成为近期内双方海上军事冲突的显著特征，显然，我们对此的高度关注应该聚焦在其心理层面，而非技术层面。

对作战环境，特别是对近海作战环境多样性的预测应明智地予以暂停。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指出，很幸运，“几乎没什么海上会战，更没多少重大海上战役能让我们去验证一个战术理论的正确性”。^② 即使是史诗般的战争所记录的数据也很难用做理论评估，因为大战发生得太少以致难以进行严格的趋势分析以得出可信的结论。美国海军最后一次参与的重大战役是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Leyte Gulf），而中国解放军海军甚至从未真正进行过大海战。此外，布罗迪注意到，双方任意

①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 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no. 1 (Summer 2003): 5–46.

② 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Naval Strategy*, 3rd e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252.

略有不同的力量配置和战术布置，都可以对特定战争产生不同的结果，就算是顶尖的分析家呈现的战术部署的效力也极有可能出现误判。^① 因此，评估过去的海军行动应该始终保持严肃和审慎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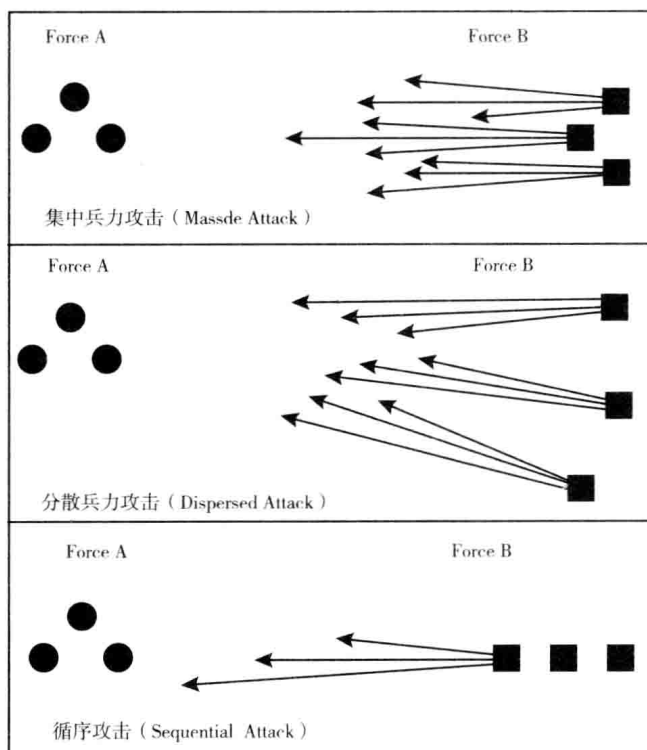
韦恩·休斯设想了海军在公海交战时三种典型的情景：大规模、集中兵力的攻击；分散的、有针对性的同时攻击；时间分散的循序攻击（见图）。^②

该模型需要先声明两点：第一，不预测中国的具体战术。简便说，这里将中国为应对美国海军进攻而实施的战术分为三种类型。休斯模型中将进攻方命名为“B军”（Force B），用来代表混合了陆基和海基导弹发射平台，并辅之以布雷舰艇、鱼雷发射潜艇的中国海军。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战略和作战偏好会使中国指挥官倾向集中兵力、分散兵力还是循序攻击呢？而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国海军是愿意与大陆保持较近距离，通过陆军力量来保护要塞舰队，还是宁愿派遣舰船到陆上保护覆盖之外的海域独立作战呢？^③

① 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Naval Strategy*, 3rd e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252.

② Hughes, *Fleet Tactics*, 244.

③ 马汉贬斥“要塞舰队”，即完全在陆地要塞范围内（路基火力支援的范围内）活动的舰队。但是，如果就目前的条件来说，他或许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与马汉时代相比，当今的陆基武器保护要塞舰队巡航的范围大为扩展，缩小了独立舰队和依赖陆上基地火力支援的舰队差距。俄罗斯指挥官不愿意挑战在托戈（巴布亚新几内亚，译者注）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因为这距离它在旅顺的火力太远。但是，一艘中国海军军舰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在得到反舰导弹支持的情况下，它可以打击2500公里以外的敌舰。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upon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in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Warfa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18), 133-173。



《海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韦恩·休斯《舰队战术：理论与实践》，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海军出版社，1986，p. 224。

第二，使用概率来衡量美军防御系统被“突击者”（leakers，突破战斗部队防御层的作战平台和武器）制服或渗透的可能性。概率避开了特定武器系统在炮弹射程、弹头大小等具体细节上的差异，使评估可以适用于大多数情景。即使战斗能力有所改变，战术原则仍旧可用于分析众多突发事件。这样将更趋近真实的战术分析，能更好地反映客观现实。简而言之，陆地和海上防御的复合区域将构成中国沿岸海域的争议地区。随着中国军事力量向深海扩展，尤其是在后台湾时代，公海海域必将成为主争夺区。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来看，随着解放军陆基武器攻击范围的扩展，

以及远洋舰队的建设,中国的“攻击制高点”将向海岸线外拓展,拒止美军进入重要海域的能力将大为提高。为争夺海上控制权,北京选择必然如此。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入侵别国时,战斗力就开始萎缩;而防守方由于军队与基地的通信线路短、环境熟悉等有利条件,其力量开始加强。“制高点”也是防御方的力量开始超越进攻方力量的交点。进入敌方的海上争议区的舰队将面临相同的情况。^①

马汉学说在中国海军思想中的应用

战争不是为战而战。政治赋予战争以逻辑,政治家和将士们的努力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而战争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民族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方法和手段。^②第二章中提到马汉提供了海上商业、政治和军事的克劳塞维茨逻辑(a Clausewitzian logic),以及海军战略、实战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本书的判断是,马汉的海权论对中国海洋战略学说影响重大。虽然马汉的海权论在美国海军界已经衰落(除去偶有官员引之以支持个别观点^③),但他在亚洲仍有市场,中国海军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① Clausewitz, *On War*, 528. See also James R. Holmes, “Roosevelt’s Pursuit of a Temperate Caribbean Policy,” *Naval History* 20, no. 4 (August 2006): 48 – 53, which describes Theodore Roosevelt’s attempt to mount a contested zone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Gulf of Mexico.

② Michael I.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3rd ed., repr. (London: Frank Cass, 2004), esp. 119 – 134.

③ Donald C. Winter, “Navy Transformation: A Stable, Long-term View,” Heritage Lecture no. 1004, February 7, 2007, Heritage Foundation Web site,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hl1004.cfm>.

马汉为发展坚实有力的海军提供了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 (the logic and the vocabulary)。海权论的拥护者们公开发文演说, 引用马汉的学说来证明雄心勃勃的海洋战略的正确性。海权作为海洋事务中“绝对权力”的写照充斥着他们的言论。马汉的海权论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脱颖而出, 赢得了北京高层决策者的青睐, 中国战略的弦外之音显露出进攻趋向。中国支持海权论的学者中, 最有想法的发言人是上海政法学院倪乐雄教授。倪教授用海权论分析了建立强大海军与倡导全球化两种呼声之间竞争性的权利要求。后者认为“中国不应按传统海权观念行事, 追求强大的海上力量, 因为当前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 ‘全球经济一体化’ 趋势使各国利益互相渗透、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 一个国家要保护自己的海上生命线, 只有‘合作’, 而不是传统的‘单打独斗’。一个国家控制全部重要国际水道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合作’ 甚至可能是中国唯一的选择”。^① 倪教授指出, 全球化这派学者敦促北京不要走上加强海军军备建设的道路,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刺激“现存海上霸权国家”——美国, 会使“中国海军引火烧身”, 这些行为弄不好还会重蹈德国疯狂追求海权最终导致两次大战失败的覆辙。^② 倪乐雄进一步解释到, 这些言论是将托马斯·巴尼特 (Thomas Barnett) 等一些全球化理论家所做的假定视为正确——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永久和平的时代, 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发达国家

① 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2005年4月17日《解放军报》。有关马汉对北京的影响的深入讨论, 可参见 Holmes and Yoshihara, “Influence of Mahan,” 53-71。

② Ni, “Sea Power and China’s Development,” 1-2。有关德国对海权的追求, 可参见 James R. Holmes, “Mahan, a ‘Place in the Sun,’ and Germany’s Quest for Sea Power,” Comparative StWrateagyte23r, mnoa.1rk (January-March 2004): 27-62。

之间的武装冲突几乎不可想象。巴尼特希望发达国家事实上废止相互间发动战争的行为，走向康德的“永久和平”状态，超越将暴力作为政策实现手段的现实。^①

然而，倪教授也指出，在世界事务中这样的革命远没有到来，甚至仅环太平洋地区事务也和其他任何国内政治秩序一样，最终还是取决于潜在或实际使用的武力。因此，在任一情形下，中国都应加强海军实力，展示出“全球海军”应有的发达肌肉，将自己国际警察部队的触手伸向远洋。中国的海上力量能够促进国际海洋秩序和平地转型。倪乐雄认为世界仍然深陷强权政治，主权国家要求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一种“自助”的手段。因此，“中国必然要选择建立一个强大的海上力量”，抵挡“某些霸权国家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威胁”。^②

所谓的“霸权国家”自然指的是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言外之意是要建一座海上长城。如果倪乐雄的海权思维盛行于中国政策界，那么华盛顿和它的地区合作伙伴们就必须认真及时地跟进这种新的咄咄逼人的中国海军战略。

毛派积极防御思想在近海作战中的应用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马汉有关作战战术的著作或已封尘，成为古籍。但与此截然相反，马汉的海权论已说服了中国，并使之亮出了第一个三叉戟（trident）。马汉认为，当战争

① 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4), 62, 108, 152, 169.

② 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2005年4月17日《解放军报》。

不可避免时，胜利高于一切，而进攻性措施将是胜利的唯一保障。^① 防御的目的是为了进攻，海上军事存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攻。这种进攻性作战倾向，以及发展前方基地和扩大海外贸易的主张，与中国的战略偏好一致。但是，马汉在巨舰大炮时代的学说对高科技时代海战的战术设计帮助甚微。^② 中国的研究人员会接受马汉关于禁用大规模战斗力在关键领域进行海战的建议，但除此之外，他著作中其他具体经验早已是不足道矣。因此雄心勃勃的中国很少使用马汉的第二个“三叉戟”。

马汉落下的一些坏名声对他的作战战术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他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承认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舰队军官，他不止一次地以“我是个思想家，并不是行动家”来回避技术争论。^③ 他与西姆斯（Sims）长期意见不合。例如，新的美国战舰是全部装备重型火炮还是混合使用大、小口径的海军舰炮？^④ 理查德·霍夫表示，最后西姆斯“废止”了马汉的混合装备的主张，斥责马汉忽视日本对马岛（Tsushima）的12英寸炮的威力。^⑤ 马汉在当时的战术争论中表现不佳，美国战术家们另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Considerations Governing the Disposition of Navies," *National Review*, July 1902, 706.

② 马汉认为战列舰是进攻性战略的标志，“任何海军的主干和实际力量是舰艇，通过一定比例的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舰艇能够完成任务”。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19), 198.

③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1-6, 101-107.

④ W. S. Sims, "The Inherent Qualities of All-Big-Gun, One-Caliber Battleships of High Speed, Large Displacement, and Gun Power,"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32, no. 12 (December 1906): 1337-1366; and Hughes,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69-70.

⑤ Richard A. Hough, *Dreadnought: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Battleship*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34-37.

寻战略智慧之源也不足为奇。

因此，中国的官员、海军、学者查阅传统战争理论，从孙子、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中汲取传统陆战的经验，起草海上作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通过个人实践与政治和军事长篇著作鲜明地阐释了他对当代中国的战略展望。他对海上追求无动于衷是众所周知的。^① 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中国目前的“近海积极防御”战略不论是名称还是其指导思想都源自毛派的积极防御学说，是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部队的作战经验中提炼出来的。^②

毛泽东反对消极防御。即使是在红军实力大大逊色于敌军，除战略防御外别无选择之时，他的军事思想仍然是进攻性的。“消极防御是一种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而防御。”^③ 即使是战略防御目标也最好通过进攻的方法和手段来取得。防御是平衡力量逆差的必要过渡，但不能作为战略偏好。^④ 这是中国海军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人眼里，美国对东亚海域的掌控类似于将国民党军队

① 关于中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努力，参见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The Chinese Navy's Offshore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47, no. 3 (Summer 1994): 9-18; and Jun Zhan, "China Goes to the Blue Waters: The Navy, Sea Power Mentalit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7, no. 3 (September 1994): 180-208.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224页。

④ 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没有泛泛而谈。积极防御“并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那就是第一号傻子” Ibid., 208。

的“围剿”战略调换到东海、黄海和南海。^①红军避开国民党军地面攻势，巧妙把握战术进攻时机，拉长作战时间，拖垮敌人军力，使得战局向着共产党所期待的力量平衡方向转变。耐心等待是反扑的前兆，并最终将带来决定性胜利。同样，在毛泽东和马汉的“启示”下，中国海军战略家们经常谈论如何从美国海军手中取得第一岛链内的海域控制权。即使美国掌控了亚洲海域，他们仍打算用进攻性手段包围和控制这些近海水域。呼吁北京取得岛链内“绝对控制”是中国战略家们越来越普遍的心声。

有些评论对于西方概念中的消极性“长城战略”进行了不好的歪曲。毛泽东的确警告在胜利无法保障时不要贸然发动战争，但如果将这种审慎的姿态等同于中国对自身军事力量的自卑，那么将是致命的错误。战略防御不是一个理想的长久状态，是毛泽东所不喜欢的权宜之计。如果解放军采纳这一海战的基本原则，那么美国就应该停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了。美国掌控下的亚洲海域并没有致使北京对所有海战都毫无胜算。北京将在其沿海水域采用马汉和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指导下的海军战略，华盛顿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样的解放军海军绝对不可小觑。

在此条件下，就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那样，分散的外线进攻对解放军而言变得越来越有战术价值，分散兵力攻击的好处不言而喻。第一，毛派喜好先安排战略防御，让美军像毛泽东的其他“疯狂而匆忙地出手，并在一开始就用光所有资源”的

^① 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有关美国的“包围”和“遏制”的说法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49页。Willy Wo-Lap Lam, “Hu’s Central Asian Gamble to Counter the U. S. ‘Containment Strategy,’” *China Brief* 5, No. 15 (July 5, 2005): 7-8。

愚蠢对手一样接近中国海岸，解放军在总反攻前先削弱敌人实力，分散其陆上和海上战区的武装力量。解放军不会将其舰队战术局限在任何特定的作战领域。导弹齐发、潜艇突袭、雷区密布……许多中国热衷的战术和作战系统都会运用其中。随着美国军队靠近中国海岸线，解放军将承担外线进攻，沿多条战线分散攻击。陆上支持回落后，中国将集中全部力量形成对美国作战部队 360 度全方位的威胁。

第二，在清扫敌对势力时，解放军指挥官们将会集中关注个别舰船或小股部队。不管中国的评论和臆断如何高调，美国军官都不应该不加思索地认定航母将成为解放军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美国海军试图援助台湾防卫力量，两栖舰艇可能是更为诱人的目标。正如我们后面的章节所述，摧毁或击沉美国海军虎虎生威的“宙斯盾”战舰来拖延美军行动，唤起人们对 2000 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遇袭的惨痛回忆，并扩大这样一个军事“壮举”在美国选民中的政治影响。解放军海军甚至可能攻击战区内或通过争议区的美国后勤船只。尽管油轮和商船的政治意味较弱，但剥夺了航母和两栖战斗群的“子弹、粮食和石油”等战略补给，使之不得不动用一些老旧装备来供应和维持对敌作战行动所需的物资，将最终使得美国的行动告吹。

第三，与上述两条密切相关的，解放军将常规和非常规的方法和武器装备纳入其防御计划，符合毛泽东和孙子的战争思想。西方海军分析家普遍援引饱和攻击（saturation attack）的概念，意味着巡航导弹将是中国必然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更可能的是，解放军的饱和攻击将协同使用导弹、空袭、水雷、鱼雷和电子战设备。将这些武器辅之以常规手段用于争议区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反舰导弹虽不是积极防御战术中最

主要的常规武器，但也是位列第二的非常规要素。例如，基洛级柴油潜艇在海上对美国发难，鱼雷齐射导弹齐攻，将迫使美国只能仰天长叹。值得反复强调的是，毛派战术是动态的，常规进攻和非常规进攻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严格区分常规战术和非常规战术将很难切中问题的实质。

第四，北京将非军事手段纳入其防御努力的范围之内，用外交等方式巩固毛派的积极防御。举例来说，在台湾等问题上，北京可能对华盛顿施加持久的外交和经济压力。权衡成本和收益，美国可能在是否发动战争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从而提高了解放军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外交官试图削弱或挖走美国的盟友，例如，限制一些国家给日本等国使用基地，或让澳大利亚等国意识到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付出高昂代价。这些都必定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北京将中国武器装备的作战成绩转变成宣传攻势。微小却坚实的战术胜利将使美国公众感到疲惫，同时也让支持美国反对中国的亚洲盟友另起他意。亚洲人都知道，中国是亚洲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力量，不论战争输赢，他们将继续与一个有着报复之心的中国为邻。中国建立或拆解联盟体系，让从北美海岸远道而来的美国去操控一个战略宏大的域外战线，这个截然不同的战略起点将使美国捉襟见肘。

案例分析：南中国海的“后台湾时代”

南中国海为未来中国的海上冲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案例。中国和西方战略家普遍认为太平洋将是 21 世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海上竞争最有可能的战场，而南海则是最有可能将中国和美国卷入战争的导火线。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海军上将刘华清

也持此观点^①。

作为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大门，北京重视中国在该区域的国家利益。至少有四个战略挑战把中国战略家们的目光引向南方。第一，中国领导人对台湾以及东部沿海无法忘怀。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或采取碰触中国红线的行为，如宪政改革之类的，极有可能导致北京对台宣战。毕竟两岸争端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须搭上全部身家性命。如果台湾问题不存在了，那么中国有信心很快跨过台湾岛，将其利益诉求拓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台湾问题妥善解决，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充分释放，国家统一事业推进，将打破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岛链包围，为解放军提供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此外，北京还可以将欧内斯特·金上将（Admiral Ernest King）的学说应用于回归后的台湾。疏通南中国海通道，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重要资源将不受干扰地运达中国港口。

第二，与之密切相关的“马六甲困境”同样困扰着中国学者、政府官员乃至国家主席。北京担心如果一旦与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及其盟国将企图封锁马六甲海峡、龙目岛、巽他海峡的中国海上运输线。^② 因此，确保连接非洲和波斯湾地区航道的畅通，特别是自由通行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极其重

① 42.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165 - 168; Jeffrey B. Goldman, "China's Mahan,"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22, no. 3 (March 1996): 44 - 47; Jun, "China Goes to the Blue Waters," 189 - 191; and Huang, "Chinese Navy's Offshore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18.

② 43. Bruce Ellema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Blockade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China's Energy Strategy: The Impact on Beijing's Maritime Policies*, Gabriel B. Collins,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and William S. Murray, ed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365 - 386.

大的课题。^① 南海和印度洋在中国的海上通道中占据着日益突出的位置，其通畅保证了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料能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保障能源运输安全已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长期追踪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南海大战略也是美国紧迫的任务。^②

第三，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了领土主权要求，使东南亚成为海上的天然战场。1992年，中国把对南海的领土主张写进了国内法律。民族情感推动了北京对该地区的要求，随着海上交通线价值的凸显，以及众多岛屿附近海底探测出丰富的海洋资源，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纷纷提出主权要求，就连如何绘制地图也是纷争不断。有人感叹说，中国大陆酷似一只公鸡，与中国的威严形象不配。但如果把中国宣称的海洋领土也包括进去，中国的地图形状就变成了引人注目的火炬。这传达的不仅是该地区对于中国的民族尊严的重要性，而且还牵涉海洋发展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有观点认为，“中国地图是中国人民情感和智慧的积聚，凝结了滴滴鲜血和熊熊烈火，象征着力量和个性，体现着价值和精神。”^③ 随着其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国是否会尝试强制执行国内法还未可知，但最起码，该地区的前景

① 中国大约80%的石油进口，也就是中国整个原油消费总量的40%，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就是“马六甲困境”，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33. 关于中国的石油需求，参见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National Interest* 76 (Summer 2004): 137-147。

② You Ji, “Dealing with the Malacca Dilemma: China's Effort to Protect Its Energy Supply,” *Strategic Analysis* 31, no. 3 (May 2007): 467-490.

③ Xu Zhiliang, “Clearly Delineate PRC Territorial Waters in Map Making,” *Nanfang Ribao*, April 26, 2001, FBIS - CPP20010427000033.

是海上航行的各国都必须认真对待的。

第四，水下作战很明显透露了中国向南海发展的势头。2008年4月，“简氏情报评论”披露，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北部的海南岛建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基地，在地下掩体中完成了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SSBNs）的建设。^① 新闻引起了西方和亚洲战略思想家们的纷纷猜测和恐慌。“印度必须着急了，不是吗？”一位印度的评论员说。^② 借用一位中国官员的比喻，三亚基地是中国在海上的“两只眼睛”之一（台湾则是另外一只）。^③ 抛开这异想天开的比喻，立足于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南中国海不仅让美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反潜战的努力功亏一篑，而且也使得中国潜艇部队能够实现外线作业。此外，三亚提供给中国海军的不仅仅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攻击潜艇、飞机和地面部队的前进基地，并扩大了其海洋作战的达到海域，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台湾在太平洋中的地位等同。

总之，南海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外线战术练兵场，即使是美国控制下的战略外线。一旦中国部队进驻三亚，基地投入使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将成为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prominence）。毋庸置疑，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军力将进入海峡，在后台湾时期，解放军驻扎岛上，中国海上覆盖范围扩大，同时也就取得了隔岸控制吕宋海峡的制高点。这会使得分散进攻的逻辑更加引人注目。解放军袭击美国执行任务海军的攻击

① “Secret Sanya—China’s New Nuclear Naval Base Revealed,”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pril 21, 2008, http://www.janes.com/news/security/jir/jir080421_1_n.shtml.

② Gurpreet Khurana, “New ‘Revelations’ on China’s Nuclear Submarine Base at Hainan: Must India Be Anxious?” South Asia Defense & Strategic Review 2, no. 4 (July-August 2008): 28–29.

③ 作者与美国学者的讨论，Newport, R. I., September 2008。

方向不仅可以来自海上部队，也可以源于大陆以及同样重要的海南和台湾——这一对麦克·阿瑟将军比喻为境外航母和潜艇的孪生护卫。通过迫使美国长线防守，解放军可以为自己开辟战术新局面。例如，它可佯攻南海，向南拉长美国的防御阵线，同时在北部寻求突破，就能轻而易举地通过冷战以来美国和日本舰队监控的狭窄海域。

通盘考虑，这类似于马汉时期美国海军为确立对欧洲海军的优势地位在加勒比海海域和墨西哥湾所做出的努力。为扩大比较经济优势和军事价值，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将目光锁定在亚太地区的市场和基地。因此，对于美国的海军指挥官而言，监控中国如何经营它的“加勒比”将是了解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重要的线索。^①

倾向一：分散的海上拒止

回到韦恩·休斯的分析模型，什么才是中国海军的战略偏好呢？具体而言，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一整套新的硬件装备来实现海上拒止的目标呢？用休斯的战术效果的三个决定因素来分析，中国守军将试图瓦解美军侦察，跨越美国武器的射程范围，利用美国舰队战术缺陷，使美国军官指挥失常。与毛泽东逐个切断敌人的手指而不是一窝端的训令一致，解放军将集中力量攻击美军的单个部队或小编队，使其无法相互支援。通过在全球各大媒体宣扬战术胜利，北京希望打压美国民间的舆论，离间美国的盟友

①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Caribb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 no. 1 (Winter-Spring 2006): 79-92.

(如日本或澳大利亚等),使美国整体的努力分崩离析。西方分析家们必须警惕中国“别出心裁”地运用战术优势和地缘战略优势。下面将介绍一些用于分散攻击的具有代表性的有效武器系统:

反舰巡航导弹。解放军已拨出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巡航导弹的采购和研发。最近的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显示,SS-N-22和SS-N-27反舰导弹部署在中国的对台应急战略的核心地区,强烈暗示着到2020年美国可能将成为两岸对抗的失败方。^①反舰导弹可以从船舶、飞行器或地面发射仓中射出,迫使美国海军应付海上、空中等多路威胁。例如,前景被广泛看好的SS-N-22“白蛉”反舰导弹(美国海军界称之为“日炙”),快速、灵活并且携带方便,解放军海军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甚至可以用其对抗美国为对敌渗透设计的最新科技法宝——“宙斯盾”作战系统。^②该武器正是常规反舰攻击的上上之选。

反舰弹道导弹。过去几年,解放军能够发射反舰弹道导弹(ASBM)攻击太平洋上航行船只的报道已经越来越普遍(有关详细信息见第五章)。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军工设计上的壮举,即使美国兵工厂也尚未研发出有如此能力的武器。远距离打击美国先进航母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将使美军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报道称,射程达2500公里的解放军东风-21C导弹可以从移动发射装置上发射)。中国能够有效打击第二岛链内绝大多数目标,在亚洲海域进行马汉式会战削减美国的战线,这将有望复制日本帝国的战略。要使该目标行之有效,势必会扩大解放军要塞

① Wendell Minnick, “RAND Study Suggests U. S. Loses War with China,” Defense News, October 16, 2008,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i=3774348&c=ASI&s=AIR>.

② “Hangzhou Type 956 Sovremenny,”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haizhou.htm>.

舰队的控制范围。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在更远距离沿外线攻击美国海军，从而大规模执行毛派战略。^①

反辐射武器。同样，解放军的反舰导弹将会与其他体系配合使用。反辐射武器虽然天性被动，但却是完美的非常规进攻武器。从阿富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过去二十年的其他武装冲突的经验来看，现代美军战争的前提是在战争爆发时赢得信息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军无可比拟的卓越技术所提供的对手战斗空间的“基本作战图像”。机载雷达可以远距离探测和锁定敌人的飞机、船舶、地面车辆等多种目标。干扰器和反辐射导弹能够使敌人的探测设备失灵，还能收集数据和发现有利条件。这些战术有效地使对手在战斗开始阶段就陷入瘫痪状态，为掌控战场的制空权铺平了道路。

北京花大价钱购买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技术攻关的 S-300 俄罗斯防空系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国产的 S-300、FT-2000 反辐射武器的变种将可能部署在台湾海峡附近，以台湾部队为作战目标，同时阻止美国军事介入两岸冲突。^② 绰号“预警机杀手”的 FT-2000 据说已投入生产，其使命是攻击美国的空中优势保护下的机载探测系统和电子战装置。^③ 它还可以用作无线电

① Ted Parsons, "China Develop Antiship Missile," Jane's Defense Weekly, January 18, 2006, http://www.janes.com/defence/naval_forces/news/jdw/jdw060118_1_n.shtml; and Wendell Minnick, "China Developing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s," Defense News, January 14, 2008,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i=3307277>.

② 关于 FT-2000 的详情，可参见 James C. O'Halloran, ed., Jane's Land-Based Air Defense (Surrey, U. K.: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2004), 109-110。

③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关于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之一的分析，1998 年 9 月的范堡罗国际航展上，一份有关 FT-2000 的推销手册曾吹嘘，这一系统是“AWACS 的杀手”。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003), 30。

的发射基站，美国在伊拉克战场就使用了高速反辐射导弹“哈姆”（HARM）攻击敌人的空中防御系统。这些防御系统离开了辐射平台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雷达失明失聪，协调功能瓦解，随时都有被导弹击中的风险。中国最新的防空战舰将配备媲美 FT-2000 的地对空反辐射导弹。

有效侦察是休斯模型中战术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FT-2000能严重弱化美军侦察的效果。射程限制了远距离寻找和锁定敌军目标的能力。由于航母战斗时代的来临，美国的海军战略已将制空权视为水面舰队行动的先决条件。在中国近岸海域作战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防空系统能完全或部分地将美国排斥在信息战的边缘，将可以延缓或削弱美国建立的制空权，使美国进攻行动迟缓，并使其军舰乃至航空母舰都将在空中和导弹对峙时暴露出来。中国强大的防空系统迫使美军投入资源以保障空中安全。娴熟运用如 FT-2000 等反辐射导弹系统将为解放军打开毛泽东意义上的攻防作战之门。

水下作战。根据学术评论和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年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推断，中国的潜艇舰队在美国防务界日益引起广泛关注。^①柴油动力潜艇，如俄罗斯制造的“基洛”级潜艇等，十分隐蔽且致命，它可以潜伏在中国近海争议区，避开探测，为解放军指挥官提供美军的作战线索，在公海制造麻烦。自导鱼雷可以通过螺旋桨引起的水波震动寻找到水下目标，柴油动力潜艇可以利用鱼雷逼迫美国军舰撤退。从现实层面来讲，它们可以分散敌军舰队

① To browse through any of the Pentagon reports published since 2002, se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Defense Web site,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的作战队形，同时解放军还可以用反舰巡航导弹对敌舰进行轰炸。这虽说有一定的难度，却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①

综上所述，解放军在设法迫使美军处于反地、反潜、反空等海上威胁境地的同时，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构成额外的挑战。核动力或柴油动力的攻击潜艇、配有导弹的巡逻快艇和“杀手铜”——水雷区都是反舰巡航导弹和岸基飞机等传统系统的良好辅助设备。

一个精心设计的中国军团对美军形成立体威胁态势，非传统和传统攻击方式沿多个战线展开，中国（而非美国）将更有可能在岛链上强行登陆或进驻南中国海。中国甚至可以部分地抵消美国先进技术释放的战争迷雾，严重削弱美军早已视作理所当然的亚洲沿岸演习自主权。信息战和动力措施的综合运用可以迫使美军远离中国海岸，帮助中国在其自主海域实现海上封锁的目标。

有一点需要注意。不管各方论调如何，这种能力将是中国海战的利刃，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局面继续，更不必说让解放军获得对美完全军事优势。但解放军海军仍然是海战的新手，在全球展开军事部署的高额成本和尚需克服的技术障碍束缚了其手脚。海军唯一可以磨刀的地方在海上，官兵须通过海上作战获得战术敏锐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物力和人力方面与美国海军何时持平（如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还尚无定论。

为了抵消这些挥之不去的缺点，解放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加强其作战和战术优势。北京希望通过抬高进入成本，阻止

^① For more on the Chinese undersea fleet, see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esp. 59–76, 359–372.

美国涉足亚洲冲突，以实现战略防御目标。解放军如果拒绝给予美军事务决定权，那么中国将获得海上拒止的关键得分点，确立对本土领海和领空的绝对的主导地位，实现作战和战略目标。该方式源自过去 40 多年的海战经验。1967 年埃及用“冥河”导弹（Styx missiles）击沉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Eilat）号，1982 年阿根廷打沉了英国皇家舰队的“谢菲尔德”号，1987 年伊拉克“飞鱼”（Exocet）攻击美国军舰“斯塔克”（Stark）号，2006 年黎巴嫩真主党用 C-802 地对地导弹击中以色列的护卫舰“长矛”号。这些案例无不表明，势弱的一方同样可以重创强大对手，改变战争态势，甚至取得彻头彻尾的胜利。^①

在每个独立事件中，只用导弹执行进攻任务服务于整套作战系统，或阻止敌方舰船完成使命，或像在“埃拉特”和“谢菲尔德”事件中一样，摧毁或击沉敌方军舰。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美国海军的“塞缪尔·B·罗伯茨”号、“普林斯顿”号和“的黎波里”号遭受伊拉克粗制滥造的廉价水雷的摧毁都是典型的例子。对于中国海军的规划者来说，分散的多方位攻击战术意味着仅用适度的投资就能换取可观的回报。听取韦恩·休斯阐明的海战原则、调整中国的战略和作战传统是解放军的明智之选。

倾向二：循序地切断美国海军的手指

即使政治效果显著，中国海军也不会指望通过打击一小部分

^① Andrew Hind, “The Cruise Missile Comes of Age,” *Naval History* 22, no. 5 (October 2008): 52–57; and Lloyd de Vries, “Israel: Iran Aided Hezbollah Ship Attack,” *CBS News*, July 15, 2006,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7/15/world/main1807117.shtml?tag=contentMain;contentBody>.

美国舰队来击败美国。不过，这些成果可以用于提高美国的战争成本，使之超过华盛顿所评估的价值收益。此前美国曾公开反对道德软弱的预测。太平洋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乃至自由伊拉克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都警示中国的战略家们不要低估了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北京保持了审慎的态度，提前思量 and 考虑如果在本土控制海域内采取海上拒止战略驱逐美军舰队的行动失败的话应该如何应对。最可行的方法无疑是继续有效作战，逐个击破美国军舰和编队，将美军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为中国的海上封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把美军舰队当作“活靶子”。

海上小规模连续胜利，类似于毛泽东的军队对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众多内外线交叉作战（*exterior-interior-line battles*）。循序攻击的战术将会使解放军逐步削减美国海军规模，依据之前所述的逻辑思路实现战术和作战目标。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是像毛泽东在陆地作战中预言的那样，军事平衡逐渐向中国倾斜，提高解放军在决战中的胜算。可以肯定，北京对控制亚洲海上冲突升级的能力有极大的自信。因此，密切关注中国的战略表达显然是美国海军规划者所不能忽略的。韦恩·休斯的第二个战术情景——循序攻击——在中国的海军战术体系中可能会排名第二。

倾向三：如果毛泽东遇见马汉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随着解放军海军与美国海军实力逐步接近，毛派学说将越来越接近马汉的集中舰对舰的作战理论。因而，休斯的第三个战术情景——集中兵力攻击——值得北京考虑。一些中国战略家也直接受到了马汉海军战略灵感的启发。知名学者张文木援引马汉学说，认为经济繁荣与海军部队战略位置

的部署是胶着在一起的，主张中国“尽可能地加快我国海军建设”并为“海战”做好准备，“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① 主要舰队的行动方法可能出现转变：解放军循序进攻随着决定性冲突不断升级而最终以马汉式的集中兵力战术而结束。

另一种情况是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倾向力量平衡，那么中国指挥官有可能会立即采用马汉战术。也就是说，一旦决定诉诸武力，中国可能会立即与美国决战，而不是采用毛泽东的循序作战方法。放手一搏并不意味着放弃毛泽东的战术。毛泽东喜欢弱勢方通过地面作战集中打击孤立的强大敌方部队。中国军队与敌军一旦力量持平或达到相对优势的地位，将享有更多的作战和战术选择，反攻自然也包括在内。在有利的战略环境中，解放军没有理由不进行直接反攻。事实上，毛泽东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有时也会扭转他自己的习惯策略。例如，尽管他的战友们持保留意见，但毛泽东依然果断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因为他深信，在初始阶段就进行大规模打击，将很快赶走朝鲜半岛的联合国部队。虽然这一豪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同样的逻辑可能会再次在中国指挥官中重演。以下一些因素可能促使解放军海军冒险采取海上行动：

毛派逻辑与马汉逻辑差别不大。如前所述，马汉思想在某些情况下与毛派传统兼容。中国在争议区深度套牢美军，解放军承担外线进攻，这比毛泽东作战逻辑预期走得更远。正如第二章中指出，伟大的舵手本人就拟尽力建立一个遍布全球的外部航线，尽管只是在外交上而非具体作战层面上。他的当代追随者们多方扩展了他的理论，追求胜利在望的反攻似乎也合情合理。

^① 张文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张文木：《海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安全》2006年夏季号。

置之死地。如果中国共产党发现其政权受到生存威胁，自我保护将会是北京的首要任务。举一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例如台海战争，如果两岸一旦开战，全中国都会团结起来一致应对；如果共产党政权命悬一线，其自我约束的重要性将会下降。如果美国干涉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可能招来的是解放军的全力反击。或者，如果美国封锁中国的资源运输等类似的情况出现，也可能导致北京采用这种行事逻辑。显然，如果美国要置中国于死地，中国的领导层就有可能压上全部赌注。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北京也担心1941年的历史重演。当时亚洲的海上强国日本大大低估了美国的意志和能力，横跨太平洋发动战争，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战略家可能认为：就像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一样，北京如果想血染太平洋舰队但又没有彻底击垮美国海军，必将导致美国的大规模反击。因此，如果美国作战部队进入中国海域，中美两军相遇，中国必然会给其致命一击。因为只有全面胜利，才能防止被报复的灾难性后果。

挑战一切，拥抱世界。如果解放军进行决战，假设在随后的舰队行动中再次获胜，那么这将加速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并重新构建亚洲秩序甚至是世界秩序。美国在灾难性的重挫之下，无法轻易重建海军，无力恢复超级大国的地位，海上霸权最终衰落。中国知道大国战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代价如何，北京是否愿意单单因为这个原因而冒战争的风险值得怀疑。但如果中国对上述推论的最终收益动心，极具诱惑力的胜利果实完全有可能促使北京为之孤注一掷。

中国的决策者们愿意冒险进行决定性的海上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这么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对亚洲军事平衡的估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综合国力，以及与美国和其他对手的差距，将为监控中国海军的战略和战术提供重要线索。

美国可以维持其制海权吗？

为亚洲海域的战争深谋远虑、厉兵秣马、修学立说，不断关注其器物层面的变化，代表了部分美国政府官员、高级军官和船舶工业的谨慎态度。军事专家指出，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能力而非意图。美军指挥官应如何为应对中国海上整体攻势做准备呢？采纳韦恩·休斯提供的“处方”是一种获取战术成功的方法。休斯敦促军舰设计师们扩大美国导弹的射程范围，提高美国海军作战部队的侦察和定位能力，并鼓励军官完善自己的战术体系，维持或恢复与潜在敌手的相对优势。策略的持续改善和战略物资的不断升级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发射控制装置的改进才能使雷达和信号发射基站免受敌军攻击。正如我们所见，展开积极的电子战是美国信息优势的关键所在。

当前，谁掌握了武器射程和高效侦察的利刃呢？假设解放军完善反舰弹道导弹技术，导弹的射程达到 2500 公里，美军将被迫在其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范围内作业。2500 公里是美国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公开的最大射程，范围之外美军力不能及。一旦反舰弹道导弹投入使用，中国海军将迫使美军海上行动离岸更远，增加美军在亚洲海域的进入成本。在载人飞机方面，解放军海军的 J-11 战斗/攻击机是俄罗斯的苏-27 和苏-30 的变种，经中途加油后，战斗时将拥有 2000 公里的战术半径。^① 装备“日炙”导弹后理论上可以抵挡美军舰队 2250 公里攻击

① “J-11 [Su-27 FLANKER]; Su-27UBK /Su-30MKK/Su-30MK2,”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j-11.htm>.

范围。这使得可控的争议区边界远远超出了第一岛链，中国在此强力支持下，可以轻松进出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地展开海上封锁。

鉴于以上数据，中国的战略家们开始自信有能力拒止美国进入第一岛链内海域，寻求打破台湾僵局。再看看美方，如果美国进入台湾，两军正面交锋，美国海军不得不近岸着陆，阻击中国登陆部队，美军也冒险进入了巡航导弹的射程包围之中，更是在陆上空军基地飞出的携带导弹的战斗机的射程范围内。防御层变薄，营地更易渗透，美国防御的反应时间直线下降。

舰载防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尤为重要。改进型“海麻雀”导弹（RIM - 162 ESSM）是美国海军最大的自卫防御系统，半自动雷达制导导弹可从垂直发射系统或甲板发射舱中射出。有报道称它的攻击目标可以精确到 45 公里内，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日炙”导弹等反舰武器赢得了反应时间。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可掠海巡航，最大速度可达 3 马赫，可在拦截末端转为半主动雷达制导。^① 有研究估计，2.5 马赫的导弹对“宙斯盾”系统的航母战斗群的命中率达到了 40%。^② 因此，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在作战条件下能快速克敌制胜。近战武器系统（CIWS）是美国海军战舰防御空袭关键武器，雷达制导的“加特林”机枪（Gatling gun）拥有每分钟 4500 转的致命射速。近战武器系统的

① “RIM - 7/ - 162 Sea Sparrow/ESSM,” 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s, February 8, 2008; and Joris Janssen Lok and Richard Scott, “Navies Face Choice Questions for Defense of Surface Combatant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February 1, 2005.

② The study was supervised by Wayne Hughes. Chase D. Patrick, Assessing the Utility of an Event-Step ASMD Model by Analysis of Surface Combatant Shared Self-Defense (Monterey, Calif.: U. S. Navy Postgraduate School, September 2001), 51 - 54.

射程很短，但从船上对空中威胁的开火速度很令人欣慰。^①

就目前而言，美国军舰空中打击或巡航导弹暂时还无法触及岸上发射的反舰导弹，但可覆盖台湾、海南和沿海的一些目标。美国海军的“战斧”系列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射程是 1600 ~ 2500 公里的范围。如今舰载机联队的中流砥柱——F/A - 18 E/F “超级大黄蜂”——具有 723 公里作战半径，并且可携带标准载弹量和副油箱。^② [另一个是 111 公里的对地攻击的“超级大黄蜂”，或 278 公里加大射程的“斯拉姆”（SLAM）空对地导弹，或 SLAM - ER 导弹。]^③ 而 F/A - 18 攻击目标的最大射程约达 1000 公里。相比之下，空中发射的 SS - N - 22 系列可获得的最远射程仅 250 公里。这些数据取决于解放军远距离检测、识别和跟踪美国军舰的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担心打击到非战斗人员，理论上不赞成这种超远距离的反舰攻击。没有理由相信从未在公海进行过作战测试的解放军海军已经跨越了复杂的技术和理论的挑战，也没有理由认为解放军指挥官会不顾民用船只的死活，除非北京想自寻死路。

现在的美国似乎是有优势的，但优势正在逐渐衰落。美海军指挥官不要以为随意冲撞中国岸上或海上的军事设施后还能再道

① “MK 15 Phalanx Close-IWn Waetaepromns aSrykstem (CIWS),” Global Security. 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systems/ship/systems/mk-15-specs.htm>.

② “F/A - 18 Hornet,” GlobalSecurity. 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systems/aircraft/f-18-specs.htm>; and “BGM - 109 Tomahawk,” GlobalSecurity. 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systems/munitions/bgm-109-specs.htm>.

③ “AGM - 84 Harpoon; SLAM [Stand-Off Land Attack Missile],” Global Security. 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systems/munitions/agm-84-specs.htm>.

遥法外，成本高昂的作战平台，如航母、两栖登陆舰、“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等都会受到损害。解放军海军作战能离岸多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所诠释的争议地区的内涵有多广？中国指挥官和政治家愿意承担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英勇的中国航海员和飞行员，以及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技术的作战威力几何？恐怕只有当美国特遣部队冒着各种危险接近亚洲海岸时才有定论。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肯定，解放军的战略触手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同样也可以肯定，北京将很快就能在两个岛链之间的争议水域和空中抗拒美国的发号施令。中国海军的离岸演习距离以及中国官员和专家的观点学说是美国有效的观测指标。最合理的假设是，美国军队靠近中国海岸将面临地面、水下和空中多路威胁，解放军将在争议区内逐步发动分散的外线攻击，以压制美国的反空、反舰和反潜防御系统。因此，美军指挥官应该考虑相互支持，或者像休斯上校所说的那样“集结防御”（massing for defense）。^① 最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军队的军备不断扩充和改善，美国也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战术体系以便更好地利用争议区，否则天平将继续向解放军倾斜。马汉的海权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局部性复苏，至少是在美国海军规划者之间，此观点参见第八章。高度集中的军事力量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南值得重新考虑。

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海军官员是否该抛弃其认为的高科技军舰和航母可以在“弓箭”发射之前先放倒其舰上的“弓箭手”的陈旧思想。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目标值得追求，但这种情形已不是定局。这种空中防御的观念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宙斯盾”作战系统问世以来的主导思维。为了加强与之

^① Hughes, *Fleet Tactics*, 247.

相适应的战斗能力，水面舰艇的装甲钢板设计得薄到不能再薄。过去几十年的造船设计可能致使美国军舰遭受重创，因为耐久力是军舰所必不可少的。正视这种错误才符合海军建设的现实主义哲学，以谦卑的态度关注着上升的竞争者，美国海军应磨剑以待，应对亚洲严酷的海战现实。

摒弃弓箭手和弓箭的假设，意味着一种态度——从上到下对领导的服从文化——的改变。然而，休斯对军舰设计的建议还不能迅速落实。加强美国军舰承受冲击的能力会减少损失，降低服役时被敌方导弹损毁或被飞行器泄露防御秘密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耐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一艘坚固船舶功能的重要指标。但是，像 DDG - 1000 项目这样运气欠佳的方案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改善材料性能将需要很多时间并且还会使开支陡增，招致更多不确定性。但不管怎样，重新反思战术和作战实践，强化战舰部队，对美国海军来说自然是越早越好。

最后，海军军官和文职官员不应该让自己沉迷于纯粹的评估，仅通过美国或中国的海军武器库的规模和技术规范来衡量海上军事实力。美国分析家们必须继续加紧努力了解像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会如何发动战争。训练指挥军官的判断力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将是一个重要课题。美国海军须主动学习和了解他国历史文化，认清未来亚洲海洋的发展前景，枕戈待旦，迈步向前。

第五章

海上导弹和反导的相互作用

本章将着重从装备层面分析中国海军在东亚沿海地区的介入与反介入作战前景。我们的展望主要依据马汉的第二个“三叉戟”的基本原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专注于导弹及其相关作战系统在塑造中美未来海上竞争关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全面分析中国的导弹力量来评估中国的作战理念，与前一章舰队战术形成补充。我们并不企图无视海战中的其他重要因素，如军舰和飞机等一些先进且价格高昂的武器和作战平台。但我们认为，21世纪初期，导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海上的攻防平衡。当敌方兵临城下时，防守方完全可以将导弹列入有效防御手段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在处理所有棘手的突发事件时，导弹就算不是首先考虑使用的武器，也是名列前茅的选项。中国研究导弹的文献多如牛毛，似乎也存在某种暗示——中国的导弹技术及其作战效能将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海洋环境。事实上，中国海军所设想的导弹攻击方式很容易使危机时刻的冲突横向扩大和纵向升级。以下，我们将试图证明一些看似无关

的反舰和反弹道导弹技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极有可能相互交织，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海域的海上控制任务形成挑战和冲击。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导弹？

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Goliath）的武器——吊索和巨石在今天已经化身为导弹。导弹可以重创航空母舰等造价高昂的大型作战平台，中国对这种不对称战略战术情有独钟。中国的理论家们反复磋商，不断加强该战略偏好。孙子的谋略提供了帮助较弱方克敌制胜的智慧，而毛泽东参考《孙子兵法》，也写出了关于弱者如何用间接的方法来战胜强大敌人的著作。所有理论家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使用高度不对称的手段提高较弱一方在战斗中的胜算概率。近年来，一些中国分析家也在开始思考如何配合中国的战略传统，将导弹变成战争中的“杀手锏”。

导弹的造价很便宜，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一枚相当先进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成本大约在五十万美元左右，就算对许多贫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点“小钱”也微不足道。无须担心财政上的压力，岸基反舰巡航导弹（ASCM）可以早早武装就位，只待敌方海军进入争议海域后伺机而动。美国一艘巡洋舰的价值在10亿美元左右，一艘航母的投资可以购买一万枚导弹。较之其他武器系统，导弹不仅在技术上毫无新意，在生产上也毫无难度可言。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自60多年前在英伦三岛横空出世以来，如今已扩散至整个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即使是在一个适度财政支持、科学技术和工程水平均一般的国家也能生产导弹，尽管其制作工艺可能会比较粗糙。

尽管低投入高产出，且进入门槛低，但导弹在海上攻击中杀

伤力依旧致命，而且难逢敌手。导弹一旦准确地找到攻击目标，敌舰必遭重创。现代战争史充分展示了水面舰艇遭遇导弹时岌岌可危的命运。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阿根廷人用一个法国产的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尽管弹头没有爆炸，但弹丸每小时700英里的速度以及导弹内剩余燃料所带来的灾难足以使英国人折腰。“谢菲尔德”号的遭遇说明了现代军舰在导弹攻击下的脆弱性，赢得了“一击即沉”（one-hit ship）的绰号。五年后在伊拉克和伊朗的“油轮战争”中，美国海军巡逻波斯湾时也遭遇了类似情况。伊拉克幻影F1飞机误射的两枚“飞鱼”导弹（Exocets）击中了与“谢菲尔德”同级别的护卫舰“斯塔克”（USS Stark），这一攻击导致了舰上五分之一的船员遇难，“斯塔克”号的铝制顶层着火，受损军舰的船舱瞬间被加热到了3000华氏度，花了近18个小时，船上的火才被扑灭。

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引起了各国军事战略家的广泛关注。例如，马岛海战就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军官学员们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中国分析家也仔细研究了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这次冲突，得出了自己关于反舰作战的体会。“飞鱼”导弹被描述为这次冲突中的“明星”，其中的一点来自于它迫使英国航母特遣部队驶往马岛以东的水域作战。“鹞”式飞机（Harrier aircraft）不得不飞行更远距离才能到达岛上，从而使其在奔袭过程中消耗了更多的燃料，在驻地修养的时间也大大缩短。^①此外，莱尔·戈尔茨坦（Lyle Goldstein）敏锐地指出，中国对马岛战争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可以将其与“假定的台海冲突进行战略类比”。^②

① 严伟江：《1982：海航第二中队战纪》，《世界展望》2003年第2期，第75页。

② Lyle Goldstein, “China’s Falklands Lessons,” *Survival* 50, no. 3 (June-July 2008): 65.

马岛海战中反舰导弹所带来的巨大战果，为中国战略家们思考如何实质把控争议区域提供了参考，导弹的威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分析文本来进一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反舰弹道导弹（ASBM）——这种潜在的、能引起重大变革的武器。

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常规弹道导弹力量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此类军备的增长源于中国应对台湾问题，处理两岸危机和冲突时美国及其盟国介入的潜在战略要求。^① 观察家一致认为，相当数量的短、中程导弹在过去十年时刻瞄准台湾岛上的重要政治与军事目标，以及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导弹这一选项对中国来说在实战中和战略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在实战中，掩护性或选择性进攻都会使用导弹破坏或损毁关键战场和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装备、设施和基地，以拖延和阻止甚至解除台湾、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行动。^② 从战略上来讲，进行此类攻击可以：①显示北京的决心；②强迫台北恢复原状；③迅速瓦解台湾抵抗的意志；④迫使台湾拒绝美国军队访问或使用在台湾的基地；⑤提高美国干预成

① See Bates Gill, James Mulvenon, and Mark Stokes, "The Chines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n Organization*, ed. James Mulvenon and Andrew Yang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555.

②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and Kevin L. Pollpeter,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7), 11.

本，使华盛顿犹豫不决，拖延美国做出决定性军事反应的时间甚至终止其后续行动。

毋庸置疑，北京将在导弹的规模、准确性和杀伤力等方面继续投入巨资，以增强其战略选择和部队的作战效能。弹道导弹虽曾被认为是不精确的恐怖武器，但现在却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强大实战能力的精密军备。美国的观察员们自然不会忽视它们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隐含意义。2007年，兰德公司的报告将最有可能成为弹道导弹攻击目标的地点详细列出，其中包括飞机场、信息中心、监视和侦察基地、后勤设施和停泊在港口的航母等。^① 兰德公司估计，中国的库存导弹拥有足够的射程覆盖台湾、冲绳、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等地部署的一些关键军事设施。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的研究则认为，远程导弹攻击能够出奇制胜，在台湾岛上的战舰和战机出击或起飞前“使大多数海、陆部队陷入瘫痪，摧毁其大部分空军力量”。^② 这种结论令人担忧，且难以辩驳，因为近年来中国日益增长的导弹实力正在证明这一点。

撇开弹道导弹只能通过陆基平台发射、只能攻击固定目标的不足，具有前瞻性的新型弹道导弹更是拓宽了导弹的效用，大大延展了中国在海洋上的触及范围。未来中国的常规导弹部队可能在攻击敌方水面舰队的海上作战任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正成为美国政策界极为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不断增长的

① Roger Cliff, Mark Burles, Michael S. Chase, Derek Eaton, and Kevin L. Pollpeter,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7), 81-90.

② William S. Murray, "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3 (Summer 2008): 24.

兴趣以及有关方面的警醒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小惊喜：岸基弹道导弹部队可以远距离命中正在离岸航行的舰船，这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新的军事手段，可以从大陆上直接控制海上发生的事件。事实上，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将对美国海军迄今为止无可置疑、无可辩驳的制海权产生多大影响，已经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以及激烈的辩论，这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海军力量崛起时也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关于反舰弹道导弹威胁的严肃讨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炒作中国发展这种潜在变革性技术力量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马克·斯托克斯（Mark Stokes）在 1999 年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战略现代化建设的开创性研究，得出的预见性结论是，北京将寻求发展诸如远程精确打击等技术，用以绕过对手的作战部队，直接威胁敌人的弱点和重心。中国很早就公开表示了对反舰弹道导弹等相关技术的密切关注，斯托克斯宣称中国已经在发展“机动变轨装置，使导弹防御系统（对导弹）的跟踪更加复杂化”^①。2002 年，斯托克斯的研究对海洋威胁的评估有所转变，声称“机动载荷的制导系统终端将使美国西太平洋上的航母面临的作战环境更加复杂”^②。

斯托克斯的预言要变成现实还需数年。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ONI）2004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对反舰弹道导弹

① Mark A. Stokes,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rlisle Barrack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1999), 89.

② Mark A. Stokes, "Chinese Ballistic Missile Forces in the Age of Global Missile Defens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in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Ballistic Missiles, and Conventional Capabilities*, ed.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Carlisle Barrack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2), 114.

海上打击能力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加。^① 海军情报办公室认为，“中国拟发展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的攻击性舰艇的打击能力，并在台湾附近各海域使用常规战区弹道导弹（TBMS），使之成为多兵种联合作战的一部分。”^② 2005年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提到，中国首次着手研究“利用弹道导弹和特种作战部队打击舰船或岸上支持作战行动中各种基础设施的可能性”。^③ 该年度报告还在后续版本中透露了关于反舰弹道导弹的更多细节。2009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反舰弹道导弹的作战能力“具有特殊意义，它将在发生地区危机时给中国提供先发制人的强制选项”。^④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在2009年4月发布了关于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威胁的权威报告，称“中国已获得新型中程弹道导弹（MRBMs）的常规武器，以实现在较远范围内进行精确打击。该系统有能力对包括机场、港口等物流枢纽和地区军事基地在内的各个地点发动攻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发展CSS-5系列基础上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⑤ 关

① Jane's Defence Weekly was first to report on the ONI's finding. See Ted Parsons, "China Develops Antiship Missile," Jane's Defence Weekly, January 17, 2006.

②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Worldwide Maritime Challenges* (Suitland, Md.: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2004), 22.

③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33,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④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2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The 2009 issue even features a graphic depicting the flight trajectory of an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drawn from an authoritative 2006 article published by the Second Artillery Engineering College.

⑤ 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 *Ballistic and Cruise Missile Threat*,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April 2009, NASIC-1031-0985-09, 14.

于这一问题，其他非官方论坛和出版物表明，一些政策团体正在严肃认真地考虑反舰弹道导弹（ASBM）所带来的挑战。自2005年以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就开始收集记录所有关于反舰弹道导弹威胁的官方数据和媒体报道。^① 2008年12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中国海事研究所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航天动力的重要会议，特意用整个板块介绍了关于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潜在能力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辩论。2009年6月，国会特许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听证会，题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的影响”，在此期间，保罗·吉亚拉（Paul Giarra）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展。^② 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大卫·杨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专业论文集上发表了一篇充满火药味和前瞻性的文章，将反舰弹道导弹描述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作战时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附图中还展示了遭到导弹袭击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航空母舰。^③

反舰弹道导弹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已经引发了一阵热议，但对导弹作战生存能力的怀疑依旧存在。2004年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相关报告充分评估后认为，使用弹道导弹威胁完成海上打击任务“非常困难”。^④ 围绕战区弹道导弹海上应用最有争议的

①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8, 2008), 2-4.

② See Paul S. Giarra, "A Chinese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N,"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11, 2009,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9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9_06_11_wrts/09_06_11_giarra_statement.pdf.

③ See Andrew Erickson and David D. Yang, "On the Verge of a Game-Changer,"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35, no. 5 (May 2009): 26-32.

④ ONI, *Worldwide Maritime Challenges*, 21.

焦点是技术的可行性。在开阔海域作战时，准确击中移动的目标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情报、监视、侦察、指挥与控制系统的配合。弹头离开地球大气层的速度和角度以及再次进入大气层所增加的目标瞄准的难度，都是弹道导弹所特有的。因此，分析家们一直非常小心地不夸大反舰弹道导弹的可行性。尽管怀疑论者质疑中国跟踪和瞄准海上舰艇的能力，但仍必须承认反舰弹道导弹的潜在作战价值。正如埃文·梅德罗斯（Evan Medeiros）所强调的那样，“发展这种能力将会严重削弱冲突期间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建立并维持 24 小时空中战斗巡逻的能力”。^①

梅德罗斯主要关注的是反舰弹道导弹可能对美国海军航空兵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美国要维持在台湾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绝对主导性空中控制能力，大部分的（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空中飞行器就必须从航母战斗群上起飞；如果北京能够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阻挠美国空中力量利用在亚洲的地面基地，那就更是如此。如果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具有所吹嘘的精确度并且其杀伤力能够摧毁在台湾附近游弋的航母的话，那么，反舰弹道导弹的成功使用将会戏剧性地改变危机时期的战略格局。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埃里克·麦利凯非常肯定地断言：

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威胁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国可能在短短几年内通过装备机动重返大气层分弹头导弹（MARVs）严重威胁美国的陆上基地和航母战斗群。携带常规弹头的机动变轨导弹既加强了弹头生存能力（挫败导弹防御系统），

^① Evan S. Medeiros, “‘Minding the Gap’: Assess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PLA’s Second Artillery,” in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ed.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173.

又可以打击移动和固定目标。毫无疑问，这项具有前瞻性的第二炮兵作战能力计划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们使美国包括“宙斯盾”系统和航母飞行平台在内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能力降级。^①

与此类似，兰德公司一份研究上述问题的报告《走进龙的巢穴》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地克服了技术障碍，其威胁航母的能力将大幅度上升，高速度使得拦截这种导弹变得非常困难，它们能够深度破坏任何目标舰船。”^②对航母的潜在威胁，虽然在许多怀疑论者看来在技术上还很遥远，但它刺激了一些美国分析家认真反省，使他们开始质疑长期以来海军军力和海上战争的基本假设。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认为：“东亚海域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变成一个美国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潜在的航行禁区，如果他们继续开展有关行动的话，其携带的短程攻击飞机必须要能够在解放军 A2/AD [区域拒止] 的系统区域范围内运转良好。在该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的短程攻击机及其支持的探测器同样面临着正在不断增加的威胁。因此，所有这些装备都将面临报废的危险。”^③总而言之，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卓越的两大标志，以及马汉海权思想的两大支柱——航母和前沿基地可能面临被荒废的命运，随着海军航空兵的到来许多战舰都将走向消亡。难怪反舰弹道导弹已让华盛顿如此焦虑。

① Eric McVadon, “China’s Maturing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9, no. 2 (Spring 2006): 96.

②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92–93.

③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s: The Erod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8, no. 4 (July/August 2009): 23.

中国反舰弹道导弹 VS 美国“宙斯盾”

中国装备反舰弹道导弹技术能力的前景被十分看好，有些大胆的中美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将美国航母致残或永沉太平洋底已不再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虽然噩梦般的情节也可以理解为纯属主观臆造，但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达到它的作战状态，确实会危及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所有水面舰艇，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反舰弹道导弹对配备“宙斯盾”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的潜在威胁。一个典型的航母战斗群需要依靠几个“宙斯盾”舰来执行系列措施以对抗敌军火力。鉴于此，哪怕仅有一艘警戒舰遭到攻击，也会危及作战部队整体任务的完成。因此，就算在“宙斯盾”周围密密麻麻地布满武器，确保连苍蝇都飞不过其防御圈，但击破了“宙斯盾”就等于破坏了航母本身的生存能力，这点毋庸置疑。

我们在第四章海军战术中提到了韦恩·休斯，这位令人尊敬的理论家指出，“现代美军火力往往成群结队地纠集在一起，攻击力量围绕着几个航空母舰展开，而防御火力则集中在空防战中的导弹巡洋舰和舰载战斗机上”。^①究其内涵，为舰队撑起保护伞的地面部队如果遭受到严重损害，会从根本上打破战术平衡，从而使战局向着有利于对手的方向倾斜。可以想象，面对敌方的进攻威胁，即使这种进攻没有直接威胁到航母，但也足以让妥协退让的舰载防空战（AAW）要么维持在海湾内，要么整个进攻部队从战场掉头撤回。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转而攻击配备“宙斯盾”的巡洋舰或驱逐舰，也可以让敌军付出作战和战略代

^① Wayne P. Hughes,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305.

价。其结果是，防空战中的警戒舰就变得与航母一样具有打击价值。

有趣的是，大批中国的研究人员一致同意这一观点。他们的著作和言论都在着力证明，切实加强意在打击“宙斯盾”的海上战斗可以作为更具深远意义的反航母战略的一部分。一些倡导者指出，新的反舰导弹的任务应该针对“宙斯盾”军舰。对于他们来说，这为北京提供了更多理由剑指美国护卫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宙斯盾”技术出现以来[1983年第一艘“宙斯盾”巡洋舰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级加入舰队]，美国海军在对抗苏联海军时一直是游刃有余的。^①如果北京能够完善对抗“宙斯盾”的反舰弹道导弹技术，美国几十年来视作理所当然的航行自由将被彻底颠覆。基于此，中国研究人员对“宙斯盾”的见解值得仔细审议。本章专门探讨他们如何评估“宙斯盾”舰的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通过他们的评估窥探中国海上打击战略思想之全貌。我们专注于海上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有四个原因。第一，海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宙斯盾”为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发射提供了监视和跟踪数据，以及拦截处在中段飞行阶段的短中程导弹的能力。第二，海基导弹防御系统是目前已获得广泛测试的防御计划。第三，具有跟踪、瞄准和拦截弹道导弹能力的“宙斯盾”舰现已在亚洲海域服役，2006年7月和2009年4月朝鲜的导弹试射都被监测到了。第四，日本参与的弹道导弹计划可以增强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的联合维度(allied dimension)，使中国更为惶惶不安。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研究人员投入了大

^① Lisle A. Rose, *Power at Sea: A Violent Peac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 p. 216-218.

量精力关注海上反导能力。^① 在中国人眼里，“宙斯盾”的战略价值使得在危机时使用装备诸如反舰弹道导弹这样具有海上打击能力的战舰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中国对“宙斯盾”的威胁程度评估

中国的研究人员对游弋在亚太地区的配有“宙斯盾”的舰船数目表示忧心。一篇题为《宙斯盾舰合围中国》文章充满了火药味，其作者指出，中国已经被部署在亚洲海上的“宙斯盾”包围了。^② 任德新认为，部署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宙斯盾”舰队的比例极其失衡，2007年他写这篇文章之时，18艘具有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宙斯盾”舰中，有16艘驻扎在太平洋海域。有评论称，2007年欧洲海军仅拥有三艘“宙斯盾”舰（全部属西班牙海军），而日本、韩国和印度却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至少让17艘宙斯盾出海。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亚洲海军的采购计划将使中国沿海周边进入一个“宙斯盾泛滥”的阶段。^③

① 关于自2006年起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一般概述，参见王树斌、荣祥胜《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历史演变过程》，《江苏航空》2007年第3期，第30~31页；朱伟：《美四位一体导弹防御系统逐渐成型》，《国防科技》2007年1月，第49~51页；温德义：《建天网：美国现今忙啥？》，《环球军事》2006年第124期，第38~39页；温德义：《美国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新动向》，《国防科技工业》，2006年4月，第59~60页。石江月翻译了美国主管“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海军少将艾伦·B. 希克斯的一篇论文，《美国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现代舰船》，2007，第16~19页。原文来源是 Alan B. Hicks, “Extending the Navy’s Shield: Sea-Bas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33, no. 1 (January 2007): 56–59。

② 任德新：《宙斯盾舰合围中国》，《舰船知识》，2007年9月，第12页。

③ 《17艘宙斯盾围绕中国》，《晚霞》，2007年7月，第18页。

杨孝文预测，日本、印度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反导竞赛将愈演愈烈，中国边境将反导林立。^① 陈位昊认为，此类舰船的大量存在反映了美国要将导弹防御网横跨太平洋的决心。^② 鉴于“宙斯盾”技术的订单全部来自美国的盟国或友好国家，这样的结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些中国评论家对美国主导的、明显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海上围剿产生了怀疑。他们看到太平洋上的海基弹道导弹构成的三道防线的防御密度下降。分析人士认为，横须贺（Yokosuka）为防御弹道导弹的第一层，而珍珠港和圣迭戈则是另外两层。^③ 横须贺是前沿阵地，是海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最前线。^④ 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讲，这些同心圆或海上警戒线的出现是专门为摧毁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印度，乃至伊朗等地横跨太平洋发射的弹道导弹量身定做的。^⑤ 位于横须贺、珍珠港和圣迭戈的“宙斯盾”的目标定位分别是在导弹的助推、中段和末端各个阶段将其击落。^⑥

中国观察家对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宙斯盾”兴趣浓厚，因

-
- ① 杨孝文：《反导：中国周边上演“三国演义”》，《环球军事》2008年第1期，第11页。
 - ② 陈位昊：《宙斯盾舰成功拦截中程导弹》，《国际展望》2006年第1期，第9页。任德新：《太平洋的宙斯盾反导系统》，《当代军事文摘》2007年第10期，第18~19页。
 - ③ 任德新：《太平洋的宙斯盾反导系统》，《当代军事文摘》2007年第10期，第18~19页。
 - ④ 海研：《军事重镇——横须贺军港》，《当代海军》2006年第9期，第59页。
 - ⑤ 刘江平：《太平洋上的宙斯盾反导战舰群》，《当代海军》2008年第6期，第29页。
 - ⑥ 任德新、程健良：《宙斯盾反导系统在太平洋的部署及使用》，《舰船知识》2007年第7期，第17页。

为这里可以确保战舰从日本本土出发到达台湾和菲律宾群岛，逼近中国海洋边界。有些人认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游弋的“宙斯盾”舰艇将能够监测到任何从中国内地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甚至可能在其助推阶段将其拦截。戴艳丽透露，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火箭通常将其助推器投弃在湖南和广东两省。依据戴艳丽的说法推断，从湖南、河南和吉林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其助推阶段将跨过东海和黄海海域，进入了“宙斯盾”的拦截范围内。“显然，如果‘宙斯盾’作战系统成功地部署在中国周边，中国的弹道导弹将有可能被摧毁在其发射基地。”^①

北京航天长征科技信息研究所的齐艳丽宣称，“如果这样的海基弹道导弹防御作战系统开始在日本或台湾等地部署，中国战略力量和战区弹道导弹的能力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并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② 该研究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作者似乎认为北京会冒险将战略力量的部署靠近海岸，同时似乎高估了“宙斯盾”舰队的某些能力在短期内技术上的可行性。

亚洲海上的“宙斯盾”战斗力的存在并不是中国分析家们担心的唯一威胁。2007年10月《现代海军》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球海军力量的特点是以“岛链”为前提。白炎林描述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指出第二和第三岛链，分别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和珍珠港，构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波堤。^③ 白炎林还认为，巡航在两岛链之间的“宙斯盾”舰可以在公海上提供多层防御，将其作为战略武器可降低亚太地区其他拥

① 戴艳丽：《我周边宙斯盾舰的运行及威胁》，《舰船知识》2007年第9期，第18页。

② 齐艳丽：《美国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05年第3期，第61页。

③ 白炎林：《岛链上的世界海军》，《当代海军》2007年第10期，第14页。

有弹道导弹国家的战略影响合力。与前面的分析类似，白炎林认为海基弹道导弹防御将很快获得拦截远程战略导弹的能力，尽管目前这对美国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但如果美国工程师克服了这一难题，中美核威慑的相对稳定性必将随之被打破。

中国的研究人员还在密切关注“宙斯盾”系统的相关测试，对报告的技术突破高度敏感。2008年2月，一颗美国间谍卫星被从“宙斯盾”舰上发射的拦截器破坏，中国对此举之意义的各种猜测铺天盖地，并得出了一些极端的结论。^① 第一，系统性能远远超出其原设计参数，也许预示着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② 第二，卫星拦截为测试和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反卫星能力提供了便利。^③ 第三，反卫星技术的窍门可能会扩散到美国 BMD 技术开发的亲密伙伴——日本。^④ 第四，卫星拦截是对中国的一种威慑信号。^⑤ 第五，该事件证实了战争可能向太空延伸。吴勤指出，“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弹道导弹将是致命威胁，而卫星将成为致命弱点。一个国家希望赢得战场的主动权不仅需要具有抵御敌方的弹道导弹能力，还需要拥有干扰甚至摧毁敌方卫星的

-
- ① 吕德胜：《美国反导，走向何方？》，《中国民兵》2008年第3期，第50～51页。
 - ② 烽火：《极限拦截——标准-3击毁卫星分析》，《现代舰船》2008年第4期，第16页。
 - ③ 火木：《美国用海基导弹摧毁失控卫星真实意图何在？》，《当代海军》2008年第4期，第23页；Wu Ganxiang, “The New Space Threat?” *Beijing Review*, March 20 - March 26, 2008, CPP20080401715024; and Li Daguang,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US Decision to Down a Satellite by Missile?” *Banyue Tan*, April 1, 2008, 85-87, CPP20080501436001。
 - ④ Hong Yuan, “US ‘Ulterior Motives’ in Destroying Satellite with Missile,” *Xinjing Bao*, February 28, 2008, CPP20080222050001。
 - ⑤ 戴艳丽：《且谈美国海基反导系统拦截卫星》，《兵器知识》2008年第4期，第39页。

能力。”^① 在一些中国观察家看来，美国正磨刀霍霍，锻炼这两种技能。

关于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对中国在战略和战区水平上造成的潜在威胁的认知存在各种看法。过去十年，中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的有效性争论激烈。一大批中国学者和技术专家批评早先危言耸听的分析，满怀信心地认为北京将能够充分应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尤其是在战略层面上。一些中国学者不动声色地坚信进攻将永远优于防御。在一篇质疑美国的导弹防御有效性的长文中，分析人士袁崇焕罗列了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的致命弱点：^②①从中国内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在助推阶段不受拦截器的威胁，不论该（拦截器）是从海上，还是在近陆海岸线运行的宙斯盾舰上发射的；②中国可以有多种类型的对策，为海基中段拦截成功作饵；③因为导弹相对宙斯盾战舰要便宜很多，成本的不对称使导弹进攻获得了压倒性的赞成票。^③

此外，许多观察家都充分认识到，在宙斯盾系统和拦截器可以击败中国装备的先进洲际导弹之前，美国的工程师们仍须进行技术攻关，克服主要障碍。^③ 近年来，关于美国海基弹道导弹防御威胁的文章仍然在快速增长。

日本因素

中国的海上周边将出现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反导环境，该看

① 吴勤：《美国太空战的矛与盾》，《现代军事》2005年第5期，第47页。

② 袁崇焕：《全球导弹防御系统——能否真的有效保护美国自身安全？》，《国外科技动态》2006年第4期，第38~48页。

③ 郭利松、刘志春、宋刘非、张蕊：《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分析》，《舰船电子工程》2007年第6期，第53页；许黎明、李汛：《标准-3独臂支撑海军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现代舰船》2005年第7期，第37页。

法刺激了关于日本在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对日本坚持弹道导弹防御的联合研究和开发的意图做了最坏的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了日本所包藏的大国野心。^①汪成洋认为，虽然日本极力辩解其参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但东京确实是在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大国。^②有学者宣称，“日本隐藏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实现其长久以来的，与其主要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梦想。”^③

同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断言，东京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想突破和平宪法，追求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努力相一致。^④有些预言说“一旦日本的（导弹防御）能力强大到足够使其忽略自身在美、中、俄和东盟多极之间的力量平衡，那么日本将极有可能放弃美国这一盟友，为所欲为”。^⑤一些怀疑论者认为，日本花费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成本过高，可能致使政府夸大朝鲜的导弹能力。^⑥中国观察家清醒地发现，美国和日本所保证的其导弹防御系统只针对“无赖国家”这点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
- ① 彭灏、张素梅：《日本导弹防御系统面面观》，《飞航导弹》2007年第1期，第22页。
 - ② 汪成洋：《日本试射新型海基拦截导弹标准-3》，《当代海军》2006年第5期，第15页。
 - ③ 林国利、朱竟成、杨海荣：《日本导弹防御系统发展透视》，《国防科技》2005年第12期，第35页。
 - ④ 王宝付：《美日导弹防御部署为何提速？》，200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 ⑤ Shen Hung and Liang Yu-kuo, "Japan Seeks Hegemony under Pretext of 'Missile Defense,'" Ta Kung Pao, July 6, 2006, CPP20060712715004.
 - ⑥ 陈家光、吴振学、陈浩：《日防卫白皮书对别国说三道四》，《环球军事》2007年第8期。

除了质疑日本的动机，中国对于日本对导弹防御的野心所潜在的战略后果也发出警告。罗山爱认为，美日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深化了盟国间的互操作能力（interoperability），东京将越来越紧密地被捆绑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之中。^① 袁冲认为，跨太平洋结盟会引发军备竞赛和加剧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不稳定性。^② 其他一些走得更远的学者还指责，日本领导人炒作朝鲜导弹威胁，并以其为借口发展针对中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③ 石江月指出，2006年的美国海军“哈尔西”（Halsey）号导弹驱逐舰巡航太平洋的主要动机是，利用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来“遏制中国”。^④ 有两位分析人士注意到，在日本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推进数千公里，增加预警时间，扩大防御纵深。从亚洲向美国大陆发射的弹道导弹将在助推阶段就被设在日本的雷达侦测到，然后立即提示整个亚太地区的海基和陆基拦截武器应对威胁，这可以显著提高成功拦截的几率”。^⑤ 鉴于中国的核战略的防御性和有限性，他们认为，未来的美日导弹防御系统将着力于破坏中国的核威慑。在作战和技术层面，与陆基防御武器相比，中国人高度赞赏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价值。

具体来说，“宙斯盾”舰给战区指挥官提供更广泛的战略

① 罗山爱：《日本用啥保卫东京？》，《环球军事》2006年第1期，第17页。类似评论见林炎：“日本首次海基弹道导弹拦截分析”，《当代海军》2008年第2期，第17页。

② 袁冲：《日本加快部署反导步伐》，《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4期，第39页。

③ 周晓光、陈永红：《日本海军战略的新动向》，《当代海军》2006年第7期，第64页。

④ 石江月：《美国加速提升太平洋军力瞄准谁？》，《现代舰船》2006年第10期，第11页。

⑤ 王鹏飞、孙志宏：《联合美台，BMD即将建成日本反导系统介入台湾》，《国际展望》2007年第18期，第55页。

选择,包括机动性、反应迅速性和灵活性,以及其他导弹防御系统的独立运作的的能力范围等。这是相较于陆基弹道防御导弹的明显优势。^①不出所料,分析人士密切观察日本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尤其重点检测了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的四个“金刚”级和两个“爱宕”级驱逐舰的“宙斯盾”系统升级。多数人同意,这六艘精干的战舰仅用两艘就足够“支撑对中国和朝鲜的弹道导弹预警和拦截。”^②装备先进的“标准”-3型导弹和Block II拦截机,比以前SM系列速度更快、射程更远。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判断,仅一艘“爱宕”级驱逐舰就可以给日本列岛提供全面保护。^③

关于日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宙斯盾”舰队,中国方面的评论相当有趣。中国的学者都对美国和日本所声称的海基导弹完全是防御性的说法深表怀疑。他们预见,未来几年的防守和进攻平台区分将会是模糊的。一位评论家称,日本的海基弹道导弹防御舰队将“‘防卫’矛头扩大了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自日本本土延展到了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④这种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中

-
- ① 中国关于海基弹道导弹作战防御优势的描述,参见孟昭香《21世纪的宙斯盾》,《情报指挥控制系统与仿真技术》2005年第6期,第3页;钟建业:《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航天》2005年第10期,第38页。
 - ② 侯健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战略与新装备》,《当代海军》2006年第2期,第20页;吕修顺:《点评日、韩最新型宙斯盾驱逐舰》,《舰载武器》2007年第7期,第64页。
 - ③ 高山:《对付中国——日本未来主力舰艇发展构想》,《现代舰船》2006年第2期,第31页;李杰:《日韩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当代海军》2007年第5期,第33页;《雷锡恩公司将进行标准-3 Block 2A的开发》,《飞航导弹》2006年第9期,第9页。
 - ④ 博慧军:《日本:加速向军事强国迈进》,《环球军事》2006年第2期,第59~60页。

国的怀疑——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不是针对朝鲜而是针对中国。温德义认为，导弹防御系统将为本国开发出更多的进攻型武器打开战略空间，包括其航空母舰和进攻型地对地弹道导弹。^①因此，该防御伞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基础，而这两地又都关系到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远林提出了针对可能的攻防问题最完整的应对方案。他指出，“宙斯盾”舰的防御武装使之能够在敌人的沿海水域运行，从而延长了进攻性武器深入内陆的范围。^②远林引用1987年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不慎被“文森斯”号击落的例子，以此证明近海运行的宙斯盾舰艇也可以对空中构成威胁。远林进一步断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提供了发展进攻能力的基础。例如，“宙斯盾”战舰甲板上SM-2防空导弹通过改良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在远林看来，拥有275公里射程，精度在15米范围内的SM-2导弹是同时兼具攻防能力的代表性武器。韩国的“奈基”（Nike）防空导弹向地对地导弹的转换提供了另一种改良“宙斯盾”拦截技术的可能性。远林总结，“很显然，未来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艇将不只是作为空中攻击和弹道导弹的威慑盾牌，而且还会成为进攻性制导导弹的作战平台。而日本的宙斯盾舰自然也同样具有对抗制导导弹的潜在能力”。^③他所指的日本开发远程对地攻击导弹的潜力是否真有其事，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日本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供应“鱼叉”

① 温德义：《盾与刀——日本加速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影响》，《现代兵器》2006年第1期，第12页。

② 远林、金琳：《防御导弹的奥秘在攻》，《当代军事文摘》2006年第6期，第64页。

③ 远林：《导弹防御系统以攻为守》，《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月23日，第87页。

(Harpoon) 反舰导弹以及制造太空运载火箭的世界顶级工艺。正因为如此, 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副产品的价值可能比远林所指出的还要大。

可以预见, 中国研究人员最担心的是美日干涉台湾海峡的突发事态。^① 关于台湾可能会直接参与日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担忧由来已久。大多数已发表的分析报告还比较抽象, 但也有一些中国的战略家开始在更具体的领域进行探索。例如, 王鹏飞和孙志宏就预言日本将使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的情报资源 (intelligence assets), 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弹道导弹和空中力量的信息, 然后直接或间接通过美国军方将数据转给台湾当局。战略和战地意识的增强甚至可能诱使日本加入美国参与下的台湾海峡的空中和导弹防御行动。^②

另一个关于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的言论也引人注意, 中国担忧“宙斯盾”共同使用的多国联合的前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不能只依赖日本防卫力量应对弹道导弹威胁。因此, 他们推测华盛顿希望吸收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到一个区域性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最大限度地利用亚洲的海洋地理环境, 特别是岛链。^③ 澳大利亚对部署“宙斯盾”舰队兴趣明显, 有些人对此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他们担心这将形成一个三方反导作战联盟。曹志刚描述了华盛顿将如何“哄骗”堪培拉加入“反导弹联盟”：“导弹防御系统完成后, 除了能够为美军在日本的部队提供安全

① 李瑞:《美日加快军事一体化对台海安全态势的影响》,《科教文汇》2007年第12期,第124~125页。

② Wang and Sun, “Joining U. S. and Taiwan,” 55.

③ 李杰:《宙斯盾为啥齐聚亚太?》,《当代海军》2007年第11期,第26页。关于韩国潜在参与美日弹道导弹防御建构计划的分析见梁峰观天下《韩国海军为何急造宙斯盾战舰》,《当代海军》2008年第7期,第45页。作者认为韩国加入三方弹道导弹防御协议将刺激俄罗斯做出反应。

保证，在完成技术防御系统的升级后它也可以成为‘前进盾牌’保护美国本土。此外，美国可以使之成为‘样板’用以吸引澳大利亚加入‘反导联盟’，从而加强美国全球反导能力。”^①因此，任德新假设，美日澳反导联盟将很快对抗中国。^②如果对抗远程导弹，澳大利亚的防御距离同样过远，日本和美国将从亚洲大陆或其太平洋的潜艇上发出导弹预警信号。任德新的结论是，海基弹道导弹防御联盟将有效地沿整个第一岛链构建一个达到地球大气层上 50000 米的屏障。

另一名观察员预测了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分工：日本负责提供前方防御对抗陆基导弹，而澳大利亚则负责监测在太平洋的潜艇。^③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设想包括探测潜艇发射的能力，比目前美国的计划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更为强大。中国清楚地“配置”了一个超出跨太平洋联盟的海基导弹防御系统，这为美国人提供了创造空间。

作战和战术评估

在宙斯盾作为支撑的美国导弹防御体系和保护美国航母攻击群的核心角色中，中国海军界极其重视和关注空防舰队中的“猎枪”——“提康德罗加”级（Ticonderoga - class）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Arleigh Burke - class）驱逐舰的作战能力。^④

① 曹志刚：《美日患上了“导弹过敏症”》，2007年7月19日《解放军报》，第5版。

② 任德新：《宙斯盾舰合围中国》，15页。

③ 杜朝平：《东经135°的网——日本和澳大利亚军事合作走向》，《现代舰船》2007年第5期，第10~11页。

④ 关于“宙斯盾”系统发展演变的综述，见施征《美国海军的保护伞——宙斯盾系统》，《海洋世界》2006年第8期，第40~46页。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对宙斯盾舰的直接导弹攻击可以破坏航母特遣部队的完整性。一项研究指出“一艘没有护卫舰保护的航母将变成反舰巡航导弹的活靶子”。^①对“宙斯盾”作战的评估策略表明，中国的战略家正在调查和研究航母的防御漏洞，他们获得的经验教训和即将得出的结论，会使华盛顿和各盟国海军规划者焦虑紧张。

例如，中国观察人士比较了“宙斯盾”舰与其他功能舰艇，以揭示美国的水面舰队作战强项和弱点。其主要结论是：“宙斯盾”舰在反地面战（ASUW）中处于劣势。一项对比“提康德罗加”级“宙斯盾”巡航舰与俄罗斯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研究表明，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作者注意到“基洛夫”是专门为打击敌人的航母而设计的，而“提康德罗加”级必须同时完成包括舰队防空等在内的多个任务，淡化了其海上控制的能力。^②另一篇标题极具煽动性的文章《航母杀手与航母守护神》探讨了“提康德罗加”级与乌克兰“光荣”级巡洋舰（Slava-class cruiser）的潜在不对称性。王逸峰得出的结论与其大致相同，“宙斯盾”舰在舰对舰作战中将无法应付“光荣”级巡航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掠海攻击。^③

其他分析人士比较了美军舰艇与亚洲海军部署的其他类似平台。2008年4月，“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拉森”号（Lassen）停靠上海，记者一翔记录了他个人在该军舰的观测数

-
- ① 丁光超、吕卫民、彭瑾、刘冬：《反舰导弹对航母编队突防策略研究》，《飞航导弹》2008年第10期，第37页。
 - ② 肖鹏：《近看两种现代巡洋舰龙虎斗——提康德罗加 VS 基洛夫》，《当代世界》2007年第4期，第58页。
 - ③ 王逸峰：《航母杀手 VS 航母守护神——简评光荣级与提康德罗加级》，《舰载武器》2007年第5期，第17页。

据。让他感到震惊的是，缺少“鱼叉”反舰导弹的“拉森”号足可以作为美国海军反水面舰艇战斗（ASUW）能力明显萎缩的标志。一翔将这种违背海军习惯配置的武器归咎于海军领导人的信念：①海军航空兵足以完成海上控制任务；②在公海发生舰队交战的概率非常低；③“宙斯盾”舰应注重在空中和导弹防御战中发挥比较优势。他指出，与此相反，日本、韩国和中国海军与“宙斯盾”同吨位舰船都是用反舰导弹武装到牙齿的。①虽然一翔没有详尽阐述各个区域海军之间这一明显分歧对作战的影响，但是，他的观察所例证的“宙斯盾”战斗的弱点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分析人士对日本自卫队的“宙斯盾”舰给予了同样的详细评估并指出“金刚”级和“爱宕”级驱逐舰在执行反水面舰艇战斗任务时能力较弱。闻舞认为“爱宕”级驱逐舰过分强调弹道导弹防御而削弱了水面作战能力。②另一个更为关键的评估将日本驱逐舰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潜力归因于美国对转让敏感技术的限制。陈安刚将这种限制下诞生的一类水面舰艇比喻为“畸形儿”。③此外，另一个别出心裁的研究则对比了中国的“现代”级（Sovremenny-Class）驱逐舰与“金刚”（Kongo）级驱逐舰，以呼应之前提到的“提康德罗加”级和“光荣”级之间的比较。在舰对舰比较中，天鹰的结论是“金刚”难以抵御“现代”级的“日炙”巡航导弹。④达砾也赞

① 一翔：《细品宙斯盾》，《现代兵器》2008年第8期，第7页。

② 闻舞：《爱宕级 VS KDX-3——东北亚宙斯盾大比拼》，《当代海军》2007年第7期，第73页。

③ 陈安刚：《点击日本宙斯盾战舰》，《现代舰船》2006年第10期，第22页。

④ 天鹰：《剑与盾——东亚水域的“现代”与“金刚”》，《舰载武器》2007年第3期，第44页。

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日炙”导弹的多发密集型攻击会造成对“金刚”级驱逐舰，甚至整个日本自卫队舰队致命的威胁。^①

这些对美国和日本水面舰队的评估遵照马汉海权论的基本原理，宣扬积极运用咄咄逼人的海军攻势。事实上，一些中国的战略家依据“马汉法则”设想的，针对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计划有可能会付诸实践。他们认为，由于“金刚”号是日本自卫队的主力舰，解放军的进攻行动必然会着眼于击败该重心。因此，作为日本核心作战能力，“金刚”级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战时是主要被攻击目标。进一步来讲，海潮断言：“如果对手拥有更强大的空中和水下作战能力，穿透‘金刚’级驱逐舰的防御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金刚’级驱逐舰受损或沉没，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那么，日本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导弹防御系统遭受到的打击将使其难以承受。”^② 与这种论断相关的还有关于如何对抗美国介入亚洲水域的讨论。海潮的发现对于潜在的美日干涉台湾等突发性事态具有指导意义。攻击较弱的美国盟友高附加值的船舶可能产生更多战略效果，如削弱联盟的凝聚力，显示中国的决心，支撑威慑，防止联盟中其他更强大的伙伴卷入使冲突升级等。

吴红民指出，“中国有句古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击沉敌人的旗舰就好比一箭双雕：既可以达到威慑的目的又能降低潜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③ 可以推断，吴红民提倡的是尽早先发制人，攻击自卫队“宙斯盾”战舰，在危机或者战争中将日本舰队淘汰出局。如果成功，这种打击可以间接改

① 达砾：《小“白蛉”能吞大航母》，《太空探索》2008年第10期，第49页。

② 海潮：《日本铸造海上防空盾牌——日本“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的性能演变》，《舰载武器》2005年第8期，第56页。

③ 吴红民：《目标——金刚虚拟战场》，《舰载武器》2004年第6期，第7页。

变华盛顿的战略部署。这样的话，这种战略很有可能会促使而不是限制冲突升级，但作者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可以明确的是，中日在海上将有一战，在一些中国战略家看来应该不会太远。

除舰对舰作战外，一些文献还研究了在空中打击“宙斯盾”的可行性。一篇文章谴责台湾兴致勃勃地购买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在否定台北全面防务的战略价值。管带指出，战时的台湾海军可能会面对来自大陆的机载武器的饱和攻击和“超饱和攻击”，“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空中防务将会在瞬间被压制。^① 赵宇断言，在由九部分现代海军系列组成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中，除非提供陆基空军的支持，否则“宙斯盾”的防御仍是高度脆弱的，“当前的‘宙斯盾’系统无法抵御苏联的标准饱和攻击，尤其是当空中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卷入其中时。TU-22 逆火轰炸机或相似类型的轰炸机发射不同类型的反舰导弹，如综合运用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和防辐射的导弹，很有可能会撕裂‘宙斯盾’分层的防空网。”^② 另一篇文章从军用和商用船舶等方面，估算需要多少架战斗轰炸机才能使八艘“宙斯盾”舰失灵。作者选择了较为合理的数字计算可能的损失以及失败的概率，其结论是需要 150 ~ 200 架苏-30S 或同级别飞机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③ 中国的分析家们对穿透“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相关问题进行如此思考，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① 管带：《“提康德罗加”巡洋舰对台湾的影响》，《现代舰船》2005年第2期，第22页。

② 赵宇：《全景扫描日本海上军事力量——海军海上作战力量》，《当代海军》2005年第9期，第58页。

③ 《中国航空兵如何突破宙斯盾合围》，《舰船知识》2007年第10期，第18页。

虽然一些研究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中国思想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对抗“宙斯盾”作战平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三位教员在由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主办的《飞行力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估了反舰巡航导弹的性能以及反舰巡航导弹穿透航母战斗群分层防御的能力。他们报告其模拟的反舰弹道导弹穿透率能达到95%。^①观察家们还注意到，有报道称美国最近研究的新一代拦截SM-6能直接应对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②而中国人对SM-6做何感想仍有待观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阐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舰弹道导弹的效用。^③他认为，虽然日本海军规划者仍然相信，他们在力量对比型海军作战中有能力击败中国舰队，但反舰弹道导弹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王湘穗认为，日本参与弹道导弹防御的联合开发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他的坦率分析表明了一些中国人的基本看法：一个可行的反舰弹道导弹计划可以对比自身能力更优越的海军产生威慑力。

中国反宙斯盾战术的分级体系

本书第四章以及我们所举出的各种评论都表明，解放军拥

-
- ① 许诚、李永胜、孙锦：《基于 MARKOV 过程的反舰导弹突防舰艇编队能力评估》，《飞行力学》2009年第2期，第95页。
 - ② 陈娜：《无限打击之刃——盘点美国未来舰载作战系统》，《国际展望》2007年第24期，第53页。
 - ③ 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王湘穗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院武桂馥，第二炮兵陆军研究所杨承军总结发言，后成文发表。武桂馥、杨承军、王湘穗：《21世纪初的航天科技与新军事变革》，《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第14页。

有一系列备选方案对抗外国海军及其“宙斯盾”战斗系统。各种方案之间并不互斥，而是彼此共同促进。北京投入必要的资源发展海军力量并拥有了联合作战能力，这使得美国海军面临多方面的威胁，需要应对空间和时间都较为分散的攻击。在反水面舰艇作战中，空中发动饱和攻击、反舰弹道导弹打击等多兵种的联合攻击有相当大的把握压制海基空中导弹防御系统，尤其是地雷和水下作战等一些杀手锏战术作为补充，其胜算大增。

这种思维上的推演，可以帮助美国海军规划者通过综合分析风险、成本、地理空间和时间等因素，将三种反“宙斯盾”策略进行排序。换句话说，解放军的备选方案可能是风险巨大、费用高昂并且极有可能失败，甚至难以实施的。而相反，在行动的早期阶段，战术选择偏向是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成功可能性最高且相对容易实施的。也就是说，解放军的规划者们通过权衡成本与风险，对各种作战能力进行排序，从而树立起一个分层防御体系以对抗美国海军力量的入侵。

舰对舰交战也许是北京最危险的备选项。探测、跟踪和瞄准公海上的舰船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需要情报、监视和侦察一系列辅助设备。海上对峙中，美国海军具有比较优势。在面对美国海军的进攻性打击时，中国水面舰艇的生存能力值得怀疑，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射程向美国的水面舰队发射反舰巡航导弹。使用超越地平线的“射后不管”（“fire-and-forget”）导弹，空中发动的饱和攻击对抗美国舰队将被证明成本较低，其成功的前景比水面舰艇作战更好。但中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需要足够的射程和定位能力击中海上航行的船只。他们还必须在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第一轮炮火攻击之前，沿第一岛链与其空中力量抗衡。

这就使得反舰弹道导弹的价值凸显。从中国大陆发射的反舰

弹道导弹，既不需要昂贵的军舰为其保驾护航，也不需要载人飞机携带其抵达攻击目标。它可以专职对抗盟军的空中防御，直接打击美国舰队。换句话说，使用这种导弹进行海战或空袭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人力和资源成本。反舰弹道导弹打击的成功门槛相对水面舰艇作战和空中打击要低很多。反舰弹道导弹不需要通过击沉或摧毁美国船舰才能打乱美国的作战计划，它们只需要攻击舰队的防御层，就能迫使“宙斯盾”放下屠刀，在海上实战条件下美国将无法轻易修补其防御圈。即使是不精确的反舰弹道导弹的攻击，也可以部分消耗甚至耗尽航母两栖战斗群的常规导弹储备，让敌军变得手无寸铁，无法对抗解放军展开的下一步行动。中国国防规划者也预见到，使用携带分弹头的导弹，可以弥补普通导弹在广阔而分散的地理区域的不精确性。例如，反舰弹道导弹的弹头可发射反辐射分弹头，用于打击“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雷达发射装置。同样，电磁脉冲（EMP）分弹头引爆后的威力美国水面舰队根本无法承受，它发生的毁灭性电磁脉冲将使航母护航舰上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停止运转。依据《第二炮兵作战技术》（The Science of Second Artillery Campaigns）对于中国战略火箭力量的权威理论指导，此类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使航母战斗群失明失聪。作者断言：“针对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或‘宙斯盾’系统中的薄弱环节，携带抗辐射弹头或电磁脉冲弹头的常规导弹，可以用于攻击敌方正在执行任务的雷达和指挥系统，仅辐射弹头攻击雷达站，而电磁脉冲弹则能使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瘫痪。”^① 联合常规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基地和亚洲其他陆上目标，引出更多不同的拦截方式，反舰弹道导弹袭击将使美国及其盟国在海上战斗中丧失持久抵抗力。解放军高级将领用他们惊人

^① 于际训等：《第二炮兵运动科学》，解放军出版社，2004，第402页。

的、专业而又极富想象力的方式，通过反舰弹道导弹来击败“宙斯盾”系统。

以这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削弱入侵舰队，中国政府可能通过连续发动空中和海上攻击，给美国海军造成更多麻烦。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发动空中饱和攻击，紧随其后，水下和海上巡航导弹齐射，抵达第一个岛链以消磨美国作战部队的防御外层。如果规划和执行得当，分层有序的攻势就会为取得进展性突破提供舞台。中国导弹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将会在美国战区指挥官、政治领导层和普通民众之中造成不可知的战略威慑、政治和心理上的冲击。这绝不是不可想象的，太平洋舰队的防御被打破很可能会使得华盛顿暂停考虑是否要在危机时继续介入。根据成本效益分析中国的战略和战术倾向才是合情合理的。这意味着反舰弹道导弹是否使用以及何时投入使用，都是北京对抗“宙斯盾”战舰的优先考虑选项。

这里我们可以重申第四章中描写的马汉的大规模集中兵力进攻。如果中国和美国军队能在数量、质量和实战技能方面达到相对平衡，那么解放军有可能储备较少的地面部队和载人战斗机/攻击机。这样的话，反水面舰艇作战似乎将面临较低风险和成本；即使是在战斗初期，成功也将更有保障；一旦解放军与美国海军在亚洲海域平起平坐，他们会更容易如法炮制。新的战略视野使得北京可以无惧遭受灾难性军事挫折而进行战略选择。解放军可以深入思考，运用毛泽东式思维，采取马汉式行动发动决定性进攻。

美国不太可能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一样，将舰队集中在敌方的海岸附近以保持相对的优势。英国封锁德国海岸是因为德国海军已经直接威胁到英国的联络通信，影响到英伦三岛本土。伦敦对德国海军的所作所为无法坐视不理。与此不同，美国是远离亚

洲的超级大国，解放军海军不会轻易去碰触美国海军的逆鳞，步德国之后尘。

中国有条不紊、严格自律地转向海洋（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七章中进一步阐述），极力避免引起美国猜忌其意在制海权继而引发竞争性恶果。反舰弹道导弹也努力配合平息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不像航母、驱逐舰、飞机等这些美国公众和政治阶层高度熟悉的作战平台那般引人注目，反舰弹道导弹及其作战深藏不露，不会引起公众的过多关注或引发过激舆论。因此，在大众眼中它们不是核武器，与部署在台湾海峡的常规导弹并无太大区别。由于反舰弹道导弹能够移动，散布在中国大陆各处，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有价值的评估。中国核学说的历史和战略导弹略微有迹可循，反舰弹道导弹就像一个“虚拟”武器，公众看不见也不能对其产生丝毫影响。即使是备受期待的系统测试，与苏联和中国分别在1949年和1964年核武器上重大突破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将重心放在监督高级政治之上，而不是这些日常琐事，他们不会将反舰弹道导弹看成一个游戏规则变革者。但这已经触动了安全研究专家们兴奋的神经，现代版冷战“导弹差距”之争已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种低调符合北京的战略偏好，使得华盛顿无法动员国家意志。这种力量结构和能力发展趋势显然有利于中国，北京也越加青睐马汉学说。相比之下，英国人的困难其实更好对付。在海权领域，真正困难的抉择正在等待着美国人。

启 示

中国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击败海基弹道导弹防御和“宙斯盾”防空作战防御系统上，所以美国必须了解在中美战略

关系的框架下北京将如何对新的海洋环境做出反应。通过简要回顾中国早期关于导弹防御较有代表性的各类声音，我们认为华盛顿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大致如下：

- 在战略层面，分析人士充分相信中国对抗美日海上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础十分坚实，可以刀枪不入。他们的结论是，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宙斯盾”舰队在亚洲沿海地区巡逻，不会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威慑价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地理环境和技术现实。综合考虑中国的战略纵深、新一代车载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配置以及解放军海军的新兴的水下威慑力，北京的报复能力有实质保障。

- 在战区层面，中国对海上导弹防御的惊恐并非错觉。有效的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确实可以削弱北京打击或威慑区域目标的能力。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会因此而让一步。

- 如果北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压制导弹防御系统，其方式要么是通过发射更多的导弹，要么是目标直指“宙斯盾”本身，那么危机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换句话说，更多的导弹发射和更多的打击目标将意味着北京发动报复行动的可能性会更高。

- 考虑到政治联盟，中国人似乎认为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美国干预下的涉台应急行动中。如果北京不将日本这个可以通过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先发制人的联盟伙伴视为弱者，那么控制升级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复杂和无把握的承诺。

- 在作战层面，预期的“宙斯盾”系统升级引发了中国分析人士的焦虑。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互动原则——“两个活跃的力量之间将无可避免地发生碰撞”。解放军应对海基弹道导弹防御必然会考虑反舰作战，美国海军不应过于偏重海上控制。

- 回到第四章中的一个观点，美国的海军学说假定海军力量

可以攻击发射平台，在弓箭手射箭之前将其击毙。这一点已经深深地根植在美国的作战偏好中，中国正在积极阻止美国将触手伸向“弓箭手”，这一高标准将可能会给进攻造成严重压力，特别是反舰弹道导弹并不需要“弓箭手”；如果在箭发出前发动攻击，美军的打击目标将深入中国内陆，这将会带来严重的战略和政治后果。先发制人，重创“弓箭手”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理想，但美军始终沉浸在这种战术上的优越感之中势必是有风险的。

关于“宙斯盾”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著作多如牛毛，中国对这些课题的兴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它的热度也不会很快消减。事实上，知识分子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话语权的激烈竞争环境，也为境外观察人士提供了了解导弹和反导相互作用下中国的思想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宝贵机会。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希望中国国内的分析人士在未来几年中继续探讨诸如反舰弹道导弹能力的发展前景等课题。将这些课题作为新的研究项目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许多专家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投身其中了。

第六章

中国新兴的水下核威慑力量

本章将海上介入与反介入的概念范畴拓展到我们尚未深度探索的核领域。乍一看，核战略与海上介入战术和作战分属不同的分析层次，似乎并无关联。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和国家意志的广泛平衡，而后者则适用于对立军事力量在战区内的遭遇战。虽然这些差异确实存在，但我们认为海基核威慑和海军介入的竞赛（the naval contest for access）将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交叉，就此打破亚洲的海上平衡。因此，华盛顿和亚洲各国的决策者们理应更好地理解和领会海上战略和战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三个前提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第二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分析的基础，这也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海军作战基本原则（military grammar）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中国第二代水下威慑力量的引进能否有助于增进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大多数西方分析人士对此都十分关注。总体而言，我们认为生存能力更强的中国核态势能够增加战略稳定性，但我们的分析要超越这一抽象概念，更为深入地探讨指导中国核潜艇规划的具体作战参数。战略部署只是一个方面，和平时、

危机期间以及战争状态下北京如何使用弹道导弹核潜艇存在本质区别，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第二，新兴核潜艇部队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它作战时免受损失的能力来测量。我们认为，行动自由取决于中国对其沿海周边的控制程度。至少在近中期，可能的潜艇部署模式会降低中国反介入武器和策略在覆盖范围内的控制能力，这点我们会在下文中进一步阐释。更大范围的沿海争议区意味着中国的潜艇部队将冒险从近岸走向更远，将其攻击目标范围扩大到目前所不能触及的地区。这可能是危险的和不利的。

第三，由海上相互报复能力带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有可能发生逆转，加剧亚洲战区层面的不稳定性。如果中国底气大增，自信其导弹核潜艇不仅能够阻止美国使用核边缘政策，而且还能够使美国陷入战略困境，那么北京可能倍感鼓舞而挑起其核保护伞下的有限地区冲突，并使之纵向升级或横向扩大。换句话说，中国对自身水下舰队削弱美国核威胁的能力认知可能会扩大中国的反介入选项。因此，反介入和核威慑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海基核威慑和海上介入之间的潜在动态，我们将首先考察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在该领域未来可能出现的变数。然后，我们再对现今关于中国未来的核态势的讨论进行回顾和考察，明确中国海基核威慑战略的底线。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将进一步预测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大体规模和部署模式。最后，我们对能彻底改变中国核战略的潜在因素进行评估。

水下核威慑的历史模型

已经部署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国家有五个：美国、苏联及其继

任者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与这几个国家的历史模型并无多大关联，虽然看似有悖常理，但事实确实如此。一方面，毛泽东嘲笑核武器，认为它们就像“纸老虎”。众所周知，他漠视中国近海海域以外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国内科学事业和工程部门，也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潜艇部队所需的专业知识发展出现了断层。因此，中国造船工程师和武器科学家从未成功构建起一支可靠的弹道导弹潜艇舰队，以使国家获得无懈可击的二次打击能力。^① 简短捷说，我们暂且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搁置一旁。

通过考察其他四国的历史模型，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未来可能的海基核威慑力量。^② 美国和苏联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选择，参照超级大国行为模式，上升到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和前景是北京广为探讨的。稍作梳理，可以将法国和英国归入另一类。冷战期间，巴黎和伦敦出于对美国核保障可靠性的疑虑和担忧，各自发展了适度的核武库，并派遣弹道导弹核潜艇出海。此外，一些中国观察家预测，北京将满足于自身亚洲地区大国的地位，类似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及其周围所享有的地位。这种可能性将北约 - 欧洲独立的核威慑力量（NATO - European deterrents）推入我们的视线。

①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关于冷战时期操作弹道导弹潜艇的技术问题，参见 Robert G. Loewenthal, “Cold War Insights into China's New Ballistic-Missile Submarine,” in *Cahirnk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ed.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 Andrew R. Wilso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286 - 303.

美国模式

冷战初期，美国历届政府都断定，美利坚必将依恃一个庞大的核力量体系。大型核武库的理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期间主要是美国在率先开发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力量视作抵消苏联在地理和人力资源方面巨大优势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北约 - 欧洲战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草草炮制了“大规模报复”理论用以对抗任何扩张共产主义的努力，但收效甚微。^①到了肯尼迪时代，“大规模报复”理论已失去信誉，使用核武器对抗第三世界国家叛乱的说法很难服众。为了填补自 1957 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与之拉开的“导弹鸿沟”，华盛顿又仓促而上，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发展和完善“相互确保摧毁”学说，即 MAD。同归毁灭论的支持者认为，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领导人会甘冒核战争的风险，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会引发自我毁灭的二次打击。^②

随之而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去核战略的声音。不过，在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eedman) 看来“(核)武器从未离开过舞台中心”。主流观念认为，一个大型核武库是对付控制着压倒性传统霸权和拥有强有力核武器的敌人所必不可少的。无论虚虚实实的学术辩论，还是断断续续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尝试，

① John Foster Dulles,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January 25, 1954).

② 关于美国核战略争论的精彩介绍，参见 see Lawrence Freedman, “The First Two Generations of Nuclear Strategists,”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e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35 - 778。

都无法打破这一基本信念。^①

因此，强大的美国核潜艇部队构成了美国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冷战后期，18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装备了三叉戟 IIC-4 或 D-5 潜射弹道导弹（SLBM），组成了美国的水下威慑力量。^② 美国潜艇部队对于其核潜艇实际部署情况口风极为严紧，以确保他们能够不辱使命，保证国家二次打击能力无懈可击。在周期长达 77 天的巡逻任务执行期间，任何无意中透露的有关美国潜艇巡逻区域（grounds）或它们的习惯位置的信息都有可能致潜艇部队遭到对手的反潜作战攻击。美国历届政府精心制定指挥控制通信程序，防止未经授权核武器发射。举例来说，核潜艇与巡逻机失去 30 分钟通信联络，紧急联络会马上启动，以恢复美国战略司令部、所有的战略力量的母控制程序（parent command）和这些关键部门之间的联络。^③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非常清醒和警觉战略核潜艇误射弹道导弹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④

① 关于美国核战略争论的精彩介绍，参见，see Lawrence Freedman, “The First Two Generations of Nuclear Strategists,”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e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35–778。

② 例如：“SSBN – 726 Ohio Class FBM Submarines,”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systems/ssbn-726.htm>; and “Trident II D – 5 Fleet Ballistic Missile,”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systems/d-5.htm>。“俄亥俄”级舰艇能够运载 24 个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从而打击 4600 英里以外的目标，并携带多弹头分导弹头。

③ 访谈美国潜艇军官，Newport, R. I., February 15, 2008。

④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Prospects for Change*, 1989,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Web site, http://www.fas.org/irp/dia/product/smp_89.htm。关于美国对 SSBN 在美国海军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其他主题）的主要文献汇集，参见 John B. Hattendorf, *U. 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70s*, Newport Paper no. 30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7)。

美国并没有对船长们进行严格的政治监控，允许他们舒舒服服地在其巡逻区域内漫游，但恣意地在敌军行动时出于自卫或其他原因而攻击附近潜艇或陆基平台是不被允许的。美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行为方式本质上似乎是进攻性的，美国对其潜艇的隐蔽能力信心满满，无须保护美国舰船的避风港，也不受地理环境的束缚。如果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模式，未来一旦技术成熟，解放军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将遍布整个太平洋海盆。

苏联/俄罗斯模式

像美国一样，苏联似乎相信要确保其核威慑力，就必须拥有比对手尽可能多的有利条件——城市、技术专利以及军队等。因此，苏联海军用最新的核弹头弹道导弹装备核动力潜艇，组成庞大的水下舰队。技术因素限制了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部署模式，特别是早期导弹射程范围非常有限，迫使苏联指挥官将这些舰艇驶入大西洋海域，以保证有足够射程威胁美国本土城市。而美国海军规划者也确实担心苏联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大西洋的军事存在，因为该片海域内连接北美和北约欧洲的重要海上航线纵横交错，海上交通线的防御和反潜任务重叠在一起，严重加剧了战时美国和盟国海军任务分配的复杂性。^①

苏联海军战略家们似乎也同样面临着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苏联在海洋事务中防御姿态的偏好再次显现。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大量证据表明，越来越强大的苏联海军正在逐步恢复

^① John B. Hattendorf, *The Evolution of the U. 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1977 - 1986*, Newport Paper no. 19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4), 23 - 36.

其防御性的部署模式。苏联武器工程师提高了海军潜射弹道导弹射程，并在这种弹道导弹上还增加了诸如发射多个独立瞄准的弹头等功能。^① 与冒险进入大西洋相比，苏联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更愿意巡逻北冰洋水域，因为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将美国本土控制在其射程范围内，同时还可以享受接近本国海军基地的各种便利。

对这种情况的敏锐洞察促成了美国里根时代的海洋战略。美国海军特遣部队为了夺取战时主动权，盘算着北上挪威海，将刺刀插入冰冷的苏联北方“大本营”，以牵制其战略力量。如果北京追随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莫斯科的海军战略，那么解放军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将会部署在地理条件优越的战略据点，如渤海或与中国海岸线平行的“第一岛链”内的水域。^② 引人关注的反舰弹道导弹作为解放军的新型武器系统，能够威胁岛链外的反潜武装。它使中国舰长们入海巡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政府所强调的防御型战略承诺相一致。

英国/法国模式

英国和法国提供了第三种模式，他们的水下威慑方法值得称道。这对满足于区域影响力和二次打击能力的中国来说，远远比美国模式和苏联/俄罗斯模式更为温和适度。英、法独立开发潜艇威慑力量，是因为担心美国核保护伞在战时太脆弱和不可靠。也就是说，伦敦和巴黎认为华盛顿可能最终不会为了挽救北约 -

① 例如：“R-39M/Grom [Bark] /RSM-52V/SS-N-28,” Global 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russia/r39m.htm>; and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russia/r39m-specs.htm>. 先进的 SLBM 可以达到 5000 英里以外，并携带 10 枚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② Hattendorf, *Evolution of the U. 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23 - 36.

欧洲盟国而将美国本土暴露在核反击之下，因此，英、法保留了一定能力以应对来自苏联的不可估量的破坏，作为美国安全保障的补充以确保自身在美国坐视不理时也能免受侵害。综合考虑这些中等经济体的微薄预算和欧洲大陆的竞争性需求，维持适度规模的海基核力量似乎是英、法势在必行之举。非对称性水下部队的出现使英、法同时兼顾了战略以及预算两个方面。

英国和法国的核潜艇力量是超级大国的缩略版。值得注意的是，撇开数字不谈，他们的核潜艇部署模式与美国海军类似。整个法国的核潜艇部队以大西洋港口布雷斯特（Brest）为基地，而英伦三岛的潜艇部队则巡逻于大西洋和北海。两国政府采取的战略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不必仅停留在封闭的地理区域内或陆军部队能够给予支持的范围内。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方式，将会继续保持传统的小型核武库，但其潜艇的巡逻范围将遍布广阔的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以确保威慑目标在其射程内。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目标包括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以及印度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一些相对不显眼的基地。^①

中国最近的研究文献对法国模式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一些关于法国海军“凯旋”级（Le Triomphant）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文章，准确把握了法国技术的发展和潜艇部队的总体演变，令人印象深刻。^② 中国分析人士指出，法国已逐渐放弃了“以弱制强”的理念，一旦遭受核威慑，战略将转变为“有效反

① Also worth consulting is Avery 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9–216.

② 董其峰：《收官之作——法国可畏号战略核潜艇》，《现代舰船》2008年第5期，第17～20页；齐耀久：《法国胜利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现代舰船》2004年第1期，第27～28页。

击”，这暗含着它具备了执行多元化打击任务的能力。^① 一些学者认为，鉴于法国 85% ~ 90% 的核打击能力都是水下核威慑，导弹核潜艇实质上已成为巴黎新战略的核心。^② 少数中国战略家还发现，法国所强调的“少而精”的核作战平台特别值得关注。^③ 中国的海底核战略极有可能向类似的方向发展，这或许正是中国对法国的经验显示出极大兴趣的原因所在，这点将在下文进一步阐释。

当然，北京也有可能发展独特的水下核战略和核力量体系，形成一种中国模式。即便如此，他人历史经验所提供的标尺也可以用于跟踪解放军的核力量发展。从冷战时期的历史案例来看，评估中国的新兴潜艇威慑力量时，以下几个指标值得考虑。

政权性质。制度可以表现出某些不同的战略和作战偏好。较之威权体制，西方自由主义政府的核能研究制定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和严格的指挥控制程序以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同时，核动力潜艇的舰长在离岸运行、进攻方式上和超出陆基支持范围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美国、英国和法国部署模式允许其潜艇在苏联攻击范围内独立巡航。相比之下，威权体制，特别是那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下的威权政府，他们要求军官绝对忠诚和全力执行命令，他们不愿意看到海军指挥官擅自做主，控制战略资源。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苏联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领导人偏爱将核动力潜艇部署在离本土较近的区域，使之能在

① 夏立平：《法国核政策与核战略的特点与影响》，《和平与发展》2008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② 查长松、惊涛、张龙富：《新世纪的法国海基战略核力量》，《现代军事》2005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③ 孙晔：《法国核武，唯海独尊》，《环球军事》2008 年第 7 期，第 50 页。

眼皮底下接受监督。中国领导人是倾向于这种方式还是会另有想法，仍有待观察。

战略文化。20世纪70年代，关于苏联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核战略思考方式和执行模式，西方战略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之前，他们的假设是不存在这种行为模式。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莫斯科一直致力于在核冲突中占上风，这与“相互确保摧毁”（MAD）的逻辑截然相反。学者和核战略执行者们长期以来假设的核威慑逻辑已应用于所有的国家决策，如果这种假设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为“相互确保摧毁”设计的核战略和核力量体系将会是致命的误导。在对苏联核战略辩论的带动下，战略思想家开始将国家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纳入其政策和战略决策的考虑范围内。^①

了解这种差异并非易事。苏联隐瞒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存在，并部署常规海军和地面部队加以保护，这种做法严重欺骗了西方民众。海军战争学院历史学家约翰·哈顿多夫（John B. Hattendorf）在1981年的一个简报中指出，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托马斯·海沃德（Thomas Hayward）发现“苏联的战略概念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很难相信苏联在用这种方式操控海军”。^② 尽管海沃德不认同这种做法，但事实确是如此。苏联和其他政权已开此潜艇战之先例，

① 关于海军事务，参见 Hattendorf, Americans “tended to view the new Soviet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mirror-imaging and refighting World War II.” Jack Snyder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disputed the notion that people from all societies make strategy in the same manner. Snyder coined the term “strategic culture,” giving rise to a debate that rages on today. Hattendorf, *Evolution of the U. 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23; and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77), 9。

② Hattendorf, *Evolution of the U. 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33.

中国照此为之也不足为奇。

威胁感知。北京如何看待潜在对手的威胁，将是塑造其核潜艇战略的关键。一般来说，这里研究的历史模型是现行的海军潜艇部队能够应付单一威胁。总的来看，苏联和美国是为了互相防止对手获得核优势，使对方因畏惧灾难性反击而不会轻易发动战争；英国和法国则是为了防范苏联核攻击和防备美国“弃卒保帅”而部署了适度的核力量。中国显然面临着一个更复杂的战略现实，因为它不仅需要担心美国在对台应急事件中打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进攻力量，还要担心印度这个新兴的核邻居——它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流血冲突。中俄关系在历史上同样也不稳定，尽管近年来已在协同合作，但俄罗斯各个基地必然也在中国核打击目标的清单中。这些竞争性的因素将如何影响解放军海军核潜艇部队的规模和作战仍有待观察。

技术依赖。从冷战时期的先例来看，技术因素造成的限制有时可能会使核潜艇部署模式有悖于政治和文化所派生出来的战略和作战偏好。苏联海军似乎更喜欢充分利用地理和陆基防御系统形成战略防御的态势，但早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是被迫进入了大西洋以履行其威慑使命。同样，西方潜艇也被迫围绕目标在其射程范围内巡逻，其行动自由因此而受到约束。但不管怎样，一旦技术限制有所缓解，基于政治和文化的战略和作战偏好就会重新回归。苏联舰艇返回到地理大本营，而美、英、法的舰艇也只在公海巡逻。在尝试构建和使用第一个有效的核潜艇舰队的过程中，中国无疑将面临类似的技术挑战。一旦克服了这些难题，中国追求核潜艇作战才会符合其战略传统和喜好。

中国的核态势：超越西方辩论

过去几年，西方战略思想家对中国新兴弹道导弹潜艇舰队以及它所预示的核威慑战略展开的激烈辩论有目共睹。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预测，中国核态势将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发展模式，其假设前提是，过去服务于北京需求的简陋陆基导弹力量将继续维持。另外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良性态势的预测，他们指出，现实情况是：中国新一代陆基机动弹道导弹得到引进推广，常规海军建设快速发展，海军潜艇特别是弹道导弹部队在不断改进和提高。长此以往，未来几年中国的海上部队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将与美国海军更为对称，这将改变中国“最低限度威慑”（minimum deterrence）的一贯立场，或者确切地说是称之为“有限威慑”（limited deterrence）的核姿态。

我们应该将中国核战略、核政策主张和 underwater 核力量等问题结合起来看。撇开北京如何使用舰队潜艇对台湾或其他突发事件进行支持等问题不谈，中国的水下核威慑力量是纯粹战略层面的。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一个更庞大、更先进、更强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不一定标志着中国最低限度核战略传统被打破。相反，适度的水下威慑力量将巩固北京所构想的最低限度威慑。^①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广泛评估中国的核学说和兵力态势的演变十分必要。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从五个宣布有核国家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位置。自 1980 年中国展示了其发射洲际弹

^① 包括“最低限度威慑”在内的，各种描述中国核态势的术语，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中国政策层对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与西方也不一致。为了保持专有名词的清晰，我们使用“最低限度威慑”，意指宽松适度，但又能确保对手相信其拥有进行让人无力承受的核打击的能力。

道导弹的能力后，其核姿态就一直非常谦逊，并且决不轻易改变。中国采取了西方分析家眼中的最低限度威慑原则，坚持自卫防御姿态，严格控制军火规模，承诺发生战争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攻击或威胁无核国家。中国官方文件一再重申这些最低限度的原则。^①《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明确公开了中国核战略的基本政策：“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发展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②

2008年国防白皮书进一步做出补充，并提供了更多有关中国如何将使用核力量的细节。它宣称：

第二炮兵遵守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第二炮兵所属导弹核武器，平时不瞄准任何国家；在国家受到核威胁时，核导弹部队将提升戒备状态，做好核反击准备，慑止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国家遭受核袭击时，使用导弹核武器，独立或联合其他军种核力量，对敌实施坚决反击。^③

①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2005年9月1日，<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book/140320.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中国的国防》，2006年12月29日，见<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中国的国防》，2009年1月20日，见<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其核政策的关键要素。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校王仲春简明扼要地指出，“中国的核战略主要特征是防御性、方向性、被动性和有限性。”^① 这种核力量最小化的政策已经对中国的核姿态产生重大影响，压缩了核力量的规模和备战兵力体系。依据 2002 年兰德公司报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长期以来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有限性。这些限制的特点包括实际数量较少的弹头，技术一般和数量有限的运输工具，对陆基系统绝对依赖，对兵工厂的生存能力、可靠性和渗透性的持续担忧，有限的研究、开发和测试规划。”^② 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在 2007 年出版的分析报告中认为，“相比其他四个同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约束下维持着核武库的有核国家，中国精干而有效的核反击力量，包括约 80 个分散部署的陆基弹道导弹，拟用于报复任务的核弹头明显数量少、品种单一，备战演练也最为缺乏。”^③ 防核扩散专家袁劲东（Jing-dong Yuan）指出：“中国将继续视核武器为国家意志较量中主要的政治和心理手段，不会直接使用。北京将继续满足于小规模核力量，只要保证其核武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即可。”^④

① Wang Zhongchun, “Nuclear Challenges and China’s Choices,” *China Security* (Winter 2007): 60.

② Bates Gill, James Mulvenon, and Mark Stokes, “The Chines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n Organization: Reference Volume v 1.0*, ed.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Washington, D. C.: RAND, 2002), 536.

③ Jeffrey G. Lewis, *The Minimum Means of Reprisa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52.

④ Jing-dong Yuan, “Effective, Reliable, and Credible: 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4, no. 2 (July 2007): 276.

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最小化或不严重背离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战略思想已经停滞不前，或北京不会重新配置其核武库。关于中国未来的核战略理论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绝大多数的争论都聚焦在战略执行上的细微差别，而理论和规划等基本原则的变动基本不曾涉及。中国人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用以形容自己的核态势，包括“有效防御”、“有限自卫反击”、“反击核胁迫”（counter nuclear coercion）和“反击核威慑”。^① 尽管战略词汇多样，但大多数分析家都公开坚信，中国核武器的本质特征是防御和适度。如荣子和洪源所说，“有关核威慑理论的许多概念本身争议度就很高，同时每个国家对实现核威慑所必需的核力量大小也没有达成共识。对于那些已经公开表示持最低限度核姿态的国家，由于国情和对战略形势的感知的差异，对最小规模的定义也都不相同，”^② 同时，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国的核武装力量结构显然已在进行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换句话说，在更广范围内的一连串变化正在发生。孙向丽强调，“规模有限的核能力并不意味着核武器数量将保持不变。在现实中，规模是一个与核武库有效性密

① 关于术语进化的最佳总结，参见刘斌《中国核战略：当变则变》，《南方周末》2009年7月17日。关于“有效防御”参见，魏国安：《中国应奉行什么核战略？》，2009年3月6日《环球时报》。关于“有限自卫反击”（limited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参见蒋轶峰《新战略导弹部队强化中国核防力量》，《报刊荟萃》2008年第7期，第72页；和孙快吉《解读我国自卫防御核战略》，《时事报告》2007年第2期，第58～60页。关于“反击核胁迫”（counter nuclear coercion），见李彬《中国核战略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7页。关于“反击核威慑”（counter nuclear deterrence），见荣子、洪源《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第122页。

② 荣子、洪源：《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第130页。

切相关的定量方式。由于各种精确打击能力迅速增长和反导系统的国际化发展，自我防卫的最低标准和技术基准必须相应提高。”^①

在一个少有的公开声明中，解放军二炮司令员靖志远将军似乎同意这些评估。他设想将“精干有效”和“足够有效”作为核战略力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② 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这是明白无误的。

北京努力定义核战略、学说和能力，就其自身而言，也是在提醒西方决策者和研究者别把他们自己的假设加诸中国。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摒弃了西方“最低的”和“有限的”威慑两个观念之间的虚假区分，认为它们的区分过于简单、狭隘，带有种族优越感，不适用于中国。^③ 他们辩论说，中国的战略环境、传统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将塑造未来中国的核战略。这种分析是我们评估的前提。与其漫无目的地猜测尚未存在的核态势，或是试图从中国五花八门的术语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宁愿认为中国将其最小化核战略的姿态（虽然不断发展壮大）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假设是合理的。^④ 这个基本假定至少给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提供了一些基准来衡量中国偏离最低核威慑的程度变化。

① 孙向丽：《中国核战略性质与特点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26页。

② 志远、彭小枫：《建设中国特色战略导弹部队》，《求是》2009年第3期，第54页。

③ 关于中国对于西方评估的评论见荣予、洪源《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第120～122页；李彬：《中国核战略辨析》，第16～17页。

④ 该假设不归结于中国的战略核姿态。特定环境下（如国际安全环境极其动荡并面临重组），中国肯定会利用必要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摆脱最小核威慑。

在这一背景约束下，中国的核战略部署开始向水下进军。例如，历次国防白皮书都强调要提高海上核威慑。2004年国防白皮书指出“海上战场的准备得到加强……和核反击能力持续提高”。^① 同样，2006年和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能够执行“核反击”任务。^② 北京显然已经盯上了作用更大的海基核威慑。

全面走向海洋

中国的国防规划者在规划水下未来的威慑力量时面临着一些最基本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采用什么类型的兵力结构？对新生的弹道导弹潜艇舰队哪些因素可能有更大依赖？多少兵力才算足够？制定舰队标准既是一种分析运算，也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部署一种人类已知最具破坏性的单一作战平台。一支大型的核潜艇舰队不仅会增加大量中国纳税人的财务负担，还可能引起潜在对手的竞争性反应。因此，中国需要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在满足战略需求的同时也过度惊动其他大国伙伴。

在北京的全盘布局中，一个重要的介入变量是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东风-31（DF-31）和海基核潜艇平台之间如何适当混编与平衡。二者就像是整个战略的两条腿，各自明显的优势和劣势都必将影响中国的成本和收益。在生存能力方面，陆基、海基两个选项都可以提高中国逃避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东风-31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中国的国防》，2004年12月27日。<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中国的国防》和《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导弹的灵活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更好地利用地理纵深。下一代094型（“晋”级）核潜艇目前已在研发中，它是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092型“夏”级潜艇的升级版^①，新一代导弹核潜艇增加了对敌军定位、跟踪和搜集情报等功能。^②这两个要素共生共存，将极大推动中国核力量的多样性。换句话说，如果洲际导弹力量在第一次打击中遭受重大损失，094型核潜艇同样可以保证北京从容不迫。因此，即使是陆基和海基核武器极少量的增加，也可以使中国在优化核武器的生存能力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③

水下战略核力量的一些特性放大了弹道导弹核潜艇与陆基对手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与公路或铁路机动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区别在于其隐秘性、无限流动性和持久力，这使得它几乎可以从任何地方发射。^④高级核工程师杨连新在一份研究中国核潜艇的报告中指出，“弹道导弹核潜艇是迄今为止最理想的‘核武器军械库’”。^⑤他明确了核潜艇成为终极武器的三个关键要

① Hans M. Kristensen, Robert S. Norris, and Matthew G. McKinzie,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U. S. Nuclear War Planning* (Washington, D. C. : FAS/NRDC, November 2006), 89.

② 洲际弹道导弹充分利用中国战略纵深的的能力取决于，中国的公路网络是否足够广阔和坚硬，从而能够支撑 DF-31 的尺寸和重量。

③ Paul Godwin 将其称为质与量混合而成的“确保最小威慑”。他的评估与 Gill, Mulvenon, and Stokes (上文已提到) 的结论吻合，后者认为，第二代战略武器（在几十年的“难以置信的”威慑后）将最终使中国能够具有可信的报复性打击能力 Paul H. B. Godwin, “Potential Chinese Responses to U. 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 S. - PRC Strategic Relations*, ed. Alan D. Romberg and Michael McDevitt (Washington, D. 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66 - 67.

④ 唯一能有效应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方法是启用传统反潜战装备，特别是攻击型核潜艇。

⑤ 杨连新：《走进核潜艇》，海洋出版社，2007，第120页。

素：生存能力（所占比重高达90%）、攻击力和破坏力。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北京减少使用不稳定的陆基武器，以防分散兵力和降低指挥控制力，加剧危机的不可控性。而袁劲东（Jing-dong Yuan）得出的结论是“海基核威慑不容易遭受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可借以强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降低危机突然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①

2009年4月，《舰船知识》进行了一次罕有的热烈辩论，焦点是海上核潜艇威慑力的优缺点。该杂志捕捉到读者对2008年国防白皮书中提及的海军的“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反应强烈，以此为契机，为各方提供一个建设性对话的机会。作为对杨连新的回应，红海认为核潜艇提供了：①位置隐蔽，生存性强；②机动范围广；③弥补弹道导弹射程有限的不足；④突袭火力强，可实施多方向攻击；⑤发射灵活，反导渗透能力卓越；⑥能远离祖国独立作战，从而降低了交火过程中对平民的附带损伤。^②

蓝海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核潜艇有一系列不足，尤其是与陆基平台相比时。缺点包括：①导弹的精确度欠佳；②海上备战的维护和保养费用高昂；③持续指挥和控制困难；④潜艇损坏、损毁或被破坏的影响大，后果严重；⑤新平台研究和开发的周期长，船舶建造和维护耗资巨大。^③ 判断哪一方更具有说服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但高质量的辩论让我们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海洋思维模式，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评估的那样。不

① Jing-dong Yuan, “Do China’s New Submarines Signal a New Strategy?” WMD Insights, July/August 2007, 4.

② 红海：《中国应该发展海基核力量》，《舰船知识》2009年第4期，第24～26页。

③ 蓝海：《中国发展海基核力量的疑问》，《舰船知识》2009年第4期，第27～29页。

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将打开一扇窗，北京决策层最终会听到这些声音。

如辩论中所暗示的，从水下的战略核力量所获得的抽象的战略和作战收益，可能无法完全说服中国领导人果断放弃洲际导弹而向弹道导弹核潜艇倾斜。任何政治领导层考虑的最关键因素应该是如何指挥和控制其核武库。北京是否会愿意委派一个战术指挥官调度和控制潜艇与核武器目前还不清楚。^①但核潜艇舰队生存能力的提高和中国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东风-31代表了固定发射井洲际弹道导弹的巨大进步，这是未来二十年中国威慑态势的重要支柱。事实上，一些中国学者似乎相信新的陆基导弹足以维持中美战略稳定。

在李彬看来，美国追求的导弹防御系统和天基雷达传感器等战略武器无法削弱中国在遭受先发制人的第一轮攻击之后陆基导弹的反击能力。太平洋部署的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尽管离中国军队的发射平台更接近，但也未必会使解放军的洲际导弹失效。^②换句话说，中国地域辽阔，东风-31机动性强大，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有能力逃脱敌人的武装进攻，随后再穿透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将抵消或部分抵消美国技术革新和在亚洲重新配置兵力所带来的冲击。如果李彬对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信心站得住脚，那么中国的领导层必须考虑是否值得投入财政和政治成本将水下核威慑作为陆基核威慑的保险和补充。而且，从实

① 关于调度与控制的挑战的评估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and Lyle J. Goldstein,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Insights from Chinese Writing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0, no. 1 (Winter 2007): 69-70.

② 李彬、聂宏毅：《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15~17页。

际考虑，技术可行性和剧增的财务支出等可能都是中国所不愿承担的包袱。建造核潜艇需要的巨大技术、科学和工程建设挑战早已有案可查。^① 第一代“夏”级核潜艇多灾多难的研发历史也向中国证明，掌握一门新技术困难重重，必须克服极高的进入门槛。^② 在成本方面，一艘现代化美国核潜艇的标价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北京所面临的财政挑战。根据 1981 ~ 1991 年的数据，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成本估计达 12 亿美元。^③ 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与攻击潜艇的花销让中国意识到了核潜艇的高昂成本。^④ 因此，陆基武器似乎具有明显的财政优势。

理论上，数量适度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可以减少中国在应对美国竞争时的锱铢必较（bean counting）。换句话说，北京将可能会赞成一个适度的力量配置以保持对华盛顿的稳定威慑。总而言之，准确地判定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可以加强核威慑，同时防止美国的对抗性反应，使整个事态保持微妙平衡。张宝辉（音）指出，如果中国拥有四艘 094 型核潜艇，每次携带 16 枚巨浪 - 2 型（JL - 2）弹道导弹，每枚导弹

① 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② 关于“夏”级核潜艇的发展简史，参见红旅《人民海军的海基核威慑——中国核潜艇研制纪实》，《舰载武器》2004 年第 1 期，第 31 ~ 34 页。

③ 这一研究承认两个非常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成本差异，包括购买力平价在内。但是，数据是有暗示性的。Ted Nicholas and Rita Rossi, *U. S. Weapons Systems Costs, 1994* (Fountain Valley, Calif.: Data Search Associates, April 1994), 6 - 10. 这一数据不包括研究、开发、训练和教育的成本，以及在建设每个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之前和过程中的卫星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s）的价格。

④ 根据解放军海军一位匿名军官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购买核潜艇的费用对于中国来说太过高昂。他观察指出：“一艘核潜艇的价格可以购买多艘（甚至可能多达十艘）常规潜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军费预算仍然很低，海军核潜艇舰队只够维持在基本规模。”见《钢铁鲨鱼》，《三联生活周刊》20，（2003 年 5 月 19 日），第 29 ~ 30 页。

带三个核弹头，那么北京的水下威慑力量将拥有 192 枚核弹头。^① 如果中国部署有六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每个巨浪 -2 型洲际导弹都有六个核弹头，那么，核弹头的数量就猛增到 572 枚。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不断推出的东风 -31 (DF -31) 和东风 -31A (DF -31A)，这些系列导弹同样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即使美国的战略力量仍旧保持着对中国核武库的数量和能力的绝对优势，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增加也会引发华盛顿的担忧。^② 虽然不会像冷战中那样引发军备竞赛以求得核力量平衡，但美国国防规划者不可能对中国核库存数量级的增长无动于衷。^③

因此，中国第二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出海的最终数量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官方和非官方估计，核潜艇数量在 4 ~ 6 艘之间。

-
- ① Zhang Baohui,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Its Impact on Sino - U. S.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34, no. 2 (Summer 2007): 92. 094 型核潜艇的公开照片表明，在潜艇上只有 12 个发射器。不过，计算还包括在建的多弹头。
- ② 例如，华盛顿不愿意削减核武库，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中国可能进行“相等竞赛”的担心。
- ③ 尽管美国的核能力比中国先进，但是华盛顿对中国的核现代化规划保持着高度警觉，并且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准则使中国的威慑处于危险境地，参见来自 200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的摘录。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事实上，美国不断演化的核态势表明，国防规划者们在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威慑关系中，寻求获得“绝对的安全”。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的技术进步和可预期的美国核能力构成表明，美国将会具有不断增加的、执行“战争胜利”（“war winning”）战略的能力，这一战略的前提是具有破坏性的、有效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以解除主要大国的武装。报告指出，“计划中的实力能够提供超出传统威慑的需求，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反制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合计数量和操作程序。” T Glenn C. Buchan, David Matonick, Calvin Shipbaugh, and Richard Mesic, *Future Roles of U. S. Nuclear Forces: Implications for U. S. Strateg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3), 92. 在美国核战略的大背景（以及假设这些分析是正确的）前提下，很难想象美国国防规划者会无所事事地站在一边，任由中国扩充核武库。

五角大楼的假设是将被部署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最多五艘”。^①美国海军的海军情报局预计“水下舰队大约由5艘094型核潜艇组成，以提供足够的人员和力量保障连续性的海上军事存在”。^②《简氏世界舰船》预计至多6艘，《简氏战略武器年鉴》的预测是4~6艘。^③

历史模型中提取的一些参数和假设对估计中国未来可能的核潜艇舰队规模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第一，最低核威慑是基本原则，只要在经受第一轮解除武装的进攻后尚存报复性核武器，这个核威慑的态势就是可靠的。从英国和法国经验来看，中国自给自足的门槛相当低。从理论上讲，即使中国的陆基核威慑力量均在首轮打击中被摧毁，只要还尚存一艘携带多个载入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可以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对敌方依旧是“晴天霹雳”。一艘094型核潜艇可以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有多大，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心中有数。

第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对中国的陆地和海上核力量同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国家。这会降低（虽然不能排除）中国针对其他有核国家，如印度，甚至俄罗斯等，进行威慑巡逻的需求。换句话说，核潜艇舰队只需横跨太平洋应对一个威胁轴线。

第三，本书假定在未来十年，美国解除对手核潜艇武装的能

-
-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48,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 ②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Seapower Questions o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orce," unclassified document obtained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y Hans M. Kristensen.
- ③ Stephen Saunders, *Jane's Fighting Ships* (Surrey, UK: IHS Jane's, 2009), 128; and Duncan Lennox, *Jane's Strategic Weapons Systems* (Surrey, UK: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2009), 38.

力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美国探测设备和反潜武器暂时无法使海洋这一天然屏障形同虚设。综合考虑声纳技术和深度窥视他国作战系统技术进步的增量，这个假设基本安全可靠。此外，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有力的水下核威胁反击力量——核攻击潜艇舰队和反潜航空中队在数量和能力方面都出现了萎缩。许多人认为要扭转这一局面将花费数十年时间。当前的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也无法匹敌水下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事实上，反潜射弹道导弹（counter-SLBM）力量的部署可能花费数十年甚至更久。中国海军对自身水下核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感到欣慰。

第四，北京对其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的表达模糊，这是中国核战略的长期特征，进一步降低了其保障绝对数量的需要。

这些因素表明，中国拥有4~6艘核动力潜艇足矣。这与中国和西方分析人士之前的估计基本一致。参照美国的海军规划者所熟悉的经验法则，在任何时间内都需要维持三艘舰艇，其中一艘在海上运转，至于余下的两艘，一艘在造船厂维修保养，完全不用服役；另一艘则接受有关的培训和检查，战争准备有所降低。假设中国也采取类似的操作，最低威慑的核战略也要求其不会拥有太多数量。假设有一半的海上战略核潜艇已落入敌人反潜陷阱，宽泛地估计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隐蔽性和安静操作能力，中国仍需要有两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在海上运转，以确保首轮攻击后至少还有一艘幸存。基于以上部署规律，那么，中国将最多需要六艘核动力潜艇以满足其最低核威慑的基本要求。

此外，根据094型核潜艇最终的质量、可靠性和技术特征，北京甚至可能不需要六艘核潜艇。如果解放军海军采用类似美国海军的蓝色和金色的两套船员系统的人员安排，每次威慑巡航后其中一组船员可以短期休养调整，港口和海上的潜艇维持2对1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四艘潜艇就可以满足中国的需求。

潜在的部署模式

除了研究战略核力量的部署规模大小，中国还必须认真考虑一套可能的部署模式。近来，美国分析人士推测中国逻辑实为“堡垒战略”（bastion strategy）。^① 中国人对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很感兴趣。^② 中国可以效仿苏联模式，将亚洲的海洋地理环境转变为自身优势。^③ “堡垒战略”打算为造价高昂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① Eleanor Keymer, *Jane's World Navies* (Surrey, UK: IHG Jane's, 2009), 84; and Lyle Goldstein and William Murray, "China Emerges as a Maritime Power,"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October 2004): 35. For 其他关于中国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堡垒战略”的逻辑的讨论，可以参见“Chinese Navy's Submarine Development Strategy,” *Kanwa Defense Review*, July 1, 2005, 44–46, FBIS–CHI–CPP20050801000242. 一位日本分析家推测，朝鲜处于中国渤海的侧翼，出于担心朝鲜政权崩溃会危害中国在渤海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部署，中国才支持朝鲜政权。见 Junichi Abe, “Why China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kai Shuho*, February 8, 2005, 54–55, FBIS–JPP20050203000035。

② 董其峰：《美国与苏/俄核潜艇发展战略对比分析》，《现代海军》2007年第11期，第34页。作者认为，苏联的“堡垒战略”本质上是放弃被废弃的、美国和北约在挪威海和沿格陵兰–冰岛–英国一线发展的反潜艇防御。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Soviet Union's bastion strategy essentially rendered obsolete the antisubmarine defenses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NATO allies in the Norwegian Sea and along the Greenland-Iceland–UK gap。

③ 一位中国分析家认为，地理是决定国家如何设计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并进行部署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发展战略核潜艇最有利的条件是：海岸线开阔，直接面对大洋，而且沿海全部为深海。潜艇在港口里就能一头扎下去则更好。（作者暗指中国）如果一个国家尽管海岸线长，但沿海均为大陆架，潜艇住外航行200公里也深潜不下去，将非常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展小型战略核潜艇，以便能在航道和靠泊港口上尽量多点选择余地。见吴谱《战略核潜艇设计方案简析》，《兵器知识》2004年第4期，第53页。

建立一些战略堡垒。例如，北京将战略导弹核潜艇集中在渤海和黄海防护范围内，^① 而核攻击潜艇、岸基战斗机、反舰弹道导弹和水面舰艇则作为“御林军”（palace guards），对敌方势力冒险搜寻弹道导弹核潜艇做出快速反应。海基和岸基设施可以大致识别在渤海或黄海附近游弋的敌对势力并将其困在内港，然后再充分利用沿海水域较浅的特点和特殊的声学环境展开行动。事实上，浅水反潜既不是美国的强项，也不符合美国核潜艇部队的战术偏好，冷战期间美国高速运转的潜艇杀手都是为公海作业而设计的。

尽管这些似乎都很吸引人，但“堡垒战略”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维持解放军海军在环渤海地区的水下威慑力会限制其巡逻方式，增加被敌人反潜力量侦测发现的可能性；降低核潜艇固有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导弹必须穿越较长距离致使某些特定目标将难以触及。^② 要克服这些障碍，中国必须建设一支精锐海军部队，保护在堡垒内潜伏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而当敌对势力试图将

① 值得注意的是“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位于姜各庄核潜艇基地，黄海海域青岛以东 15 英里。有关“夏”在姜各庄的卫星图像，见 Thomas B. Cochran, Matthew G. McKinzie, Robert S. Norris, Laura S. Harrison, and Hans M. Kristensen, “China’s Nuclear Forces: The World’s First Look at China’s Underground Facilities for Nuclear Warheads,” *Imaging Notes* (Winter 2006), http://www.imagingnotes.com/go/page4a.php?menu_id=23. 推测认为，这种设施可以停靠 094 型，这适合堡垒战略的要求。

② Apparently referring to the lower forty-eight states,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point out that, “Even with a possible range of 5, 095 miles (8, 200 km), the JL-2 would not be able to target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from the Bo Hai Bay.” However, a 5000-mile range would allow China to target the entire states of Alaska and Hawaii as well as the critical node at Guam. Such a limited reach would still largely conform to China’s minimalist doctrine. Kristensen, Norris, and McKinzie, *Chinese Nuclear Forces*, 85.

其困在有限水域瓮中捉鳖时，有能力助其突围。这种强力的核威慑战略的主要风险还在于，它保护核潜艇部队的过度投入将耗费大量精力和战略资源，造成诸如执行台湾突发事态、海上航道防卫、海外能源供应通道安保等同样高优先级的任务的兵力空虚。^①

作为苏联启发下堡垒战略的替代选项，战略核潜艇可以在空中力量的防护伞下，沿着中国海岸线大范围自由巡逻，空中部队可以从大陆基地或正在作业的船舶起飞。最近的研究（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推断，中国已经在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沿着海上周边创建“争议区”，用本土作战优势抵消美国在数量、硬件和实战技能上的优势。^② 结合海上封锁，北京的本土优势将扩展到第一岛链内所有海域，包括从日本列岛穿过菲律宾群岛再到大部分南中国海这片广大海域。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允许其核潜艇沿亚洲大陆巡逻，特别是渤海、黄海、东海、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鉴于中国在亚洲面临多对核威慑（其中还包括印度），有分析认为，南

① 自1995~1996年导弹危机以来，中国国防规划专家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台湾应急事件上。在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面临更紧迫的安全挑战，北京似乎不大可能将保护弹道导弹核潜艇置于应对预期的台海冲突之前。但与此同时，位于渤海、黄海海盆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将是台海冲突中的一支补充力量。进一步讲，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将是台海战事中直接的核威慑力量。核武器如何在大国干涉下发挥作用的具体分析可参见长缨《浅谈核威慑的两个作用》，《兵器知识》，no. 4（April 2004），第51~52页。美国一些分析人士猜测确保二次打击的能力源自一个更强大的核武器库，这样中国才能更大胆地接近核舰船。有趣的是，有文章描述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战争中的“杀手锏”，可以在台海冲突中用于威慑美日的干涉，见高新涛《中国海军潜艇战略》，《广角镜》（2005年1月16日~2月15日），第69页。

②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49, no. 4 (Fall 2005): 677–694.

中国海战略核潜艇的存在将有助于支撑南侧核威慑。^① 它可以使解放军海军施展联合反潜防御，通过吕宋海峡威胁或发起突破进入太平洋。显然，这种“扩大的堡垒战略”为解放军开辟了新的战略选择。因为渤海和黄海的作战困境仍然存在，甚至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刘江平认为：

第一岛链内近岸沿海水域不仅狭小，而且非常浅。对于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战略核威慑，这些海域的条件完全不适合作为巡逻基地或攻击位置。在浅水中，核潜艇无法有效掩藏自身，无法逃脱敌人的反潜侦测。在狭小海域，核潜艇无法在有限的场地内自由巡航，也不能依靠高速机动性摆脱敌人反潜能力的跟踪。^②

刘江平的结论是，海基核威慑力量只有在开放海域才能充分发挥其报复性作用。在这个宏大的计划中，中国可能将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进行突袭，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苏美的水下竞争。有分析推测，中国可能让在南海基地的战略核潜艇深入太平洋而不被发现。^③ 海南岛的三亚大型海军基地非常适合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母港。

① Christopher McConaughy, “China’s Undersea Nuclear Deterrent: Will the U. S. Navy Be Ready?” in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ed. Lyle J. Goldstein and Andrew Erickson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5), 44.

② 刘江平：《海上挑战催生海军转型》，《海洋世界》2007年第8期，第72页。

③ Richard Fisher Jr., “Developing US – Chinese Nuclear Naval Competition in Asia,”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 Web site, http://www.strategycenter.net/research/pubID.60/pub_detail.asp.

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往东游弋进入太平洋后，更多的美国目标将进入巨浪-2（JL-2）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假设中国研发出能力超群且噪音极低的核潜艇，解放军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巡逻就会对美国海军反潜作战构成最大挑战。公海巡逻将迫使美国投入更多的攻击核潜艇跟踪中国的核潜艇，而原本随时待命以应对台湾告急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兵力被转移和分散了。正在服役的攻击潜艇仅有53艘（2008年数据），攻击核潜艇已成为太平洋舰队中非常稀缺的资源。^① 拉伸美国的防御范围是解放军明智的战略选择。

然而，解放军海军这种大跨度部署可能会招致战略和作战风险。从政治角度而言，在第一岛链内或太平洋上的频繁巡逻肯定会刺激美国采取强烈反制措施。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太平洋威慑巡逻早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可能会将中国进入亚洲海域视作一种重大转变。自“夏”级核潜艇进行威慑性巡逻以来，一个温和但不断向前的部署模式预示着中国核战略的重大变化，这些都明显加剧了美国对威胁的感知。

从作战角度来看，在大陆沿岸或太平洋的潜艇巡逻会将解放军海军的舰艇暴露在美国及其联合反潜措施之下。^②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跟踪苏联潜艇，建立了大量高效的海底探测网络，

① Ronald O'Rourke, *Navy Attack Submarine Procurement: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 2009), 3.

②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所面临的反潜挑战，中国还关注在关岛永久停泊的“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关于关岛对美国在亚洲安全态势的重要性，可参见李文盛《聚焦关岛》，《兵器知识》2004年第9期，第15~19页。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海军必须获得自己的反潜平台，以应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转变，参见台风《中国需要反潜艇巡逻机吗？》，《舰载武器》2005年第3期，第70~75页。

最著名的是声纳监听系统（SOSUS）。在太平洋战区，在声纳监听系统的帮助下，美国潜艇可以监测到苏联堪察加半岛海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每一次活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日本海军提出将反潜战上升到一种新境界，紧密合作以抑制苏联军队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行动。这由此形成的作战系统和成熟的战术，都将成为对抗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反潜战的宝贵资产。

2004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追踪到中国“汉”级核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这反映了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水平的反潜准备。在针对该事件的评论中，一名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行政人员声称，中国的潜艇将无法通过琉球岛链进入太平洋深海，或通过巴士（吕宋）海峡到达台湾的南部或北部。美国和日本的反潜力量可以侦测到任何反常行动。^① 如果日方所言不虚，那么选用三亚基地就可能十分令人担忧。部署在三亚基地的 094 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必须通过夹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才能够进入巡逻海域，使巨浪 - 2 型导弹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在危机时刻，解放军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是否可以不被发现或不受干扰到达广阔的太平洋海域，将是中国海军规划的关键性难题。

鉴于这种巨大的风险，中国可能避免沿海和深海巡逻，特别是在部署的初始阶段，训练、战术技能和指导理论仍然不成熟时。^② 此外，北京也可能只是没有足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去考虑风险更大、更加激进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中国可能会满足于保

① Oga Ryohei, "What the PRC Submarine Force Is Aiming For," *Sekai no Kansen*, July 1, 2005, 96 - 101.

② 一位中国分析家认为，在中国包括航母在内，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力量结构之前，弹道导弹核战略潜艇不会在大洋巡逻。而之后，战略核潜艇将能够在航母的保护下在深海游弋，见《核潜与中国海军》，《舰船知识》2005 年第 3 期，第 13 页。

障任何时候都有两艘核潜艇巡逻。如果这样，那么诸如巡逻南海以威慑印度这一类次要任务，将被看作威慑美国这一主要任务的衍生。这些因素表明，解放军海军的潜艇部署模式是相当克制的。在核潜艇部署的早期阶段，北京可能偏重军力防护而不是作战成效，从而满足于某种“堡垒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潜艇被证明有能力到达远离中国海岸的水域巡逻，那么中国可能愿意放松保护，允许其走向更远的前方。

中国人深知他们面临的战略和作战困境。科研人员对冷战期间法国核潜艇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判断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根据中国的一种说法，射程有限的法国第一代潜射弹道导弹迫使法国将核潜艇部署在北海和挪威海以便攻击莫斯科，但自身却暴露在苏联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其他反潜设施之下。^①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法国海军积极努力扩大导弹的覆盖面，从而保障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巡逻安全。然而，即使是法国扩大其导弹射程，还必须发展拥有先进穿透能力的弹头用以击败莫斯科的反导系统。法国与苏联的互动和当前的中美战略平衡的相似之处，显然已经引起了中国战略家的关注。北京在借鉴法国水下核威慑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射程不断提高的巨浪-2型导弹，种类开始增多，对策措施也不断成熟，这些都可以用来更好地对抗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堡垒、海岸巡逻、公海巡逻这些部署策略互不排斥。随着安全条件的变化，中国可能会单独采用或交替使用其中一种或多种策略。平时没有直接的威胁，北京可能会满足于依靠“堡垒战略”。而在危机或冲突发生时，中国

① 李杰、刘涛：《战略核潜艇发展的争论焦点及思考》，《现代舰船》2008年第11期，第19页。

会采取更活跃的沿海巡逻，甚至派遣弹道导弹核潜艇进入开放水域，以表决心或对敌人发出核威慑的信号。总之，即使是很小的水下核威慑力量，也可以给北京提供多种选择以应对一系列的突发事件。

扩大水下核威慑力量的潜在因素

虽然目前中国的核战略可能是克制的，但未来的中国在重压之下继续维持最低核威慑力的意愿如何，值得我们探讨。美国政策界的中国专家们认为，至少这十年来中国的核战略正在从最小威慑转向有限威慑。^① 西方分析人士早就预言，中国将变得更加灵活以便解放军能够执行更广泛的核“作战”任务。这种转变需要核武器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增加。所以，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开始质疑和复议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基本优点。

尽管官方政策坚决强调会维持现状，但有三个关键因素可以挑战最小主义逻辑。第一，最低核威慑概念的核心目的未达到，中国不被承认拥有切实可行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这部分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屈从于中国进行报复打击的核威慑。一些美国战略家不同意在中国的反击面前故意示弱，主张美国应设计专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用以抵消中国的核威慑。^② 作为这种态度的反映，

① 对于这一问题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s New 'Old Thinking': The Concept of Limite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 3 (Winter 1995/96): 18-38.

② Robert A. Manning, Ronald Montaperto, and Brad Roberts,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0), 47.

导弹防御的倡导者认为，如果北京继续对华盛顿表示敌意，尤其在对台问题上，美国除了建立针对中国的防御，“可能根本别无选择”。^① 如果华盛顿公然否认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北京会做出回应，强化其核武器现代化建设，这当中自然包括水下战略力量。

第二，令人惊喜的战略技术突破，可能会让中国绷紧它原本相当放松的核神经。例如，在未来几十年，美国装备了可靠的高性能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动摇北京对原有的核报复能力的信心。尽管这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可以想象，空基激光武器和其他一些先进技术的出现，确实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认知和观感。^② 现有的缓慢而有限的技术进步幅度使人们对出现这种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突破的前景心存疑虑，但如果战略核潜艇能够提供一张战略王牌的话，美国工程师确实也有可能取得科技飞跃。^③

第三，美军吹嘘的侦察/精确综合打击能力可能会改变中国只是出于报复的核威慑的单一立场。朱成虎少将的言论曾轰动一时，2005年7月他对外国记者宣布说：“如果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或制导武器袭击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核目标，我认为我们必将以核武反击。”^④ 他还认为，中国解决台湾等问题时，如果常规武

① Stephen J. Hadley, “A Call to Deploy,” *Washington Quarterly* 23, no. 3 (Summer 2000): 26.

② 关于未来潜在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参见 Stephen F. Cimbala, “Nuclear Weap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Defense and Security Analysis* 21, no. 3 (September 2005): 279.

③ 令人沮丧的是太空弹道导弹降低了遭受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的可能性，使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应速度变得至关重要。

④ Jeffrey Lewis, “China and ‘No First Use,’” July 17, 2005, <http://www.armscontrolwonk.com/677/china-and-no-first-use>.

器面临必然失败的前景的话，那么北京除了对美国城市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外，将别无选择。

在客观评估中国可能的改变后，沈丁立认为如果台海冲突爆发，对中国的核力量精确常规打击可能会迫使北京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他声称，“如果中国的常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台湾又趁机宣布法理独立，这时的中国是不可能任由其核武器被敌方常规武器摧毁的，中国会将核武器用作真正的威慑手段。”^①

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常规攻击的效果与解除核武装的首轮打击并无区别，那么中国再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愚不可及。^② 荣予和彭光谦构建了一种假设的分析情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这一类似的观点：

如果交战一方的核武器被敌对方的常规武器攻击，造成核辐射、核污染、甚至核爆炸时，这是否可以被视为首先使用核武器呢？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个传统攻击，但实际上，它的影响与遭受核打击并无不同，且同样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攻击也可能被视为打破了核门槛，被攻击的一方将很难避免使用核反击。反过来，也将大大增加任

① 沈丁立：《21世纪的核威慑》，《中国防务1》（2005年，秋季号）：13。

② 有关美国的分析，参见 James Mulvenon, “Missile Defenses and the Taiwan Scenario,” in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 - PRC Strategic Relations*, ed. Alan D. Romberg and Michael McDevitt (Washington, D. 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58 - 60. 作者假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情景：在台海冲突中，台湾对大陆单边采取进攻性、常规精确打击。无法确定这些打击的真实来源，最坏的打算使北京作出误判，认为华盛顿为了解除中国的核能力，采取了先发制人行动。在危机的这一时刻，中国将面对如同朱成虎和沈丁立之前所描述的重大决策。

何一方首先启动核攻击的风险。^①

以上论述的含义对核战略稳定的影响显而易见，分析人士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中国长期反感的核讹诈。在此背景下，一个规模更大的核潜艇舰队似乎是应对这种首轮解除核武装攻击——不论是常规武器打击还是核打击——唯一可行的保险策略。

显然，下一代水下核威慑力量将给北京更多的战略选择以应对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突发状况。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弹道导弹核潜艇不是中国解决前面所提到的战略困境的唯一密钥。北京正在积极开发一系列替代对策以支撑其核威慑力量的可信性。例如，它已制订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挫败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方案。^② 2007年，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清楚地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更多替代选项以确保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削弱北京的核威慑态势的决心。

启 示

本章阐明了中国会如何在不从根本上动摇最小主义（minimalism）（至少在战略层面）核战略的同时，使其核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取得重大进展。也就是说，即使接受基本原则的约

① 荣予、彭光谦：《再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防务5》，No1（2009年冬季号）：85。

② 关于可能的中国弹道导弹防御对策，参见 Andrew S. Erickson，“Chinese BMD Countermeasures：Breaching America’s Great Wall in Space？” in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ed. Lyle J. Goldstein and Andrew Erickson (Newport, R. I. :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5), 77-88. 关于中国对弹道导弹诱惑技术的综述，参见李文盛《漫话战略弹道导弹诱饵技术》，《兵器知识》2005年第2期，第28~31页。

束，其战略和兵力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和理论的进步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旦 094 型核潜艇加入舰队，中国将拥有一个更有效和更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它的出现使中国重新定义了最低核威慑战略的相关参数，使之与周边安全环境保持同步。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评估强调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较保守的部署模式，如“堡垒战略”和“扩大的堡垒战略”，都需要以陆基和海基设施为依托以确保其生存能力。换句话说，中国的战略家青睐的部署计划最有可能是资产密集型（asset-intensive）。相反，“堡垒战略”将会发生在解放军进行反介入战术和作战的水域。第一岛链内外的潜艇巡逻区域将受益于岸基和海基力量所建立起的保护伞。近海争议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作战地理环境，有助于北京维持其最低核威慑，以获取更大的战略目标。控制这片海域还有利于控制台湾以及其他争议领土和海上安全航道。这也进一步证实解放军海军与空军和地面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可以相互促进。加强核潜艇舰队、解放军海军的常规部队、空军和陆军之间的协调能力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还将收获颇丰。

最后，尽管 094 型核潜艇的引进预示着中美总体核战略稳定的良好开端，但它可能不利于战区级海洋互动的稳定。意味深长的中国海岸核威慑性巡逻，肯定会巩固北京对中国海域的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提高介入东亚沿岸的风险。如果这样，该战略最终还是会导致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亚洲海洋格局。

第七章

海上软实力

2008 年底，中国向亚丁湾派遣两艘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共同执行打击海盗的任务，这一消息很快成为头条新闻。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远征作战能力得以展示：包括在远离本国海岸的情况下提供燃料和补给品，在附近没有中国船厂的情况下进行维修，以及派遣舰队与其轮换舰队进行任务交接。根据各方报道，中国舰队顺利地与其他舰队协调行动，包括美国主导的特混舰队 151、欧盟海军亚特兰大行动组，以及试图使途经亚丁湾的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个别海军特遣队。解放军海军的实力使西方观察家改变了一贯对中国海军远征作战能力的嘲讽式估计。此外，此次部署打破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将威胁地区安全”这一被普遍认可（尤其是印度）的观念，成为印度洋的海洋谅解前景的里程碑。

解放军进入了亚丁湾这些不熟悉的海域巡航，其打击海盗的巡逻表面上看来无恶意，甚至是有益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一直试图改善其在亚洲海域的外交和战略环境，塑

造一个本质上值得信赖的大国形象。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以便让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① 这些学院还致力于推广中国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这些学院正是由此命名）的哲学思想，并将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描述为儒家遗产的继承人。孔子倡导以纯粹防御性，甚至和平主义的方式进行政治互动。同样，北京宣传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这位明代宦官在六个世纪前带领船队穿过整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到达目的地，续写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和商业体系，这是亚洲政治持续数千年的特征。明代的远征几乎完全是非暴力的，这是北京从未忘记向亚洲对话者强调的一点。

这种叙述能引起中国民众以及整个东南亚和南亚主要受众的好感，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有吸引力的中国愿景，避免小国团结起来抗衡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向外界宣扬，中国在东亚以外地区部署海军力量的举措并不具有复杂的含义。北京认为没有必要，也从未鼓吹过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保持强大兵力。尽管古代中国王朝和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北京还是希望使关键受众相信，中国仍然保持着儒家思想，这是值得信任的，中国不会滥用其积累的海上力量。中国将自身描述为一个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国家，并据此确立了其在海上的行为标准。其他亚洲国家会将中国的行为与孔子的信条以及郑和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使中国坚持这一崇高的标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外交官为外国分析家（就像我们）跟踪中国海洋战略的演变提供了帮助。

^① Confucius Institute Online, <http://www.uri.edu/confucius/>.

塑造可用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航海未来的画面。中国对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等国外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从海上运输）的依赖是真实存在并且不断增长的，在此驱动下，中国已将注意力集中于印度洋（其大多数自然资源的来源地）和南中国海（中国通往南亚的海上门户）。在这一过程中，北京的领导人努力塑造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所称的“可用的历史”，旨在向有着陆权思想的中国民众证明其日益雄心勃勃的海上战略，并舒缓这一战略可能在亚洲各国中引起的忧虑。康马杰解释了在西半球重新开始新生活的美国人如何编造自己的历史故事。他们为迥然不同的民众精心设计了一个英雄的过去——故意刺激民族主义，从而推动一个新国家的形成。他们非常迅速地做到了这一点。康马杰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为自己塑造可用历史的速度和慷慨更加令人难忘的了。”^①

美国的可用历史体现在历史、传说和英雄人物中，当然还有类似画作的文物以及爱国民谣。开国一代在美国的认同感中灌输了某些特征，这被罗纳德·L. 杰普森（Ronald

^① 参见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and Other Essay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67), 3-27. Commager 认为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深化是与学者有关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相一致的。参见，例如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L. Jepperson)、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和彼得·J. 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直接定义为美国的“基本特征”。^① 不管早期的美国人是否有意为之, 其国家认同所产生的预期为外国观察家预测美国将如何处理国家事务提供了帮助。对世俗或宗教暴政的恐惧是美国人性格的核心。美国人厌恶常备军和集权。对他们来说, 国家拥有不同于旧世界的特殊命运是一种信仰。他们普遍同意, 美国应避免可能使其卷入对外战争的纠葛。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制定的“重要原则”以及托马斯·杰弗逊针对“结盟”的警告使得这些观念成为法令。美国人应避免与美国利益“没有什么关系”的海外阴谋; 一旦国家得到了巩固, 领导人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 依照自己的利益, 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作出选择。”^②

这一切都传达了美国对冒险行为的反感。在随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历经变化, 但其避免领土扩张或军事统治的大国形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尽管美国在美西战争后夺取了一些领地 (如获得

①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

②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in *George Washington: Writing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7), 962–977. 关于美国早期的评论, 参见: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Clinton Rossiter (New York: Penguin, 1961), esp. 77–84, 320–325; Thomas Paine, *The Thomas Paine Reader*, ed. Michael Foot and Isaac Kramnick (London: Penguin, 1987), 65–11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George Lawrence, ed. J. P. Mayer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88), esp. 226–230;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5–93。

了在亚洲的第一个基地，即菲律宾），但美国仍保持这一形象。^① 迅速发展的实力以及美国人有时专横跋扈的态度，对外国特别是拉美邻国的情绪造成了刺激。^② 尽管如此，直到冷战结束并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后，美国仍保持着相对没有领土扩张欲望的大国形象。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预测不同的是，尽管偶尔会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疑虑，但尚未出现反对美国霸权的同盟或联盟。美国拥有形成威胁的途径，但它没有形成威胁的任何明显倾向，这有助于解释世界对美国霸权保持沉默的原因。

总之，美国的认同感带有可用的历史、文化标志和传统的印记。这种编造的共同历史不仅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且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与过去的大国相比，他们的国家对强权政治或领土扩张几乎没有热情。^③ 新的国家认同使外国对美国的行为有了一定的期望，有助于缓解对美国崛起为强国以及对一个繁荣、横跨大陆的国家可能带来威胁的担忧。毫不奇怪，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家都想方设法地保持这种鲜明的国民性格。^④ 这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

①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42), 463 – 478. Bemis titled the chapter o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e Great Aberration of 1898.”

② 参见，例如，Richard H.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 The Panama Canal,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Latin American Contex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雷金纳德探究了美国的“战争深化”，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美国的道德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斯图尔特主张，美国的创始思想非常倾向于普鲁士战略思想家卡尔·克劳塞维茨的有限战争的思想。参见 Reginald C. Stuart, *War and American Though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nroe Doctrine*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2 – 194. See also Max Boot,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Small War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④ Jepperson, Wendt, and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60.

当代中国有意为自己塑造一个善意的、克己的国际形象，以博得国际认同。北京希望建立一种航海认同感，以此赢得民众对海洋冒险行动的支持，并创造符合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战略条件。由于已经看到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下降，中国认为必须保持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表现才能实现发展。实际上，北京希望以经济繁荣来替代意识形态热情，从而为共产党的执政赋予新的合法性。于是，国内经济上的迫切需求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海上航线上，正是这些海上航线将现在经济生活的原料从中东和非洲的供应地运输到中国的海港。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可让中国有能力制定一个大战略来维护中国在公海上的利益。

由于在战略思想中加入了航海元素，北京明白，自二战以来一直统治亚洲海洋的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将对中国新制定的扩张性大战略及其背后的海军和陆军力量保持警惕。因此，平息这种担忧，以免引起对抗甚至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对于中国大战略的成功非常重要。北京正试图借助历史来重新调整国家认同和“战略文化”，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和平的海上力量，使其适合当今的迫切需要。强调历史上的中国航海家的功绩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例如郑和，他在下西洋时曾在亚洲海域暂时停留而未试图进行武力征服。

因此，中国领导层塑造的海洋认同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将如何适应亚洲正在形成的国际秩序。北京的动机是什么？正如尤吉·贝拉（Yogi Berra）所说，预测是一种危险的事业，特别是在涉及未来的时候。但至少有三种不同分析角度的情景是合理的，其中每种情景都得到了著名学者的支持：

- 儒家和平主义。中国领导人是在和平主义与厌恶武力侵略的中国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本能地追求非暴力的大战略，将

武力视为最后的手段。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将武力描述为中国领导人在落实外交政策时“轻视”或反感的手段。^① 中国外交寻求宣扬与费正清的评估相符的海洋认同。

• 文化管理。在这种观点中，中国领导人不是文化的俘虏，而是能够灵活操纵中国的战略文化，追求以现实政治为前提的大战略，同时用他们的善意打消其他海洋国家的疑虑。江忆恩（Iain Johnston）和科林·格雷（Colin Gray）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虽然对战略文化的运作方式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认为独立于文化的行动是可能发生的。

• 防卫信仰。在这种观点中，中国的精英们深信自己的国家不能违背和平主义传统，即使在使用武力进攻或先发制人时也是如此。施道安（Andrew Scobell）将此描写为“中国的防卫信仰”（Chinese Cult of Defense）。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中国领导人可以积极动用武力，同时坚持认为（并且显然相信）他们的行动是防御性的。^② 这显示出对认知不一致的异常宽容。

所有三个思想学派都有可取之处，但我们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解释中国战略行为的通用模型。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可能出于混合、多变的动机。即便如此，每种情景对亚洲国家以及对美国的政策含义都是非常不同的，是

① John King Fairbank, "Introduction: Varietie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Frank A. Kierma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7.

②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Barracks, Pen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May 2002), 3-4. For a fuller exposition of these views, see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值得进行分析的。这一分析所引出的一个无法估量的因素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是否会与早期美国文化具有相同的可塑性，后者基本上是让美国开国一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国家认同。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否可能，在不发生扰乱国家文化平衡的创伤性事件的情况下，将中国文化向海洋方向重新定位，从而形成新的海洋平衡？中国历史是否将是可用的，或者说它是否是必然发生的？

认同和文化的影晌

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简单探讨一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事务中的认同指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是否容易受到决策者有意识的操纵？我们将来自认同相关文献的概念与来自战略文化相关文献的概念随意地混在一起，正如彼得·J·卡赞斯坦的著作《国家安全文化》的供稿人那样，这些人中包括中国战略文化方面的一位顶级专家江忆恩。^① 这些作者在某些观点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时甚至非常不同。但即使是不协调的意见也可使对中国认同和文化的分析活跃起来，并帮助亚洲海洋国家跟踪中国大战略的未来，确定可能在某个方向影响这些未来的变量，并制定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战略。战略文化学者的最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将国家包含在内的安全环境

^① 参见，例如：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4 (Spring 1995): 32 - 64;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sp. 1 - 31, 61 - 108。

中有一部分是文化和制度，而不仅仅是物质。”^①安全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和能力。这些学者的见解是评价中国海洋认同的有效途径。^②

第一，民族国家具有独特的认同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观点与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物质的、可量化的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截然不同。^③一个民族国家及大环境的组成不仅来自于外部因素，还来自于传统、态度、思维习惯，这些是一个社会处理事务方式的基础。观念也很重要。这是我们与纯现实主义者持不同观点的一个原因，纯现实主义者根

① Jepperson, Wendt, and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33.

② 对于战略文化文献的彻底回顾，可参见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no. 3 (December 2002): 87 – 113;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Military Innova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Ph. D. diss., Fletcher School, Tufts University, 2004), 13 – 62.

③ 例如，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中，肯尼斯·沃尔茨主张，权力小者趋向于结合在一起去平衡新崛起的、有可能成为主导性权力者。最近，亚洲一些政治学学者宣称，权力平衡政治主要出现在西方，亚洲体系更倾向于等级而非平衡。对于现实主义者的评论，可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no. 2 (Fall 1993): 44 – 79; and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对于其他现实主义者得评论片段，可参见：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no. 3 (Winter 1993/94): 5 – 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no. 3 (Winter 1993/94): 34 – 77; and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3 (Winter 1997/98): 36 – 73. For a rejoinder to the realists, see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2 (Spring 2003): 57 – 85; and David C. Kang,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 – 1900,” *Asian Security* 1, no. 1 (January 2005): 53 – 79.

据成本效益分析这一可能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分析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虽然领导人和有关机构确实有成本效益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用于计算特定变量值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利益或风险与某种行动或政策是相关的。民族传统和思维习惯会影响对上述各项的态度。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一句名言，即，恐惧、荣誉和利益是国家行动的原动力。^①在这些动力中，利益容易进行现实主义的成本效益分析，但恐惧和荣誉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社会有很大的差异。这里借用第三章的一个简单例子，大英帝国在地理位置上与德意志帝国非常接近，德国海军的发展不仅触动了英国的自由航行和国土防御利益，还引发了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海军实力的恐惧，而最终促使英国坚定不移地保持制海权的关键是维护英国的国家荣誉。相类似的，美国在亚洲自由航行方面有着切身利益，全球的贸易和商业的秩序正是依赖于此。但北美离中国很遥远，因此在美国民众的眼中以及在政治课上，中国对美国本土的任何威胁都非常遥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中国海军建设对美国国家荣誉的触动是否会达到与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相同的程度，还有待观察。我们认为，并没有可以决定人类事务如何演变的代数公式。

第二，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复杂的，由混杂的观念和传统组成，即一些智力和情感因素，而这些因素有时可能不易共存，甚至相互矛盾。尽管许多战略文化理论家暗示，每个民族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非常难以改变的静态“核心”战略文化，但

① Thucydide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ed. Robert B. Strassler, intro. Victor Davis Han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43.

认同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观点应灵活一些。康马杰关于可用的历史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指精英可能将历史、传统和标志性符号应用到工作中，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同时将他们自己的观念刻画到该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可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之上。江忆恩指出：“传统被历代精英们不断重新定义和解释，这些精英是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突出或淡化特定的传统。”^① 江忆恩还指出，地理、文化和战略经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可能会产生多种战略文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社会历史中的某个时期，某些特征就会凌驾于其他特征之上或是被弱化，这取决于环境。^② 实际上，这为经验丰富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帮助他们选出与他们所选择的政治目标、政策和大战略相一致的文化特征。

第三，由于统治精英操控着认同和文化，他们对该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期望。部分原因是，尽管文化并不是完全难以驾驭的，但文化的变化比政治条件的变化缓慢，这使得民族国家的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这种观点在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的著作中获得了支持，他指出，精英们可通过能够与民众产生共鸣的语言来唤起民众对特定战略选择的支持。^③ 库普乾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容易对潜在的竞争对手采取轻率的、“自我挫败的行为”，即以过度合作或过度竞争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④ 他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精英们倾向于唤起他们

①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10.

②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10-11.

③ Charles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2.

④ Charles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无法实现的民众诉求——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是声望和影响力，对既有大国而言是保持现有的特权。^① 管理文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库普乾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比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更为狭义，后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造了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一种载体（body），即，指导和限定战略问题思考、影响战略问题的态度和信仰、影响战略问题形成的方式，以及为战略争论设定的词汇与认知参数”^②。而库普乾则认为，战略文化属于“国家认同和国家自我形象的范畴”，包括一系列形象和符号，即，体现一个政体如何理解宗主国安全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构想其在国际体系层级中的地位、认识国家外部野心的性质和范围。这些形象和符号会立即影响公众的态度，并在决策结构和过程中变得制度化和常规化……由于战略文化塑造了外交政策领域中合法政治行为的界限，并影响精英们构想国家利益和设定战略优先事项的方式，它起着塑造大战略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这个定义是认同和文化的抽象概念与精英和政府机构的具体行为两者连接起来的关键。库普乾认为文化的影响在变革时期尤

① 为避免混淆，我们将不把战略理论运用到分析当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战略文化以获取公众对特殊决策的支持这一想法，是与卡尔·克劳塞维茨的“矛盾三位一体”概念相一致的。克劳塞维茨声明，英明的政治家管理政府、武装部队和民众来获取确保战争所需的凝聚力。从一个社会传统演化来的语言和概念为政治与军事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影响公民的机器，普鲁士理论家将其描述成原始激情领域。公共的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能发现和控制公众期望的政治领导人是很难得。参见：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89。

②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77), 9.

③ Kupchan,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5-6.

为明显。当精英们“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立即作出不连贯的政策选择时”，如权力的国际分配及其影响发生转移时，他们“对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分配通常以战略信仰和国内政治力量为指导。”^①

总之，作为大社会的成员，精英受到优势战略文化的影响；他们使用源自该文化的概念塑造公众态度；他们发现自己受战略文化的约束——这是他们自己通过鼓吹所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或认同的独特愿景而帮助建立的约束。作为战略文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科林·格雷认为，文化渗透于思想和行为之中，为各个级别战略决策提供“背景”：

应将战略文化视为塑造行为的背景，同时其本身也是这种行为的组成部分…… [人和制度] 都有内在的战略文化

① 为了分析透彻，许多分析者将战略文化单独限制在军事战略的范畴内。例如艾伦·麦克米伦、肯布兹和拉塞尔坚持认为，如果战略“被运用到安全的军事范畴以外，那么这个词会变成安全的同义词而失去它特殊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文化仅仅变成政治文化的同义词。大多数都会认同，这样是没有什么益处的”。(Macmillan, Booth, and Trood, “Strategic Culture,” in *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d. 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esp. 10 – 11;). 借助于库普乾的分析，将战略文化拓宽运用而非限制在军事事务中，国家除了运用军事工具外，还使用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工具。如果我们运用大战略概念，我们必须在大战略层面上允许文化发挥职能。江忆恩做了同样的设定。科林·格雷尽管和江忆恩在很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但认为文化为战略制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内容”，而不仅仅在军事领域。一脉相承的还有吉原恒淑，他预想了一个综合性的“战略等级化”，这一概念表达了从大战略到实施和策略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参数。参见：Kupchan,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7 – 8;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1999): 49 – 69; and Yoshihara,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v, 89, 105。

并在一定程度上建设、解释和修改该文化。换句话说，战略行为的战略文化背景包括人类战略行为主体以及通过解释他们的认知来“制造文化”的制度……战略文化不仅是“外在的”，也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背景。^①

因此，战略文化具有循环性。从国家认同、传统和思维习惯产生的预期使得统治精英们可以制定国家话语规则，但公众态度和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历史预期也束缚着精英们的战略选择。民族国家的领导人显然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将认同和文化用于大战略。扎根于历史、传统和国民精神中的特征，可能不会像库普乾及其志同道合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可塑。事实上，库普乾本人将崛起中的帝国和既有帝国的自我败坏行为，归因于精英们修改战略文化的速度跟不上国际体系中的变化节奏，并因而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引起的预期。文化既是可塑的，也是难以驾驭的。

第四，如果巧妙地加以管理，认同和战略文化可以成为大战略的有益帮衬。这些特征暗示民族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其内政和外

^①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50. 这里是格雷对江忆恩批评的回应，江忆恩批评格雷一代的理论家假定了一个错误的战略文化理论。如果战略文化同时渗透着思想和行动，那么要保持江忆恩认为的本质，这儿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科学测量了。他因此设法将文化限制在思想的范畴内，以努力衡量对行动的影响力。格雷反驳道：“任何人在江忆恩流派中寻找可证伪的战略文化理论，那么就会犯那些将人的身体和思维割裂开来的医生那样的错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懂得战略行为”（ibid., 53）。对此，肯·布兹表示认同：“如果不太苛求，这个学科的理论将变得更加丰富”（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ed. Carl G. Jacobse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125）。

交，为支持精英们的政治目标和战略建立预期。这也适用于常规外交，就像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说的，早期美国人，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的性质。我们考虑一下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用以吸引其他民族和国家，从而创造一种友善的气氛，以帮助本国领导人为其赞成的外交政策计划争取更多支持的文化属性、思想和政策。^① 流行话语往往会将软实力简化为麦当劳和好莱坞，但美国开放、民主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主要的软实力储备库。^② 作为亚洲传统的“中心”国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在不断提升，拥有相当大的软实力储备。^③ 如果美国或中国能够使其他国家相信他们历史上曾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并仍信守自我克制的传统，则可以减小该体系采取平衡行为来遏制其外交政策的倾向。如此，其外交或军事成功的前景将会更加明朗。

总之，行动与构成其民族国家战略文化的原则、信仰和传统相互配合，使得统治精英的意图和声明更有说服力。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坚持原则，或以过去互动中的某种方式行事，那么他们今天的话语将更有分量。如果他们发出采取各种行动的公开承

①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and Joseph S. Nye, "Asia's Allure Lies in Soft Power,"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6, 2005.

② Joseph S.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no. 2 (April 2002): 238.

③ 陈建区分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中心说”和“统治说”。他观察到，“中国集体记忆中的‘中央王国’的光荣已经远去——记忆中不仅仅是中国作为文化中心，而是文明中国——国家近代的屈辱经历构成了国家在 20 世纪现代化的不懈动力”。参见：Chen Jian, *The China Challen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 C. : U. 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8), 4-8。

诺，从而使自己对沉浸于社会认同和文化之中的选民负责，他们可以利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承诺战术”这个特别强大的、受文化影响的变体。^①公开发表意见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如果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约束自己，然后似乎软化立场或违背其国家的基本特征，他们就有可能抹黑自己在国内民众、国外外交官和士兵眼睛中的形象。明智的政治家会谨慎利用他们可用的历史。

古代航海者帮助中国重塑其认同

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海洋，促使北京修改以陆地为基础的、传统的大战略。为了使民众团结起来支持其航海追求，面向海洋的中国领导层必须采取一些类似美国创始人所进行的文化炼金术。数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将自己的国家视为纯粹的陆地国家。^②毛泽东轻视海洋，敦促中国继续如此给自己定位。^③毛泽东认为，控制紧邻中国海岸的水域就已足够。但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刘华清敦促北京摒弃毛泽东时期海防传统。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述，刘华

①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esp. 21 – 52; and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sp. 35 – 91. See also Jeffrey Z. Rubin and Jeswald W. Salacuse, “The Problem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 (April 1990): 21 – 80.

② 中国明代时是厌恶海洋的，例如，参见：Valerie Hansen, “China in World History 300 – 1500 CE,” *Education about Asia* 10, no. 3 (Winter 2005): 4 – 7。

③ 记录冷战时中国海军的努力，参见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指挥着解放军海军，支持旨在让中国控制东亚水道以及重要地理节点（如与中国海岸线大致平行的岛链）的海上战略，并最终到 2050 年左右，把解放军海军建设成为一支与美国海军不相上下的蓝海海军，在海上部署航空母舰和全套海军武器。^① 2009 年初，为了庆祝海军成立 60 周年，国防部官员或多或少地证实了解放军将建造航母的猜测，尽管并未说明详细的时间表。

但是，作为海上力量的代言人，刘华清上将的呼吁大多没有得到响应。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才使中国领导层的观念发生变化，他们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经济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强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都至关重要。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陷入低谷，中国越来越多地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来巩固其合法性和安抚公众情绪。1993 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② 考虑到国家的资源需求，如果中国领导人尚未修改刘华清的阶段式海洋战略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可以动手了。他们将把战略目光转向南方而不是东方（南向的海上通道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及天然气运抵中国的必经之路，是重要的海上补给线），而在东向，主要是中美（与美国海军在广阔的太平洋

①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165–168; Jun Zhan, “China Goes to the Blue Waters: The Navy, Sea Power Mentalit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September 1994): 180–203; and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The Chinese Navy's Offshore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47, no. 3 (Summer 1994): 9–18.

② 例如，参见：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National Interest* 76 (Summer 2004): 137–147。

上展开竞争的区域)。^① 刘华清毫无疑问会同意这种地理重点的转变,因为这种转变使中国的海洋战略与切身首要利益保持一致,与美国进行实力和影响力的直接竞争可以等到更有必要时再进行。

中国的海洋知识非常有限,中国的战略精英们已经开始转向借助历史,帮助培养本国民众对东南亚和南亚航海冒险的兴趣,争取民众对中国海洋诉求的支持,同时努力消除中国海军建设可能在亚洲海洋国家中引起的任何疑虑。总之,他们已经开始将海洋特质融入中国的认同和战略文化中。中国古代有一些可用的航海历史的基础。已故的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L. Dreyer)指出,事实上,让中国短时期成为亚洲海域霸主的明朝诞生于内陆的水战。^② 中国领导人已经唤起了民众对郑和的各种回忆,将郑和作为目前中国外交事业的合作伙伴。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进行外交、贸易和发现,造访了全部东南亚和南亚沿岸的港口。北京巧妙地利用明朝航海六百周年纪念,将郑和塑造成了中国海洋冒险事业的大使。

-
- ① 台湾当然是中国海军战略的一个复杂因素,但在本书分析时我们将其视作中立性因素。台湾岛不仅处在离岸岛链上的中心点位置,潜在地妨碍中国大陆接近太平洋公海,而且跨在连接北中国港口与马六甲海峡的海线上,很多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通过那里。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重点。参见:的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49, no. 4 (Fall 2005): 677 - 694. For a contrary view, see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Atlantic* 295, no. 5 (June 2005): 49 - 64. 卡普兰预言,正如刘华清所说的,中国海军将向东进军太平洋。
- ② Edward L. Dreyer, "The Poyang Connection, 1363: 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Frank A. Kierma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02 - 240.

郑和下西洋是基于国内的自身利益，即明朝皇帝朱棣（1360～1424年）害怕被他赶下皇位的侄子结束流亡回国复仇，但这些探险更多地具有外交和商业性质。中国官员将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方面作为其区域外交的支柱。^① 这位古代航海家在中国和整个亚洲海域极受欢迎，有助于北京重新唤起民众对海洋的关注，培养他们的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今天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就是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喉舌《解放军报》补充称：

海洋是国际交往的大通道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增强大国战略地位与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600年前郑和扬帆出海的庞大船队，在蓝色波涛中写下了光荣与梦想；今天，实现和平利用海洋的蓝色梦想，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③

此外，通过援引郑和的事迹，北京可以向明朝“宝船队”（因其运载了与外国交易的宝物而命名）曾经往返途径的沿岸国家示好。这样有助于缓解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海军野心的担忧，并提

①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 - 1433*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3.

② “发扬郑和精神，促进和平与发展”，2005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其他类似评论可见《人民日报》7月15日、19日、20日的报道。

③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军队的历史任务——写在《解放军报》创刊50周年之际”，2006年2月17日《解放军报》。

醒亚洲国家，中国曾在该地区建立过基于海洋的良性霸权。

这种海洋姿态并不只是为了炫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来，北京已经逐步转变了外交姿态。它推翻了外界的预测，与东盟建立关系，并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该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它发出了有意义的信号。2004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打算派军舰到马六甲海峡巡逻，这一计划遭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强烈反对，中国与日本合作以寻找一种替代方案，从而可以顾及各方利益。在海洋关系方面的灵活性有助于北京建立信誉。

北京将郑和作为外交工具，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南部海域的“硬”实力相对软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12月海啸之后，当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派遣舰船前往印尼的亚齐和苏门答腊海岸进行救援，帮助灾后重建时，北京不愿派遣海军进行救援，凸显了其动用军力影响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不足。^① 美国海军在救灾中起到的示范作用，对于北京而言，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插曲。

对此，中国分析家们做出了毫无保留的评价。他们生动地描述到，美国将锋芒毕露的军事投送能力转化成为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当中国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切后，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正如区肇威的感叹，“一直欲在该地区施展自身软实力的中国，却因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国扭转了其在伊拉克战争以来在亚洲地区的负面形象。”^② 区肇威

① Bruce A. Elleman, *Waves of Hope: The U. S. Navy's Response to the Tsunami in Northern Indonesia* (Newport, R. 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February 2007), 103 - 105.

② 区肇威：《医疗舰——中国施展软实力的海上平台》，《现代兵器》2009年第3期，第14页。

认为，中国担心美国“压倒性的软实力影响”可能会削减中国在亚洲的接触战略，这促使解放军海军建造大型医疗船作为战略对策。因此，海啸的经历痛苦地展示了硬实力必须为软实力提供有效保障的残酷现实。正如布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所说，从儒家概念“仁”的角度来看，华盛顿使北京相形见绌。中国渴望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并为此动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所有政府权力，但在接受考验时，中国海军未能达到要求。^① 北京挥之不去的军事弱点，海外经验的缺乏，以及为确保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安全和为重新控制台湾而进行的军事部署，妨碍了解放军在利益真实存在且不断增长的地区加强力量。这些战略障碍和迫切的优先事项说明了中国在2004年无所作为的原因。

由于在这些地区没有硬实力，北京转而将郑和作为权宜之计，通过巧妙地重述，宣传一个令人钦佩的中国概念。这样，即使北京在海上处于弱势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官们仍然有一些说话的机会。这样还有助于北京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地区创造外交条件，以期将来在中国领导人认为有足够的利益理由时加强其在地区海域中的海军力量。其创造的软实力可能会产生一个无害的中国印象，有助于中国在亚洲沿海不断扩大政治和军事存在，使之更容易被不欢迎这种存在的地区政府所接受。

因此，历史影响着中国对海洋事务的看法，为北京的海洋抱负灌输一种宿命感。在试图安抚其海洋邻国的同时，中国的领导层总是将大战略与历史努力联系起来。总之，战略文化正帮助中国领导人在切实善意的配合下，利用受崇敬的历史人物事迹来制定公共外交计划，以唤起对今天海洋冒险事业的支持。

^① Elleman, *Waves of Hope*, 104.

扩大中国文化在国内外的吸引力

郑和体现了中国史诗般的海洋历史，因此成为一个自信心日益增强的、外向型国家的优雅大使，这有助于北京传递几个信息。中国领导人列举宝船队的传奇故事，以证明中国在本质上是亚洲海洋安全的一个可靠管家，比任何西方国家，也就是在该地区已有六十年海军优势的美国更加可靠。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自于郑和之手，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当地统治者承认中国为宗主国，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和外交好处。郑和很少使用武力维护该体系，即使使用武力也是以有限的方式。这位宦官海军统帅的自我约束在今天的中国外交中很常见，它在学术上得到了一些支持。

事实上，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这一纪念活动为中国分析家们提供了一次有利时机，他们可以衡量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性，由此引出的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分析家们一致认为，郑和为和谐的国际秩序树立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先例。他们认为，尽管明朝船队具有军事优势，但郑和却没有在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胁迫与征服，而是从事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①这意味着，今天中国海军的崛起并不预示着亚洲海域会充满激烈的竞争。正如一篇中国文章所言，“在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时代，中国没有谋求霸权：今天和将来，中国将和平崛起，仍然不会谋求霸权。”^②

① 韦振华：《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洋文化》，《珠江水运》2006年第7期，第14页。

② 朱广彦：《唤醒600年沉睡的海权——郑和下西洋的纪念与反思》，《党员干部之友》2005年第7期，第19页。

第二，中国评论员们深信，郑和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和平接触归因于中国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这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向弱小的亚洲邻国展示“和平宽容”。^① 由此推定，当今的中国也可以复制中央王朝的良性外交关系。另一些人将郑和的克制归功于中国的儒家传统。^② 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这位明朝统帅造访过的相同土地的探险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的冒险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截然不同。正如饶咬成总结的那样：“郑和的和平是一种文明的和平交汇……郑和的远航是一种中国人对外和平交往的化身……它都根植在我们中华文明生存的沃土当中。”^③ 虽然这些笼统的说法中有些可能是夸张的或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修辞，但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例外论观点仍然非比寻常。举例来说，很难想象日本评论家会以类似的必胜信念来描写东京外交政策的未来。

第三，中国人将郑和视为中国目前对世界和海洋开放的象征。事实上，一些人将他的成就视为邓小平经济改革开放活动的先驱。蔡一鸣认为，这对北京未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证明：“向海则兴，背海则衰”。开发海洋与改革开放总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要学习郑和下西洋的航海精神，同时要正视中国历史文化中长期以来缺乏经略海洋观念、目光短浅的陆权思想对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危害性。^④

① 王翔：《对郑和下西洋和平外交政策的探究》，《中国水运》2006年第3期，第12~13页；云飞：《弘扬郑和精神迈向海洋强国》，《珠江水运》2006年第7期，第152页。

② 周思敏：《从儒家思想角度解读郑和下西洋》，《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第29~30页。

③ 饶咬成：《中国的海洋意识与海权现况——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鄱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第88页。

④ 蔡一鸣：《论郑和航海精神与我国和谐海洋观》，《中国航海》2006年第3期，第3页。

换句话说，中国长期战略的成功取决于郑和在六个世纪前所弘扬的这种和平的海洋商业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成功将需要全国一致努力抛弃过去面向陆地的孤立定位。

将郑和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明朝年间的等级结构并不逊色于欧洲的权力平衡体系，他们指出，与欧洲国际关系中常见的流血冲突相比，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诉诸武力是比较罕见的。^① 康灿雄（David Kang）则更进一步，他指出，以崛起的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在亚洲的回归将有利于国际体系未来的稳定。康灿雄称：“1300～1900年的东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它比欧洲体系更稳定、更有层次……等级体系是有内在逻辑的，它在（早期）现代环境下可导致并且已导致一个稳定的、相对和平的等级式国际体系。”^② 虽然判断康灿雄说法的理论有效性超出了分析的范围，但很明显，在国际事务中以中国例外论为前提的、“中国中心论”的地区秩序的观点仍然很受欢迎。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大国政治并不总是悲剧性的。这一想法在一些西方学术界的流行程度表明，接受郑和故事的听众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海岸。

与康灿雄的等级制度逻辑相似，中国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公开宣称，他们的国家决意要和平崛起为地区强国，或者用北京最新的惯用语来说是实现“和平发展”。^③ 因此，中国官员利用商

① 例如，参见：Kang,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 79.

②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49.

③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18 - 24; and Esther Pa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 2006年4月14日,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446/>.

业和发现性质的郑和下西洋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善意的、没有威胁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力量在本质上是自我克制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胡锦涛主席在南非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称，郑和的船队“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① 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时称，郑和给外国人民“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中国文化”，“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②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称，虽然“郑和船队的规模很庞大……但他的航海并不是为了掠夺资源”（而掠夺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标志），而是为了友谊。在同其他国家贸易中，他的施远远多于受，促进了理解、友谊以及中国明朝与东南亚、西亚和东非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③《人民日报》认为，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儒家学说中的“和谐”精神，而哥伦布及其后继者则在美洲“开辟了大量殖民地”，热衷于“典型的掠夺式崛起”。^④官方的《中国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对中国与西方进行了更为清晰的比较：“与后来的欧洲探险家远跨重洋、征服他国

-
- ①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比勒陀利亚大学所做的关于中非合作的《推动中非团结与合作，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2007年2月7日，<http://www.internationalepolitik.de/>。
 - ② 陈建、赵海燕：《温家宝谈中美关系：珍视和谐；和谐但不同》，中国新闻社，2003年12月8日，FBIS - CPP - 20031208000052。
 - ③ “Kenyan Girl Offered Chance to Go to College in China,” Xinhua, March 20, 2005, FBIS - CHN - 200503201477.
 - ④ “Enlightenment Drawn from Global Worship of Confucius,” *Renmin ribao*, September 29, 2005, FBIS - CHN - 200509291477 北京的孔子机构网络旨在普及孔子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邻国的软实力。更多关于中国运用软实力的文章，参见：James R. Holmes, “‘Soft Power’ at Sea: Zheng He and China’s Maritime Diplomacy,” *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28 (2006), <http://www.uky.edu/Centers/Asia/SECAAS/Seras/2006/2006TOC.html>。

不同，中国船队给这些国家带去了茶叶、瓷器、丝绸和技术。他们给其他国家和平与文明，从不占领外国土地，其成就象征这个古代王国与其他国家增进交流的真诚愿望。”^① 向那些警惕北京野心的国家传递的信息是，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俱增，但可以相信中国不会占领别国领土或谋求西方式的军事霸权地位。^② 中国的认同和战略文化将会限制其在公海的野心，就像宝船队时代的中国一样。联合起来抗衡重新崛起的中国是不必要的。正如中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中所称，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600年前，郑和……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立足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13亿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③

① 叶随：《追求幸福，和平无价》，2006年8月14日《中国日报》。

② 有一位中国评论员反驳美国五角大楼200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强调，在郑和时代，明朝“并没有用她强大的国力去拓展疆界和领土，相反却去延伸和加固长城用以自卫。而且中国没有去建立海外殖民地和掠夺他国，中国强大的舰队友好、慷慨而不求回报地对待他国。”李学江：《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隐藏阴险动机》，200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FBIS-CHN-200507271477。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新华社，2005年11月22日，FBIS-CHN-200512221477。也可参见胡锦涛2005年9月12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加强互利合作，推进共同发展。”新华社，2005年9月13日，FBIS-CHN-200509131477。

于是，中国的海上崛起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一项惠及整个地区的、积极的国际公益事业。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主题演讲中，温家宝总理再次谈及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和文化层面。温家宝引用郑和事迹来强调中国对强权政治和统治的反感。他宣称：

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15世纪，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他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还帮助沿途有的国家剿灭海盗，真正做到了播仁爱于友邦。

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①

中国发言人也试图以笼统的历史来缓和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海军建设的担心。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说，“郑和下西洋的精髓并不在于凸显中国海军曾经多么强大，而在于表明中国在十分强盛时仍追求和平外交……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说明和平崛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② 中国官员暗示，要不是明朝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放弃航海探险，亚洲历史很可能走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在中国监管之下、很可能更加仁爱的道路。因此，中

①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2009年2月2日。

② 参见，例如，“中国祭奠古代水手，展示和平崛起”，新华社，2004年7月7日。

国官员正试图传播一种观念，即，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代表了一支实力优越的安抚力量。

中国的领导层还利用郑和下西洋为中国的声誉增光添彩，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熟悉航海、造船以及海战（尽管北京淡化海洋事务的这一方面而专注于目的）的航海民族。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在印度洋驻扎海军编队的第一个国家。^① 宝船队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是一个技术奇迹。中国的船只自宋朝起就配备有罗盘。航海家们知道如何确定纬度，并能够使用海图绘制抵达预定目标的路线，并沿着此路线航行，这些海图相当准确，其中有许多在 18 世纪时仍在使用。

郑和的宝船基本上是巨型的远洋帆船，有些配备的桅杆多达九个，这些宝船所拥有的技术创新直到 19 世纪才被西方海军所采用。^② 举例来说，如果宝船在战场或恶劣天气中出现船体损坏，分隔船只内部的水密舱壁可以阻止进水扩散，防止船只下沉。^③ 如果战斗一触即发，宝船配有燃烧性武器，就像宝船队用

①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 ov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28.

② 对于宝船的规模，一直存在争议。明代历史记录，船身长 440 米，宽 180 米——据现代分析家布鲁斯·斯旺森的观点，这个比例需要使用宽梁来支撑，而这会使“船在海中遇到稍大的浪就会反应迟钝”。斯旺森声称，这放在几个世纪前，就好比把一满船的宝物装进了一个垃圾场再带入海里，据此估计，船的长度应该是 180 米。他进一步称，这个宽度的船在历史记载里是造船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了。其他如著名的路易斯·雷瓦西也承认这一数字。不论如何，郑和同时代的航海家哥伦布和伽马所驾驶的船就小得多。（Columbus' *Santa Maria* was all of 85 feetlong.）参见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33-34; and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19.

③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34-36. 根据现代说法，舱间布置——用水密舱壁将船体内部隔成小舱间——避免海水泛滥进入其他舱间。除非船体遭到巨大损坏而使多个隔板破裂，否则一个布置有多个舱间的船会抵挡住能瞬间淹没船只的“汹涌海水”。

来威吓并打败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在当时与现在一样是海运贸易和商业的要道——附近的海盗船队的弹射式火药“榴弹”。^① 姚明德是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筹备小组负责人，他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指出，“郑和船队在七次下西洋中的航行规模和难度之大、航海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② 对中国航海能力的此类夸耀在中国的评论中比比皆是。

郑和的故事使北京很自豪，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航海技术曾比西方更胜一筹，同时北京还不断渲染中国的航海技术。例如，在一次访欧之旅中，温家宝总理提醒听众，中国探险家的“海外航行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③ 中国发言人总是将郑和船队的规模与技术复杂程度与15世纪欧洲出海的、相对落后的船队进行对比，其中不仅包括哥伦布的船队，还包括曾于1498年停靠于印度次大陆的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④ 达·伽马的远

①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47, 50 - 52. On China's present-day "Malacca dilemma," 参见 Ian Storey, "China's 'Malacca Dilemma,'" *China Brief*, no. 8 (April 12, 2006): 4 - 6; 刘建平、冯宪会：《走向世界：跨越600年的对话》，《瞭望》2005年9月8日，FBIS - CHN - 200509081477。

② “中国下水行动，纪念航海先驱郑和”，新华社，2003年9月29日，FBIS - CPP - 20030928000052。

③ “温家宝总理欧洲之旅中的几次谈话”，新华社，2004年5月16日，FBISCPP - 20040516000069。听起来，温在2005年春季的南非之旅也有相同的主题。参见肖强：“温总理南非之旅收获巨大成果”，《人民日报》2005年4月13日，FBIS - CHN - 200504131477。中国在15世纪亚洲占有优势的程度，参见：Roderich Ptak, "China and Portugal at Sea: The Early Ming Trading System and the *Estado da India* Compared," in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Asian Seas: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s (1400 - 1750)* (Aldershot, U. K.: Ashgate, 1998), 21 - 37。

④ “China Launches Activities,” see note 61.

航开启了欧洲在亚洲数百年的统治，而北京将其作为与郑和船队进行对比的案例之一。

中国官员还指出，明朝的航海技术使中国率先成为海上亚洲的一员。^① 例如，2003年，胡锦涛主席在澳大利亚议会演讲，他把郑和下西洋作为中澳关系的历史基础，“早在15世纪20年代，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到达澳大利亚海岸”，他们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并“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多元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② 胡锦涛关于中国航海家在明朝就定居澳大利亚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中国在亚洲海上的存在和实力远早于欧洲。^③ 此外，胡锦涛暗示，由于海洋亚洲正处于向更好的未来恢复的过程中，所以中国的航海优势应受到欢迎而不是担心。

这种说法使中国例外论和民族主义成为焦点。然而，正如许多国家的传说一样（我们回到美国的例子，想想魏姆斯牧师关于乔治·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虚构叙述），北京的郑和故事作为历史的真实性也很一般。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统

①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印度王国在明代郑和航海之前统治着印度洋。虽然印度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对自己海洋历史郑重其事地强调，但印度人普遍知道自己宏伟的航海历史。在郑和探险的一个世纪之前，印度王国结束了其在海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然而，这样的后遗症就是，印度航海狂热者在与中国人开展航海外交时处于不利地位。

② 胡锦涛：《日益增多的共同之处》，澳大利亚议会演讲，2003年10月24日，<http://www.australianpolitics.com/news/2003/10/03-10-24b.shtml>。

③ 有趣的是，胡锦涛的疑问式的表达是建立在孟西斯的1421年之说之上的，1421年之说是一种被大多数学术专家认为具有鲁莽投机性的主张，比如，孟西斯认为，郑和要比哥伦布到达美国海岸早70年。参见：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3); Hansen, "China in World History," 4-7; and Wang Gungwu, "China's Cautious Pride in an Ancient Mariner," *Yale Global Online*, August 4, 2005。

治政权的性质十分重要。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很难说是明朝（或任何其他帝王朝代）的直系继承者。事实上，在毛泽东政权时代，共产党人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视为革命障碍，对其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清洗。因此，用古代事件来预测当今中国的行为并不可靠。^① 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根据郑和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十分短暂的努力推断出当今中国没有军事霸权倾向，势必是轻率的。

如果明朝没有从海洋撤回，解散其令人生畏的海军并最终禁止建造海船，它或多或少会采取类似西方的做法，动用武力来维持朝贡体系。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Dreyer）直言不讳地将郑和下西洋称为军力投送演习，旨在威吓较小的亚洲国家，以达到不需使用武力就能贯彻中国皇帝的政治意愿的成效。^② 但是，宝船队确实也曾使用武力，确保支持外国国王对中国皇帝的忠心。例如，1411年，中国海军曾干涉锡兰的一次内部战争，镇压由佛教首领亚烈苦奈儿（Alakewwara）领导的起义，并宣示了明朝对该岛的主权。^③

另一个因素也为中国海洋外交蒙上阴影：正是儒家理论对谋利的怀疑促使明朝朝廷从大海退回并解散了郑和船队。远洋贸易

① 中国发言人表述了北京当今的政策，尤其是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珍贵的传统延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光楷是持此种观点的发言人代表，他指出，“中国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这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表达了和平外交思想。”在郑和航海过程中，“传播给外部世界的是中国对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渴求。”参见熊光楷《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正确处理多样化的安全威胁》，新华社，2005年12月28日，FBIS-CHN-200512281477。

② Edward L. 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Old Tappan, N. J.: Pearson Longman, 2006), xii.

③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114-118; Frank Viviano, “China’s Great Armada,” *National Geographic*, July 2005, 41.

和商业可能无法像中国外交所表明的那样与儒家的信条和平共存。中国版本的历史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事实。从本质上看，在和平、善意的中国决心向该地区提供国际公共利益的叙述中，这些问题的存在足以让研究郑和外交的外人停下来思考。总之，中国可能不会是像其宣传的那样，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国。

中国的海上软实力与打击海盗的行动

中国对可用历史的重视与发生在海上的真实事件相互交织。直到最近，由于解放军海军的部署仍然相对靠近本土，中国的外交官们还在大唱赞歌，他们的国家没有进攻性，甚至在海洋领域保持稳定。由于中国的高谈阔论远远超出了其物质能力和在该地区从事的海军活动，周边国家没有依据来评判北京所引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可信度。因此，亚洲官员倾向于忽略中国的保证，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表态，或是对其现实的政治思想的一种临时性伪装。现在北京的诚意可以接受检验了，海军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为评价郑和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研究案例。

可以将下列问题作为向导，衡量中国海上软实力的效用，评估北京是否言行一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是否明确将护航任务与外交政策的原则相联系，将护航的目标与郑和的外交相联系？在印度洋，中国软实力信号的受众如何回应中国海军力量的存在？中国海上软实力带来的长期回报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将揭示中国海上软实力的成效和缺陷。

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的行动并非一夜之间形成，或政策真空期中的构思。中国的决策者们预计，至少十年内中国必须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毒品和贩卖人口、海盗、恐怖

主义、人道主义灾难、武器走私、网络犯罪、国际经济和金融犯罪以及流行病。分析家们认为，应对此类挑战的积极努力不仅是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责任，而且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软实力。吴伟兴解释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和参与解决热点问题经验的日益丰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向国际社会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① 为国际安全做贡献将改善北京的国际形象，说明中国是在和平崛起，这一认知显然得到了中国战略家们的共鸣。与此同时，吴伟兴描绘了一个非常乐于接受中国行使与其新兴地位相称的权力的国际环境。

有关军队在处理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与美国军界有关“非战争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的说法相似，中国人采用了“非战争军事行动”一词，用来描述低于常规冲突门槛的军事活动。朱之江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定义为防止战争，消除冲突，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行政当局设定的常规非军事手段难以完成的目标，符合国际法和相关战争法律标准要求的军事活动。^② 有些人认为，在海洋环境中，和平时期的多国海军演习是一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旨在表明军事实力，加强威慑，从而维持稳定。^③

大量有关非传统威胁及相应的非战争应对的学术研究和政策

① 吴伟兴：《从软实力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思考》，《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9期，第69页。

② 朱之江：《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84页。

③ 高月：《军事演习：非接触性对抗和政治较量》，《舰载武器》2005年第11期，第15～18页。

辩论，直接表明了中国有关打击海盗的战略思想。解放军海军领导层完全赞同将“良好的海上秩序”作为一项主要的非战争军事任务。解放军海军参谋长苏士亮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海盗、恐怖活动、严重灾害和流行病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频繁发生，对我们的海上运输、资源开发、渔业生产和海外的利益造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并已成为我们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主要威胁。”^① 苏士亮大力号召海军“有针对性地加强准备，以应对海上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时锻炼打赢更多海上常规战争的能力。苏士亮对中国海军满足更多角色的角色和使命做出的指示，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的。

中国海军领导人将海军远征明确地描述为中国负责任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宣称，首次护航任务的成功“充分展示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优良行为，展示了我军威武、文明、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展示了人民海军过硬的军事和政治素质。”^② 吴胜利对中华文明美德的肯定与郑和海上功绩受到的赞扬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许多文章同意吴胜利上将的观点，认为印度洋中的海军舰队增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③ 关于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展对中国国际声誉的影响，王利文的论述十分清晰，他认为：

远洋护航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突破口。随着中国综合

-
- ① 苏士亮：《坚决执行胡锦涛主席海军建设的重要思想，大力推动海军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人民海军》2009年6月6日。
 - ② 引自刘翔《海军举行会议总结首次护航经历》，《人民海军》2009年5月29日。
 - ③ 李大光：《亚丁湾护航——中国海军发展的新里程》，《国防科技工业》2009年第1期，第20页；北军：《中国海军开赴索马里》，《海洋世界》2009年第1期，第18页。

国力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海洋航线的免费乘客。崛起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它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打击索马里海盗，就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了契机，表明我们愿意为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①

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再完全受狭隘的自我利益的推动，这一观点在中国政策和学术界影响广泛。与美国海军相比，中国处于搭便车的状态，对于这一观点，中国分析家们拒绝接受。他们向北京发出呼吁，认为中国应该提供海上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呼吁表明，中国的分析家们已经内化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概念。事实上，持全球经济相互依赖观点的理论家们将会支持本书的结论，即，远洋贸易是全球经济命脉，而中国在对远洋贸易的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许多关于打击海盗行动的评论中，郑和占据了重要位置。当前打击海盗行动的地理位置，与郑和当年在印度洋剿灭海盗处于同一纬度，这一点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② 2009年1月，由两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战斗后勤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队抵达索马里，该舰队被称为“现代郑和舰队”。^③ 历史的巧合与中国关于其稳定外交政策中的例外论主张相吻合。中国海军司令清楚地意

① 王利文：《中国海军远洋护航意义重大》，《世界知识》2009年第3期，第4页。

② 参见李大光《中国海军有能力打击海盗》，《文汇报》2008年12月28日。林东：《海盗猖獗，国际反恐战争重心需要从陆地向海上转移》，2008年1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③ 李大光：《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生命与灾害》2009年第1期，第23页。

识到护航努力在软实力方面的意义。在参加中国海军成立 60 周年庆典活动时，面对来自 29 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吴胜利上将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将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当前对海洋的重视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是和谐海洋观的积极实践者……600 多年前，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带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曾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造访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没有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没有拓展一块疆土，没有带回一个奴隶，还为沿途国家剿灭海盗，广播仁爱于友邦，为他们访问的国家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东方文明，将他国人民的信任和友谊带回了中国，开创了海上和平友好往来的世界范例。^①

吴胜利上将对郑和故事的描述表明，在塑造有关当代中国海上崛起的认知和态度方面，他对历史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的讲话显然是为了支持国家主席胡锦涛有关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观点。吴胜利提到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宽厚品德时语气舒缓，而对西方帝国主义则不加掩饰地批评，实质上，这种行为与其政治领导人所传达的信息一脉相承。这表明，海军的做法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北京很好地掌控着中国的大战略，这比许多汉学家想象得要好。

决策者、学者和高级军事官员显然认同北京对郑和下西洋的阐释。他们将郑和下西洋视为输出中国崛起正面形象的外交载体。通过海洋历史来隐喻中国的未来，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① 吴胜利：《共同努力建设和谐海洋》，《人民海军》2009 年 4 月 22 日。

从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开始，中国一直在这样做。^① 不过，虽然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海洋历史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但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对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听众有多少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外部世界对郑和的故事做出怎样的反应，这是对中国吸引力的重大检验。

检验中国的海上软实力：来自印度的反应

解放军海军在索马里表现良好，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说，提供了有用的服务。中国海军已证明，它不再仅仅是海上防御力量，现在它具备了在海上进行燃料、武器和军需补给的能力，并能够实现与在岗船只轮换任务。解放军海军一直在试验建立一支更加雄心勃勃的舰队。目前，这支舰队正在进行它的处女航行。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抓住了证明其言行一致的机会，但是，打击海盗任务的战略影响还有待观察。然而，关于中国的魅力攻势及其地缘政治后果，一些西方评论家做出了一些不祥的、有些令人咋舌的结论。例如，他们推测，中国可能利用其新收获的影响力将外部势力排除在亚洲之外。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预测东南亚在中国魔力下的命运时做出如下假定：“也许，正如年轻的美国在西半球曾经做的那样，中国可能会将该地区据为己有——中国的东南亚门罗主义将使北京对地区事务起到重大影响，并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② 但最终的事实未必如此。即使在东南亚，虽然这里的国家相对弱小，精英和普

①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相互合作》，1997年12月1日，哈佛大学，<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zmgx/zysj/jzxfm/t36252.htm>。

②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11.

通公民都愿意接受郑和的故事，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可能并不会使各国政府完全接受中国的说法。康灿雄等分析家们自信地断言，与郑和所复兴的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类似的等级秩序将会重现，但历史很少一成不变地重复自己。^① 但麻烦的是，东南亚的追随行为既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倾向于追求的战略要比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战略更加隐蔽和复杂，他们不愿意公开选择阵营，而是小心地游走于大国之间，避免选边站队。^②

此外，中国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吸引力。随着中国把目光从东亚转向印度洋，很多受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它的软实力。在南亚，中国的例外论外交可能会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这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来提供海洋公共产品。这种阻力来自印度，它是该地区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的海上软实力如果要在印度洋地区获得回报（Pay dividend），需要得到印度的默许。然而，新德里战略界的活跃成员对中国海军进入其后院并不欣然接受。事实上，一些更危言耸听，有时几乎是恐慌性的印度评论表明，印度对中国的安抚姿态近乎充耳不闻，对于中国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任务，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机构领导人的心理十分矛盾。

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在索马里打击海盗是中国海军实现在印度洋永久驻军的第一步——如果明朝没有从海上撤回，而是使

① See for instance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② 参见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Military Technology* (January 2006): 321 – 323; and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ugust 2005): 311 – 312.

郑和的宝船队驻留，则这种结果可能在 15 世纪的南亚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怀疑论者直言不讳地说：“打击海盗行动为中国渗透到印度洋并实现永久驻军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中国海军舰队将在远距离海洋作战行动中获得经验，为其建立远洋航母舰队做好准备。”^① 新德里还相信，北京打算将“珍珠链”（即，中国通过与南亚国家谈判而获得一系列基地使用权）军事化。前海军中将达斯（P. S. Das）毫不掩饰地警告称：

中国目前还没有上场，但鉴于其海军的现代化建设的速度、能源利益和明确表达的目标，不久后它寻求成为印度洋一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缅甸的实兑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建设港口的活动可能是这一未来现实的先兆。它已经在紧邻安达曼群岛的可可岛建立情报监测站，并正在寻求将其现代化。我们必须谨慎关注这些进展。^②

一位著名的分析家将“珍珠链”的比喻加以延伸，勾勒出一条从日本开始，沿第一岛链，通过印度洋，直到亚丁湾的中印“竞争弧”。印度海军航海理论与概念中心（Indian Navy's Maritime Doctrine and Concept Center）负责人库拉纳（Gurpreet Khurana）中校以生动的地理术语解释说：“作为新兴国家，它们〔中国和印度〕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已经从其紧邻的周边地区扩展到最边远地区（甚至更远）。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和印度最直接的安

① Bhaskar Balkrishnan, “China Woos Mauritius, Eyes Indian Ocean,” *Political and Defence Weekly* 7, no. 41 (July 2009): 7–9, SAP20090731525005.

② P. S. Das, “India's Strategic Concerns in the Indian Ocean,” in *South Asia Defence and Strategy Year Book*, ed. Rajan Arya (New Delhi: Panchsheel, 2009), 96–100.

全需要分别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但它们的战略领域在这两个地区开始出现重叠。这导致它们将其海洋战略‘足迹’延伸到整个亚洲地区”。^① 值得注意的是，库拉纳修改了2004年的印度海洋学说声明（实际上就是海军的战略构想），在2009年发表了一个新的印度海洋学说。因此，对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印度人而言，中国海军的技巧与熟练程度的提高预示着将来的麻烦——如果“竞争弧”的概念具有指导意义，这些麻烦可能使印度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海军实力，作为回应，还需要向太平洋投送力量。印度在中国海洋后院的对抗行动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中印海军竞争。

此外，印度认为自己是印度洋中最重要的国家，并且倍感自豪。因此，如果北京一旦对新德里的地区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就将会遭到印度的有力还击。正如中国海军主义者将中国的海洋视为北京的自有势力范围一样，印度的战略家们同样认为，印度在印度洋中拥有合法特权。持有这种态度的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上将总结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确保印度洋地区战略稳定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将落到印度的肩上。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印度不仅需要提高其经济实力和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整个地区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总之，印度必须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保持敏感，并作出有远见、有决心的迅速反应。”^② 这种紧迫感，也就是印度必须迅速对中国海军

① Gurpreet Khurana, “China-India Defense Rivalry,” *Indian Defense Review* 23, no. 4 (July-September 2009),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2009/04/china-india-maritime-rivalry.html>.

② Arun Prakash, “Indian Ocean: A Zone of Conflict?” in *South Asia Defence and Strategy Year Book*, ed. Rajan Arya (New Delhi: Panchsheel, 2009), 43-50.

的崛起做出反应的意识，随着对美国驻军的信心减弱而必然会变得更加强烈。巴德拉库玛（M. K. Bhadrakumar）大使认为，印度保持警觉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海军的霸主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海军在未来十年内拥有的战舰数量可能会超过美国。”^① 因此，马汉主义逻辑鼓舞着许多印度战略家的思想。

印度分析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并密切地关注郑和的故事。^② 然而，与东南亚同行们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并未使他们感到安慰。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托马斯·马修（Thomas Mathew）称，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吴胜利上将在青岛举行的国际海军阅兵期间，提出了“和谐海洋”的主题，但是“没有多少人信服”。^③ 一些印度分析家甚至推翻了郑和的故事。帕塔萨拉蒂（G. Parthasarathy）发表了与爱德华·德莱耶类似的想法，他将郑和的船队描述为“远征军”，并指责北京“正在恢复明朝皇帝的帝国野心。”作者警告说，如果面对中国努力重演这种不愉快的历史，印度不能做出有力反击的话，那么，“印度将被坚定自信的扩张主义者中国，在战略上实现边缘化和包围”。^④ 前东部海军司令部高级将领库马尔·辛格（Arun Kumar Singh）中将也颠覆了中国对郑和下西洋的解释，将其描述为中国向印度洋部署攻击型潜艇的

① M. K. Bhadrakumar, “Sri Lanka Wards Off Western Bullying,” *Asia Times*, May 27, 2009.

② 对于印度人如何看待胡锦涛反复提及郑和航海，参见 Sunanda K. Datta-Ray, “Frozen by China—India Has to Snap Out of Its Stupor if It Wants to Be a Force to Reckon With in Asia,”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8, 2007, 10, SAP20070108384011. 达他·瑞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的高级访问学者。

③ Thomas Mathew, “Mighty Dragon in the Sea,” *Hindustan Times*, June 24, 2009.

④ G. Parthasarathy, “Challenges from China: India Faces Growing Hostility after 26/11,” *Tribune*, March 19, 2009, SAP20090319378013.

不祥预兆。^① 如果说北京正在兜售其安抚之意，很显然许多印度人不会买账。

鉴于印度战略界对郑和故事的接受程度有限，有三个与中国海洋软实力相关的问题值得仔细推敲。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北京正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些国家也可能会顽固地抵制中国的吸引力。北京可能会发现，南亚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儒家理论和郑和故事表示欢迎和赞同，但却拒绝根据这一想象的和睦时代来行事。可能的原因是，软实力虽然可以有效地减少对一个国家的行动的猜疑，但其提供的动力过小，不足以促使目标国家采取积极的行动。不公开反对中国的行动是很容易的；为了中国领导的冒险而耗费国家资源却可能并不容易，更不用说还有政治上的危险。

其次，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国家吸引力几乎都不是普遍适用的，即使美国开放、民主的社会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② 某些国家可能对其他国家持有完全不同的假设，或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从而使他们不受软实力预期效果的影响。来自印度洋的证据表明米德的说法是正确的，中国已经在新德里遇到了冷漠无情的观众。中国的魅力攻势似乎注定要遇到热情、冷漠、怀疑，甚至公然敌意的某种组合。

再次，当一个形象仍然是抽象的、没有混杂棘手的现实情况时，保持这个形象的吸引力是相对简单的事情。然而，当一个国家追求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它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是具体的行动，这些行动常常会与其领导层希望提出的战略表述发生冲突。

① Arun Kumar Singh, "Let's Prepare to Meet the Chinese in India's Ocean," *Deccan Chronicle*, February 20, 2009.

② Walter Russell Mead, *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in a World at Ris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37.

随着北京开始向印度洋等战区投入海军硬实力，它可能会发现，对一个外国观众的吸引力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个外国观众，并且随着它为了本国利益而采取行动，其软实力将会下降，或至少需要精心的维护。

因此，中国文明固然有吸引力，但并不能保证其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功。如果遇到棘手挑战时，北京（或任何其他政府）试图将软实力视为一个可利用的护身符，那么它很容易面临失败。如果印度战略界坚持漠视北京传递的信息，中国是否会继续宣传郑和的故事仍有待观察。中国可能会坚持下去，以期通过坚定不移的言行一致来说服新德里。北京沟通战术的变化可能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重新评估其明朝故事的价值。外部观察者以及亚洲各国将会认真地监督北京如何掌控其海上扩展的努力。

中国海上软实力的潜在缺陷引发了对未来中印海洋互动的质疑。首先，郑和故事对于新德里而言是否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种魅力攻势是否一定会被置若罔闻，从而面对印度时，中国无法推动它的国家目的？其次，为什么印度对中国的安抚信号无动于衷？这种免疫力在印度的战略界中有多普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基本世界观的差异、权力不对称、体制偏见还是个人信仰？最后，当在印度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北京需要对其传递的信息进行何种程度的微调，还是全面修改？如果提升中国的形象意味着必须放弃使用一些必要的硬实力，那么它值得付出多少努力？北京对郑和故事的投入所带来的回报是否将会越来越低？这些问题的一些答案对决策者和学者都将是宝贵的。

对美国的意义

鉴于中国的海上软实力的不确定性，美国应避免反应过度。

华盛顿应谨慎地接受北京对亚洲海域领导权的一些主张，将中国参与防扩散安全倡议等地区海上活动的意愿作为接受条件，这在理论上应可推进共同的政治目标。最近两国军方的接触表明，美国的新旧政治领导层欢迎中国在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美国必须对中国恢复在该地区霸权的任何努力保持警惕。如果说郑和为北京提供了一种应用软实力的方式，那么他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衡量中国意图的标尺。假设美国要保持其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它就必须注意中国偏离郑和外交所具有的善意目的的迹象。到目前为止，打击海盗任务与北京传递的信息非常一致，这对中美更广泛的海上合作是个好兆头。

然而，华盛顿在南亚和东南亚面临着对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美国必须在该地区制定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大战略，以免发现自己对亚洲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排除在亚洲之外。^① 战舰、飞机和导弹形式的前方军事存在并不能代替强有力的外交。但是，60年来，美国已经习惯于提供自由航行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很少要求回报。相比之下，郑和时代是短暂的，他的努力发生在早已成为历史的一个年代，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很难将明朝短暂的航海功绩划归自己名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海上力量提供的切实安全利益为美国的软实力反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华盛顿必须巩固这一基础，以免自己的地区地位走向衰落。

^① 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事务领导地位的雄心已经公之于众。2005年12月中旬，在北京的坚持下，亚洲国家举行了东亚峰会，这次集会明确将美国排除在外。

第八章

美国的东亚海洋战略

正如《国防战略》《四年防务审查报告》等官方文件所显示的，美国和中国都十分关注公域（the concept of the commons）的概念。为了配合 2010 年度《四年防务审查报告》的发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发表了一篇关于竞争中的海军概念的文章。弗卢努瓦称，“现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基于全球经济的自由与公正，而这又需要稳定的全球公域”。马汉可能是第一个创造这个新词汇的战略家，他在其 1890 年的论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认为“世界海洋正如好用的公路一样，属于广泛的公域”。^①

毫不奇怪，有关美国海洋战略的声明都必谈公域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适合于美国的海洋战略。但是，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不是研究 2007 年 10 月发布的《21 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而且，我们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记录美国海洋战略的历史。我们想要对照和对比历史上政策制定的两次努力：海洋战略与合作战略，其中海洋战略

① Michèle Flournoy and Shawn Brimley, “The Contested Commons,” U. S. Defense Department Web Site, <http://www.defense.gov/qdr/fournoy-article.html>.

发布于1986年的里根政府时期。我们认为这种回顾虽然简单，但却能够有效地说明当今美国的战略家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最终权衡。大体说来，我们把1986年的战略作为“新马汉主义”战略家所设计出的战略的代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那么“马汉主义”意味着对抗、海军竞赛和斗争。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看，（1986年的战略）是符合当时的环境的，因为它说明了冷战期间如果海军想要应对同等实力的竞争者，那么必须保证武器装备。同时他认为，这个文件具有可执行性，因为它把应对具体敌人——如苏联——而进行的高强度战争所需要的平台和武器都进行了具体规定。令人吃惊的是，海军官员在经过大量的实践之后，也倾向于支持1986年的战略而不是2007年的。

对照发现，《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详细阐述了海权逻辑，却并没有提到具体执行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抱怨，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战略，而只是一次公共关系的冒险。确实，通过与1986年的海洋战略对比发现，2007年的文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声明，缺乏可操作性。用杰弗里·梯尔（Geoffrey Till）的话来说，合作战略是为“后马汉时代”的“后现代”世界设计的，在这个世界中，关于海洋的争斗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弱，诸如反海盗、反扩散和反非法交易成为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这体现了与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相近的海上服务的观点，他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缓和国际关系，会使国家间的武装冲突成本提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① 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通过联合行动保护航海贸易体系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共同关注的事情。因此，这个文本应该允许海军外交和战略交流。然

^①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 and the Commons: Angell or Mahan?" *World Affairs* 168, no. 4 (Spring 2006): 172-191.

而，该合作战略并没有涉及相关内容，扰乱了实践层面的很多海军行动。

马汉主义和后马汉主义的范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他们承担的使命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以海盗问题为例，修昔底德曾记叙，克里特岛的国王迈诺斯是如何在荷马时代之前建立第一支希腊海军，并与海盗作战。海盗为了复仇曾经活捉恺撒大帝。中国明朝的郑和在600年前曾经击败了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巴巴里海岸战争中清剿海盗的艰辛作战史也终于改变了美国海军差点因联邦缩减开支而解散的命运。美国海军在冷战期间履行了世界警察职责，虽然这并不是其海军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战略建立于支撑全球化的国际伙伴关系之上，其海洋舰队仍然随时可以展开行动，如果有需要会履行其他战争使命。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创新。传统挑战和非传统挑战寻求的都是为什么针对不确定的周边环境不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马汉主义世界的战略：论1986年海洋战略

为了对2007年海洋战略有所理解，我们值得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瓦特金斯（James Watkins）和约翰·莱曼（John Lehman）战略的发展、原则和它所受到的批判——最后的官方海洋战略文件。^① 已公开的一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纪

① 有关1986年战略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份材料中大致概括出来：John B. Hattendor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1977 - 1986*, Newport Paper no. 19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4); John B. Hattendorf, ed., Newport Paper no. 30,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70s: Selected Documents*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7);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80s: Selected Documents*, Newport Paper no. 33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8)。

事》的增刊中指出，对战争的准备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互动、重估和调整，最终形成了 1986 年的海洋战略。关于苏联威胁的本质以及美国应对这一威胁的正确战略选择的争论，在当时还是很抽象的。修昔底德说过，战争是一位粗暴的老师。西方国家与苏联没有在海上发生过真正的战争，美国的海洋战略及其战略概念也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战争的检验。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竞争对手实力相当、财政紧缩严重，针对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而制定海洋战略，并为之而付出的努力，仍然体现了一贯的主题。

精心制定战略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为了使最终手段与目标一致，随着新思想的出现，被接受、被拒绝或者被修改，在不同阶段要做出各种努力。正如克劳塞维茨和米歇尔·亨德尔 (Michael Handel) 所指出的，战略包含着交战双方为获得比较优势采取的各种竞争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对立国不断互动的过程”，这使战争从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测性。^① 亨德尔补充到，“参战双方各自寻求比较优势的、不断互动的过程使得每场战争都独一无二”。^② 互动、重估和调整贯穿于整个冷战，同样的情况也将在亚洲上演，这是美国 2007 年海洋战略的首要地区。

在 1945 ~ 1970 年间，美国海军履行了很多职能。它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实施封锁，向朝鲜和越南投送兵力，阻止苏联海军的挑衅，并实行常规的海军外交，在重要地区显示美国的存在。但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它并没有和任何一个舰队交战。1944 年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trans. Peter Paret and Michael Howar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6, 139.

② Michael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3rd e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117.

10月，美国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在莱特湾（Leyte Gulf）交战，这是美国进行的最后一次舰队间的直接冲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论述“远洋战略”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战后的新时代并没有给美国海军带来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苏联海军实力虚弱，很少发生莱特湾那样的交战，这使得美国海军没有控制海洋的意识。^①虽然违背常理，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成为战争胜利的受害者，因为获胜使美国失去了可以与之抗衡的海军力量，它无法有针对性地构建自己的战略和实力。

远洋航行的日益发展，以及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海军实力的上升，使上述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苏联海军传统上是一支本土防御性力量。二战之前，斯大林已经下命令建立一支“马汉主义”的战斗舰队，但是莫斯科的这一野心最终落空，因为苏联的造船工业过于落后，而且在当时苏联面临严峻的陆路防御任务。^②斯大林担心北约会沿着欧亚大陆两侧发动两栖进攻，但是他的继任者认为，海上形势没有那么严峻。他们的（这种态度）让刚刚成型的舰队很快衰落。到古巴导弹危机时，在华沙条约国沿岸的海域之外，苏联海军已经无力挑战美国及西方盟友的海上控制权。

因此，在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莫斯科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打破美国海军在古巴海域建立的封锁区。古巴的失败暴露了苏联海军的弱点，震惊万分的莫斯科开始行动。戈尔什科夫大元帅（Grand Admiral Sergei Gorshkov）是苏联深海舰队的缔造者，他力

① Samuel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80, no. 5 (May 1954): 483-493.

② Milan L. Hauner, "Stalin's Big-Fleet Progra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7, no. 2 (Spring 2004): 87-120.

主革新苏联的海军战略，建立一支能够执行这一战略的舰队。和中国一样，俄罗斯是一个陆地强国。它最近一次尝试发展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是在1905年。但是，在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将军的指挥下，日本联合舰队将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击沉于韩日之间的对马海峡。

俄罗斯和苏联的海军历史为西方国家了解苏联海军的未来提供了微乎其微的帮助。官方声明和文件会误导对苏联成败的认识，因为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家利益、联盟政治甚至是最高政治领导人虚妄的粉饰品。反而，船舶制造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苏联战略及其意图。和其他国家一样，在苏联，船舶承担着各种使命，这些使命和当初建造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有关研究苏联政体的其他材料显示，对苏联海军战略所隐含的原则和目的之分析，属于猜测性分析。

“蓝带防御”是影响苏联思考海军事务的又一概念。^①“蓝带”在地理上限定为距离陆地领空和海域一定范围内的离岸区域。就像现代中国思考海洋思维一样，苏联认为占领尽量广阔的海洋区域至关重要，这就好比陆军的任务是尽量占据广阔的陆地。苏俄的战略家把陆地战争的概念运用到了海洋领域。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试图在苏联边界周围建立一个由友好国家或中立国环绕组成的边境带，形成阻止陆上进攻的缓冲区。像斯大林时代一样，戈尔什科夫及其支持者们试图建立一个具有防御性的障碍带以阻止北约东扩。

①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 S. Navy, 1890 - 199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95, 398, 420, 422; Robert Waring Herrick, *The USSR's "Blue Belt of Defense" Concept: A Unified Military Plan for Defense against Seaborne Attack by Strike Carriers and Polaris/Poseidon SSBNs* (Arlington,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1973).

马汉痛斥俄帝国海军“堡垒—舰队”的概念，认为这会使海军成为海洋沿岸防御工事的附属物。^①但这一概念一直保留在苏联的海军思想中。新科技武器，如反舰导弹的发明和反潜战的实行，可以使“蓝带”区域向外扩展，使苏联有能力抵御美国及其盟国违反“华沙公约”（Warsaw Pact）争夺海域的行为。这听起来很符合逻辑。欧洲是欧亚大陆凸出而形成的巨大半岛，在这个半岛上，拥有地区主导权的国家的海军舰队在此海域自由游弋，并制定出相应的航行条款。亨廷顿在那篇关于跨海战略的文章中，敦促美国海军把地中海当作欧亚大陆的入口，使其成为向苏联展示实力的平台。苏联若想使西方国家无法炫耀实力，就必须与北约国家争夺这一入口。戈尔什科夫并未言明苏联试图建立的防护带有多大，但估计是苏联海军防卫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开始出现显著增长和提升。

在硬件建设领域，针对水下战争是苏联海军建设的核心。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海军配备了50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同时还有约300艘核攻击潜艇。虽然数量很多，但不能对之高估，因为戈尔什科夫（甚至斯大林）都认为数量多本身就是优势，这使得他们不在意性能。一个曾在潜艇上进行声纳相关操作的退休人员戏称，提前发现苏联潜水艇就像偷听两个穷人在破旧的金属桶里做爱一样（轻而易举）。声纳装备问题使苏联早期在数量上的优势毫无意义。鉴于早期弹道导弹的射程较短，苏联虽想对美国的城市形成威慑力，但却只能在距陆地很远的海域航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 (Boston: Little, Brown, 1911), 385, 391, 393, 397, 403, 441.

行。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苏联的战略选择不得不转向其他方面。

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苏联海军的行动表明，莫斯科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美国一决高低，即便美国自1945年后一直占据海上优势。例如，在70年代，苏联人曾发动了一系列以“海洋”为代号的行动。这一时期，苏联在美国的传统占领区如地中海、北大西洋地区部署了舰队，还开进了挪威海及印度洋。美国已不再能单独控制海洋。苏联的行为使人怀疑在欧洲大陆发生战争时，美国是否还能自由运用大西洋航线维护北约的主要阵地——欧洲。1973年的阿以战争更彰显了苏联在蓝色防护带上的扩张野心。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地中海舰队的数量超过了美国派出的第六舰队，这使美国海军及尼克松政府都十分震惊。美国和苏联在造船率和造船预算上的差距日益缩小，数量增长难分伯仲。

一些不寻常之事开始出现。虽然戈尔什科夫在他的蓝色水域舰队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但是苏联海军的实力仍然无法赶上美国的水平。首先，与美国相比，苏联无法建造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承载甲板。其次，（苏联）海军领导者在从抵制海洋到控制海洋的战略转变中，表现得略显急躁。虽然防御海峡袭击是有效控制海洋的基本方式，但很明显苏联认为反潜战是海面舰队的备选方案。最后，随着海洋技术的逐渐成熟，潜射弹道导弹潜艇（SLBM）射程的扩大，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可以在本国附近操作，这使攻击美国的任何目标都不必承担脱离岸上保护伞的风险。总之，战略家认为苏联海军提高了自身的作战实力。

这些模式公然挑战了西方的假定。1981年，美国海军最高将领汤姆斯·海沃德上将（Thomas Hayward）公开表达了对苏联建立强大海军模式的质疑。西方分析家感到困惑的是，苏联海军以进攻和防御模式建造的平台并不一致，他们曾辩论苏联是否具

有基本的海军理念，也曾辩论如果苏联准备在 60 年代的一场欧洲陆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那么苏联领导者对核战争和无核战争的区别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拥有一支威武的海军能否促使苏联领导人产生新的动机和战略选择。如果莫斯科握有“锤子”，那么任何挑战看上去就都是“钉子”。

领导者的言论可以成为一种指示。戈尔什科夫也曾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专著《国家的海军实力》与马汉的观点相左，认为苏联曾经既是陆上强国也是海上强国。海上战争固然重要，但击败帝国主义国家的海上“大棒”，而不是从西方国家手中夺取海上控制权，才是苏联的主要目标。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坚信，只有打败西方的威胁才会使苏联获得新自由，戈尔什科夫肯定了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耐受性，但同时也坚持，潜艇的使用最好是在陆地补给范围之内。事实上，他断言，美国会仿照苏联的方法来装备三叉戟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美国海军部署行动也会仿照苏联。^①

随着舰队实力的不断提升，苏联海军把在海洋上的注意力向东转移，并重新在东亚水域庄严亮相。以海参崴为基地，太平洋舰队使苏联海军的核遏制战略多元化。弹道导弹核潜艇成为苏联在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的移动堡垒，这种在东部地区的存在使苏联海军在亚洲周边可以发挥遏制战略，不仅阻止美国海军势力的扩展，而且在中苏关系敌对的情况下，为苏联提供更多选择。太平洋舰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它所辖舰船比北方舰队还要多。苏联舰队的 30%、地面战斗部队的 90% 都部署在远东基地。

在这样一位对手看来，美国是否仍是海洋霸主还未可知。但

^① Sergei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9).

是20世纪70年代，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和海军战略家们重新考量了苏联海军挑战的实质，一致认为，美国海军有机会重获海上霸权。例如，苏联已经放弃资本主义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崩溃的希望，也不会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核扩散使战争结果更不可预知，这就会如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著名的预言，苏联政权将日益成熟^①。与此同时，苏联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是莫斯科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提升海军实力所需的资源供给更少了。

如果苏联的政策恢复到防御型，那么美国有可能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来重获海洋霸权。美国可以在美苏冲突初期抓住苏联的失误，来消除苏联在前十年中所建立起来的部分优势。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还有待思考。

乔治·巴尔（George Bare）评论认为，有效的战略需要掌握核心威胁是什么。准确评估苏联的威胁对于美国的战略调整至关重要。美国的海军战略家不断思索基地的数量和类型。其中，自二战以后航母一直是美国海军的中坚力量，现在是否还应该？这是最值得思考的。而且，就算航母仍是核心力量，为了与苏联争夺欧亚海岸的控制权，美国是否应该冒同归于尽的危险，这也是需要认真思索的。

虽然整体上倾向于重新采取进攻型战略，但事实上，不同的海军将领关于这些问题有不同的想法。艾尔默·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上将在越战后期担任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①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available at The History Guide Web site, "Lectures o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http://www.historyguide.org/Europe/kennan.html>.

(CNO)，他认为，美国海军应该重新以控制海洋为战略重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海军能够在亚洲海岸轻松地展示他的实力，而不担心他国干涉，但随着苏联海军能够将 200 艘以上的船只同时部署在世界各地海域，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也使北约第一次感觉到海洋战线受到威胁。朱姆沃尔特同时表示，控制海洋可以确保美国有能力在战争一爆发就能迅速通过大西洋补充兵力和战争物资。

朱姆沃尔特上将引发了关于美国海军战略、使命和平台的长时间的讨论。他承认重新掌控海洋任务艰巨，但美国仍然应该这样做。更具争议的是，他坚持海军应该在短期内保持较小实力，从而把资金投在新的长期性建设中，但这极具风险。他主张建立“高/低混合”性舰队，这种舰队包括了大量的低性能平台——奥利弗·佩里冒险护卫队就是最好的例子——像“尼米兹”号级别的战舰系列，包括了昂贵而高端的核承载设备、巡洋舰和驱逐舰。对于在经济状况不稳定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服役的朱姆沃尔特来说，这就是最简单的现实。

这位上将推行的定量方法，倾向于现实获取而非纯战略，政治和战略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朱姆沃尔特支持的“项目 60”，其焦点集中于舰队数量、技术创新和新的平台武器系统，如与“佩里”号同等级别的导弹护卫舰（FFG）及海洋控制舰，因其成本低而更可以用来冒险，但昂贵的鱼雷反舰巡洋导弹等装备（CVN）就不可以用来冒险。“项目 60”显而易见的缺点使得官员们认为应该重新恢复海洋服务的战略传统。朱姆沃尔特的批评者们认为，混合舰队使美国实行防御性战略，能保有海洋控制权，但却不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取得胜利。也就是说，高端的舰队和设备可能会非常少，可能它并不能赢得马汉主义者认为的成功，因而需要借助于低端设备。他们坚持认为，最好的防御

就是进攻，但美国海军正在放弃进攻。

朱姆沃尔特夸大了华盛顿方面在预算过程中的理性成分。国会很乐意提供海军更换退役舰队所需要的资金，但是立法部门认为虽然资金充足，但是没有必要进行更换。^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期，由于舰队建设速度急剧下降三分之二，舰队规模迅速缩小。舰队数量由 1965 年的近 900 艘减至 1980 年的 500 多艘。虽然在海军淘汰旧舰船的同时提高了每艘军舰的质量，但是高质量不足以应对数量庞大的苏联海军。

詹姆士·豪勒威（James Holloway）上将是朱姆沃尔特的继任者，他组织了几次调查来考察缩小军队编制的反响。^② 在向国会汇报调查结果时，豪勒威说“海军实力的不断降低使美国海军成为只针对某一个海域的海军。”^③ 太平洋海域是美国海军的真空地带。其他分析者也得出了相似的可怕结论。一项针对性调查显示，500 艘舰船的规模根本无法使美国在重要海域占有优势，如北约战略依赖的大西洋海上交通线，亨廷顿所认为的横跨海洋的海军发挥实力所必须占据的地中海以及重要盟国日本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域。这位海军将领宣称，只有保持 800 艘的舰队规模才能履行其所有职责。

此项结果使得民众和领导者都颇为震惊。（大家都记得）单在 1978 年，新建设项目就被削减一半。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和国防部长海洛德·布朗（Harold Brown）建议减

① Norman Friedman, *The Fifty-Year War: Conflict and Strategy in the Cold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② Hattendorf, *U. 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70s*, 53–101.

③ James L. Holloway III, *Aircraft Carriers at War: A Personal Retrospective of Korea, Vietnam, and the Soviet Confrontatio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31.

少航母数量、停止建造新的核力量承载器。卡特和布朗认为，应像其他国家一样，减少建造昂贵的短距离升降承载器。作为豪勒威的继任者，托马斯·海沃德（Thomas Hayward）上将公开表示，美国的海军战略已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① 无独有偶，海军部葛兰·克雷特（Graham Claytor）也曾表示，海军的管理会使美国海军成为海洋上的“马其诺防线”。^② 克雷特非常肯定，他选择的海军战略，显示了美国海军已经沦为防御型力量。

不管海军将领在代表这个庞大的力量进行游说的过程中表现得有多么明智，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方面的主导性看法。20世纪70年代，军备控制和裁军盛行，卡特政府和其前任都顺从了这一大趋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只是尼克松时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时期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的一部分。那些认同武器控制论的人认为，实力均衡——而非优越性或必能取胜的战争——是军事战略和军事实力的目标。对于需要选举才能上任的官员来说，海军应该追求的是均衡而非控制海洋。

海军在北约的战争中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现在尚未可知。北约所信奉的“灵活反应战略”假定盟国将运用战略核武器，以期在战争之初就能制止华沙条约组织的地面进攻。这样，在海军参战之前，战争就已分出胜负。20世纪70年代，海军实力在决定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小于综合国力中的其他因素。外交是第一手段选择，而海军实力则是下下之选。国防部长布朗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并把海军的职责降低为护航和驻

① William M. McBrid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865-194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2000), 233.

② Nathan Miller, *The U. S. Navy: A History*, 3rd 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273.

扎存在。不管这些将领们是怎样进行争论的，把海军与国家政策割裂开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但是海军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早在卡特时期，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战略概念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像“海洋计划 2000”和“海上打击项目”这样的项目名称。^① 海军分析机构和智库中的专家也持相同的论调。第一，海军的支持者宣布，马汉所说的制海权是其他一切海洋任务的先决条件，因此进攻性应是战略辩论的前提。美国海军应该重新获得海上霸权。第二，专家宣称，技术上的进步也使马汉所主张的制海权成为可能。像“宙斯盾”这样的新系统更提高了反潜战的硬件和软件，巡航导弹会使水面舰队即使在高强度威胁环境之下也有机会生存和发展。总之，即使在面对使用综合武器来维护其蓝色防线的苏联海军时，（美国的）战斗群也能够凸显实力。

第三，美国海军应该抓住战争爆发的初始阶段使战争在欧亚大陆的外围进行。这种外围战术能迫使苏联及其盟国四处应战而无法将火力集中于德国，还能将战争区域不断向岸上推进。海军分析家认为，卡特政府应该放弃不断摇摆的计划，或者把太平洋舰队部署到大西洋以应对危机。政府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大西洋舰队，支持它的欧洲优先战略，与此同时，太平洋舰队应该负责拖住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和潜艇，威胁苏联海域外围。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一个“威胁”会使得苏联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防守远东，这样可以减轻北约在欧洲的威胁。

重点是，美国海军应该包围苏联在欧亚边缘的蓝色防线，迫使莫斯科方面不得不在是否对欧洲发动地面进攻的问题上重新考虑。一个绝对强势的海军能够缩小苏联的蓝色防线，同时使苏联

^① Hattendorf, *U. 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70s*, 102 - 133.

认识到海岸之外的海域是危险地带，而由高低混合舰队组成的海军绝不能做到这一点。海沃德上将的继任者、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上将（James Watkins）以及他的上级、海军约翰·雷曼（Navy John Lehman）部长，看到了将这一战略思想正式纳入海军战略的机会。这一战略曾在内部讨论会上向大量不同的听众简要介绍，并经过大量修改后于1986年发表在海军研究所的《海军纪事》期刊上。

沃特金斯和雷曼兄弟吹嘘，在国家领导下，这一战略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放在了“同一组乐谱中”，这是近几十年，最起码是近几年的首次。^① 这一战略不赞成北约和华约之间的战争必然导致核大战的论断，不认为海军实力是进行战争的有力武器，主张美国应在苏联外围采取小规模的海军行动，应该尽量拖延战争使战争成本不断增加直到莫斯科方面无法承担。这种间接的方式便于美国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结束战争。^②

也有人不赞成这一战略。批评者质疑战略制定者所假设的战争的实质。他们怀疑这一战略是否能够耗尽华约在欧洲的地面和空军力量，他们认为，这是对“小范围-持久战”的过分相信，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其中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持强烈反对意见，他于1985年向海军战争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其后刊登于《国际安全》杂志。米尔斯海默强烈地批评上述战略，认为其试图通过海军实力来改变常规战争中的核均衡状态。在常规冲突中，对苏联的水下舰队进

① Hattendorf, *Evolution of the U. 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75.

② "The Maritime Strategy, 1986," in Hattendorf, *U. 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80s*, 203 - 258.

行打击会使莫斯科陷入用还是不用核武器的两难困境，莫斯科可能宁愿采取弹道导弹的齐射式攻击也不愿在对美作战中丢掉其战略核潜艇。^①

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争论，反正结论是什么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苏联海军这个敌人表现得多么威风凛凛，要面对它都是相对简单的。分散威胁的存在使战略制定过程沦为一系列问题、参数的辩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年，日本就非常关注美国为太平洋战争创制出来的颜色系列作战计划。这些问题包括：巴伦支海的海军行动中航母能够幸存吗？在地面武器的掩护下，苏联将会在哪里发动战争？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多少反潜战设备才能抵挡住规模庞大但技术落后的苏联潜艇的进攻？

同时，宣称相信“小范围－持久战”也是有问题的。从战略角度来看，一艘强大的敌舰能够使美国政府、选民和军队共同支持“前进式”的海洋战略。马汉曾经回忆，在19世纪说服美国进行海洋军备建设十分困难。内战后，美国国民的这种冷漠使海军进入了“完全不可思议”的停滞时代。马汉把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面对世界范围观念不断更新时的思想麻痹”。没有公众和政府的支持，美国海军只能在一个权宜之计到另一个

① John J. Mearsheimer, "A Strategic Misstep: The Maritime Strategy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1, no. 2 (Fall 1986): 3-57. 有关海洋战略的其他论文，又见 Robert W. Komer, "Maritime Strategy vs. Coalition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60, no. 5 (Summer 1982): 1124-1144; Barry R. Posen, "Measur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al Balance: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reat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no. 3 (Winter 1984-1985): 47-88; and Christopher A. Ford and David A. Rosenberg, "The Naval Intelligence Underpinnings of Reagan's Maritime Strateg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8, no. 2 (April 2005): 379-409.

权宜之计中勉强维持。^①

马汉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强调，强国威胁加勒比海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一些抽象的观点因不真实而没有分量，却偏偏要强行寻找支撑。马汉写道，只有美西战争能够“把理论家和极端分子的抽象概念用真正的现实加以诠释”。美西战争使美国人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他启示美国民众看向更远处的太平洋——尤其是菲律宾群岛（现在这里已成为美国海军针对中国的桥头堡）。马汉总结说，“曾经被认为是想象的事情现在已被国民接受为现实”。共和国的公民重新审视了它的“政治传统的圣经”，发现虽然值得尊敬，但不可否认它已落伍。^② 看起来，所谓的马汉主义战略需要一个马汉式的威胁来团结公众。

全球化世界下的战略制定

马汉可能会同情现在的海军将领们。第一，和内战后的海军一样，现在的海军面对着这样的战略环境，即传统的海军竞争不可避免，但威胁尚未完全形成。关于海军的争论仍然是抽象和推测性的。第二，马汉的战略分析集中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敦促美国保卫其通向亚太地区的“大门”。现在的海军则面对世界范围的挑战，而且只要美国自认为仍是海洋安全的守卫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1907; repr., New York: Da Capo, 1968), 267 - 268.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8 - 12.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02), 8 - 12.

者，那么它将一直面对这种世界范围的挑战。第三，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还没有像强劲的敌舰那样强大，因此像海盗、武器扩散这样的挑战只需要大量的舰队、飞机和监视装置来对泛滥地区加强管制就可以了。主力舰没有必要用来与海盗或者贩卖武器的人作战，因为他们没有控制海洋的需求和能力。海军和海洋护卫队行使这种警察职责时，数量大是优势的准则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像美国这样既把本国当成海洋航线的托管国，又把与竞争者进行斗争当作防御的国家，其难处在于如何更好地分配稀有资源。在行使海洋霸权的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实力。这种辩论并不新鲜。《哈珀》的编辑、反帝国主义者卡尔·舒尔茨在诺曼·安格尔之前，于1897年做了预测，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任何和平的胜利都不如战争的胜利那样伟大”是一种自我防御性的观点，他指责罗斯福对战争的狂热忽视了超级大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罗斯福或马汉的这种“进攻性的言论”是一种纯粹的胡言乱语。“由于我们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加之大国之间的相互警惕”，和平一定能实现。美国远离大国间的冲突，因此“只拥有较小规模的海军就能履行海上警察的权责”，除此之外，美国民众会欣然接受这种毫无武装的和平。^①

过去和现在一样，华盛顿的困境也有其特殊性。海盗这样的威胁在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等地区还是存在的，但它远离美国政府和民众的视线。相反，引起人们日常关注的、能够与美国进行海上竞争的对手还未出现，甚至都还不存在。来自中国的强大威胁尚无征兆，或者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幻想。借用马汉的话说，现

^① Carl Schurz, "Armed or Unarmed Peace," *Harper's Weekly Magazine*, June 19, 1897, 603.

在它还只是抽象意义上的，这加大了政治家、策略家和军事规划者的工作难度。

我们看到中国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来美化她的崛起，把她的崛起描述成惠及亚洲各国的好事。中国的领导者试图使所有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海军威胁都始终维持在抽象阶段，希望这样的做法能使美国放弃重建其海上实力。中国方面充分地利用了西方学者和国际事务实践者的理解。西方人日益认同诺曼·安吉尔关于世界已大大超越权力政治的观点。这样看来，像战舰这样的武器就是没有用的。^①除非北京方面使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否则没有什么能像美西战争、太平洋战争和冷战那样使美国对海军冲突有更具体的认识。

这一战略问题体现了朱利安·科贝特（Sir Julian Corbett）爵士的智慧。科贝特打包票说，不受约束的公海才是常态。马汉所设想的在海上横扫敌人舰队的“压倒性权势”的覆盖范围由于占用大量资源而不能持久。^②2005年，前作战部长（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ke Mullen）海军上将显然也

①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For America, the Age of Geopolitics Has Ended and the Age of Global Politics Has Begun,’” *Boston Review*, February/March 2005,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186/>; and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2003). 其他持有相似观点的，包括例如 Joseph S. Nye,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②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1911; repr., intro. Eric J. Grov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91–94.

在资源不变或减少的条件下，增加作战要求的战略调查的基础上做了相关总结。保护舰队的关键是在把他们部署于战略要地的同时也有能力在尽量广阔的海域投放力量——就好像科贝特希望海军舰队能够通过公海上的灵活集结到达指定海域。^① 对于麦克·马伦海军上将而言，实现科贝特想法的最好办法就是哄骗盟友加入非正式的“千舰海军”或航海联盟。千舰海军——由于别国官方认为“海军”一词暗含其他国家必须服从美国的命令而反对使用“海军”这样的字眼，因此更名为“全球海上合作伙伴关系”。是保证在所有重要水域和空域内都能提供足够资源的唯一办法。^②

下面来看一下亮相于海军战争学院，并轰动一时的2007年海洋战略。2007年10月，大约有1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将领和海上防卫专家聚集于美国纽波特（Newport），共同探讨该战略的优点与不足。《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是美国海军部、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共同签署的关于目标的简明声明。如果我们同意科贝特将海洋战略看作决定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之间关系的艺术，那么这个合作战略堪称是美国真正的“海洋”战略，因为它不止包括了作战部分，还包含了政治功能。

该战略最值得夸耀的是“集合了美国所有的海洋力量——

-
- ① 对科贝特而言，舰队的集结，是基于大英帝国海军历史教训的“一种习惯”。而“分散实力”，他坚持认为“只有超越了良好组织的限度之外才会有害”。Ibid., 131-132, 134。
- ② Geof Fine, “‘Global Maritime Partnership’ Gaining Steam at Home and with International Navies,” *Defense Daily*, October 25, 2006, http://www.navymil/navydata/cno/mullen/DEFENSE_DAILY_25OCT06_Global_Maritime_Partnership_Gaining_Steam_At_Home_And_With_International_Navies.pdf.

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共同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海洋战略”。^①事实上，1986年的海洋战略只是一个海军战略，是由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詹姆斯·沃特金斯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P. X. 凯利上将共同撰写并发表在不加密的论文集《方法》中的。之后的战略文件例如“由海向陆”（1992）和“前沿……由海向陆”（1995）都是由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连署的，以此体现海军部门共同的战略视野。^②

探究某一位官员为什么签署了这份文件而没有签署另一份文件的原因非常重要，对此，我们不妨稍作推测。的确，2007年的海洋战略第一次将美国海岸警卫队包括进来，这预示着打击海盗、防扩散以及其他类似的执法行动被纳入海军的任务。该海洋战略是唯一一份由三个军事力量首长签署的文件。与之前的几份文件由海军部长批准相比，这份文件没有政务官签名，原因何在？

首先，是现实情况。与之前的战略不同，2007年战略的主体包括了海岸警卫队（国土安全部的一个组成部门），而不只是国防部。发布一份联合文件可以引发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常见的沟通问题。通过掌握战略的所有权，这几位部门首长就可以避开复杂的，甚至是旷日持久且令人不安的过程，从而使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的内阁部门在目的和原则上达成一致。

其次，这个文件的影响力可能远远不止在布什政府时期，因

①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 C. : Department of the Navy, October 2007), <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 3.

② U. S. Secretary of the Navy, “... From the Sea,” September 1992,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vy/fts.htm>; U. S.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ward...from the Sea,” 199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vy/forward-from-the-sea.pdf>.

为它不仅会左右其他国家的态度——不论其是否有能力赞同或反对美国海军战略，而且也会影响布什之后的下届美国政府。海军部长唐纳德·温特将会在战略发表后约一年离开五角大楼。如果温特是这一战略的最后批准人，那他肯定缩短了这个战略的保质期。新任总统将把其前任的政策束之高阁，然后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策。当总统之位在两党之间易手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若考虑到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所制定的那些备受争议的政策，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了。将领们也许觉得，如果不让布什政府染指该海军战略，那么他们的战略观可能会为新政府所接受。

这就能解释将领们为什么决定在 2007 年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公布这一战略了。他们希望能够在布什第一任时的对抗性立场、第二任时的较为缓和的立场之后设定一种新的立场。事实上，《合作战略》的策划者已经为一个持续性的战略方法奠定了基础。虽然强调某些变化，但坚持守卫全球体系、保有足够数目的战斗力，并把战略关注重点转移到亚洲地区，这些战略原则迎合了奥巴马政府的主张。这无非是权力政治和体系问题的持久性而已。

以上就是 2007 年海洋战略的起源。撰写者指出，这份战略的制定不同于以前的“闭门造车”，而是在公众的广泛关注之下制定的，在“与国民对话”期间，美国海军代表团四处征求公众意见。^① 公众的反应表明，美国人民希望军事力量继续强大，并与盟友共同防止战争，并全力以赴保卫国土。海洋战略的经久

① Karl Walling, "Why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ountry? A Backward Look at Some Forward - Thinking Maritime Strategists," *Joint Force Quarterly* 50 (3rd quarter 2008), http://www.ndu.edu/inss/Press/jfq_pages/editions/i50/28.pdf.

力，以及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海军说明了什么呢？

马汉担心美国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政府会阻碍海洋力量的发展。美国国土横跨了一个大陆；像法国一样，具有令人骄傲的宜人气候和丰富资源。这种优越的条件可能会导致美国分心，不能专心追求海上实力。法国人在与英国海军的竞争中一次次失败，这种耻辱的结局警示了美国“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海军衰落”意味着什么。^① 这与相对贫瘠的英国发展海洋实力，努力寻求贸易和财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② 或者，就像马汉所设想的，美国有可能步海权黄金时代的荷兰之后尘。当时，占荷兰统治地位的商人不愿意提高税收，阿姆斯特丹在面对贪得无厌的英国人时，“不会”为维持一支足以支撑世界地位的海军“买单”。^③

美国也许会成为下一个法国或荷兰，在争夺海权的斗争中失败。以马汉的指标看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一些因素。他认为，“如果海洋实力必须依赖于稳定发展的商业繁荣，那么人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必然高于对发展海洋的追求，这是所有原则中的重要特征”。^④ 尽管会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但是美国仍然有着健康的商业，这种商业依靠二战后它所支持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来实现。夏威夷和关岛作为美国领土，是美国军队在第二岛链中的坚强要塞。然而，确保美国力量投射到第一岛链，则涉及如何灵活处理与日韩等国的同盟关系。单从海上力

①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76.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39, 53 - 54, 70 - 82.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38, 49, 68 - 69.

④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1890; repr., New York: Dover, 1987), 50.

量考虑，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力量，但是美国籍的商船队则稍显落后，大量美国商品由其他国家的货船运输。因此，美国是否还能在亚太地区维持实力尚未可知。

因此，海洋战略需要巧妙地处理与其亚洲受众之间的战略沟通问题。战略的起草者避免提出任何一个对手的名字，而且事实上也做到了（中国并未出现在文件中）。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如果这一战略旨在提出今后十五年的行动原则，那么提出一个新的对手便有违于其进一步加强与原有盟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的理念。例如，北京方面仍然对防扩散安全倡议无动于衷，把它作为下一个重要敌人的做法可能会导致这一倡议的失败。

不管怎样，海洋战略都不是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合适场合。五角大楼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该报告连续更新对解放军军事潜力和不断变化的战略评估。在十年内，中国海军实力基本上达不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海军所拥有的全球投送能力。例如，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根本无法和 1975 年反映了莫斯科的蓝海实力的 Okean 海军演习相提并论。除非中国的行动表现出其威胁，海军将领们没有必要制造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避免弄巧成拙的行为是合作战略框架的核心。

对中国实行安抚政策的消极影响是有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尤其是日本担心华盛顿会越来越倾向于与中国和解。东京在很久以前就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将其国家安全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最新的《日本 2009 年防卫白皮书》认为，“鉴于本国的人口、领土和经济状况，日本若想单独负责本国防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仍将与世界军事霸权国——美国，保持盟友

关系”。跨太平洋联盟构成了“日本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① 由于将自身命运完全系于美国，日本领导人对美国政策和战略上的任何微小变动都十分敏感，时刻警惕任何被抛弃的迹象。

但是，日本战略界对于中国的未来，以及如何处理与这个巨大邻国的长期关系极为矛盾。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是非常明确的。那些主张继续采取对华接触政策的人或许是出于中国明显缺乏海洋战略这一考虑。他们担心美国制定的海洋战略会刺激中国，增加日本的风险。如果（美国的海洋战略）导致一个海上对手的出现，那么东京将不得与华盛顿保持距离，并试图发展本国更为独立的对华政策。反过来，美国则需要盟国彰显军事存在，维持在该地区的霸权。同时，不安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者们指望美国在本地区制衡中国。对中国的过度敌视和防备会损害 1945 年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海洋秩序。由此可见，形成能够维持亚洲微妙平衡的政策绝非易事。

海洋战略的几个方面需要认真审视。撰写者首先注意到了全球化世界中相互联系的特点。他们支持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和已逝的英国外交官爱尔·克劳（Eyre Crowe）等人的观点，强调体系的维护是国际公共产品，会使所有海洋国家受惠。^② 通过在过去六十年里提供海上安全，美国海军使美国合法地统治海洋，正如英国皇家海军之前给英国带来合法霸权一样。正是由于

①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2009,” Ministry of Defense Web site,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09/Part3-chap2.pdf.

② Joseph S.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no. 2 (April 2002): 238; and Eyre Crowe,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January 1, 1907,” in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 3, *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 1904–6*, ed.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27), 403–417.

(这一战略)出于海军战争学院研究机构之手,因此海洋战略带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就不足为奇了。^①而且,虽然全文未提及马汉,但是,就像第一章提到的,文件却与马汉关于商业的首要地位的著作在基本方面保持一致,因此认同他有关海权的大逻辑也不足为奇了:

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其他重要利益越来越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只有维持由全球贸易、金融、法律、公民和治理组成的相互依赖的全球体系的稳定,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各国都在这一体系下进行交换,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一系列破坏产生连锁性的、扩散性的危害效应时,这个体系会很脆弱。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违法以及自然灾害——所有这些都很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的繁荣发展。^②

虽然军事部门负责人坚持沿用战争手段,但是2007年的海洋战略认为,战争——不论大小——都会损害现有海洋体系,而不是直接威胁美国海上霸权。而且,该战略还把战争归为不幸之列——这些不幸不止包括威胁(使对手的能力与意图联系在一起,因而更有挑战性),还包括自然灾害、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不均衡发展以及不属于人类行为产物的其他现象。为避免战略中所提到的这些现象产生的二、三级影响,就可能在无数意外面前

① Peter Dombrowski and Andrew C. Winner, "The U. S. Maritime Strategy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Seapower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February 2008.

②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4.

采取行动。在追踪“相互联系的有害效应”，消灭其源头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

显然，这和里根时期以敌人为中心、保证无事故发生的战略图景完全不同。冷战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而2007年海洋战略传达出的信息是，所有国家都是现行体系的利益攸关者，各国应该共同努力维护这一体系，提供海上自由这一公共产品。在此过程中，海上的联合行动能够“在一个开放、多极的世界中，通过面对共同威胁和维护相互利益的集体安全行动，建立国家间的互信”。海洋战略认为，各国在功能领域内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有助于培育一个更为健康的世界体系。文件中的关键段落把海上职能分为六个“战略举措”。

在紧张地区或我们承诺向盟友保证安全和稳定的区域，美国将会集中部署海军力量，使得美国有绝对的战斗力量去限制地区冲突、阻止战争爆发。如果阻止失败，美国便会参加战争。此外，美国强大的、能够完成各种任务的海军实力将布置于全球各地，以便能够更深入地保卫本土。这种分配也是为了培育和维持与一切能合作的伙伴进行合作，阻止或缓和地区冲突和危机。^①

不严格地说，这意味着海上职能部门能够快速遏制他们的战争准备，防范传统的军事冲突，同时磨炼他们在警察职能、国家建设和海军外交等类似领域的的能力。这一海洋战略主张，根据技能和能力来对战斗力量和安全力量做灵巧的功能区分。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可能会发现，他们要暂时承担以上

①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8.

所有职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当年希腊海军在公海战斗时，政治领袖一声令下，海军必须攻击商船或为商船护航，同时还要打击海盗。

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实现如此多的目标呢？2007 海军战略指导海上服务去实现六种“扩展性核心能力”，即前沿军事存在、威慑、海洋控制、离岸投射能力、海事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反应能力。为了具备这些能力，该战略要求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必须提高自身之间以及与盟国之间的协调，必须提高海洋领域的认知和情报、监测以及侦察能力，必须使本国民众随时准备应对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剧烈变动的战略环境。关于控制海洋，将领们是很坦率的：

我们控制海洋的能力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没有哪个挑战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潜艇——不论是柴电动力还是核动力——这个挑战更显著。因此，为了抵消这一威胁，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战术能力、加强训练以及加快技术进步。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海军丧失海上机动能力和海上通道的通行自由，更不允许某个对手通过封锁关键海上交通和商业航线来打破我们的全球供应链。我们必须能够在必要之时强行控制我们想要控制的一切海域，当然理想状态是与我们的朋友与盟友一起控制，但是如果迫不得已，我们自己也要能做到自由控制一切海域。^①（本文的重点）

这份文件是一份马汉式的海军备忘录，直截了当地将目光集中于亚洲。该文件特意提到潜在敌人的能力，即尤其值得注意潜

^①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13.

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常规动力和核动力水下力量积累了巨大力量的海权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军已经新推出了三个级别柴电力潜艇（基洛、宋、元）和两个级别的第二代核动力潜艇（“晋”级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和“商”级攻击核动力潜艇）。上文所述也许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海军现代化是美国海军制海权的最大挑战。如果将对手是否具有开发和操作大量现代潜艇的能力作为衡量其是否威胁美国控制海洋的因素的标准的话，那么，显然中国的威胁比较大，甚至可能是最大的。

合作战略坚持认为，“海洋控制战略的关键是保持强大的舰队——军舰、飞机、海军陆战队以及近海防御舰队——从而能够有选择地控制某些海域、维持离岸投送军事力量，以及保护盟友军民免遭攻击”。这是在前沿部署海军的用意之一。“美国将会继续在西太平洋、阿拉伯湾和印度洋保持可信的军事力量的存在，用以确保一直向盟友承诺的地区安全，并阻止潜在敌人和竞争对手的出现”。^① 这和马汉最好战的观点十分相似。

此外，这一海洋战略几乎没有涉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军事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应如何设计。海军部门领导人将目光主要投向马汉的第一个三叉戟，因为这一特点符合该战略的合作特性。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一战略试图建立基于美国领导权的海上力量的逻辑，其对象主要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在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按照这个海洋战略建设美国海军，并不能给国际社会传递一种令人满意的信息。现在仍然无法预测哪个国家将站到哪个阵营。因此，海军部门的领导人貌似很乐意让关于海洋战略和力量协调的辩论在国内外继续下去。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马汉

^① U. S. Navy, Marine Corps, and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9.

的第二个三叉戟会随着具体事件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华盛顿从其他国家获得支持的种类和大小。

对合作战略的批判

当回顾了专家对 1986 年和 2007 年的战略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分歧。1986 年战略是一份明显的文法性文件，对其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像米尔斯海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珀森（Barry Posen）这样的学者。而迄今为止，对 2007 年战略（一种海权逻辑的声明）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现役或已退役的军人，例如已退役的海军军官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和简·范·托尔（Jan van Tol）。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家们可能将关注投向进行遏制所需要的操作性努力，这是进入核时代之后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军人们抱怨说，2007 年的战略根本就不是一个战略，因为该文件并没有提出应对原则（类似 1986 年战略授权指挥官可以对在其本土水域发现的苏联海军进行打击）、资源分配或者详细的飞机和军舰数量，没有任何指导意义。2007 年的战略文本缺少像里根时期的六百艘军舰那样详细的内容。

罗伯特·沃克曾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的副主席，2009 年 5 月被任命为海军次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在奥巴马政府获得如此重要的职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对 2007 年战略的批判。2008 年，他和简·范·托尔，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官员，评价说，这一战略是海军部门寻找的“海军圣杯”，以代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海军官员中有广泛影响的马汉的“地理因素论”，但是它没有遵循打败日本帝国的启示，因而使得美国战略

家缺乏明确海上对手。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目睹了世界海军的消亡，重新确立了马汉的进攻主义传统。

合作战略的作者们提出三个指标评估任何后继的战略效果：必须能给执行者可以实施的指导；必须能给出明确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获取公众与精英的支持和资源；必须能够“被美国海军的同盟所接受，即使他们不完全同意或支持这一战略”。沃克和范·托尔认为，按照这些标准来看，对合作战略的评价褒贬不一。像罗伯特·卡普兰这样的权威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官员对它赞赏有加，但是美国的海军、国会和民众对它反应冷淡。^①

沃克和范·托尔首先质疑该战略是否能被称为战略。显然，他们所做的分析中使用的战略概念是采用了五角大楼的出版物——《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而非任何有关战略理论的巨著。他们认为，合作战略有效地指出了目标和方法，但同时也认为，“这一战略和美国很多的其他战略一样，存在着过于关注目标、次级目标和核心能力却忽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次级目标的问题”（他们的重点）。更糟糕的是，“这一战略缺乏对实现其途径和目的的必要手段，或者说根据该战略设定的优先权分配资源所需要的实质性讨论，这使得它不能被称为战略。事实上，这个新的战略根本忽略了特定资源的影响”。^②正是由于没有对资源需求进行细致说明，没有做到使手段与目的相匹配，这个战略不符合标准。沃克和范·托尔承

① Robert O. Work and Jan van Tol,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March 26, 2008), 1-3.

② Robert O. Work and Jan van Tol,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March 26, 2008), 4.

认《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的重要性，但他们将其描述成一个战略性概念而非一个战略。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来说，战略是“军事力量应当如何、何时、何地保卫国家，使之免受某些对其安全的威胁”。^① 由于缺乏指导性概念，因此海军部门发现它从智力角度、道德角度和物质角度都是毫无头绪的。

同样地，沃克和范·托尔发现，“从宏观来看”，这一战略“很好地”将2005年《防务审查报告》和2006年《国家防御战略》中关于合作主题的内容展示出来。^② 但是，这一战略忽略了很多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很多读者都发现，文件的撰写者认为，崛起的中国仅仅是潜在的海上竞争者，而为潜在的对手制定反制战略是没有必要的”。避免使北京成为敌人这一正确的目标并不能作为“三个海军部门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地认识到中美两国明显处于海军竞争的边缘这种状况的借口”。^③ 他们认为，如果缺少关于中国的分析或者美国将要发动什么样的战争的讨论，那么海军和国会将会根本无法确定战略优先权或者分配资源——尤其是在海上的非传统威胁处于低潮阶段，很难确定客观的措施。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分析家暗示，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华盛顿在实施这一战略时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他们指出，足以合情合理的是，机密版本的规划可能增添了某些他们曾批评的该战略所忽略的细节。然而，海军领导人坚持说这一战略没有机密版本。严格说来，这种看法是对的。不过相当现实的是，像海军作战理念和海军战略构想这样的具体文件确实在解决像如何与中国

①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483.

② Work and van Tol, "An Assessment," 12.

③ Work and van Tol, "An Assessment," 20.

作战这样的争议性问题上有所帮助。外国领导者对签署全球海上伙伴关系倡议心存疑虑，这是因为他们怕签署之后，在分工合作中，美国负责全球海上战备，而自身则会被要求履行警戒职能。如果这样的话，其他国家或真或假地成了美国行为的共谋。外交文本中的陷阱使读者们不得不仔细品读，这样他们可能会读出起草者原本没有的意图。^①

海军军官和官员们并没有用这种方式分析过海洋战略，不过辩论中有明显的克劳塞维茨式声调。特别是在缺乏明确威胁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或者军队有可能制定出合适的计划吗？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它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基于能力的计划”这一辩论中提出，这个计划概括出了美国要应对所面临的威胁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如果海军领导者们故意不关注中国的崛起，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认为，美国不需要具备占优势地位的舰队？主张积极承担责任的官员们尤其不希望建立强大舰队的理论被淡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当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出现时，便会毫无准备。他们明白，对手改弦更张很容易，但是若想在一个已经衰弱的时代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则相当困难。这是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现实。

对海军战略的地区性反应

合作战略将如何与主要舞台——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关键受众互动呢？同战略的外交本质相一致，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官员和学者们都慎重地做出了回应。尽管这一战略事实上改变了日本已经加入的防扩散安全倡议及其他集团中的合作方式，

^① Work and van Tol, “An Assessment,” 25.

如美日导弹防御合作，东京仍然做出了一贯的缄默反应。海上自卫队为了支持“争取持久自由”行动而履行印度洋的加油任务，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行动，这都说明日本愿意遵守文件中规定的原则。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为战略中只字未提中国崛起和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而担忧。对他们而言，这个战略很像华盛顿将会对北京采取安抚政策的前兆。他们担心这意味着美国降低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地位，甚至，美国将要和日本解除同盟关系。^①因此，这一战略使日本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文件所强调的保持良好的海上秩序与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国际和平支援行动”相吻合。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明显沉默证实了日本长期关注的问题，即美国对日本所面对的最头疼的地区安全挑战过于乐观了。

大体来说，安德鲁·埃里克森所说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复合体”对这个战略持赞赏态度，但对美国的诚意持保留判断。不过大多数人，比如外交学院的苏浩认为，这一战略给美国的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欢迎他重点防止战争，并称赞他认同作战任务，正如第六章讨论的，一种中国近些年所拥护的操作模式。^②但是，持批评意见的人也存在。国防大学的王宝付从美国海军坚持“海洋霸权心态”追溯到马汉主义思想，他认为虽然美国的海军战略几经变迁，但是事实上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实现

① Dombrowski and Winner, “U. S. Maritime Strategy,” 11 - 13.

② Andrew S. Erickson, “Assessing the New U. S. Maritime Strategy: A Window into Chinese Thinking,”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36, 38 - 39; and Su Hao, “The U. S. Maritime Strategy’s New Thinking: Reviewing the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70.

海洋战略的马汉方式。^①

很明显，王宝付从文法措辞上思考，认为美国仍然实行残忍的海上战争策略。同时，他也考察了战略通过交流逐步成型的过程，但是他对此做出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解读。他提出“某些人与军事工业利益集团”炮制出了“‘中国海军威胁论’或‘俄罗斯海军威胁’观点”，并以此进行游说，从而获得更大份额的海军预算。^②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陆儒德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合作战略的提法非常好，但是关键要看美国是否能践行这些原则。陆认为战略中提到的“阻止潜在的竞争者”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他否认海洋战略已经改变了潜在事实：“很明显，‘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没有改变美国主宰世界海洋的目标。美国仍然企图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来控制全球海域，实行全球部署，会继续挥舞手中的军事大棒来‘阻止大国之间的战争’，进而维护其全球海上霸权”。^③ 他似乎表达出中国对海军战略的某些想法，主观认为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美国仍在试图用其“岛链防御”对它所提到的战略对手进行牵制。^④ 正如前面章节中所

① Wang Baofu, "The U. S. Military's 'Maritime Strategy' and Future Transformatio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62 - 64.

② Wang Baofu, "The U. S. Military's 'Maritime Strategy' and Future Transformatio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66. 值得注意的是，以托马斯·巴内特为代表的一些美国观察者，指责五角大楼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寻求获得更多的国防预算。巴内特强调，中国已经成为先进国家的和平王国中的一员了。See T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tnam, 2004), 62, 108, 152, 169。

③ Lu Rude, "The New Maritime Strategy Surfac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58.

④ Lu Rude, "The New Maritime Strategy Surfac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4 (Autumn 2008): 57.

讲的，岛链和遏制战略是中国的噩梦，因为它们使中国联想到自己在海洋上的软弱无力。中国的分析家非要在今天的战略中找到迪恩·艾奇逊“太平洋周边防御”的影子，而艾奇逊的战略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事实上，这种关于美国海洋战略的矛盾看法在这一政策出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中国分析家从马伦海军上将 2005 年提出的“千舰计划”中解读出美国是别有用心（就好比印度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海盗行动不怀好意）。杜朝平对美国海军提出了尖锐的抨击：“冷战结束后，美国军队谋求霸权的野心越来越大，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意识到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缺乏盟友的合作与支持很难负担不断扩张的欲望。通过建立‘千舰海军’，美国便将其盟国组成一个统一的舰队，这样就能使舰队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的目标”。^① 备受尊敬的军事分析家李杰指出了美国推进“千舰海军”的四个可能动机，分别是：①借助他国的海上军力，来分担自己日益捉襟见肘的军费不足；②利用各国熟悉周边海域海况及相关地形的优势，协助美国海军在不同的海区更好地对付恐怖分子；③借更深入细致地对付恐怖分子之机，探测与了解他国或地区相关海域的水文、气象等资料信息，以便为美今后平时和战时服务；④增加信息沟通，建立联合指挥体系，以保证美国随时能可靠地介入地区事务，实现快速反应。^②

中国的观察者发现，美国推行这一费用分担项目最主要是出于财政考虑。例如，他们拿五角大楼为北约盟友制定的不合时宜

① 杜朝平：《与狼共舞——美国“千舰海军”计划与中国的选择》，《舰载武器》2007年第12期，第25~26页。

② 李杰：《“千舰海军”的玄机》，《兵器知识》2007年第2期，第44页。

的“百星计划”相比较，标注它只是增加发展新空间技术的财政负担的一项粗糙的计划。^①于是，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所倡导的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不能增强实力，反而成为软肋。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教训：美国希望他传达的东西可以全部传递出去，但对于信息接收者如何去解释无用。

印度方面如何评价“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呢？2008年，一名印度海军军官告诉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加里·拉夫黑德，印度海军上下已经详细研究了这一战略，认为“没有一个字是不恰当的”。^②这样的说法稍显夸张，但是印度方面大体上对这一战略持欢迎态度是毫无疑问的。前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指挥官古佩特·库拉纳（Gurpreet Khurana）也在暗示，面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事态，这一战略是有利的。^③战略中强调消除全球贸易、商业和交通网络中的威胁是促使印度持积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符合印度的主要海上利益。同时，这也是向美国表示，它希望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由该战略看来，大概是15年左右，在印度洋海域保持可信的军事存在。库拉纳认为，这种前沿部署能保证美国对其友国和盟友的承诺，也能防止未来的对手采取不利行动。而且，像马拉巴尔这样的联合演习能够使新德里对北京产生威慑作用。

而麻烦的标志呢？虽然新德里多次表示赞成世界多极化，“但这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因此它不断迎合美国来设计自

① 杨承军、孙毅：《百星计划——快乐并痛着》，《兵器知识》2007年第8期，第22页；刘德胜：《“100卫星项目”可能无法如期工作》，2007年6月19日《解放军报》，OSC - CPP20070619702001。

② Author discussion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 I., August 8, 2008.

③ 本节内容节选自詹姆斯·霍姆斯与Gurpreet Khurana之间的电邮通讯内容，September 28 - 30, 2008。

己的温和形象。目前看来，美国权力的继续存在是“全球和地区安全所必需”。但是，美国必须避免塑造“霸权印象”——传达欺凌弱小的信息。这会“对印度在地区的形象产生外溢效应”。若美国的一些举动遭到国际社会的集体反对，便会损害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也会因为印度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影响到印度的软实力。“不一致行动”会在一定条件下使两个国家的海上合作破裂。即使是表面看来无害的类似反海盗这样的行动也有可能产生问题，比如，若美国决定在索马里海岸发动打击行动，但这样的行动会给索马里人民带来灾难。

总而言之，库拉纳认为，“美国的这一战略与印度目前的海军实力和战略考量很是契合”。它有可能是两国长期成为海上友好伙伴的基石。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好名声，妥善解决可能恶化美印关系的争议事件，对印度执行这一计划在政治及其他细节问题上保持耐心将是这一计划成功的关键。虽然这一海上合作战略体现的逻辑是合理的，但是两国在规则上偶尔的不一致也会使印度稍有迟疑。

那么，看起来，对亚洲的基本共识是：亚洲的海军正处于过渡阶段。美国仍然控制着海洋，但是它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于潜在对手的优势正在下降。东京方面担心海洋秩序可能处于变动期，而美国对它的安全保障变得越来越脆弱。对于印度而言，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是稳定剂，它维持着大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均衡。新德里方面感激于美国霸权为自己带来的战略性假期，因为这可以使印度从容地发展海军实力，而不用制定速成的发展海军规划，避免与发展经济发生冲突，而发展经济才是新兴大国的首要任务。

目前看来，中国也承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至少目前是这样。正像对印度那样，这对中国也有好处。只要美国海

军仍然是海上安全的管理者，中国海军就可以继续舰队实验，可以用自己的舰队和战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如果美国想要保持与印度的长期伙伴关系，想要在共同利益上与中国合作，想要履行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承诺，那么，加强自身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仍将是美国跨太平洋关系中的主要支柱。

对两个战略的评价

以上论述有什么指导意义呢？面对 1986 年海军战略与 2007 年海军战略两个战略的异同点，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亚洲海洋格局中应该怎样制定和调整战略呢？首先，这两个战略基于不同的分析层面。1986 年战略的受众是执行层面的指挥官，它符合克劳塞维茨的海军观念，或者说与马汉关于舰队战术的论述一致。2007 年的战略倾向于大战略层面，符合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与马汉的海权哲学相契合，也符合亨廷顿关于战略概念的定义。我们在第六章验证了水下威慑与海上反介入的相互影响，同理，战术层面与战略层面也是相互影响的。正如战略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自我矛盾的，沃特金斯 - 雷曼战略也是从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试图改变核均衡。这使大战略包含了具有攻击性的海军战争视角。即使合作战略没有论及具体的执行层面和策略层面，很明显它的目的也是管理这些问题。这是战略家们需要谨记的另一个会相互影响的小层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后果。

一个对手透露了焦点，而另一个领导热衷坦率地认定和制定对抗对手的计划，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战略家们的分析难度。1986 年的战略就是这一状况。但是，当时的战略和现在的战略在内容上存在巨大差异。当沃特金和雷曼推行他们的新计划时，苏联的威胁正盛。但是 2007 年战略的起草者就没有这么幸运。合作战

略本身可以塑造一个“中国威胁”，甚至去决定究竟需不需要出现一个威胁。试想，1986年战略怎么能在发布之前就影响到1960年左右莫斯科的战略辩论呢？当时，戈尔什科夫上将还没有提出筹建舰队、苏联海军还只是一个小麻烦。最有可能的是，宣称美国军队试图在其所属水域击沉苏联舰队的战略，增强了戈尔什科夫上将与陆军和空军争论的战略性和为戈尔什科夫的有力论据。

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关于战争的言论可能会导致莫斯科在海上采取更具有进攻性的立场，这是苏联压倒一切的保卫蓝带的战略偏好。这就使得华盛顿的战略选择更有难度、更加复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最初阶段更新1986年战略会在亚洲水域产生反作用。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讲到的，中国努力营造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和平形象。一份好战的美国文件可能会破坏中国领导者的政策安排，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领导可能会表现出倾向于温和、调解性的政策选择，但实际上很可能会加强政府的强硬性。正如安德鲁·埃里克森在海洋战略发布不久所提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也许已经认为，美国的海军实力与野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美国仍然试图挑战中国的国家利益”。^①

然后，可能从语言角度来解读美国的海洋战略，不仅会使中国在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增强关键部分对美国防备的倾向性，而且会使两国更不可能成为合作国。中美之间的敌意可能产生的后果尚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以中国为发起国而制定的关于战争的策略必然会阻碍海洋合作。我们始终要谨慎对待非正

^① Andrew S. Erickson, "New U. S. Maritime Strategy: Initial Chinese Responses," *China Security* 3, no. 4 (Autumn 2007): 45.

式声明，因为与中国直言相待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将增加双方的敌意和竞争，若使 1986 年战略再度生效，那么亚洲的海洋战略环境将会恶化，这将会对盟国和其他国家产生同样的警醒作用。

然而，在一定条件下，战略声明本身已经成为战略制定国与敌对国、同盟国和中立国互动的一部分。粗心大意的表述等同于弄巧成拙的行为。1986 年和 2007 年的战略都是战略交流的一种演练。战略交流的对象相当于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大致可以分为政府、民众以及军队，而且每个行为主体对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感兴趣，再加上国际主体如联合国安理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也对海洋事务感兴趣。很明显，随着行为体的不断增加，战略交流变得越来越复杂。1986 年海洋战略的逻辑相对简单，集中于美国、苏联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7 年的海洋战略试图把所有国家囊括进一个海洋战略，因此要复杂得多。由于 2007 年的海洋战略只提出了原则，没有具体规定，因此，这一战略可能比 1986 年战略更有持续性，更能适应像亚洲这种权力架构和利益尚不明确的地区。

其结果：坦诚很需要，但也有其误区。西奥多·罗斯福很喜欢引用西非的一句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但是，甜言蜜语并不等于掩饰矛盾，如中美海军竞争。考虑到中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应该利用传统海军冲突来缓解昂贵设备如航母和“宙斯盾”级驱逐舰的压力，以获取对亚洲各国领导地位，美国的做法也确实如此。对于战略交流家们而言，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中最糟糕的一种。无论华盛顿方面说什么，历史经历都使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对美国的海洋权力十分怀疑。一般的规则是，美国最好就正确使用海上权力能够轻声细语——同时坦诚地给予表达。

第九章

谁掌握着三叉戟？

2009年8月，兰德公司出版了一部分析台湾海峡军事平衡的专著。此书使用战争游戏模型，设定了一个高强度的入侵场景，以此来说明海峡两岸对峙中军力的相对平衡。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报告代表了对兰德公司在十多年前所完成工作的诚实的、全面的重新评估。本书的五位作者中，有三位来自原来研究的同一团队，这有利于跟踪美国最优秀研究机构的观点和态度的演变过程。该团队的新研究结果令人耳目一新，它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基础，对中国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选择和作战效能进行了反思。

兰德公司的报告警告说，中国的大型现代化导弹和空军力量很可能对台湾本土及制空权的努力构成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分析家们认为，针对台湾空军基地的大规模弹道导弹密集轰炸，将严重削弱台北出动足够战机架次以争夺空中优势的能力。他们称，“随着中国海军跨台湾海峡火力打击能力的增长，美国和台湾将越来越难以保护台湾岛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免遭严重破坏，并且不久以后将彻底无法做到这一点”。^① 由此，作者认为，中

①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Toy I. Reid, Murray Scot Tanner, and Barry Wilson,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9), 126.

国大陆凭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有能力去压制台湾和当地美国空军基地严重威胁保持海峡制空权的防御能力。^① 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已不再有把握能赢得夺取制空权的战斗。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 50 多年来的对峙已发生戏剧性变化”。这一结论发人深省。^②

该报告上述观点与过去大不相同。多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始终认为，台湾的空中优势是抵御中国入侵和胁迫的最终王牌。没有空中掩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水面舰队和两栖攻击部队将彻底暴露于空中打击之下，这使得任何跨海作战即使不是自杀行为，也会充满风险。虽然中国的空中优势并不能保证对台湾军事行动的成功，但北京的胜算在显著提高。因此，这一研究的结果推翻了有关台湾防御的关键假设。事实上，兰德公司的作者承认，“与我们在 2000 年所做的评估相比，前景显然不甚乐观，华盛顿和台北难以做出战略、作战和纲领性决策。对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未来稳定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征兆”。^③ 台湾的地位正在恶化，这在短期作战方面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此外，更根本性的问题是美国对两岸僵局的政策和战略。该报告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结论，即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作战区，再加上中国轻易而迅速地打击亚洲区域目标，可能会使台湾难以维持防御。报告非常

①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Toy I. Reid, Murray Scot Tanner, and Barry Wilson,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9), 139.

②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Toy I. Reid, Murray Scot Tanner, and Barry Wilson,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9), 131.

③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Toy I. Reid, Murray Scot Tanner, and Barry Wilson,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9), 139.

明确地指出：“中美之间的这种地理不对称，加上美国可选择的前沿军事基地有限，并且中国大陆对这些基地发动持续、有效攻击的能力不断增长，使人对华盛顿保证台湾长期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①

下面将此版本得出的严峻判断与几年前发布的研究报告进行比较。2000年出版的报告预测，如果两岸在5年内爆发战争的话，台北会处于更为有利的形势。这些分析家还认为，“如果措施得当，台湾有相当的自信打败中国大陆的空中进攻，防止其成功登陆”。^② 他们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与当时的主流传统观点一致，即整体军事平衡仍偏向台湾。他们断言：“短期内，2005年左右，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任何企图都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事件，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解放军没有把握赢得空对空战争，其舰队也缺乏充分的防空和反导弹防御。倘若台湾在遭受攻击时可以使其空军基地保持运转……则非常可能使北京失去向海峡对岸安全运输大量地面部队所需的空中和海上优势。”^③ 分析再次重申，空中优势在任何对台战役的早期阶段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空中优势，后续的解放军海军部队很容易成为台湾空中轰炸的目标。因此，兰德公司的报告做出以下总结：“北京依靠大规模的空中和导弹攻击，或将进攻台湾作为强制统一的一种手段是不明智的。

①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Toy I. Reid, Murray Scot Tanner, and Barry Wilson, *A Question of Balance: Political Context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Disput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9), 140.

②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and Barry A. Wilson, *Dirg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 S.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56.

③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and Barry A. Wilson, *Dirg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 S.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xvi.

我们的结果表明，这场战争的代价将会极其高昂，对解放军获胜持严重怀疑态度。如果美国积极介入台湾防御（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则台湾对大陆的胜算将进一步提高。”^①（本文的重点）。

在比较分析中，美国的作用最令人困扰。十多年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美国支持台北时，台北就很快能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兰德公司2000年的研究也明确认为，美国象征性的军事援助将挫败中国的企图，阻止中国进攻台湾或对台湾发动高强度的打击。现在，中国军力快速提升的事实提醒美国决策者，美国已经不再拥有无可争辩的边缘优势了。

虽然本书的分析价值并不只局限于台湾问题，但我们认为，有利于台北和华盛顿的两岸军事平衡终结，这反映了更大的地缘战略发展趋势，是与我们的分析相符的。如果北京选择追求更具扩张性的外交政策，那么针对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可能会被运用于实现更大的野心。正如2009年报告中所述，“一个传统上在东亚沿岸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可能对美国作为地区稳定和安全保证者的地位构成直接、艰难、广泛和持久的挑战，这一挑战可能远远超出台湾地区”。^② 通过整个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争夺进入第一岛链的能力，为中国在亚洲沿海以及更远地区开辟了更多的战略途径。根据定义，反介入赋予拒止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进入限定区域，并宣称控制该区域的能力。即使是中国沿海地区受限制的解放军军区也可能会改变地区军力配置。同时，对公域更加稳定的控制将使北京能够支撑其他战略目标（包括其水下威慑态势），并为中国领导层注入更大的信心。控制公域将使

①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and Barry A. Wilson, *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 S.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30.

② Shlapak et al., *A Question of Balance*, 141.

中国政治家在寻求进入权时更有胆量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海域。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无论是增值性红利（轻松进入）还是连续性的红利（进入的范围）都有可能从强制性解决台湾问题的投资中获得。

同样重要的是，兰德公司的重新评估提供了一个修正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方法的机会。由此，我们希望能够预见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引起的一些批评，并说服那些倾向于怀疑中国军事实力的人，他们应该接受我们书中提出的、有关持久性海上挑战的论断。并不是只有兰德公司在 2009 年重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一些著名学者也开始反思北京的海军力量以及中国针对台湾的选择。2001 年，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认为，台北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即使没有美国帮助，也可将中国拒于岛外。罗斯大谈台湾战术飞机的作用：“台湾购买的 150 架 F16 战斗机和 60 架幻影 2000 战斗机，再加上岛内生产的经国战斗机，几乎可以保证其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使大陆失去维持对台进攻作战的能力。大陆仍然缺乏突破台湾沿海防御和占领台湾所需的两栖能力。台湾仅靠自身力量即可挫败大陆的努力。”^① 他同意兰德公司 2000 年研究报告中的观点，并补充说，几乎肯定的是，美国将会救援台湾，如果这样，美国的干预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绝对优势意味着美国军事干预使中国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成本都将是天文数字。美国的传统优势及其强有力的对台政治承诺意味着，美国干预威胁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威慑态势却是不同寻常的稳定。”^②

① Robert S. Ross,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National Interest* 65 (Fall 2001): 70.

② Robert S. Ross,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National Interest* 65 (Fall 2001): 72.

然而，在5~6年后，罗斯大幅修改了这一论点的前提。2006年，他得出的结论是，“北京日益增长的陆基导弹以及在台湾海峡的空中能力，确保其能够在两岸战争中使台湾付出高昂代价……自从美国在1950年首次承诺保卫台湾以来，中国军力第一次能够对台湾的经济和民主造成严重破坏，而不论美国军事干预的水平如何”。^①一年后，他宣称，“美国已不再能够保卫台湾。它无法帮助台湾应对大陆的报复性制裁，也无法保卫台湾不受大陆飞机和导弹的攻击”。^②其对两岸平衡的态度从乐观到颇为宿命论的逆转，是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中转向最明显的。罗斯是有先见之明的，随后兰德公司提供了更具体的研究成果。

两岸军力失衡并不是引发中国问题专家观点发生重大转变的唯一主因。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远远超过西方观察家们一度认为不可达到的水平，他们彻底改变了以前对海军发展的评估。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海军的先驱性著作，他在2001年指出，

即使没有美国海军的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想在东亚占主导地位，海军力量也尚待时日。日本海上自卫队肯定比解放军海军更具优势，韩国海军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即使台湾海军，也是解放军海军不容易打败的对手之一。显然，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北京海洋战略家不会让解放军海军与上述任何一支现代化海军力量进行“一对一”

①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372.

② Robert Ross, "For China, How to Manage Taiwan?" *Forbes*, October 27, 2007.

的对抗。^①

2003年，科尔分析了中国海军在台湾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能力，他对台北的防御仍保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回答道：“解放军海军目前以及在2005年时是否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是的，但是在海军对抗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对台湾海军不会构成威胁；如果美国介入，中国海军更不会构成威胁。”^②但是，到2007年，科尔针对10年后的台湾海峡平衡做出了两个稍有不同、相当悲观的预测。在一项研究中，他改变了以前的估计，声称台湾海军再也无法依靠自身赢得对抗。此时，科尔认为，只有美国的援助才能避免台湾海军的战败。他预言，中国大陆“在海空、水下和水面的海军实力到2016年将明显优于台湾”，并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只有美国对台湾突发事件干预成功才会改变这一推断”。^③

科尔在其第二项分析中得出了更加全面的结论。为了说明他在判断上的转变幅度，有必要更详尽地引用其研究成果。他声称：

到2016~2017年，中国海军作为体现国家实力的重要

①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174.

② Bernard D. Col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LAN and Taiwan's Security," in *Taiwan's Maritime Security*, ed.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London: Routledge, 2003), 72.

③ Bernard D. Cole, "The Military Instrument of Statecraft at Sea: Naval Options in an Escalatory Scenario Involving Taiwan: 2007 - 2016," in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s Security*, ed. Michael D. Swaine, Andrew N. D. Yang, and Evan S. Medeiro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198.

手段，将有能力执行雄心勃勃的任务。台湾问题可能仍然是首要任务，但解放军海军在此后10年[从2007年起]还将有能力使其他国家失去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制海权，并有能力再间断性地控制这些海域……2016~2017年的解放军海军将具备三倍于目前的规模，并将在东亚海军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海上自卫队可能例外）……并将对在这些水域中活动的美国海军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目前的趋势表明，到2016~2017年，中国海军将使北京能够在东亚海域享有霸权。^①（本文标注的重点）

虽然科尔没有界定“霸权影响”的含义，但是他的估计与其早期的看法相去甚远，过去他认为中国连二流的地区性海权都算不上。解放军海军的霸权可能会使北京不仅在台湾海峡，而且在远离亚洲海岸的其他地方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的文献回顾并不是为了贬低中国问题专家同行。预测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们回顾文献的原因是，在短短的数年内，顶级分析家们就被迫放弃早先有关中国军事的合理的、准确的研究结果，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们相信，这种分析是一个有益的提醒，说明研究处于封闭社会的中国军事存在着内在的困难，也说明北京在致力于发展其海洋事业。通过探讨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希望鼓励中国观察家不要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前景抱有成见，既不要贬低，也不要夸大。

^① Bernard D. Cole, “Right-Sizing the Navy: How Much Naval Force Will Beijing Deploy?” in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ed.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Carlisle Barrack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7), 552–553.

对中国海权的旧思维

回顾西方学术界自 1989 年以来的研究，为识别分析缺陷提供了一个基准，有助于解释对解放军整体，特别是中国海军评估滞后的原因。20 年前，研究中国海军发展的西方专家寥寥无几。其中许多人低估了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规模和速度，也低估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重创的、中国的科学和工程界的研究能力。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军队仍然是一个封闭、装备简陋、局限于陆地作战，并且拘泥于人民战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组织。

此后不到两年，美军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壮观展示，似乎为高科技战争时代中国军队的极度不足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许多专家自信地预言，在进入 21 世纪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放军在专业和硬件方面仍将处于落后地位。西方人对中国海军同样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在 1989 年以后非常常见，1990 年权威性杂志《简氏世界舰船》中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技术上落后且运作不成熟的海军，拥有最基本的命令和控制系统，缺少远洋经验”。^① 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的后续研究结论均维持这一评价。

1994 年，《国际安全》杂志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一长串困扰解放军海军的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缺乏现代化战舰和潜艇、资金短缺以及研究和开发能力薄弱。针对北京的军工复合体，作者迈克尔·加拉赫（Michael Gallagher）预测，“解放军非常可能

^① Richard Sharpe,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Surrey, UK: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1990), 79.

受困于比目前情况更糟的、过时的技术”。^① 换句话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中国军力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类似的，海军分析中心在 1996 年的一个报告中，低估了 2010 年之前中国部署区域性海军的能力。报告的题目是“海上人民战争”，这令人印象深刻。在考虑将国内生产、逆向工程和国外收购视为现代化的潜在途径之后，作者认为，这些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均不会让解放军海军在 2010 年之前有能力发展区域性舰队。报告预言，到 2020 年之前，一支“区域性的中国海军”将是难以置信的。^②

新世纪到来时，这种判断仍在持续。有关“中国是一个二流军事强国”^③ 以及“中国军力确实不是非常强大”^④ 等表述是解放军观察家们的传统观点。如前所述，观察家们相信，台湾在多年内能够独自抵御中国海军。顶级防务分析家们声称，台北占优势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强大的地理特征有利于防御，北京有限的军事选择使得台湾成为一个固若金汤的海岛堡垒。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在一篇挑衅性的文章中断言，“即使在最有利于中国的、有关冲突发生方式的假设中，中国也无法侵占台湾，并且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也无法做到这一点”。^⑤

-
- ① Michael G. Gallagher,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1 (Summer 1994): 181.
 - ② Christopher D. Yung, *People’s War at Sea: Chinese Naval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1996), 52.
 - ③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29.
 - ④ Bates Gill and Michael O’Hanlon, “China’s Hollow Military,” *National Interest* 56 (Summer 1999): 62.
 - ⑤ Michael O’Hanlon, “Why China Cannot Conquer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82.

更有甚者，在华盛顿的智囊团中有一种刻薄的说法广为流传，即中国除了“百万人游泳”渡过台湾海峡以外，几乎没有武力手段可供选择。^①

现在，正如我们所知，这些判断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然而，完全抹杀这些判断是不公平的。在这些作者做出判断时，公开的材料很少，而且限制也远远超过今天，如今的分析家们则可以从美国和中国获得大量的信息。因此，有必要承认，他们在某些重要领域是正确的，是他们确定了未来几年内可能继续存在的障碍和制约因素。

首先，解放军海军力量的整体增长肯定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力量区域平衡的根本性转变。对于水面舰队，中国似乎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实验过程。解放军海军通常对每种级别的舰船只建造数只，然后评估该级别的性能，作为后续级别舰船技术改进的基础。海军司令部显然还没有选定用于批量生产的舰船设计。因此，西方应注意北京建造更大规模近乎相同的驱逐舰或护卫舰群的迹象。这将是美国海军及盟国舰队未来不得不与之对抗的解放军水面战舰，这些战舰可能会快速建成。

其次，正如毛泽东所忠告的那样，胜利的真正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硬件。中国海军在“软件”领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培训、教育、航海技术以及包括战备在内的大量的其他技能。更重要的是，解放军海军从未面对过现代海战的严酷。解放军观察家间的一个普遍观点是，自从中越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已

① Phillip C. Saunders and Scott Kastner, “Is a China-Taiwan Peace Deal in the Cards?” *Foreign Policy*, July 27, 2009,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7/27/is_a_china_taiwan_peace_deal_in_the_cards.

经有三十年没有打过大规模战争，解放军海军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中国舰队在实战条件下对抗一支有能力的区域性海军时将如何表现是谁也说不准的，与美国海军对抗时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海军一直不愿与别国海军进行（超出肤浅的港口停靠和演习的）重大联合作战，这表明其缺乏信心，倾向保密，或两者兼有。

再次，中国海军力量的地域范围仍相当有限，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的影响力遍布全球。解放军海军仍专注于海洋拒止任务，用以对抗美国沿东亚海岸的制海权，它缺乏在蓝海环境中主张制海权的能力。但是，正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表明的那样，解放军海军已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贯穿中国海域、用以运输全球经济血液的关键运输路线。带着对柯庆生的歉意，我们认为中国拥有能够给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麻烦的航海工具，但能力却未曾以对称方式迎头赶上。^①

不过，总的来说，中国观察家们忽略了中国海军（更宽泛地说是中国海上力量）已处于重大转型门槛的许多关键指标。乐观的结论和俯视的态度持续了多年，而其他证据却被忽略了。因此，一些棘手的问题值得被提出。借用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话，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对中国海军力量的早期预测与其实际发展之间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为什么修改过时的估计需要这么久？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决策者有必要回答这些不愉快的问题，以免再次误读中国海军的发展并因而损害地区海上稳定。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4 (Spring 2001): 5-40.

解释分析盲点

作为解决这个难题的第一小步，我们大胆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西方分析家们过于傲慢，不肯将中国的过去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指导。最经常听到的历史言论是，缺乏航海传统使中国失去了海上力量的基础。像科尔所言，“中国海军规划者面对的是航海传统的缺乏：500多年前的航海并不构成有用的遗产，因为中国在此后几个世纪一直致力于内省的民族主义”。^①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狭隘解读。有关中国海洋历史的当代著作表明，中国王朝与海洋的接触远比原来认为的要丰富和密集。^②此外，海洋传统与海上力量之间是相关的，但不是因果关系。一个明显的亚洲例子是：海洋传统不能全部或部分解释日本海上力量的崛起，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数百年，内向型的群岛居民一直缺乏航海经验。到1894年，在明治维新30年后，日本帝国海军打败了实质

① Cole, *Great Wall at Sea*, 184.

② 参见 Peter Lorge,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5), 89 - 90; Ralph D. Sawyer, *Fire and Water: The Art of Incendiary and Aquatic Warfare in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4); Peter Lorge, "Water Forces and Naval Operations," 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ed.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David A. Graff,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31 - 135; David A. Graff, "Dou Jiande's Dilemma: Logistics, Strateg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eventh-Century China," 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n Ven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0), 77 - 104; Billy K. 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 - 13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Gang Deng, *Maritime Sector, Institutions and Sea Power of Premodern Chin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9)。

上更具优势的清朝舰队，并为其在 1904 ~ 1905 年与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决战做好了准备。在这次决战中，两支俄罗斯舰队被击沉。意志坚定的民族可以异常迅速地建造一支伟大的海军。

我们已在第三章中阐明，近 100 年前的德意志帝国与如今的中国在表面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一切。一个陆地强国未能转变成海洋强国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个陆地强国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地缘政治条件可能有助于中国向海洋的转变，帮助解放军对美国构成挑战，并且这种挑战比德国公海舰队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的挑战更广泛、更持久。

对于其他观察家而言，中国现代史是北京海上前景暗淡的另一个代表。19 世纪，清朝海军现代化胎死腹中，清朝统治低谷时期中国海军战败，这些都被认为是北京目前海洋事业的预兆。科尔在感叹中国的军工复合体状况不佳时称：“今天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方式与一百多年前李鸿章试图创建中国海军时采用的方式相同，都是通过以下三种不同途径来实现：本土生产、国外购买和对外国系统实施逆向工程。这在当时并不是非常有效，而在 21 世纪也不太可能会更有效。”^① 但是，清朝海军使用这三种途径创建了一支被认为现代化并且有能力的舰队。清朝海军的失败与物质不足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与航海技术不佳、军官缺乏进攻意识以及对手具有更高的锐气和技能有关。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中国分析家们如今将日本帝国海军，而不是清朝海军视为制海权的典范。帝王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反面教材。

还有一些人指出，对中国的工业能力以及科学和工程创造力而言，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和相关遗留问题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障碍。一位分析家在对 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努力进

^① Cole, *Great Wall at Sea*, 186 - 187.

行调查之后发现，中国对每项外国技术实施逆向工程和进行批量生产所花费的时间平均为 15 年。他从 40 年前的模式进行推断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不连贯的表现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下去。但是，当代中国既不是内部腐朽的王朝，又不是饱受激进思想运动困扰的革命国家，虽然过去的毛泽东和帝王时代对中国挥之不去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引起了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这些经验更加贴切，并且在我们思考历史先例时应被包括在分析组合中。同样，对那些不贴切的历史先例可以进行纠偏分析。

第二，一些贬低中国未来海上力量的论断给他们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们争辩说，对北京而言，全球性的蓝海海军完全是一个理想，因此，中国的野心以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仍将是微乎其微的。正如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和马丁·克莱伯（Martin Klieber）所指出的那样，“将购买现代海军舰只，特别是具备蓝海作战能力的舰只等同于扩大地缘政治的野心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① 这种口号可以归纳为没有航空母舰就没有威胁。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洞察意图（而不是作战能力）是一项充满重复和循环论证的棘手工作。

更关键的是，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表达的那样，中国并不需要通过对称的或全球性的竞争来挑战美国在亚洲主战区的驻军。北京不能在一对一的对抗中打败美国，并不妨碍解放军以马汉主义决战式海战以外的方式对美国海军造成巨大压力。马汉本人告诫美国，将其海军努力集中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美国在这

^① Anthony Cordesman and Martin Kliebe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orc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137.

些地区获得相对欧洲舰队的地区优势是可以考虑并且必要的。我们在第四章中详细说明了北京构想按照马汉的主张，中国海军在交战中如何致命打击美国海军的先进舰队的战术——尽管完全没有航空母舰以及相匹敌的武器。发展航空母舰对于中国海上实力而言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有关未来中国军力投送范围的辩论。正如一些人认为的，北京具有（或者缺乏）将制海权扩展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能力，使人们对中国海军的倾向产生怀疑。也就是说，由于解放军获取超出第一岛链制海权的能力尚且有限，因此北京海军的野心和能力并不值得关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永久的海上利益使得北京将注意力投向了南方和西南方——朝向印度洋，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太平洋中部。第七章详细介绍了北京在印度洋这一运输中国经济所需自然资源的必经海域，为培养一个宽松环境所做的努力。几乎没有理由预期中国会放弃在南亚的迫切地缘政治利益而去控制其东部的远洋地区。出于谨慎，中国会将有限的资源用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诚然，在美国区域战略的假设中，关岛被定义为美国军事力量的中心，以及进入中国海洋附近地区的起点，中国战略家们为关岛的突出地位而感到担忧。但是，中国对针对关岛投送压倒性的军力并无兴趣，它回避了与美国在海上开战的徒劳努力。2009年春天，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上将蒂莫西·基廷司令透露，解放军海军的一位高级官员曾提出，希望分治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太平洋盆地。^① 这位中国官员可能只是半开玩笑，但中国海权的逻辑

① Manu Pubby, "China Proposed Division of Pacific, Indian Ocean Regions, We Declined: U. S. Admiral," *Indian Express*, May 15, 2009,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 - proposed - division - of - Pacific - Indian - Oceanregions - we - declined - US - Admiral/459851>.

辑和规则均表明，这种分治接近中国和美国利益范围，分界线大约在第二岛链附近。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表明的，在使用源自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的作战理念发起致命打击之前，中国更愿意“诱敌深入”，允许敌军接近或进入第一岛链。

第三，一些评述建立在不可靠的假设之上。将美国的有效性和效率概念套用于中国海军发展是一种常见的模式。例如，有假设认为，解放军海军为了实现其目标，需要或多或少地复制美国尼米兹或福特级核动力航母（CVN）。这一假设导致一些人过早地得出结论，即，对于中国来说，所费资金难以承受并且过于复杂。虽然表面上来看的确如此——鉴于核动力航母是美国数十年航母经验的产物，中国制造它尚需时日——但是，这一推理并不准确。如果对反舰弹道导弹（ASBM）加以完善，解放军有希望建立一道防御屏障，阻止美国特混舰队进军亚洲。依靠这一屏障，更小、能力更低的中国小型航母也可以在亚洲周边地区执行任务。这些小型航母不需要冒险与10万吨级的美国航空母舰进行不对称的作战。它们还可履行许多其他职能，如胁迫性外交、展示军事力量，等等。在岸基军力迫使美国海军舰队保持在安全距离的前提下，这些小型航母不需具备舰队作战功能。

即使选择了大甲板的核动力航母，北京也可暂时使用少于华盛顿部署数量的航母战斗群，除非或直到其选择可与美国比肩的全球性海洋战略。这是在作战区域中作为防御方的优势。在穿行海域更少、更小的情况下，解放军海军的战斗准备就绪舰只与检查准备中舰只的比例可能暂时是二比一，而美国在训练、维修和部署周期中采用的这一比例为三比一。中国舰只的靠岸时间可能会更多，就如同郑和与他的舰队一样，在向东南亚和南亚民众重新宣示宗主权之后会定期返回东亚。如果北京在未来几十年内展现类似的面貌，解放军的航母舰队就不会有相同的磨损以及定期

检修的需求，其舰只在需要时才在港口内进行维修。将解放军海军活动限制在亚洲，将减少维持航母运转的费用和技术要求。解放军海军不可能承担与美国相同的作战要求，因此，也不需拥有和美国数量相当的航母舰队。

对于中国弹道导弹潜艇（SSBN）的辩论与航母争议有关。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讲述的，美国关于可持续水下威慑的假设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作战要求。根据北京的构想，比 14 艘编制的美国海军舰队更适度的弹道导弹潜艇舰队足以保证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我们认为，镜像作用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阻碍了创造性思维，以研究有关中国如何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弥补其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对劣势。

美国分析家们还将美国过去对手的行为和能力生搬硬套到中国。例如，观察家们对中国部署反舰弹道导弹的前景表示怀疑，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主要依据是，冷战时期苏联曾试图开发类似武器，但胎死腹中。一位前任美国海军情报人员认为，苏联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对核武器升级的担忧以及难以获得发射反舰导弹的替代平台而放弃了反舰弹道导弹。^① 这意味着，中国将会遇到相同的障碍和机会成本，因此这一部署也将被迟滞。

撇开事实不提，从莫斯科放弃其反舰弹道导弹计划到现在已经过去近四十年，目前可用技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莫斯科的历史先例经不起推敲。技术准入壁垒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所有战略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可以克服技术困难，苏联也将放弃反舰弹道导弹。作战和战略偏好等非物质因素

^① T. A. Brooks, "Comments and Discussion," 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35, no. 6 (June 2009), 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archive/story.asp?STORY_ID=1898.

可能会促使他们这样做。与此相反，中国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倾向，这将促使他们执着地寻求反舰弹道导弹，而不考虑作战效能是否较低。我们在第五章中认为，反舰弹道导弹与作战直接相关的独特性（包括其相对低调的政治形象）加大了该技术对中国的吸引力。是什么使得一个武器系统“足够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第四，分析家们习惯于低估中国的海军潜力，正如同他们习惯于夸大美国在亚洲的作战能力一样。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开始就美国在该地区战略地位发出警报，尽管对美国军队在战时救援台湾的能力感到绝望，但是，罗伯特·罗斯仍坚持认为，美国海军将保持较大的领先地位，中国不会形成任何挑战。罗斯承认，美国的海军“再也不能保证航空母舰的安全”，但是，美国正在制定适当的对策，确保其有能力向亚洲海域投送军力。在反潜作战方面，他声称：“由于加大了资金投入、改进了技术以及在和平时期加强了对中国潜艇的监视，美国航母战斗群跟踪这些潜艇的能力以及美国海军的反潜能力都在不断提高。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反电子战能力还能够干扰解放军海军的侦察能力。”^①因此，在美国海军力量不得不“与中国海岸保持更远距离”的时候，罗斯教授使人确信，“对美国行动造成的此类水下问题并不会显著影响华盛顿向海洋战区投送优势军队的能力”。^②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战略家们是马岛战争的狂热学徒，通过这场战争看到英国航空母舰竭力在远距离保持相同出动率，他们将对这一观点持有不同意见。

① Robert S. Ross, "Myth,"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 August 25, 2009,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2022>.

② Robert S. Ross, "Myth,"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 August 25, 2009,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2022>.

我们在几方面对罗斯的预测有不同看法。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海岸附近随意作战，则说明中国的反介入能力和战略相对主要假想敌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如果我们将与中国海岸保持“更远距离”理解为不进入第一岛链内外海域（本质上就是东亚沿岸的所有水域），那么，美国海军还可以向哪个海洋战区投送军力就不得而知了。美国海军尚未部署航母攻击机或其他武器，这些武器的作战半径足以让航母战斗群使用相同的火力攻击更远的目标。与此同时，远程、有效载荷大的 A-6“入侵者”攻击机已经在数年前退役。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A-18 E/F 超级大黄蜂战机作为所有舰载机联队的核心，与前几代攻击机相比，其作战半径有所减小。航母打击范围缩小，意味着它必须冒着更接近海岸的风险才能完成相同的任务。它的战斗力相应地减弱了，同时它目前的缺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如果美国海军不再能够为其航母提供防御，那么，解放军海军已经处于在近海海域实行海上拒止的边缘，局部海域的控制权将会出现在北京的眼前。而海军共同体并不认同罗斯对美国的信心，即美国有能力掌握亚洲的制海权。罗斯承认，美国无法确保航空母舰的生存。虽然这是近乎神圣的使命，但这种说法对于被委以管理西太平洋重任的战区舰队指挥官来说，并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我们在第八章的分析中强调了海上部门所面临的困境，即，在预算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既要承担高端的常规任务，又要履行治安职能。借用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话来说，美国海军如何管理其“体面的衰落”，是未来美国在亚洲的海洋战略的中心。^①

① Robert D. Kaplan, "America's Elegant Decline," *Atlantic*, November 2007,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711/america-decline>.

第五，时间就是一切。海军和陆军的现代化计划需要投入巨资。类似军舰的大国防项目，其生命周期从研发到批量生产、从正常服役到退役，长达几十年。因此，在世纪之交以后，解放军作战部队中出现的许多新武器必定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研发的，而当时的西方观察家们能利用的只是参差不齐的公开信息。事实上，这些计划是保密的。解放军在过去十年中引入主要武器系统的速度表明，这些武器系统是并行开发的，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实现武器技术跨越式发展。

然而，分析家们并不知道，当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21 世纪初期完成各种著作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处于发展历程中的拐点。因此，在解放军的投入和努力获得成就之前，分析家们很容易盲目低估中国的军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兰德公司等机构仅在 2005 年左右，当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冲击波开始爆发时，才开始修改他们的评估。我们自身也没有避免此类分析陷阱和谬误，唯一可以确定无疑的预测是，我们的一些见解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做前瞻性思考时，必须铭记迈克尔·亨德尔（Michael Handel）对战争的描述（我们还可以加上所有竞争性的人类事务），战争是交战双方争夺比较优势的持续互动过程。^① 预测是一件需要去争取的好事，但研究亚洲这个最具活力地区的国际关系，清醒才是最好的态度。

稍稍审视针对中国海上崛起的辩论会发现，强调马汉的海权原理，排斥其治理逻辑是危险的。诚然，如同德国和日本在推崇马汉理论的时期一样，海战规则有可能在中国的战略思考中胜出，从而推动中国海洋战略向不祥的方向偏移。中国绝不是第一

① Michael I.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3rd e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117.

个热衷追求优势武器或海洋蛮勇的国家。但我们不应以为情况总是如此。无论如何，海战战略逻辑与基本原理之间发生倒置是有可能的，这为我们提供了追踪中国战略发展的另一路径。如果中国话语偏离了介入逻辑，转而以武器系统本身为中心，这对美国及其盟国将是一个麻烦的征兆。

在此之前，最保守的假设是，中国的航海命运将由海权逻辑，而不是各种海军武器的技术规格来决定。在辩论中使用马汉关于海战的第二柄三叉戟的同时，引入马汉关于商业、政治和军事实力的第一柄三叉戟将极大地丰富有关中国海权的西方话语——那些随舰船下海的美国人和亚洲人的境况也会因此变得更好。

后 记

翻译并出版一套“海洋战略译丛”，系统介绍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海上力量崛起以及国际秩序变革的作品，是我们在承担中国社科院亚太国际关系重点学科建设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和愿望。

从21世纪初开始，海洋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权重日益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以及其他涉海纠纷不断升温。如何处理海上摩擦，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课题。在国内相关研究展开的同时，出于对中国如何使用力量的困惑，国外学界对于中国海洋战略、中国海军发展、中美海上力量与战略博弈的关注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大量相关著作迅速面世。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有选择地翻译有关海洋战略的国外著作有助于国内学界掌握相关议题的研究前沿，有助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认知。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为中国民众提供系统化的知识，增强对海洋安全战略的理解。

我们最早设想在三年之内完成整个译丛工作。但是，在翻译、出版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与阻力，幸得来自各方的支持和鼓励，第二本译著《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

与美国海上战略》终将付梓。本书翻译工作分别由张洁承担中文序，钟飞腾承担序言、第一、第二、第三章，黄杨海承担第四、第五、第六章，李志斐承担第七、第八、第九章，全书由张洁、钟飞腾校译。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必须诚挚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院长的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丽副总编、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恽薇主任、许秀江编审、王婧怡和刘宇轩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尤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部张蕴岭主任在百忙之中为译丛作序。

我们期待着后续的译著能够尽早出版。

是为后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

张洁

2014年3月6日

红星照耀太平洋

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红星照耀太平洋》将会成为研究中国海权崛起的鼎力之作。它篇幅不长，但内容详尽，它观点平衡，但言无不尽。在清晰的叙述中充满着热情。这不是一本关于海军问题的枯燥论述，而是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地理意识。

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

美
国的海
军已经在西
太平洋地区维持
了近70年的统治地位，
但是，中国海权稳定而全面的
崛起将很快会对这一现状构成
根本性的挑战。在这本著作中，吉原
恒淑和霍姆斯精确地分析了一场即将到来
的海军变革，当中国的控制能力延伸到其所有的
沿岸海域和台湾时，事实上是整个太平洋海域内的第
一岛链时……每一位美国海洋战略家和海军指挥官都期待
阅读这本至关重要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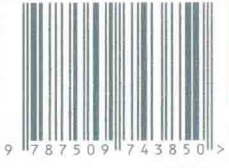
詹姆斯·库尔斯 (James Kurth) —— 斯沃斯莫尔学院与外交
政策研究所，克劳德·斯密斯 (Claude Smith) 荣誉教授

随着中国海权力量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正在发生转变，这一现象将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作者通过深入而专业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扩张的动机不必然怀有恶意，而且美国也不会自动地那样认为，但是，美国必须对这种挑战加以持续关注。

杰弗里·梯尔 (Geoffrey Till) —— 英国三军联合指挥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防务系海上研究教授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4385-0



ISBN 978-7-5097-4385-0

定价：49.00元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